恰巴耶夫

富尔曼诺夫著



封面设计：陶雪华
封面画、插图：伍必端



书　号：10208·73
定　价：1.45 元

〔苏联〕富尔曼诺夫著

恰　巴　耶　夫

郑泽生　陈恩冬　陈明秀　耿龙明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Д. ФУРМАНОВ

ЧАПАЕВ

据Д. ФУРМА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I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0) 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恰巴耶夫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248,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18

198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2,000

书号 10209·73 定价 1.45元



作 者 像

前 言

长篇小说《恰巴耶夫》是苏联作家德·安·富尔曼诺夫的代表作。富尔曼诺夫一八九一年生于劳动人民的家庭，从小喜欢文学，在中学时代，阅读过大量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喜爱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的诗篇，崇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一九一二年，考入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大学时期，高尔基的作品对他影响很大。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富尔曼诺夫弃学从军，在前线的救护列车上当看护兵。他在前线两年中所接触到的黑暗现实：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沙俄军官对士兵的残暴压迫等，加深了他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认识，促进了他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思想上的进步。一九一六年秋，他毅然离开军队，回到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在当地的工人补习学校里当一名教员。

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富尔曼诺夫积极参加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工作。他经常在群众大会上演讲，并深入农村做宣传鼓动工作。他一度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政党的影响。后来，在工人阶级、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是伏龙芝的帮助下，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逐渐摆脱了资

产阶级政党的影响，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一九一七年八月，他被选为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委员。十月革命时期，他担任过当地革命司令部的主席，制止了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资产阶级分子所发动的邮电局的罢工，迅速恢复了革命秩序。一九一八年富尔曼诺夫参加了共产党。由于他忘我地工作和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先被选为省执委会副主席，后为省党委书记。

一九一九年初，为了击退白匪军的猖狂进攻，富尔曼诺夫带领一支工人队伍去支援东部战线。他曾担任恰巴耶夫师的政委，与著名的战斗英雄恰巴耶夫共同战斗。同年八月，他被调到土尔克斯坦战线政治部工作。一九二〇年三月，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土尔克斯坦战线的全权代表。他曾率领少数共产党员深入维尔内依(现为阿拉木图)，平息了武装叛乱，巩固了塞米列契斯克省的苏维埃政权。

一九二〇年八月，富尔曼诺夫被调到高加索第九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兼任红色陆战队的政委，胜利地完成了歼灭从克里米亚入侵库班地区的弗兰格尔匪帮的任务，因而荣获红旗勋章。同年十月，富尔曼诺夫担任第九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一年又被任命为第十一军的《红色军人》报主编。不久，红军击退外国军事干涉，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富尔曼诺夫被调到莫斯科国家出版局文艺部工作。在此期间，他专门从事创作，写了不少文艺作品。富尔曼诺夫还参加了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曾担任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书记和全苏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执行局委员。他跟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和文艺团体进行斗争，坚决捍卫了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他不幸被脑膜炎夺去了生命，当时年仅三十四岁。

鲁迅先生在《〈一天的工作〉后记》中谈到富尔曼诺夫："他墓碑上刻着一把剑和一本书；铭很简单，是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共产主义者，战士，文人。"的确，富尔曼诺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战士，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艺战士。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写作，参加革命后，他的创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日臻成熟。甚至在紧张的国内战争年代，在戎马倥偬中，他也没有放下过笔杆。他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和特写。他的作品的体裁丰富多样，有诗歌、特写、政论、随笔、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及文艺评论等。这些作品有的反映革命前的生活，有的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九二五年富尔曼诺夫着手写一部反映二十年代苏联文艺界斗争和党在文艺战线上如何领导了这场思想斗争的小说《作家们》，由于作者过早去世而未能完成。在富尔曼诺夫的整个创作中最著名的作品是中篇小说《红色陆战队》、长篇小说《恰巴耶夫》和《叛乱》，其中《恰巴耶夫》是他的代表作，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恰巴耶夫》这部小说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一九一九年春，外国干涉者利用盘踞在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的三十万反革命军队为主力，向苏维埃政权发动了第一次进攻，他们越过乌拉尔山，妄图攻占莫斯科。同时，在北高加索的邓尼金和波罗的海的尤登尼奇也配合高尔察克发动了新攻势。苏联共产党发出了"一切为了东线"的战斗号召，党团员和广大工农

群众纷纷响应，竞相奔赴前方。《恰巴耶夫》所反映的正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到八月在苏联东线上的战事，作者形象地再现了恰巴耶夫师所处的历史环境。当时在东线战场上作战的，大多是由农民组成的红军部队，恰巴耶夫师就是其中的一支部队。穿上军装的农民战士，在恰巴耶夫的领导下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可是他们自由散漫，游击习气很重。苏联共产党派了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支队和政治工作人员去改造这支半游击式的队伍。师政委克雷奇科夫到任后，深深感到，要使每个指战员都成为有觉悟的革命战士，首先必须在师长恰巴耶夫身上下功夫。农民出身的恰巴耶夫，确实多谋善断、机智灵活、骁勇善战、视死如归，在南征北战中所向无敌，使凶狠暴戾的白匪军闻风丧胆，不愧为优秀的军事将领。但他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对党的政策也懂得不多，有时甚至过于自信。克雷奇科夫把恰巴耶夫逐渐引上了正确的道路。恰巴耶夫师也在工人支队和其他政治工作人员影响下，不断成长，成为一支有觉悟的革命军队，在粉碎高尔察克和哥萨克白匪军的战斗中，多次获得胜利。可是，在勒比辛斯克附近一役中，恰巴耶夫的师部遭到突然袭击，恰巴耶夫本人不幸牺牲。但是恰巴耶夫师的指战员们仍能重整旗鼓，投入新的战斗。作者不仅出色地描写了这支队伍的勇敢精神，同时也描写了他们从一支散漫的、无政府思想浓厚的队伍，在战争中不断锻炼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的过程。

这本小说突出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武装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和对农民群众的影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有典型意义的。由于农民不是近代的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不可避免地

李

具有阶级局限性。因此农民的武装斗争要取得胜利，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工人阶级也只有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小说真实地描绘了恰巴耶夫师的战士们逐渐懂得组织纪律的重要，并成为有政治觉悟的战斗集体的过程。

小说中，党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员、政治工作人员来体现的："一个政治委员穿得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朴素，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行军时，和战士们一样受累，在战斗中，总是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冲在前面，优秀的政治委员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党保证了这支队伍的政治方向，同时也改造了这支农民队伍。他们不只对自己的作战部队不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而且还经常对前线附近的居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在解放的土地上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就体现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全书贯穿着党的思想、党的政策和党的立场。在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坛上，涌现了许许多多描写武装斗争的作品，可是有些作家把它们写成是一种自发的、无政府的运动，而富尔曼诺夫在《恰巴耶夫》一书中却正确描写了党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年轻的苏维埃文学面临的新任务，是要求作家们创造出新的苏维埃文学作品，塑造新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许多苏联作家进行了创作探索。有些作家写了国内战争中的英勇事迹，表现了人民的英勇精神，可是他们笔下的主人公的形象往往是某些概念的化身。有些作家还把共产党员刻划成抽象的、公式化的"穿皮茄克"的人。关于新的人物如

何塑造，富尔曼诺夫作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是如实地描写恰巴耶夫,连他的一些细节、一些过失,以及整个人的五脏六腑都写出来呢,还是按照一般写作模式,创作出一个虚构的人物,也就是说,虽然形象很鲜明,但是把他许多方面都割弃掉呢?"最后他选择了前一条道路来塑造这位英雄人物。这个人物是通过真实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令人信服的形象体现出来的。

恰巴耶夫深得人民群众和红军战士们的爱戴和崇敬，这主要是由于他对人民的解放事业忠心耿耿，日夜思索如何打败敌人,以及他跟战士们同甘共苦,密切联系群众和以身作则的作风。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卓越的军事才干，使他能以正确判断敌情，制订出周密的作战计划。恰巴耶夫在战场上总是身先士卒，什么地方最危险，他就冲向那里。他善于鼓舞士气，用胜利和光荣感去激发他们的斗志，因此在他的领导下，红军立下了赫赫战功。由此，他获得了极高的威望，成了人民敬爱的传奇人物。

富尔曼诺夫从各方面刻划了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恰巴耶夫对革命是忠诚的，作战是英勇的，然而英雄身上存在不少缺点。他在政治思想上是幼稚的，对党的政策有时是无知的。他入党已一年多了,可是对党纲所知无几,跟宗教也没有决裂，有时还要用右手在胸前画十字。他看问题的方法有时是片面的；他认为所有的哥萨克都是坏人，都是反动派；他声称不进军事院校，也能带领大部队打仗；他认定每一个旧军官都不可靠。他认为作战取得胜利主要靠拿武器的前方战士，而"司令部"是不拿枪杆子的机关，因此他非常讨厌"司

令部”。

富尔曼诺夫认为:“恰巴耶夫的缺点也和他的优点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的确，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在一定时代、一定阶级地位中生活，恰巴耶夫也是这样。恰巴耶夫是农民群众的代表，在他身上体现了农民群众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切不可抑制的、盲目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同时也集中了当时农民群众的勇敢和英雄气概。但由于他缺乏文化知识和很少学习马列主义，因而对党的政策和革命的道理就懂得不多。书中虽对他落后和无知的一面作了较多的描写，但作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着墨的。与此同时，作者又从发展的角度来揭示恰巴耶夫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描绘了恰巴耶夫的成长过程，描述他怎样克服过去的偏见，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新的苏维埃人的性格和品质怎样在他身上获得了胜利。

富尔曼诺夫在这本书中还塑造了另一个典型人物——师政委克雷奇科夫的形象。作者笔下的克雷奇科夫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政治工作人员。他担任恰巴耶夫师的政委后，很快就弄清了这支部队的特点。他认为要帮助恰巴耶夫，首先要取得他的信任。克雷奇科夫团结和教育这个游击习气很浓厚的农民军代表人物，不是无原则的迁就，而是以党性作基础的。他从爱护同志、关心同志出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时，如果发现对方有错误倾向时，他坚持原则，分清是非，因势利导，纠正错误。克雷奇科夫在教育方法上是委婉、机警、谨慎的。他巧妙地纠正了恰巴耶夫在宣传党的政策中所犯的错误，纠正他对“司令部”和哥萨克的看法。克雷奇科夫耐心地制止恰巴耶夫有时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倔强行

为，抑制他独断独行的不良习惯，警戒他避免作出轻率的决定。由于经常向他进行一系列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克雷奇科夫终于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他们思想上能够一致，在工作上很快成了亲密的战友。

此外，克雷奇科夫在和恰巴耶夫的相处过程中，自己也在不断成长。他第一次参加战斗时有些胆怯，他便以恰巴耶夫为榜样，逐渐克服了恐惧，因而对战斗环境逐渐习惯起来。经过短短六个月的时间，他便感到自己和以前判若两人——他成长了很多，他的毅力也大大增强，经过了种种考验，能处理各种困难问题。作者刻划了他的思想境界，他的举止行为，深刻地描绘出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形象。

富尔曼诺夫把恰巴耶夫和克雷奇科夫刻划得丰满动人，表现了他们的进步、成长过程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后胜利，这在二十年代初的苏联文学中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部小说不是二十年代文学中描写新型英雄人物的唯一优秀作品，同它媲美的还有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和法捷耶夫的《毁灭》等，但《恰巴耶夫》一书发表于一九二三年，比《铁流》（一九二四）和《毁灭》（一九二六）都早一些。

对白匪军的残暴，小说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控诉，这就从反面教育了红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大大增强了对白匪军的仇恨，百倍英勇地投入彻底消灭敌人的战斗。作者十分动人地写出了红军战士们艰苦卓绝的行军和斗争场面。有两个在战斗中失掉双腿的红军，爬回自己的部队，不肯离队，在后来的战斗中还当了机枪手。恰巴耶夫的壮烈牺牲、西佐夫的最后奋战，都反映了那个时期极其坚强的革命

精神。正由于红军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和人类的解放充满了信心，所以才能在猛烈的炮火下奋不顾身，连续苦战。当斗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高尔基给予这本小说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本“很有教益的书”。这本书深受苏联读者的欢迎，不断再版，教育了广大读者。被译成各国文字后，又以同样的力量打动了千千万万外国读者的心弦。富尔曼诺夫所塑造的恰巴耶夫和克雷奇科夫的形象，大大地鼓舞了西班牙人民为反对法西斯而进行战斗。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战士们曾用恰巴耶夫及其政委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队伍。在朝鲜，人们曾用恰巴耶夫的名字来称呼最受爱戴的战士。这本小说于一九三六年被介绍到中国，深受我国读者欢迎。恰巴耶夫及其战士们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不仅在我国民主革命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同样能激励我们奋发图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英勇斗争。

江 文 琦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一 工人支队

车站上拥挤不堪，人，黑压压的一片。月台上，红军战士拉成长长一列横队，好容易才拦住欢腾的、叫嚷不休的人群。伏龙芝召集起来的一支工人队伍，今天半夜里就要去打高尔察克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各工厂的工人都聚集到这里，送别他们的伙伴、兄弟、父亲、儿子……这些新“兵”显得那么笨手笨脚、天真烂漫，使人觉得有点可笑，其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穿上军大衣哪！大衣穿在身上，别别扭扭，很不服贴，鼓鼓囊囊的，好象发了酵的面团。但哪有工夫管得了这许多呢？它无损于这些小伙子们威风凛凛的英姿。瞧，这一个，用皮带把腰扎得象“高脚杯”的颈子，简直透不过气来，可是小家伙走起路来却挺神气，鞋后跟踏在地上噔噔直响；再瞧那一个，大大咧咧，满不在乎，摆出一副老行伍的架势，刀歪歪斜斜地挂在腰带上，一只手按着刀柄，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和旁边的人争论不休；另外一个，腰的左边挎着一支手枪，右边挂着两颗木柄手榴弹，子弹带象一条蛇似地缠在腰里，他从月台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急速地走来走去，想在亲戚朋友和熟人们面前炫耀炫耀他那威武的仪容。

那黑压压的一大片工人，怀着骄傲、喜爱的心情，兴致勃

勃地望着他们，谈论着他们。

"他们能学会打仗的，老弟，能学会的……一到前线，他们就会尝到他妈的打仗的滋味……"

"可不是吗，上前线可不是躺在摇篮里玩啊……"

这时，大家动起来了，笑起来了，一个个朝前伸长了脖子。

"瞧，那个捷连季，你都认不出来了，他在溶铁车间里的时候，满身油污，象根灯芯子，可现在，你瞧……可神气哩！……"

"没说的，走起路来两手叉着腰……瞧那把军刀，跟将军的一模一样，挎在腰上，晃晃荡荡。"

"捷连季，"一个人逗笑地喊了他一声，"快把军刀塞到口袋里去吧，别让哥萨克抢去。"

站在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别让你妈拿去当菜刀……"

"捷连季，别跌一跤把军刀碰断……"

"小心别把你的小手指给削掉……你这个半吊子将军！"

"啊哈，啊哈……喝、喝、喝，哈、哈、哈……"

捷连季·包奇金是个织布工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满脸雀斑，一头棕黄色的头发。他听了这些玩笑话，回过头去，和颜悦色地瞅了一眼，感到有点难为情，急忙抓住歪到一边的军刀……

"我要……给你们点尝尝，"他涨红着脸，朝着那群人挤出这么一句威吓的话。他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回答，也不知道怎样去对付这一连串热情的玩笑和打趣。

"尝什么呀！？捷连季，什么呀？……"那些打趣他的人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说，"来，娃娃兵，给你点瓜子嗑嗑吧！你这件

军大衣大概从牛犊子身上剥下来的吧……啊哈……喝，喝……”

捷连季面带笑容地向车厢走去，消失在一群灰色的、乱哄哄的红军战士中间。

大家一看到那些笨手笨脚的战士，就取笑一阵。刻薄的嘲笑，辛辣的俏皮话，如滂沱大雨，倾泻下来……然而不一会儿，又谈起正经的、严肃的事情来。情绪变得很快，话锋也转得很快——处处笼罩着神经质的、紧张的、过于敏感的、惶惶不安的气氛。人群中三五成堆地议论纷纷。

“假如需要的话，我们能把魔鬼从地狱里揪出来……大家不是抱怨过吗？什么没有鞋穿呀，没有大衣穿呀，没有子弹……可现在，你瞧……”说话的人用手向车厢那边一指，表示他说的是红军，“你看，装备了整整上千人……”

“你说多少？”

“是的，看样子有千把人，那边还在继续召集呢，而且什么都准备好了。老弟，只要肯干，就有办法，眼下哪有时间说空话，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困难的时候呗！有啥说的，”一个人用低沉嘶哑的声音说。

“哼，还能不困难？高尔察克这帮龟孙们拚着命往前窜，你看，乌拉尔那边也不太平了……”

“唉——”一个老头儿叹了口气，他又瘦又小，穿了件短皮袄，冻得直哆嗦。他满脸皱纹，活象一块干蘑菇。

“是啊……眼下咱们的事情会到咋个地步呢？情况实在太糟了，”一个人用单调的、忧郁的声音抱怨说。

有个人郑重而严肃地回答：

"谁能知道呢，活儿不做不出来，事情总得有人去搞。你瞧，一搞就集合起上千个小伙子！……老弟，这可是件大事，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真正了不起啊！……你没有听报纸上说过吗，军队里工人少，可是需要……工人比别的什么人都有见识……眼前就是个例子，拿帕夫卢什卡·洛帕里来说吧，真不愧是条硬汉子……有头脑，干什么事都砸不了锅！"

"那还用说，当然……"

"不光是男子汉，你看看那个玛尔芙莎，那个'皮茄克大姐'，也不是个等闲的婆娘，一般的男人还不是她的对手哪！"

玛尔芙莎是个纺织女工，她正从旁边经过，听到有人议论她，就很快转过身来，走到说话人的跟前。她宽肩膀，大脸盘，一双天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有几颗麻子，虽说已经三十五岁了，但看上去要年轻得多。她穿着一件崭新的士兵服：马裤、皮靴、军上装，头发剪得短短的，军帽扣在后脑勺上。

"你为啥惹我？"她走过来问。

"我干啥惹你，玛尔芙莎，是你自己找上来的。我是说，我们的'皮茄克大姐'不象个女人，倒象是一匹没笼头的野马……"

"你是说，我是匹野马？"

"那还能是谁？"突然，他改变了玩笑的口吻，说："我是说，你倒真象个战士……就是这么句话！"

"象也好，不象也好，需要……"

"当然是需要……"他沉默了片刻，又补充了一句："那末，你那一摊子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自己家里那些杂七杂八的事儿怎么办？”

“自己的事算什么……”玛尔芙莎两手一摊说，“孩子都放到孤儿院去了，要不放到哪儿去啊？”

“是啊，放到哪儿去啊……”对方同情地说。

接着他沉重地叹了口气，用同情的、低沉的声音说：

“嗯，我们会照料他们的，会照料他们的。玛尔芙莎，你不要难过，我们一定会照料他们的……放心去吧，我们留在这里，除了为你们做点事儿，还有什么事可干呢？……也许，到时候，我们也要去……是吗？”

“就是嘛……”玛尔芙莎点了点头，“这是毫无疑问的……难道一支队伍就行了吗？……你们准会去的。”

“那些小伙子们好象也有点那个……”对方把头向车厢那边一摆说。

“他们有什么呢，”玛尔芙莎回答说，“就巴望早点儿出发呢！他们说，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光是听说出发，出发，干吗老耽在这儿不动？……喂，安德列耶夫！”玛尔芙莎向一个走过去的人喊了一声，“关于出发的事，那边讲起过吗？”

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一副苍白的面孔，身材匀称，动作灵活，戴着一顶尖顶军帽，穿了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这就是安德列耶夫。他是彼得堡的钳工，不久前才来到伊万诺伏的。他踏着轻健有力的步子走过来，好象向首长报告一样，走到跟前，鞋后跟咔地一碰，举手行了个军礼，脸上不带一丝笑容，那漂亮而又严肃的眼睛，直盯着玛尔芙莎，报告说：

“荣幸地报告长官，火车再过四十分开出！”

玛尔芙莎扯了扯他的袖子说：

"咱们要不要向大伙儿去告别一下呢？伙伴们都在等着哪，总要讲几句告别的话吧，你看呢……克雷奇科夫在哪儿？他钻到哪儿去了？"

安德列耶夫又举手行了个礼，仍然用同样的口吻，不动声色地一板一眼说：

"报告长官，他正在用茶涮肚子呢！"

玛尔芙莎打了一下他的手背，说：

"去你的，小鬼，你昏了头，看你把我当作什么将军啦……"

安德列耶夫突然变了另一副模样，用他本来的清脆的嗓音对玛尔芙莎说：

"亲爱的玛尔芙莎……"

"啊？"

"亲爱的玛尔芙莎，你自己要不要……嗯？"

安德列耶夫噘起嘴唇，瞪大眼睛，富有表情地做了个鬼脸。

"要什么？"玛尔芙莎瞅了他一眼。

"你自己要不要也来说两句呢？"

但是玛尔芙莎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她踮起脚尖，从人们的头上望过去。

"瞧，他们亲自来了，大概……"

站在旁边的人也都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朝玛尔芙莎看的方向望过去。那边有三个人，在众人簇拥中走了过来。看得最清楚的是洛帕里，他头发又黑又长，有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一副瘦长的身材。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好象自己的一只脚

踩在另一只脚上，动作不太利落，笨手笨脚。

他身边是叶莲娜·库尼齐娜，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是个纺织女工。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讲起话来，简单扼要，条理分明，动听有力，在纺织工人的集会上经常能听到她的讲话。她还没有戴上尖顶军帽，只包了一块头巾，身上穿的也不是军大衣，而是一件薄薄的黑大衣。眼下正是朔风凛冽的正月天气啊！在她那苍白而又严肃的面庞上漾着内心蕴藏的喜悦。

叶莲娜身旁是费多尔·克雷奇科夫，他不是纺织工人，而且根本不是工人。他是不久以前从莫斯科回来，有事耽搁在这里的。他在这儿住了下来，在几处教私学，每天跑东跑西，象只小鸟一样，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上过大学，参加革命以后，很快就发现自己是一个蛮不错的组织者，他在大会上讲起话来热情洋溢，引人入胜，充满激情，虽然不一定每次都讲得同样有道理。工人们跟克雷奇科夫很熟，都喜欢他，把他当作自己人。

站在月台外面的一群人，一看到库尼齐娜、克雷奇科夫和洛帕里，立刻向前拥来，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看来他们马上要讲话了。”

“很快就出发了……”

“是啊，快点告别吧，也该睡觉了。”

“好，咱们现在去跟他们吻别一下，就算了事了。”

“听，铃响了。”

“是第一遍铃吧？”

“第一遍。”

“十二点整开车……”

“你看，他们就是要在这深更半夜里出发。”

这群人，有的穿着油污的短大衣；有的穿着破烂的短皮袄，皮领子斑斑块块，好些地方都脱了毛，袖子很短，胳膊肘那里都磨破了；还有的穿着用厚呢做的、平呢做的、或用皮子做的黑色短茄克。真是别具一格啊！

车站并不大，容纳不下多少人。机灵一点的人，有的跨上栅栏墙，有的爬上窗台，有不少人爬上车站两侧的耳房，向下探着头，瞪大眼睛望着下面的人群；还有的人弓着身子，吊在门上面的拉手上，有些人抓着行李架，占据了车厢的过道；也有些人爬到车顶上，站在扶梯上或踏脚板上……真是拥挤不堪。人人都想挤到前面去，离讲话人要站的那只箱子近一些。人群中，有的挤得尖叫，有的哼哼喘气，有的轻声埋怨，有的互相吵骂。不一会，克雷奇科夫出现在箱子上，他穿的那件军大衣，又旧又破，还是从上次大战传下来的呐。他没有戴手套，手冻得厉害，他不时地把手插在口袋里，伸在怀里，再不然把通红的、冻僵的拳头放到嘴边呵呵气。他的面孔比平时更苍白了。最近这两夜，他睡得很少，又睡得不好，整天价东奔西跑，忙得不可开交，实在太累了。他那一向清脆响亮的声音，今天变得有点瘖哑，瓮声瓮气，好象是从洞穴里传出来的。

克雷奇科夫第一个发言，他代表支队向纺织工人们告别。天气很冷，人们都冻僵了，要抓紧时间，话要简明扼要！

他向四下扫了一眼，黑压压的人群，一眼望不到边，最边上的人已经站到有几盏瓦斯灯照明的广场的外面去了，他觉得在他面前站着的几千人的后面，紧接着还有几千人，淹没在漆黑的夜色里，而在这几千人后面又有几千人，直至无穷无

尽。在这最后时刻，他突然感到非常难过，这黑压压的人群对他来说是多么可爱，而又多么可贵，同他们分离又是多么痛苦啊！

“我还能再看到他们吗？……我还能再回来吗？……大伙儿什么时候再能回到家乡？……将来我是不是也能回到这儿，象这几年一样常常向他们讲话呢？”

克雷奇科夫心中充满悲伤的离情，没有能够好好地考虑自己简短的演说，也不知道该讲些什么，就大喊一声，声音特别高，他从来没有象这样喊过：

“工人同志们！我们在一起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最后一遍铃声一响，我们就出发了。我代表支队的全体红军战士们，向你们告别：再见了！记着我们吧，记着自己的弟兄们，要记着我们上哪儿去了，做什么去了。你们要准备好，只要一声令下，你们就跟上来。不要和我们断了联系，经常派人送个信来，尽你们的可能，从你们微薄的收入中拿些钱给我们买些东西带来。你们要帮助战士们！同志们，前方在挨饿，很艰苦，比这里更艰苦，你们不要忘记这一点！你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有许多人丢下了无人照管的、生活没有保障的一家人，丢下了难免要挨饿的儿女。你们不要不管他们。我们在战壕里、在行军中、在战斗中已经够苦的了……如果我们再听到我们的家属由于无依无靠，没人照顾，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将会感到百倍的痛苦……临别前还有一句话要向你们讲：你们要好好地工作，更加同心协力地工作！你们都是纺织工人，应该明白，你们在伊万诺沃织的布越多，在乌拉尔、奥伦堡的白雪覆盖的草原上就越温暖，凡是你们的产品运到的地方就越温暖。

好好地工作吧，并且要牢牢记住：要取得胜利，不能单靠我们的刺刀，而且还要靠你们的劳动。我们将来是不是还能见面呢？我们相信是一定能见面的。即使我们不能再见面，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革命是不计较个人牺牲的。再见吧，亲爱的同志们，我代表支队的全体红军战士向你们告别：再见吧！”

仿佛白雪覆盖的草原上刮起的暴风雪在怒号，人群流着眼泪高声地回答：

“再见吧，同志们！一路平安……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喊声停息，接着而来的是一片悲痛的寂静。过了片刻，突然人群中有人悄悄地说起来：

“叶莲娜……叶莲娜来了……库尼齐娜……”

叶莲娜·库尼齐娜站到了箱子上，她那一双美丽的、浅褐色的眼睛，显得更深了，而且完全变黑了。她很利索地用手掠一掠面颊和两鬓，把散垂在头巾外面的几绺头发掖好，然后用两只手把头巾压紧。

接着她用低沉的音调，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同志们！”

鸦雀无声，静候她讲话的人群都朝她伸过头来。

“我临别前要向你们讲几句话。同志们，我们那里是前方，而你们这儿，比方说，是后方，前方没有后方不行，后方没有前方也不行。互相支援，咱们大伙儿要互相支援——这就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如果我们晓得我们的背后很平静，一切很顺利，同志们，那末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要是你们这里也搞得一塌糊涂，那还打什么仗呢？这两年咱们工人吃的苦并

不是白费的，难道是白费的吗？难道是无用的吗？不，同志们，咱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有用的。比如说，我们妇女也要上前线去了，在我们支队里就有二十六个妇女。我们也懂得，我们的国家经历着多么困难的时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上前线去，这就是我要向你们说的。支队的全体妇女，你们的母亲、妻子、女儿、姐妹、未婚妻、女朋友，要我代表她们向你们致以最后的敬礼。再见吧，同志们，振奋你们的精神，我们也同样……”

回答她的是几千张嘴巴发出的由衷的欢呼、热情的誓言，是对她那充满智慧的、激动人心的话语的感激。

“嘿，叶莲娜，你满可以当个部长了！别看是个婆娘，干起事来，简直比得上一台机器！”

这时，一个身穿黄色短皮袄、头戴油污便帽、脚蹬毡靴的老年纺织工人，从人群里挤出来，爬上了箱子。他那干瘪的脸上刻满了一道道又黑又深的皱纹，嘴唇翕动着，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在他那湿润的、但很明亮的眼睛里，在他那被灯光照亮的面孔上，泛起一阵阵无比喜悦的浪花。

“好，我们来回答……来回答……”他迟疑了一下，突然摘下帽子，露出斑白的头发。“我们把你们装备起来，我们知道是为了个啥。你们会碰到各种情况，会经受各种考验，兴许根本就回不到我们身边来了。我们这些作父亲的，当然很难过，但这没什么，我们还是要对你们说：去吧！既然需要去，那就得去。没有什么好磨蹭的，只要不给自己的事情抹黑就行，我说的是咱们的大事啊！在最艰苦的时候，你们想一想我们，困难就容易克服了。我们也向你们提出保证：你们的妻子、儿女，我

们不会丢在一边不管，不会忘记他们；我们能帮多少忙，就帮多少！不消说，忙是帮定了，这是战争嘛。不这样不行……”

老人郑重地摊开两手，忧郁地、清晰地咂着嘴说：

“不管怎么样，反正是没有别的出路！”

然后，他站了一会儿，想再说些什么，可是没有想出来，于是一甩手，很快地将帽子扣在有着几丝稀疏白发的头上，他刚要走开，又突然用响亮有力的声音喊了一声：

“再见吧，孩子们……兴许，根本……”

老人噙着泪水，声音颤抖着，颤抖的悲泣声象一股强烈的电流穿过人群。

“也许，说不定……什么事都会发生的，战争嘛，还有什么说的，战争说不定……”

泪水从老人那湿润的眼眶里扑簌簌地滚下来，涌到他那深深的皱纹里。他用短皮袄的脏袖子揩了揩，把泪水抹了一脸。人群中许多人都哭了，有些人向这个从箱子上下来的老工人喊道：

“对，老爹！说得对，说得对，老人家！”

老人走了下来，箱子上没有人了。在人群的上空响起了第二遍铃声，清脆而又响亮。克雷奇科夫最后一次跳上了箱子。

“好，再见吧！让我们再说一次：再见吧，同志们！预祝我们能再次见面，预祝我们将来能幸福地见面，乌拉！”

“乌拉……乌拉……乌拉！！！”

喊声刚静下来，就传来一声命令：

“全支队，各就各位！”

便帽、军帽、尖顶帽忙乱地晃动起来，吻别声咂咂地响成一片。送别的话语声、郑重的嘱咐声、悲切的请求声、徒然的安慰声，杂乱地交织在一起，在空中回响。

一个母亲伏在一个紧锁双眉的红军战士的肩上，头不住地颤抖着，眼泪流满了灰白色的面孔。母子俩，一个在呜咽，在抽泣，在大声地痛哭，一个呆呆地站着，严肃、坚定，默默地沉思着。

全队都上了车，送行的人群更靠近车厢了。从车厢的窗口望出去，只见密密麻麻的一片，分不清面目来。他们在乱哄哄地、焦急不安地拥来拥去，活象一头皮毛丰厚的巨兽，它长着上千对爪子，上千双眼睛，但又象一只毛茸茸的、躯体伸缩自如的大熊。

第三遍铃响了……

哨子吹得象夜莺啼啭，汽笛响得象猫头鹰尖叫。机车的喉咙在吃力地冒气、喷烟、喘息。车轮压在冰冻的铁轨上吱吱地发响，猛地匡郎一声，车厢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火车离开原位，向前驶去……

红军战士们从车厢里探出头来叫喊着，黑压压的人群灵活地跟着火车，边跑边喊。不一会儿，列车淹没在漆黑的夜幕里，只能听见从远处传来的一阵阵轰隆轰隆的响声，响声越来越远，渐渐地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

半夜里，纺织工人们冒着正月的严寒，低垂着头，怀着抑郁的心情，含着眼泪，说着伤心的话儿，从火车站出来，各自回家去了。

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到萨马拉走了很久，至少有两个星期。但是在当时，要算最快的了。路上并不感到十分疲倦，许多新的地方使人很感兴趣，异常的环境坚定了人们的意志，朝夕不同的观感不断激发人们的精神，人们的心情象琴弦一样拨到了最高的旋律。强烈的新鲜感扫除了旅途中的寂寞和烦恼，扫除了在偏僻小站上停车等候的无聊。只要火车一停，车厢旁边马上就活跃起来。在漫长的旅途中，经常召开群众大会，举行各种大小会议，自发地组织临时报告会，同那些热心的听众们三五成群地进行交谈。在这支由布尔什维克纺织工人组成的队伍里，都是一些精明能干的、严格要求自己的小伙子，他们一路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意料不到的印象。当时，在大的火车站上，在偏僻的小站上，在小城镇里，在乡村里，有无数的"自由军"到处流窜，既没有人理睬他们，也没有人收编他们。于是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大小队伍，各种牌号的"地方武装"和一批昏天黑地、蛮干一气的人物。他们漫无目的、莫名其妙地在广阔的俄罗斯土地上荡来荡去。这一帮帮、一股股人马，都靠老百姓养活，没有人给他们关饷，他们到处称王称霸，惹是生非。他们爱怎么闹就怎么闹，没有人约束他们，因为在穷乡僻壤，苏维埃政权还不巩固，还不够强大。

那时，人们敏锐地感觉到，一个人只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两只灵敏的耳朵、一双可以劳动的手，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胸膛里有一颗孤独的心，是不够的。在那不是人过的世道里，做人该有多难啊！

苏维埃国家的优秀人物都上前线了，其他的人在后方夜以继日地劳动，累得精疲力尽，哪能事事都照顾到，事事都

听得见，又哪能把该做的事都事事做到呢！在那混乱时期，在偏僻省份的灌木丛中，在边远农村的密林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的。人们所受的痛苦逐渐化为眼眶里的泪水。那些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到处流窜的“自由军”，横冲直撞，肆意践踏着苏维埃生活的幼芽，然后又大摇大摆、满不在乎地一哄而去。

旧的推倒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无依无靠的人们到哪儿去安身呢？这一阵狂飙是谁掀起的呢？

啊，是布尔什维克吧？是他们那些昏天黑地的“自由军”闹得人们不得安宁，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吧?!

新政权正在给这些放荡不羁的野马准备套索，但在当时，人们又何曾知道呢！

于是，边远地区的农民们，把自己所有的沉重痛苦和压在心头的忿恨，都一古脑儿发泄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了。

“强盗！暴徒！孬种！”

而现在，乡下人和小城镇的居民们突然在这个支队里，在这千把个布尔什维克纺织工人里看到的，干脆说，是清一色的好人，这些好人注意地、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气地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必要时还作简单明了的解释。这些人不随便翻他们的仓房，不撬他们地窖的门，不拿他们的东西，要是拿的话，也给钱。农民们都感到诧异。这是新鲜事！这是个怪事！这是受欢迎的事！有时候，列车在某个小站上耽搁几昼夜，居民们就从遥远的村庄赶来“听听聪明人的讲话”。宣传工作搞得真是呱呱叫啊！这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工人后来在内战时期大规模开展宣传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开

端。那时候，到处都可以遇到这些红色的纺织工人——在中国的边境上，在西伯利亚的大森林里，在奥伦堡的草原上，在波兰的边境上，在彼列科普附近的锡瓦什湖畔——他们什么地方没有到过，哪个战场上他们没有流过血呢？正因为这样，人们是这样拥戴他们，保护他们，热爱他们，但也有人憎恨他们。也正因为这样，人们怀念他们，编成歌曲在辽阔的苏维埃平原上到处歌唱他们。

现在他们正开往前线，坐在冰冷的棚车里，忍受着正月的彻骨严寒，学习、工作，思考、思考、再思考。因为他们都明白，要做好准备，应付一切。不仅要学会用刺刀来打仗，而且要学会用中肯的、鲜明的语言，清醒的头脑，丰富的知识和迅速了解一切并能准确传达给别人的本领来打仗。每一节棚车里都是书声琅琅，大家都在顽强地学习，有时象一群寒鸦似地叽叽喳喳地争论着问题，有时在清澈的寒气中突然响起了歌声，这歌声是那么轻快、嘹亮，是那么充满革命激情：

> 我们是铁匠，我们有蓬勃的朝气，
> 我们在锻造幸福的钥匙。
> 沉重的铁锤高高地举起，
> 向那铁砧猛击、猛击、猛击！

一路上，从那缓缓爬行的、吱吱作响的车厢里，不断飘出战斗的歌声，激荡在平原的上空。那歌声有时和车轮的轧轧声交织在一起，有时把它压下去，象一曲雄壮的凯歌隆隆地响彻云霄。他们唱得多好啊！他们，这些纺织工人们，唱得多好啊！在地下斗争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停止唱这些歌曲啊！

所以，后来在前线，在全师，找不到一个团，能象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团那样，一直坚持着唱战斗的歌曲，而且是唱得那样好，那样朴实、那样的无比深情、那样的热情奔放。这些歌曲在全军燃起了自豪和喜悦的火焰。啊，歌儿啊，歌儿啊，你真能打动人们的心弦哪！

离萨马拉越近，车站上的面包就卖得越便宜，不仅是面包，其它食品也一样。在粮食奇缺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往往几个月领不到一磅面包，大家已经习惯把一片面包皮看成了不起的宝贝。而到了这里，工人们突然看见面包要多少有多少，才晓得问题完全不在于缺粮，而在于其它方面。他们对于这种混乱现象、对于工业中心区与产粮区缺乏联系的情况感到痛心。现在他们来到这产粮丰富的地区，就赶紧敞开肚皮吃个饱，补偿过去没有吃足的分额，好象对长期挨饿进行报复一样。照理说，他们应该相信，既然到了萨马拉这个鱼米之乡，东西一定会越来越多，价钱一定会越来越便宜，可是不然，他们不相信。饥饿使他们不敢贸然轻信了。到了一个小站，看到面包很便宜，很白，一买就是三四十斤。谁肯错过这种难得的机会呢？可是第二天，到了另一个地方看，这里的面包更白更便宜，只好相视苦笑，悄悄议论，十分懊恼，不知道将干了的面包往哪儿放才好。

列车到了萨马拉，在离车站很远、附近只堆了一些生了锈的铁轨和车厢残骸的“十五股岔道”上刚停住，大家就一拥而下，聚在路基上，七嘴八舌地催促队长赶快去打听打听下一步的行动。

到哪儿去？什么时候动身？去干什么？是不是现在马上就出发，还是要在城里耽搁一、两天？

这些事只有去问伏龙芝才能知道。伏龙芝已经是第四军的司令了。他比这个支队早几天离开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目前他在乌拉尔斯克。在这里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里，他给费多尔留了一张便条，要洛帕里、克雷奇科夫、捷连季·包奇金和安德列耶夫火速赶到乌拉尔斯克去找他，支队随后开来。伏龙芝热情地、衷心地向老乡们表示欢迎，简单地介绍了一些情况，指出大家面临的工作是多么艰巨。克雷奇科夫向全队宣读了这张便条。大家兴奋地听着敬爱的司令讲的这些话，很受鼓舞。有人提议打个电报向他致敬。

“发个……电报，发个电报！”

“就说谢谢！”有人嚷着说。

“不能光说‘谢谢’，”有几个人打断他的话头说，“要说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准备干起来！不论什么地方，不论什么工作，只要需要，我们就去！就这么说！”

“对，就这么说：我们准备干起来！还要说，我们大家象一个人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一条心！”

“来吧，弟兄们，我们来拟一个电报！伏龙芝万岁，乌拉！”

“乌拉！……乌拉！……乌拉！……”

他们把便帽、鸭舌帽、盔形帽抛向空中，好象一群受惊的寒鸦腾空而起。

便条里的亲切话语使费多尔非常激动，他招笑地高高地举起便条，晃了晃，兴高采烈地、天真地贼了起来：

“同志们！同志们！这就是那张简短的便条，它是咱们司

令亲笔写的啊，难道你们不觉得，这是完全和我们平等的、在各方面都平等待我们的人写的吗？从这种同志式的态度来看，从这种朴实的语调来看，难道你们不觉得，在我们的军队里，从普通战士到司令，实际上相隔只有一步之遥吗？甚至连一步也不到。同志们，因为战士和司令已经溶为一体，他们是一个人，既是领袖，又是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我们军队的力量就在这里，就在于内部的一致、团结和同心协力，力量就在这里……来，为我们的军队欢呼，为我们的胜利欢呼！”

红军战士们又欣喜若狂地把帽子抛起来，高喊着：“乌拉”，尽情地抒发自已的快乐、自豪和决心，好象海底的石子被惊涛骇浪抛到岸上来一般。

局势变化得很快。支队接到命令马上集合，司令部把支队长叫去，命令他率领支队准备出发。

革命军事委员会提醒那指定的四个人：

“马上到乌拉尔斯克去！”

这四个人忙了一阵，急着要出发，也没有来得及好好地向全队告别，不过大家相信，不久就会在乌拉尔斯克见面的。

两辆三套马拉的雪橇离开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头一辆坐的是费多尔和安德列耶夫，后一辆是洛帕里和捷连季·包奇金。

马儿扬起前蹄，车夫打了一声口哨，挥起象蛇一样的长鞭，甩出清脆的响声，两辆轻快的雪橇象鸟儿一样，消失在弥漫的暴风雪中。

二 草 原

早晨，草原上冷得要命。马车夫们拿厚实的老羊皮袄裹住全身，竖起毛茸茸的皮领子遮住脑袋，根本不顾背后打盹的乘客了。

“洛帕里，冻坏了吧？”冻得直打哆嗦的包奇金蜷缩着身子对他说。

“五脏六腑都冻透了！”洛帕里沮丧地用嘶哑的嗓子说。“是不是快到站头了？”

“谁知道呢？要问问这位老伙计……喂，朋友，”他戳了戳车夫身上那件棕黄色的羊皮统子。“是不是快有人家了？”

“冻坏了？”

“够呛，老哥。请问，快到村子了吧？”

“毛估还有七八里[1]地，弄不好，还有十二、三里！”车夫头也不回地乐呵呵地说。

“说正经的，到底还有几里？”

“就那么几里呗。”车夫咧开嘴笑哈哈地说。

“你刚才说的那个村子叫什么来着？”

“伊万且耶夫卡……”

“那末，从伊万且耶夫卡到普加乔夫远吗？”

---

① 本书中的“里”，均指俄里。一俄里等于一.○六公里。——译者注。

"还能有多远呢!"

马车夫用精明、机灵的目光斜了他一眼,把一个冻僵了的手指深深地塞进鼻孔里,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可以说,没多远了。到塔沃洛日卡十八里,从塔沃洛日卡算起二十二里,正好晌午前可以赶到!"

"你是哪儿人?尼古拉耶夫卡的吗?"包奇金试探着问。

"当然是那儿的,还会是啥地方的?"

听话音,车夫好象有点不高兴,照他看来,活见鬼,全是废话。既然是尼古拉耶夫卡拉的乘客,车夫当然也是那地方的人喽。

"老大爷,为啥呢,也许你是伊万且耶夫卡的人呢,"包奇金想反驳他。

"别瞎扯,什么伊万且耶夫卡人……"

老大爷嘲笑地咂了一下嘴,又赶忙拉了拉缰绳,其实这根本用不着。

这里的车夫有一个惯例:比方说,有一个名叫喀尔普·叶德连内奇的车夫从伊万且耶夫卡拉客人到尼古拉耶夫卡去,而另一个叫叶德连·喀尔普奇的车夫也接到出差通知,要从尼古拉耶夫卡送另一个客人到伊万且耶夫卡去。可是叶德连自己并不出车,免得回来放空,而是把乘客交给喀尔普,于是喀尔普赶着他那跑乏的马儿,拉上客人慢腾腾地往回爬,天晓得要多少时间才能爬到。以后,叶德连也用同样的办法补还给喀尔普老大爷。这对两位老大爷来说,当然很方便,可乘客却倒了邪霉:短短二十里的一站路,往往一步一步地要拖上四五个钟头,也不管你的出差证上注着什么字句:

“紧急……优先……特派……”

所有这些吓人的字眼很少能触动喀尔普·叶德连内奇这些人，他们从结着冰渣的胡子下面露出得意的微笑，满不在乎地，慢慢地捋着毛刺刺的胡须上的冰凌条，安慰着急躁的乘客：

“马上到了，别心急，送死总来得及的……亲爱的！”

车夫们这种惯例，捷连季过去听人说过，现在回想起来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刚才这位老大爷咂起嘴来那么诡秘，那末甜滋滋的。

“老哥，你拉我们，是跟别人换的工吧？”

“那还用说！”车夫又来了劲儿。“谁不知道换工搭客，大家合算……”

“哼，这要看对什么人啰！”

“对谁都一样，大家合算……”他想打消捷连季的疑虑。

“你们当然合算喽，这还用说，”包奇金表示同意。“你们这套办法可把我们害苦了，马已经累乏了，跑不快，慢腾腾地拖上一整天……”

“你说我的马累乏了？”马车夫突然感到受了委屈，猛地转过身去，精神抖擞地扯起缰绳，吆喝一声，马就飞奔起来，这时只见雪片飞旋，扑面打来。“驾，驾，鬼东西，快跑啊，我的乖乖，啊，哈……快到了……嗯……噢……可爱的飞鹰啊！”

这时，你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象是在赛马，一个劲地在白雪茫茫的草原上奔驰。

他消了气，勒住跑得气喘嘘嘘的马儿，把缩在高领子里的头转过来，瓮声瓮气地说：

“你瞧这马跑乏了?”

“棒,老哥,真棒!”乘客们夸奖他说。

“就是棒嘛!”老大爷点点头说,接着又郑重地说:“马有时候也会跑乏,那是有原因的,路走得太多,自己的生意要拉,公差也得支应……就是魔鬼也要累乏的,何况是马呢……”

“派的差大概不少吧?”洛帕里好奇地问。

“还能少得了,”车夫马上回答说。“这里人来人往,一个劲地要……这些鬼东西干吗老是跑来跑去,真弄不懂。不是他来,就是你去,大家都要车要马,假如耽搁了一下,就要挨揍。”

“还要打人?”洛帕里有点不信。

“打你又怎么样?你还能找谁去告状?”

“你们乡下人净爱扯谎。”他严肃地对车夫说。

“你才爱扯谎呢!”老大爷有点生气。他在座位上费劲地挪动了一下身子。

“真是活见鬼!”洛帕里激动起来。“只要有个人编个什么事儿,就会有人相信,要信就信呗,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

“哼,编个事儿……”马车夫不满意地咕哝了一句。他感到受了委屈,为什么话锋转得那么快,而且突然变得那末不客气。

“你自己挨过打吗?”洛帕里问。

“咋没挨过呢!有个家伙,跟你差不多,用军刀捅了我一下,这个狗崽子。亏得皮袄厚实,要不肠子都捅出来了……”

“为啥呢?这个混蛋喝醉了?”

“看样子是喝醉了……”

“咳,跟酒鬼有啥好搞头,”洛帕里好象无意地说出这一

句话。

"我也没有跟他搞呀。"

捷连季很想打听一下这里苏维埃的情况，是不是巩固，工作是不是顺利。于是他打断了车夫吞吞吐吐的话，向他问了一些别的事情，可是他听到的回答仍然是牛头不对马嘴，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好象他有什么顾虑似的。

"去它的……什么事都会有的……我们现在还有啥好说的呢……"捷连季听到的不是认真明确的回答，而是转弯抹角的搪塞话。

"你这话叫人摸不着头脑，讲清楚点，"洛帕里忍不住光起火来了。

"小伙子，你脑瓜真不灵活，你想想看，就能猜出来了……"

"不，你别插嘴，等一等，"捷连季阻止洛帕里，怕他打断话题。"我问你，这里的苏维埃怎么样，好还是不怎么的，干不干事情？"

"为啥不干呢？大家都知道……只是戈尔什科夫派的差不公平……"

"不公平？"洛帕里马上抓住了这句真心话，就象猫抓到了一块肉。

"就是不公平嘛！每回派差，他总是想着点子让老丈人逃过去，可俺们哥们就苦了，一个劲地往头上摊，连个先后次序都不管。"

"你去告他嘛，"捷连季提醒他说。"到苏维埃去，拿出证据，讲明情况，他们马上会收拾这个坏蛋的。"

"哼，收拾，"车夫用懊丧的语调低声地说，失望地拉拉缰绳，拍打了一下马胯骨。"当心啰，收拾。弄不好收拾到你自己头上来，让你到不该去的地方尝尝滋味……"

"嘿，你胡扯些什么？"洛帕里又动火了。

"不是胡扯，俺说的全是实情话，"车夫用悲伤的声调说。他把头垂在一边，象死了的小鸟一样。

"真有过这样的事吗？"捷连季象个审讯员一样，紧盯着直截了当地问。

"真的，真有过这样的事……"

"什么事呢？"

"也没啥事，"马车夫嚅动着蒙着白霜的嘴唇说。"有这么回事，也就当它没这回事。'人生一场，两眼一闭，也就万事大吉了'……"

"为什么不吭声呢？"洛帕里又盯着问。

"不吭声，为的是图个太平……"这个有点滑头的车夫不动声色地，乖巧地解释说。"只要你不吭声，事情也就过去了……"

"说笑归说笑，"洛帕里打断他的话。"可事情……"他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就和颜悦色地接着说："哦，老大爷，你们现在出趟车是不是还要赔几个？眼下各地方的苏维埃都出了告示：'坐车要给钱，拿东西也要给钱。'你知道吗？你亲眼看到过吗？"

"看到过……让它贴着吧……"

洛帕里懊恼地吐了一口唾沫，把头深深地缩进被气汗水呵湿的领子里，闷声不响了。他习惯于同城里的工人们谈话，

直来直去，完全是另外一种味道；而刚才那种谈话，他感到别扭：乡下人那种吞吞吐吐、含胡不清、乖巧圆滑的回答，着实地把他气坏了。在到达伊万且耶夫卡的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很有耐心的捷连季·包奇金却仍然从车夫滔滔不绝的、真真假假、含含胡胡的话语里，象打捞贵重的珍珠一样，去捕捉琐碎的个别事实、难得听到的思想和见解，这些都是狡猾的爱唠叨的车夫无意中说出来的。

在费多尔和安德列耶夫坐的那一辆雪橇里，谈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话题。

"格里沙，你在他那个支队里干过吗？"费多尔问小伙子。

"我这条腿就是跟着他受的伤，"格里沙用指头戳了戳坐垫说。"整整一个夏天在草原上跑过来跑过去，他们追我们，我们想法子胡弄他们……捷克佬是傻瓜蛋，可哥萨克人你就胡弄不了，他们在这儿土生土长，咋能胡弄得了呢？！"

格里沙翻开领子，侧身坐在座位上。这时费多尔很清楚地看到在他那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的脸庞上，透出一股朴实、豪爽的勃勃英气。尤其在讲得激动以后，他把上嘴唇放下来，紧紧地压住下嘴唇，这个姿势显得特别有力。扁平的鼻子，深灰色的眼睛，低低的额头，上面布满一道道油光光的皱纹——总之，这相貌很平凡，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可你在平凡中又感到他具有一股真正健旺的、用之不尽的力量。格里沙只不过二十二岁，可是光看他的脸，你准以为他有三十五、六岁了。雇工的繁重劳动，战争中打断左腿所受的痛苦，在他脸上留下永远抹不掉的印记。

“哎，他怎么样，还年轻吗？”费多尔接着上面的话碴儿，好奇地问。

“是啊，还非常年轻，大概连三十岁都不到……”

“是本地人吗？哥萨克？”

“哪里是什么哥萨克……离普加乔夫不远有一个村子叫维亚左夫卡，他大概在那儿住过，也有人说，他过去住在巴拉科夫，是刚搬到这儿来的。谁也闹不清……”

“他这个人怎么样？”费多尔紧紧地追问道。从他那激动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已经入了迷，生怕漏掉一个字。

“叫我咋说呢，一句话，是个英雄！”格里沙好象自言自语地说。“比方说，我们坐在大车上，弟兄们老远看到他，就喊：‘恰巴耶夫来了，恰巴耶夫来了……’其实一天能看到他十来回，可还是看不够。老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看见他，大家都从车上跳下来，看啊，瞧啊，好象看稀罕一样，可他一边走，一边向左右捻着小胡子，他喜欢胡子，老是理来理去……

‘歇着呐？’他说。

‘嗯哪，恰巴耶夫同志。’

‘好，歇着吧，’说完，他就走了。用不着他多说什么，只要说上一句，你就会感到更加高兴了，这就叫做真正的人。”

“嗯，英雄……真的是个英雄？”费多尔试探着问。

“这还有啥疑问，”格里沙意味深长地摇了下头。“还可以拿伊瓦欣科夫斯基工厂的事件做个例子。他多么想赶去搭救那儿的工人，可是没有来得及，去晚了。”

“去晚了？”安德列耶夫战栗了一下。

“去晚了，”格里沙叹了一口气，重复着说。“只晚了一点

点，可这一点点时间，厂里的工人白流了多少血啊……唉……”

格里沙轻轻地摆了摆手，沉重地垂下了头……

大家很悲痛地静默了整整一分钟，接着格里沙用很低的声音说：

“说法尽管不一样，可是死掉的至少也有二千。一排排地躺在厂房之间，整个院子都是尸体，有女人，有小孩，还有老太婆，一句话，老老少少都杀光了，唉，这帮畜生……”

他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扯了一下放松了的缰绳。

“你亲眼看见的吗？”费多尔追问他。

“怎么不是亲眼……其实用不到再讲了……在那儿看到什么呢？污泥中的血和肉……不分男女老少，都被这帮畜生用机枪扫死了。”

“那末，恰巴耶夫自己怎么着？”

“他有什么办法呢？他气得暴跳如雷，两眼直冒火，他全身发抖，象狂奔的马一样，他抡起马刀，一下子砍在石头上。他说：‘血债要用血来还，我要让他们流更多的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定要报仇！……’”

“仇报了吗？”安德列耶夫严肃地问。

“报得可凶哩！”格里沙马上回答说。“他象凶神一样，在草原上东砍西杀。他下令，见到他妈的哥萨克一个也不留。他说：‘把这帮坏蛋全部杀光，我永远不会忘记伊瓦欣科夫斯基工厂！’”

大家又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克雷奇科夫又继续问津津乐道的格里沙。

“格里沙，他手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就是他那些战士都是哪儿人？”

“本地人呗，还会有别处的？都是咱们弟兄们，咱们扛大活的，还有比咱们更苦的穷哥们……还有拉纤的，他们干得比咱们还早哩……”

“你们是什么编制？是一个团吗？”

“是的，驻在普加乔夫的时候是一个团，后来慢慢地叫支队了。恰巴耶夫自己也不喜欢把它叫做团。他说，还是叫支队更符合实际一些……”

“嗯……支队……你说说，支队里受伤和牺牲的，你们怎么处置的？”

“处置？”格里沙拖长声调，略有所思地说。“各种情况都有：那些来不及抢回来的，都给哥萨克劈死了，不会有一个活命的。那些抢回来的，都往各个村子里一放，这儿到处都有咱们自己人，就是在塔沃洛日卡这个地方也放过伤员。哪儿没放过？到处都放过……”

“怎么治呢？”

“照样治呗。只是药品一点也没有。老太婆想到什么办法，就用什么办法治……弄到城里的，那还能凑合一下。可在咱们这儿乡下，嘿嘿，治起来就五花八门了。有的伤员腿上只连着几根筋，碎骨头格拉格拉响。让乡下这种无知的老太婆怎么能包扎得好啊！这些老太婆怎么能给人治病呢？”

“有这样的情况吗？”费多尔声音颤抖地问道。

“怎么会没有呢？打仗嘛！”

“说得对！”安德列耶夫突然高声地说。他一直闷声不响

地坐着，把头深深地缩在羊皮袄里，仿佛在生谁的气，或者对什么不满意似的。"你说得很对！"他用力地又说了一遍，亲热地拍了拍格里沙的老羊皮袄。

"唔，这还用说，"格里沙高兴地摆了摆手说。"什么情况都有！"

"格里沙，"费多尔插嘴说。"格里沙，你们是到哪村吃哪村吗？"

"总得吃各个村子呗！……"小伙子神气十足地回答说。看来他很得意，居然他的话能使大家这样感兴趣。"我们随身带的干粮很少，怎么带呢？往哪儿放呢？大家都吃老百姓，他们来，他们要；我们来，我们要。方圆只有十五个村子，转来转去，就是这么个地方。"

"唉，老乡们够苦的，"费多尔叹口气说。

"大家都苦……难道我们舒服？"格里沙马上接下去，生怕人家误解他的话。

"当然不舒服，"费多尔赶忙附和说。

"就是嘛，"格里沙这才放了心。"什么事都有，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有时候，老乡们不肯给我们粮食，或者不给麦子喂马，或者是我们的马跑累了，他们也不肯换一换……如果我们一定要，他们就得给，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依我看，我们也好，他们也好，大家都一样……有什么好吹的，好象什么事都做得很漂亮，可是也有不漂亮的时候……比方说，你几天几夜吃不上东西，加上行军打仗，而他们连一块面包也不肯给，这时还讲什么漂亮。开头，我们说，给点吃的吧，我们饿坏了，他给你碰个钉子，这样，你还能和他满脸陪笑吗？哼，那就只好抓他

个把，见到脑满肠肥的，就请他吃几个耳光，哪儿有时间跟他们闲磨牙？”

“打过人？”费多尔屏着气问道。

“打过！”格里沙干脆而又肯定地回答说。“大家都打过，这是打仗嘛！”

“好样的，格里沙！”安德列耶夫兴致勃勃地又插进来说。

安德列耶夫爱听这种纯朴、坦率、而有点粗鲁的老实话。

“你以为我没挨过打？”格里沙转过身来说。“也挨过……有一回，恰巴耶夫亲手揍了我一家伙。既然该揍，有什么办法呢！”

“怎么，恰巴耶夫？为啥打你？”费多尔听到（不止一次）这个富有魔力的、惊人的名字，又来了劲。

“那一次我正在站岗，”格里沙原原本本地说了起来。“过了普加乔夫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火车站，叫什么名字……我忘了。站啊，站啊，老兄，真腻烦死了……我心想，站岗这差事真他妈的没劲儿，一句话，憋死人。就在车站旁边有一片小白桦树，树上歇着一群寒鸦，抬头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嘎，嘎，嘎，叫得可欢哩！我想，给你一枪，看你还叫不！开头我这么想，是想着玩的，可后来却真的干起来了。我想，这里有谁看得见呢。还有，因为各种原因打枪的人多着呢！我就瞄准一群寒鸦，呯，呯，呯……五发子弹一下子全打光……打中的那几只从树上掉下来，我还记得，有的翅膀挂在树枝上，扑腾扑腾地抖动一阵子才死去。没有打中的，遮天盖地地飞了起来，一边飞，一边嘎嘎地乱叫。可谁知道，他，恰巴耶夫正坐在军运指挥员的房间里。他走了出来，皱紧眉头问：

‘你开的枪？’

‘不，’我说。‘我没有开，不是我。’

‘那末是谁把寒鸦轰起来的？’

‘八成是他们自己飞起来的，’我说。

‘好，把枪给我看看，’他一手夺过枪，拉开一看，弹仓是空的。

‘咋搞的？’他说。‘看你上哪儿去弄子弹，兔崽子。你拿什么去打哥萨克，你这木头疙瘩！你以为寒鸦比哥萨克还可怕？活见鬼！’说着就用枪托朝我的腰部狠狠地给了一家伙！

当时我一声不吭。对他说什么呢？突然，心里一亮，想出了点子，可是已经晚了。我应该用另一套办法对付他，在他伸手夺枪的时候，我应该往后一闪，说：站住，再过来我就要开枪了，哨兵的枪谁也不准碰！他也许会另打主意，你就硬是不给，还把刺刀对着他的肚皮。他就喜欢这样，可能当场就饶了你……”

“他喜欢这样？”好奇的费多尔眯缝着眼睛问。

“他可喜欢着呢，你越硬，他对你越亲热。只要你是硬汉子，不管你对他怎么样，他对你总是尊重的。‘好样的，’他说。‘只要你不是孬种……’咳，他的事怎么一下子能说得完呢！你看，前面就是伊万旦耶夫卡，”格里沙高兴地说。他按照车夫的姿势坐好，用缰绳敲打着马胯骨，打得拍拍直响；他一会儿甜滋滋地咂咂嘴唇，一会儿吹吹口哨，一直闹腾到村头，路上只有一次回过头来问：

“拉到苏维埃去吗？”

“对，对，到苏维埃去，格里沙。”

"要不拉到帕尔费内奇家里去，他说起恰巴耶夫，可……"

"帕尔费内奇是什么人?"

"也是咱们弟兄，参加支队比我们还早呢。他的胳膊打掉了，就回来了……"

"他是本地人吗?"

"本地人。他现在什么家当也没有了，给哥萨克毁个精光，房子拆了，仓房烧了，只剩下他光杆一个……他好歹整理了一下，还是不行。"

"路过他家的时候，指给我们看看，"费多尔随口提醒一句，以备万一。

"一定……"

他们进了伊万且耶夫卡村，村子很大，街道很宽，银白色的积雪踩得结结实实。冬天，大雪把小村子填平、盖严，整个地埋了起来，活象个熊窝；可是大村子在冬天银装素裹，分外漂亮。格里沙扬鞭催马，马儿迈着细碎的脚步，轻快地跑了起来，气派十足。他用手指了指一间小木房，那就是帕尔费内奇的家，他又指了指另外一间房子，很快地回过头来，用手指头弹了下自己的脖子，得意地笑了笑，看来他是要你知道，这里是酿私酒的地方。一会儿，来到了苏维埃。这个苏维埃照例座落在村中心的一块空场上，设在旧村政府的房子里。他们从雪橇上爬下来，拖着麻木的双腿，慢慢地走着，他们脱下结了冰渣，上面又蒙了一层雪花的老羊皮袄，挟在胳肢窝里，手里拎着小篮子和包裹(这就是少得可怜的家当，每人只有七八公斤)，登上台阶，走进了苏维埃。

这儿的苏维埃也跟别的地方一样：宽敞、简陋、肮脏，令人

感到不舒服和气闷。天色还早，如果在城里的机关里，这时连一个人影也找不到。可在这儿，你瞧，已经是人碰人了。他们这么早想干什么呢？有的蹲在褐色的沾满油污的墙边，卷着马合烟，喷着烟圈，把本来已经令人难受的、和着酸味的空气，弄得更臭了；有的挤在窗口，在结了冰的玻璃上乱划；有的冻得搓着手，让手暖和暖和，懒洋洋地、漫不经心地唠着一些无聊的话……看得出来，好多人，大多数，也许是所有的人，都是因为闲着没事才到这儿来的，他们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事儿可干，所以都挤到这儿来了。

他们一看到有人进来，都转过身，上下打量一番，接着就七嘴八舌地唠叨起来，什么天冷啊，路上辛苦啊，往哪儿去啊，干什么去啊，现在出门难啊，以后又扯到大麦燕麦不够吃啊，又说今天一定要起大风雪，"无论如何"不能再赶路了。

"好啊，同志们！"洛帕里向大家打招呼，他不知为什么在外面耽搁了一下，是最后一个进来的。

"您好！"有几个人哼哼哈哈地回答着。

"想找主席……"

"就在那边，"有人指着隔板那边的房间说。

洛帕里一路上充当四个人的代表的角色：办交涉，找车马，打听哪儿可以落脚、吃饭，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安德列耶夫没有脱下羊皮大袄，很不客气地推了推坐在窗台上的老乡，自己挤着坐上去。他点着烟，一声不响地把烟递给老乡吸了一口。捷连季已经挤在人群里面，搭讪起来，问他们这儿村子里有多少人，各项工作搞得怎么样，苏维埃的工作做得好不好，老乡们对苏维埃政权满意不满意。一句话，单

刀直入，想起啥，就问啥。

费多尔心上还盘绕着格里沙讲的那些事儿。草原上大头领恰巴耶夫的传奇式形象一直映现在他的眼前，使他感到激动、担忧和高兴。

"他无疑是个人民英雄，"他独自思忖着。"他跟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一样，都是自由民营垒中涌现出来的英雄。那些人在他们那个时代建树过自己的业绩，可是恰巴耶夫生在另一个时代，他所干的却是另一番事业了。从格里沙讲的话，可以断定，恰巴耶夫性格上的主要特点是剽悍和骁勇。他与其说是个战士，倒不如说是个英雄；与其说是自觉的革命者，倒不如说是一个狂热的冒险家。看起来，他过分好动，老想变换环境，然而，他在农民起义的队伍里是一个多么独特的人物啊，是一个多么出类拔萃、光彩夺目的形象啊！"

费多尔从老乡那儿打听到去帕尔费内奇家的路。等格帕里同苏维埃主席谈完话，领着大伙去吃茶点的时候，费多尔没有一同去，他说明自己的打算，就按人家告诉他的地址去找帕尔费内奇去了。

约摸过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又离开了伊万且耶夫卡。费多尔坐在雪橇里，闷闷不乐，一声不响。他没有找到帕尔费内奇，这个人前一天到普加乔夫去了。安德列耶夫问了他两、三个问题，想逗他聊聊，一看谈不拢，也就不吭声了。捷连季和洛帕里坐着，坐着，忽然想唱唱歌。他们的二重唱实在太精彩了：洛帕里不是在唱，而是在乱嚷嚷，捷连季扯着假嗓子尖叫，他们乱唱一通，很刺耳，唱得人汗毛直竖。后来唱得大家实在吃

不消了，坐在前面一辆雪橇上的安德列耶夫回过头来，大喊一声，叫他们不要再嚎叫了。这两位老兄看来是同意了，也就不再作声。他们接着打起瞌睡，一直睡到塔沃洛日卡。到了以后，没有等多久，要到了马，又向普加乔夫出发了。

刚从塔沃洛日卡出发的时候，车夫乜斜着眼睛，望了望阴暗天空中翻滚奔腾的浓烟一般的乌云。风声尖厉，风向不定，它从四面八方刮来，好象在进攻一个无形的敌人，又好象一只锁着的恶狗，猛扑上来，发疯似地乱抓乱咬，但是每一次都被狠狠的一脚踢了回去，一会儿又扑了过来，一会儿又暴怒地跳了回去；它尖叫着，狂吠着，痉挛地咆哮着。狂风卷着雪花，打着旋涡，在地上旋转、奔驰、乱滚。道路阻塞了，被深深地埋在雪里。黄昏降临，风雪越来越大，天色越来越暗。狂风一阵紧似一阵，更加猛烈，更加刺骨地扑打着人们的两胁。天色更黑了，棉絮般的雪片急转直下，搅在旋风里，象尖针、冰棱和石块似地扑打在人们的脸上。

乘客们深深地蜷缩在老羊皮袄里，就象田鼠钻在洞里一样。车夫们也只露出一双眼睛。顶头风呛得人透不过气来，打在脸上象针扎一样。他们在路上走了好久，越往前，越空旷。草原上的暴风雪刮得更加凶猛。马车走进低洼的深谷，两边的高坡上长着稀稀拉拉的小树，这儿的风好象小了一些，可是一上了平地，暴风雪又狂吼起来，好象一个豪横的主人在狂喝滥饮的宴会上高喊："一切都是我的，我要统统捣毁，谁也管不了我！"在风雪交加的草原上，令人兴奋，令人陶醉，但也令人毛骨悚然。

到普加乔夫还有十多里路。迎面不时碰上晃晃悠悠的骆

驼队，偶尔也看到一些单个骑马的人。兴许，其中有许多人这次没有能回到家，有的干脆冻死了，有的整夜倒在雪地里，只是到了第二天早晨才被扒了出来，总算死里逃生。

“这样大的暴风雪，”草原上的人说。“已经多年不见了。有人说，这一定是上帝降下的惩罚，因为大家祈祷不诚，礼拜不勤，把教堂也给忘掉了。”

这只是说说而已，显然，这些话都是空话，是一句常说的口头禅。老乡们这么说，多半是出于宗教上的应酬话；其实，他们对自己说的这些话也是压根儿不信的。

暴风雪把人们都赶到车站里来了。我们这四位乘客到了车站，一个个象雪球似地从雪橇上滚下来。这一回，没有派洛帕里一个人去打听消息，而是一齐出动，有的去找站长，有的去找军运指挥员，而派态度和蔼的捷连季冒着暴风雪去找开往乌拉尔斯克的列车。他们这样“分工”，是由于在到萨马拉去的路上已经上百次地领教过：铁路上专管发车的头头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巧妙地哄骗他们。如果他们告诉你，车子“过一小时”开，那你就踏踏实实等吧，到明天也不会挪动一步，如果他们告诉你，火车“明天早上”开，那末，你就会看到火车一下子从你鼻子底下开过去。

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了一节准备送一批政治工作人员到乌拉尔斯克去的车厢。他们说好说歹，总算说通了，拿了东西上了车。可是在到达乌拉尔斯克之前，他们还碰到了许多麻烦事。快到叶尔绍夫的时候，铁路被雪埋了，大家下车，清除了雪堆。同军运指挥员吵了几次，才好歹搞来了点木柴，烘了烘冰窖一样的小车厢。车走得很慢，令人烦闷。火车刚刚开出叶

尔绍夫，车头又出了毛病，又是一阵忙乱，又下车等了好久，真是急死人。后来轴箱又坏了，又停了车，又忙了一阵。跑东跑西，一路上修了这个，坏了那个，岔子一个接着一个。从普加乔夫到乌拉尔斯克近在咫尺的一段路，却整整走了两天。

三　乌拉尔斯克

到了乌拉尔斯克，他们从车站上挂了个电话。不一会儿，军运指挥员派来了两部无座雪橇，四个人拿着行李，登上雪橇，直奔中央旅馆。旅馆里冷得出奇，房间里又潮湿，又肮脏，空无一物，没有地方坐，也没有地方躺，连东西也不知道往哪儿放才好。不过总算可以将就一下，他们看了一遭，选中了一个小房间，四个人就一起住了进去，因为大家都不想分开住。由于路上冻得够呛，他们一连喝干了两壶茶水，喝完以后，就到街上闲逛，不知道到哪儿去消磨时间。还在车站上的时候，他们就听说伏龙芝一早就到前沿附近去了，去指挥已经发起的进攻。当时，最近的前沿阵地离开乌拉尔斯克只有二十里路，必须赶快把敌人撵跑，尽量撵得远一些。然而，最初几仗，我们打得并不十分顺利，没有能够把哥萨克赶走，只是到了后来，在制定了规模更大、更周密的、从几方面同时发动总攻的计划之后，才把他们打跑了。我们的军队不仅从乌拉尔斯克，而且从亚历山大罗夫-盖依进攻斯洛米欣斯卡亚镇，从而切断乌拉尔斯克—勒比辛斯克—古里耶夫公路，因为由

北面进攻的红军部队必须沿着这条公路去追击哥萨克。

有关这次进攻的情况以后再讲，到该讲的时候讲。我们将不止一次地提到乌拉尔斯克到古里耶夫这条战火纷飞的公路。

我们这几位老兄都有一种特殊的癖好，甚至成了各自的专业。比方说，捷连季·包奇金非常喜欢写纪要，在这些纪要里几乎都是经济方面的消息。每到一个地方，他总要打听清楚，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好买，价钱多少。他把打听到的行情记在心里，然后写下来，进行比较。

克雷奇科夫呢，他每天都写日记。在任何环境里，在任何条件下，他总要挤出时间，把最重要的事情记下来，不是写在小本子上，就是写在纸片上，有时走在路上，他也会靠在栅栏墙上写起来，总之，看到的事，非写下不可。大伙儿经常取笑他，认为写这玩意儿屁用也没有。

"费多尔，你干吗老是糟蹋纸啊？"有时，安德列耶夫对他这样说，"你怎么有兴趣记这些鸡毛蒜皮？难道别人说了啥，做了啥，你都记得下来？既然要记，就得把一切都记下来，懂吗？只记一星半点，没有多大意思，甚至还有坏处，因为人家看了反面会摸不清头脑。"

"不，安德列耶夫，你说的不对，"费多尔向他解释说，"我发现一点记下来，第二个人发现一点记下来，第三个人、第十个人……大家记的合在一起，就有名堂了，就成了一部历史了……"

"去你的吧，你简直是胡思乱想，哪儿是什么历史？"安德

列耶夫对此表示怀疑。

“我做什么，我自己清楚，”费多尔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对这样毫不客气的、没完没了的纠缠，感到很不自在。

“你清楚什么？你什么也不清楚，”安德列耶夫打断他的话说，“你做的事情，毫无价值。”

克雷奇科夫不愿意再谈这个话题，他知道安德列耶夫脾气很固执，所以就闷声不响了，有一些问题他干脆置之不理。这样，谈话也就只好中断。

他写在日记本上的，一般都是报上根本见不到的，即或报上有所披露，也是一鳞半爪。为什么要写日记，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大概是由于某一种自然的、本能的需要，总之，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安德列耶夫的专业又不同了，他专钻研工人方面的情况。他对这方面感兴趣，正象捷连季写纪要和费多尔·克雷奇科夫写日记一样。安德列耶夫只要同初次见面的人一交谈，或者刚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提出一大堆与众不同的问题：这里有没有工厂，建立多久了，生产搞得好不好，为什么停工，停多久了，厂里有多少工人，素质怎样，觉悟高不高，表现如何，有哪些具体行动，这些行动发生在什么时候……等等。他这样做，也许是无意识的，也许是出于本能。这看得出他是个工人，总爱接近自己队伍里的人，关心他们的切身问题、需要和疾苦。他也关心其它一般情况，主要是当地的物产、人口、居民的成分和可靠程度。其实，对于这些问题，四个人差不多都同样关心。

洛帕里是个军事专家，每到一个地方，他顷刻间就能摸清

附近驻扎的是哪些部队，哪些团比较好，哪些团比较差，红军战士中的政治工作搞得怎么样，共产党员多不多，表现怎样，以及前线的总的情况等等。

他们各自的这种专业在路上已经多多少少地明确了，但主要的是到了后来，到他们四个人正式投入工作以后，才最后确定下来。有的同志视野缩小了，比如，安德列耶夫，因为他很少有机会到工人中心区去。另外一些同志，比如，洛帕里，视野却开阔了。在到达这里的最初几天，有一件事大家看得很清楚：战争的问题和战争需要逐渐吸引住他们的全部精力。于是，趁其它生活问题和需要还没有一拥而上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问题推到次要的地位去了。

他们逛遍了城里的大街小巷。这里的环境很新奇，很特殊，令人感到惊异。街上能见到的只有灰色的士兵大衣、步枪、刺刀、大炮和辎重马车——真是一座地道的兵营。街上红军战士一队队开过去，三三两两的个别士兵，来来往往，行色匆匆。骑兵在纵马奔驰，炮车在慢腾腾地转动，驮着军火的骆驼队大模大样地向前沿阵地蹒跚地走着。到处都是枪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只是到了晚上才稍许静了下来。有的人在“通枪管”，有的在打“野味”，也有的人“偶然走火”，根本没有必要打枪，都是在胡闹。有一个军事专家按分按秒地计算过，得出乱枪的平均数，说这样一天下来要白白浪费二三百万发子弹。计算是否准确，很难说，不过这种胡乱打枪的行径确实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我们所讲的这部分战斗在草原上的部队，当时还没有建立起自觉的铁的纪律，各个团里也缺少有觉

悟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因而不能把这些部队一下子改造过来，使他们具有新的面貌、新的形式、新的作风。这件事后来才办到。一九一九年初，在乌拉尔斯克附近作战的几乎都是由农民组建的部队，他们猛打猛冲，打得很出色、很英勇，而在这些部队里，或者根本没有共产党员，或者很少；即使这很少几个，也有一半是“挂名党员”。在这些部队里，有一种宣传占了上风，说什么共产党员都是宪兵和暴徒，似乎他们从城里到这儿来，是用暴力推行“共产”的……

在这些部队里，还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论调，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嘛，是同志和兄弟，而共产党员却是凶恶的敌人……”克雷奇科夫到了这里两天后，甚至不得不就“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员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个荒诞无稽的题目，给战士们作了一次报告。

其实，这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当时几乎闹遍了全国，特别在各个边远地区，如高加索、乌克兰、乌拉尔、土尔克斯坦，辩论得特别激烈，甚至还传到了格鲁吉亚。

当时，有一位光明磊落、机智干练的革命家，名叫林多夫，他同一批布尔什维克，竟全部死于自己的部下——“红军战士”的手里，单从这一事件来看，就可以判断出当时部队的情况有多么复杂。

过了几天，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支队到达了乌拉尔斯克。他们头上都戴着式样别致的、嵌着大红星帽徽的尖顶军帽。他们接到了守卫这座城市的任务。打这以后，这些纺织工人常常遭到从角落里射来的冷枪，开枪的都是“自由”农

民部队的红军战士，因为开到这里来的纺织工人剥夺并约束了他们放荡不羁的“自由”。然而不久，当这些部队看到纺织工人这样能打仗，打得那么顽强勇敢，他们的偏见一下子消失了，表现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友好态度。

乌拉尔斯克本地的共产党员并不多，一些人在战争中牺牲了，还有一些人被哥萨克掳走了，一部分早就被赶走和吓跑了，只有一部分还留在队伍里。这里的工作多半由外来的共产党员在做。中心人物是个绰号叫“地雷”的矿工，他为人光明正大，是个受大家爱戴的、经过考验的战士。同他作对、经常跟他竞争的是个名叫普列苗特金的家伙，这是个无耻的小知识分子，一个政治骗子，专会装腔作势，虽说也是共产党员，但却属于品质恶劣、着实令人厌恶的一类人物。普列苗特金的种种表现，说明他是一个追求虚荣的吹牛大王、空谈家，爱说漂亮话，到处出风头，一心想捞个好名声。四个人来到乌拉尔斯克以后，很快就搞清了围绕在普列苗特金和“地雷”周围的两个“小集团”的底细，于是就站在“地雷”这一边。没过几天就和他们处得亲密无间了。

四个人逛了半天，走得很累，现在回到没有生火的小房间。捷连季提笔写他的行情纪要，里面写道：“一盘酸菜鱼汤加面包，五个卢布；一磅黑鱼子，二十三个卢布……”他刚写到一半，这时司令部派来了传令兵，通知说：“伏龙芝回来了。”大伙儿霍地站起身来，拔腿飞跑。到了司令部，他们觉得很奇怪，很新鲜，跟平常大不一样。哨兵甚至没有立刻放他们进去，而是先要去通报一声，向谁通报呢？向米哈伊尔·瓦西利也

维奇。这是他们最熟悉的同志，一起亲密地工作过，相处得不分你我。这是不是在做梦呢？哪儿会是做梦，分明眼前站着持枪的哨兵，很不友好地瞪着他们，因为他们莽莽撞撞地硬要闯进门去见司令。他们在走廊里踱了一阵，觉得很尴尬，谁都尽量不瞧谁。

“请进来，”有人喊了一声。

他们走了进去，受到了热情的、不拘礼节的、同志式的亲切接待。他们觉得，站在他们面前的依旧是那个朴实的、平易近人的、和蔼可亲的同志。他们不象刚进来时那样拘束了。这时，他们突然又看到了一桩新鲜事：伏龙芝周围坐着一些军事专家，这不是什么“小鲈鱼”，而是真正的“大扁鱼”——是一些旧校官和将军。他们老是对伏龙芝说：“是这样”，“不能不是这样”；他们点着头，哈着腰，只要伏龙芝的话一出口，就顺杆往上爬。小伙子们明白，对这些人来说，这是“纪律”，非这样做不行，然而自己怎么也不能学他们那种腔调。小伙子们看见司令，差点儿要叫出他的小名“米沙”来了，谈话的时候还顶顶撞撞，好象以前开党委会一样……将校们听着他们谈话，有点莫名其妙，茫然失措地望着他们，尴尬地微笑着，他们更加小心了，生怕同这班刚来的小伙子们混在一起，谈话出轨，僭越犯上。所以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刚来的四个小伙子，另一个就是那些军事专家。伏龙芝给他们谈了谈前线的情况，战局发展的趋势，以及当前应采取的相应措施。小伙子们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拚命想把他讲的话记住，弄个清楚，可是白费了力气，什么也没有记住，什么也没有弄清。第一，他们没有看过地图，所以村镇也好，据点也好，他

们听来都是一些空洞的名称；其次，“战略”、“战术”、“机动”以及其它一些术语，他们只有一般的概念，而没有深刻的体会。

不多久，专家们告辞走了，留下的全是自家一伙人，“音乐会马上改弦更张”：全部计划详细地、坦率地摊了出来。费多尔从侧面打量伏龙芝，暗自惊异，为什么伏龙芝对军事这样内行，为什么问题掌握得这样准确，为什么难题到他手里都能迎刃而解？他对什么都了如指掌，判断情况毫不费力，样样事都考虑到，预见到——可真不是凡人啊！要知道，他不久前不还是个普通老百姓吗？还在伏龙芝刚担任指挥员的时候，就已经崭露出他独具的许多特点：灵活、机敏、理解问题全面透彻，分析问题周密及时，考虑问题面面具到，执行任务沉着稳健。他充满信心，充满必胜的巨大信心，这种信心不是空的，而是有事实作根据的。

他们坐着聊天，一起回忆故乡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回忆曾经相处在一起的伙伴，回顾不久以前的工作。他们一直聊到半夜才分手。第二天一清早，伏龙芝又匆忙出发，奔往萨马拉去了。行前对他们说，任命书将由萨马拉寄给他们，接到任命书之前，他们只好呆在这里，呆在乌拉尔斯克，暂且在党委会里工作一段时间。这件偶然落在头上的党的工作，整整占据了他们八天时间，一直到四个人都被分派到部队为止。

四个人私下这样议论过：

“米哈伊尔·瓦西利耶维奇……气色可不太好……”

“大概是……工作太多啦……”

“脸色发黄，人也瘦了，真叫人担心……”

“不光脸色发黄，还有点儿发青啊……瞧，这儿的部队，简

直是一伙发疯的暴徒，这种人闯的乱子还能少吗？据说，已经不止一次下命令不许乱放枪，可是结果怎么样，咳，你听听看！”

他们把耳朵贴到窗上，窗外果然呼呼嘭嘭响着零乱的枪声。

“无政府主义，该死的东西！”安德列耶夫气愤愤地咕哝了一声，然后沉默了片刻，又用平静的语调充满信心地低声说：“我们不仅要摧毁一切，而且要改造一切……”

二月二十三日，红军诞生一周年的盛大节日就要来临了。筹备工作照例早就开始了，可是庆祝活动的实际组织工作，三四天以前才开始进行，现在才完成了。细心的洛帕里到这里的第二天就发现，这里的党组织太薄弱了，庆祝活动实际上没有人管，如果没有人积极过问，没有靠得住的人把这件事抓起来，那末庆祝活动肯定要吹的。革命委员会告诉洛帕里，说这件事由党委会负责，可是他找到党委会，党委会又往回推给革命委员会，推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委员会身上。在洛帕里坚持下，很快召开了一次会议，邀请了一些工人代表出席。可是革命委员会还是没有派人参加，于是洛帕里决定自己冒着风险，担当起一切责任，他宣布这次会议有效，有权，他扼要地报告了即将举行的庆祝活动的情况，并说庆祝活动的组织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他建议选举一个能认真办事的执行机构，他当选为这个机构的主席，安德列耶夫为秘书。工作总算搞起来了。全市划分成几个区，确定了举行会议、群众大会和专题报告会的地点，确定了谁在哪儿做报告，以及使用剧场、电影

院和乐队的办法……他们同各个工会取得了联系，调来一批男女工人，指派其中一部分人负责搭讲台，另一部分人去参加印刷传单、标语和《雅依克真理报》，女工们负责照管孩子。这一天，要改善孩子们的伙食，领他们去看戏、看电影。三天工夫，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二十三日清晨，一队队工人，以工会为单位，从四面八方涌向中央广场，一行行地排在主席台两侧，中间让给军队。战士们这一天身上也收拾得整洁一些了。广场上人山人海。演说……一个接一个地发表演说。“地雷”的精辟、通俗，而又简短的发言，最受工人和战士们的欢迎，感到很亲切，很真挚。“地雷”讲完以后，普列苗特金照例跳上台去，他一拉开话匣子，就絮絮叨叨，车轱辘话来回转，没完没了，讲的都是尽人皆知、早已听厌的关于对付“反革命多头蛇”的一番大道理……要是没有人打断他，阻止他，他准会一个劲地吹下去……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过去了。普列苗特金还在滔滔不绝地讲。人家已经扯了他两次衣服，可还是不管用。大家实在不耐烦了，天气又这么冷，红军战士们早已冻得直跺脚。人快冻僵了，再也忍受不住了，洛帕里从后面斩钉截铁地对普列苗特金大声说：

“如果你不立即停止，我就要喊‘乌拉’了。明白吗？”

普列苗特金赶忙回过头，扫了一眼，两只浅色的眼睛射出恶狠狠的目光。当他看到洛帕里脸上那种坚决的神情，他才明白这个人不是在开玩笑，于是急忙煞了车，从台上爬了下来，钻到人群中去了。今天的演说是通常的……这一天在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到处都发表这样的演说……晚会也是通常的……大概到处都开得一个样：演说、演出、电影……

人们从广场出发，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在全市举行了示威游行，而后来到烈士公墓，这里也搭了讲台，"地雷"和洛帕里登台发表了演说。普列苗特金也跳上了台，要讲话，但被人及时阻止了，没有讲成。在洛帕里回忆到长眠在地下的死难同志们的时候，讲到烈士们为了什么牺牲，我们应该怎样纪念他们的神圣业绩的时候，他的话悲愤慷慨，充满了生气和力量，全场的人听了心头沉重，一个个全神贯注地静默了好久。突然一声枪响。这孤零的一枪，也许纯粹是偶然的走火，可它却象信号一样，使这儿的所有的部队，都兴高采烈地开起枪来，来一个"瞄准上帝"射击。枪声震天动地，乱放一通，根本不象是隆重地鸣枪致哀。在这一片混乱中，如果有个白匪想撂倒几个站在台上的布尔什维克，那可是轻而易举了。在闹哄哄的骚动中，谁也不会注意，也认不出是谁干的。如果台上的人溜下来呢，那又觉得难为情，他们就只好站在高台上硬挺，一直等到红军战士们把子弹打光为止。洛帕里站在上面，脸色苍白得象惨淡的月光。在这几分钟内，他经受到象进了坟墓一样的恐惧。以后，他一直没有，就是在最可怕的残酷的战斗中，也没有感受到这样惊心动魄、不禁瑟瑟发抖的莫明恐惧。当一个人感到自己一筹莫展、听天由命的时候，那他的处境是再糟糕也没有了。

在乌拉尔斯克，红军节过得还算不错。可是州里过得怎么样，就无从知道了，指示没有来得及发下去，只是一般地通知一下应该做些什么。包奇金和费多尔·克雷奇科夫还在红军节的前一天就到前线去了。他们随身带去手头有的一切印刷品，《雅依克真理报》特刊、文告、各种传单。两个人一直到了半

夜才回来。他们叫醒正在熟睡的安德列耶夫和洛帕里，兴致勃勃地对两个迷迷糊糊、睡眼惺忪的朋友讲起他们在前线的情况：他们如何受到热烈的欢迎（他讲到"前线"两个字的时候，显得洛外的自豪），战士们怎样感谢送去的礼物和纪念品，怎样听他们的演说，并请他们以后再去。两位睡意未消的老兄对这番激动人心的话语，反应却很冷淡。安德列耶夫蒙蒙眬眬地骂了一句，说他对这种"无稽神话"早就腻烦透了。看来，话不投机，无法再谈，虽然他们很想把这次到真正前线去的奇妙旅行，滴点不漏地讲一讲，但是由于没有听众，也只好闭口不言了。我们四位朋友就这样过了红军节这一天。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正当四个人吃过饭，聚在一起的时候，来了一封电报：洛帕里和捷连季明晨到旅部报到！

完了！分手的时刻终于到了！

大家思想上有一种突然的感觉，内心充满着异样的惜别之情。两个人明天早上先动身，还有两个人兴许随后也要出发，这本来没什么奇怪的……他们盼的正是这一天嘛！但四个人的心里还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洛帕里和捷连季突然显出一种罕有的尚武精神，仿佛他们以前只知道打仗似的……安德列耶夫比平时更加沉闷了，费多尔若有所思，一声不吭，嘴角挂着微笑，倾听着即将动身的两个同志的激动异常的谈话。

早晨，捷连季和洛帕里坐上雪橇，同留下的两位朋友吻别以后，就启程了。这时又来了一封电报：安德列耶夫留下来，到师里当政治委员，费多尔·克雷奇科夫去亚历山大罗夫-盖

依，整顿一个新编师的政治工作，该师师长已任命恰巴耶夫担任。

费多尔看完电报怔住了，一时简直不敢相信。他又把电报看了第二遍、第三遍……一点不错：

恰巴耶夫……

他突然感到太阳穴在抽动，血液在奔流，激动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同这样的英雄一起……同恰巴耶夫并肩……这事儿真有点蹊巧……真是出了奇迹：我一直梦想能见到恰巴耶夫，把他当成传奇人物，可现在突然要和他一起……就在他的身边，就象现在我同安德列耶夫在一起一样……兴许，我们俩还会处得很亲密，成了很要好的同志呢！……嘿，见鬼，真有趣，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从那时起，费多尔只有一个心思，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快一点见到恰巴耶夫。他不管谈什么，总是三句不离恰巴耶夫。根据电报判断，恰巴耶夫眼下不在亚历山大罗夫-盖依，正在准备到那儿去，但是没关系，没关系……还是要马上赶到亚历山大罗夫-盖依。于是费多尔等不到第二天，过了三个钟头就出发了。他同安德列耶夫，这一对好朋友，亲切而又简单地告了别。费多尔走了，剩下安德列耶夫一个人留在乌拉尔斯克。

四　亚历山大罗夫-盖依

费多尔听人说，乘火车，差不离第二天就能到阿尔盖（亚历山大罗夫-盖依的简称）。可是后来才发现，要在叶尔绍夫、乌尔巴赫和红库特村换车。换三次车，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凡是在一九一九年乘过火车的人，一定能体会到，一路上换三次车，可不是容易的事儿，那简直是活受罪。费多尔约略地估摸一下，这段路程平均算起来，得走一个半星期左右。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在杰尔加契下了车，换乘驿车，从杰尔加契到亚历山大罗夫-盖依，一直走，只有一百五十俄里。

沿途又是一片草原，旷野，蔚蓝色的地平线，一望无际的茫茫积雪……有的地方雪已融化，露出了黑色的小土丘。如果不刮大风，白天出太阳，天气变暖和，那么，载歌载舞的明媚春天很快就要来临了。这儿草原上，村庄稀疏，相隔二十五到三十俄里才见到一个。这儿的人，生活丰裕，不愁吃穿，跟外界不相往来，姑娘们也很少嫁到外村去，本村人同本村人结婚就已经足够了。每一个村庄，就象一个小小的共和国：自由自在，有吃有穿，万事不求人，有很浓厚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到阿尔盖必须经过一些大村子，有奥辛诺夫-盖依、奥尔洛夫-盖依、库里洛沃……这些村子在乌拉尔草原的内战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这些村子不仅输送出个别志愿加入红军的战士，而且组建了整团整团的红军部队。当然，这些村子里也有不

少富农投靠了白匪，可是大多数人始终站在红军一边，这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实。一九一八年，哥萨克打进了库里洛沃，由当地富农作眼线，到处搜捕苏维埃干部，这时，村里广大的劳动群众奋起抗敌，抄起刀枪棍棒，打死好多哥萨克，没打死的也都给赶跑了。于是他们决定建立自己的部队，叫库里洛沃团。其它村子，也在差不多相同的情况下，建立起自己的地方部队，如多马什金诺团、普加乔夫团、斯捷潘·拉辛团、新乌津斯克团、小乌津斯克团、红库特团等等。他们建立这些团，最初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战士和指挥员（一开始并没有政治委员）都是本村人，因此大家紧紧地抱成一团，彼此相处了几十年，有些人是多年的老朋友，还有不少人有亲戚关系。比方说，在库里洛沃团里，就有父子六人同伍的父子兵，然而，也有另外一种现象，本来很要好的朋友，突然分道扬镳了：一个投奔了白匪，一个加入本村团队当了红军。还有比这更为离奇的怪事：一家人分成两派，一半投了白匪，一半参加了红军。

不久，这些为了保卫本村而建立起来的地方团队，随着局势的变化，不得不离乡背井，开到了遥远的乌拉尔草原去打高尔察克，打完了高尔察克又回到草原，然后又从草原出发，开到前线去打波兰地主武装。

各团之中，英勇善战，功绩卓著的要算穆斯林团了，它是由十四个民族组成的，人数最多的是吉尔吉斯人，他们一直遭受过寄生生活的哥萨克富翁们的残酷无情的剥削，因此对哥萨克怀有刻骨的仇恨。这些志愿部队确实创建了许多英雄业绩：他们没有炮弹，也缺少子弹，装备低劣而且残缺不全，衣服褴褛，缺鞋少袜，可是他们能长期坚持下来，打起仗又顽强，又

勇敢，多次顺利地打败了起来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乌拉尔哥萨克。在作战方面，他们自始至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在政治方面，他们并不是一下子成熟的，也不是一下子领会到和弄清楚当时展开的社会斗争的起因和规模。他们松松垮垮，对"自由"有着独特的看法，长期来一直要求指挥人员由选举产生，对中央提出的任务和颁发的指示也理解得不正确、不清楚——这一切就是这几支敢打敢拚的、清一色农民志愿部队有别于中央俄罗斯部队的特点，这些特点以后还保留了很久。

亚历山大罗夫-盖依，同别的"盖依"，如奥尔洛夫-盖依、奥辛诺夫-盖依，甚至同所有那些草原上彼此相象的村庄，没有什么两样的地方：它也是疏疏落落、空空旷旷、村中心很脏，四郊泥泞难行。在那个时候，亚历山大罗夫-盖依曾经是一个热闹的地方：旅部、政治部、各种指挥机关和作战部队，都驻在这里。这儿交通方便，四通八达，可以通到希里纳亚巴尔卡、巴依-土尔干和波尔特-阿尔图尔，还可以通到乌拉尔斯克，这里同各战斗部队、各领导中心都保持着密切联系，车辆络绎不绝，人员来来往往，一队队骑兵，到了这儿，马不卸鞍，停一会儿，又赶往别处去了。一批批的军用物资，装在农民的大车上，慢悠悠地拉着，或者由高傲的骆驼摇摇摆摆地驮着，这儿运进，拉出，装上，卸下，一片繁忙。这在亚历山大罗夫-盖依，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景象。当地的"知识界"每天晚上在广场上，在主要街道上举行象赶集一样的游艺会，这时，为阿尔盖女人的姿色所倾倒的红军战士们，自然也不会蒙头去打瞌睡……

旅政治部经常召开红军战士大会和有当地居民参加的军

民联合大会。在这些集会上，主要是做千篇一律的"形势报告"。吸引居民们参加政治生活，当然比红军战士要困难一些。红军战士们都愿意参加大会，听报告，听的时候思想也很集中。他们要求多召开一些这样的会议，希望讲得更多些、更详细些。他们的愿望是好的，可是，却不能经常得到满足。这不是由于政治工作人员不够，不是的，在当时当地，政工人员，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主要因为当时的军事形势不允许经常举行这样的大会：四周都是哥萨克，随时可能发动突然袭击，让大批手无寸铁的战士集在一起，那会造成重大的灾难。

当时主持政治部工作的是一个彼得堡工人，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约日科夫，人很年轻，二十一、二岁左右，但是政治上已经很成熟了，他为人聪明，工作认真，同时还兼任旅政治委员。在村子里，不仅指挥人员和红军战士十分尊敬他，而且居民们也都十分尊敬他。大家热爱他，因为他讲话很真诚，很通情达理，很委婉动听；因为他从来不开空头支票，总是说到做到；还因为村里从未发生过骚扰居民的事情。这一点确实应该归功于他对红军战士的思想教育。战士们热爱他，特别是因为他在行军中总是同他们在一起，打仗时，他象普通的战士一样，同大家一起卧倒、冲锋。

应当说，在当时，在一九一九年初，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基本上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政治工作的形式和方法还不明确，许多政治工作人员，特别是下级政治委员，不过是由一些觉悟较高的战士担任，他们只能做到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使一个红军战士认识到应该怎样经受饥饿、寒冷和缺衣少鞋的考验，应该怎样忍受行军跋涉的各种艰苦，应该怎样英勇作

战，而在必要时能够从容而光荣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由于连续不断地打仗，不可能抽出几个星期，更不可能抽出整整几个月，用来进行一次比较集中、比较系统的思想教育工作，只能偶尔组织一次"政治突击活动"，而真正的政治教育只好拖到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进行了。在亚历山大罗夫-盖依，政治工作的情况，同其它地方相比，不算坏，也不算好。这里的预备队人数很少，他们只是暂时到这儿休整一下，不会停留太久。大部分兵力都在火线上，一刻也不能离开。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除了那些从事"坐板凳"工作的人外，常常走出政治部到前沿阵地去，带去书刊、新的命令、指示和手册，在那里同政治委员、党支部挂上钩，作一些必要的指导；如果有机会，也到红军战士中间进行一些工作，一旦需要，就放下指导工作，拿起步枪，投入战斗。正巧在那些日子，在三月初，旅政治部的三名工作人员在哥萨克大队人马的追击下，同一小队红军战士沿着峡谷往后撤，在敌众我寡的战斗中牺牲了。

政治工作人员在几支农民部队里享有很高的威信，正如那些优秀的、勇敢的、忠诚的红军战士一样。在这方面，约日科夫是受到大家特别尊敬的人物，战士们总是拿他作为自己的榜样。

到三月初，前线一直位于波尔特-阿尔图尔附近，这是一个被炮火毁坏得只剩下断墙残壁的小村子，它位于通往斯洛米欣斯卡亚镇的大路旁（距阿尔盖几十俄里），穿过这个哥萨克镇，就是一条由乌拉尔斯克经勒比辛斯克、萨哈尔纳亚镇通往古里耶夫的公路。指挥中心设在乌拉尔斯克的那个军，正打

算在最近几天发动一次总攻，采用协同进攻的方法，先把哥萨克从乌拉尔斯克撵跑，撵得愈远愈好，而后再把哥萨克白匪军全部歼灭。从亚历山大罗夫-盖依方面发起的攻击，矛头直指斯洛米欣斯卡亚镇，然后再进一步扩大攻势，穿过奇任沼泽地，进至乌拉尔斯克-古里耶夫公路。这种机动的战术可以切断受乌拉尔斯克方面红军进逼而退却的哥萨克匪军的退路。进攻的日期临近了。阿尔盖旅正在进行紧张繁忙的准备工作。

费多尔一到阿尔盖，就直奔政治部。到了那里，他们就带他去见约日科夫。约日科夫身上裹着一件厚实的黑皮大衣，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羊皮高帽，脚穿一双毡靴，独自一个人坐在一间高大的、空荡荡的、根本没有生火的办公室里。他正在用通红的、冻得发颤的手指翻动着堆在桌上的一叠叠文件。

室内陈设十分简陋：一张桌子加一把椅子，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桌上放着一段蹩脚的、已经短得不能再用的铅笔头；一个灯盏，里面盛着叫人呕心的污水，大概是墨水；一支龌龊钢笔，活象一根熏得黑不溜秋的蜡烛，一个自己做的吸墨器，两本政治小册子，一本"公文"簿，还有一堆堆乱七八糟、各式各样的纸头。两个人见了面，互相问好，各自作了介绍。费多尔把伏龙芝的电报交给了他。那电报上写着："兹派克雷奇科夫同志到亚历山大罗夫-盖依军主持政治工作"（由于补充了新的部队，原来的旅扩编为军了）。

约日科夫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电报，一声不响地又还给了费多尔。过了一会，他突然说：

"来，"他说，"我先帮您安排一下，怎么样，喝杯茶吧！路上

辛苦啦，您先休息一下！”

费多尔本想马上就跟约日科夫谈谈工作，了解一下总的军事形势、政治工作的情况、事态发展的前景、采取的措施，以及各方面的条件等等——一句话，他想马不停蹄，立即投入工作。可是约日科夫却急急忙忙，很关心地把他带到自己房里，热情地张罗开水和面包。这样，谈工作的事，只能搁在一边了。约日科夫占的一套住房很大，空落落的，一无所有。这套住房，中间是客厅，两侧是卧室，他把其中的一间让给费多尔住下来。客厅里有一架钢琴。约日科夫刚让费多尔坐定，自己就跑到钢琴旁边，弹起革命歌曲，他弹得并不高明，但却一首接一首地弹个没完。屋子里很冷，琴声激荡响亮。

两个人慢慢地扯了起来。费多尔望着他那年轻、苍白、严肃的面孔，仔细地端详着，想到有这么一个好小伙子领导着这儿的政治工作，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也象平常两个人初次见面一样，在开头一个小时里，就相互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以前做党的工作的历史和工作情况，怎样到了前线，以及目前想要做哪些工作。他们谈得似乎很融洽，可是费多尔总觉得约日科夫忙着要到什么地方去，又象是有点儿烦躁不安，又象是受了什么委屈，有些不满。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直爽、坦率和朴实的人，然而此时此刻，他却始终没有对着费多尔的眼睛正视一下，而是眨巴着眼睛，望着地板，搓着两手，坐不安稳，不时地突然站起身，笑起来很勉强，不是发自内心，态度也过分谦虚，只要费多尔一说什么，就赶忙表示赞同……

“真见鬼，搞的什么名堂？”费多尔暗自问自己，可是自己

也回答不上来，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摸透约日科夫的心思。

他们回到政治部冰冷的办公室里，在这里谈话，自然而然地带上了公事公办的味道。约日科夫很少说话，他闭口不谈自己的任何事情，只是听到费多尔提出了问题，才三言两语回答一下，很勉强，干巴巴的，好象不屑一答似的。可是有哪一个同事进来，他立刻笑脸相迎，拉起来没完没了，扯的话显然毫无必要。如果他真是一个爱饶舌的人，那末，这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然而费多尔的判断不错，约日科夫根本不是这一号人，他不爱多说话，尤其是在正式的场合下；他无论下达命令、说明情况，或是解答问题，总是恰到好处，简单明了。现在，他故意喋喋不休，又使克雷奇科夫觉得这是一种反常现象。他奇怪，为什么约日科夫不愿意跟他，费多尔谈话，而一看到他的同事进来就如此高兴呢？

从约日科夫三言两语的回答可以得出结论：这里的党支部都已经建立起来了，同志审判会的工作搞得很出色，各种刊物也有不少，报告会、大小室内会议和群众大会都按时举行，而且效果不错，等等，等等——一句话，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堪称模范。所以费多尔到了这里，用不着再去"布置和开展"什么工作，这儿的一切都准备停当了……

坦白说，费多尔来接这个新的工作的时候，自己也感到相当困难。以前他从来没有到过前线，前线的情况一无所知，因此，他谈不上"指教"约日科夫；他到这儿来，是抱着真诚愿望来工作的，一句话，不是发号施令，而是来实干的。他根本不计较什么隶属关系。他跟约日科夫第一次谈话时，就把这个想法坦率地摊了出来。可是约日科夫总是哼哼哈哈，所以费

多尔也弄不清约日科夫对他的这种坦率态度究竟抱什么看法，是好呢，还是坏？现在费多尔在办公室里跟他谈话，听到的只是牙缝里挤出来的几句回答，因此费多尔决计以后做事要分外谨慎和讲究策略，他发觉，由于任命他来担任这个新职务，约日科夫降到了下属的地位，从在旅里和整个阿尔盖的巩固地位上摔下来，因而感到受了委屈。到眼下为止，约日科夫是唯一有威望的政治中心人物；条条线都通到他那里，谁碰到问题总是来找他解答，只找他，不找別人，可现在，突然冒出个克雷奇科夫——全军的政治首脑，旅只不过是它下属的一个部分……这下可完了！地位可能会发生动摇。克雷奇科夫会逐渐地把他压下去，从统治地位上排挤掉。费多尔心想，这就是使约日科夫感到不安的疑虑所在，也就是他们见面一个半钟头以后，他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不友好态度的原因所在……

克雷奇科夫警惕起来，他不再深问下去。凭一个组织者的敏感性，他懂得下一步该怎么做。

首先，他决定阅读一些文件和报告，实地了解一下旅的工作情况。如果不能通过约日科夫，就通过他的助手和同事，搞到正式报告和所有的资料。

其次，他坚决要求召开各党支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经济检查委员会的各种小型会议和召开全体军事委员会议等等一系列会议。这有助于他一下子看到并了解到许多事情。

接下去他打算到各个部队去转一圈，看看工作安排的确实情况；最后，他想以普通一兵的身分，亲自参加当前的战斗，以此赢得优秀同志和勇敢战士的称号。这些行动将对他今后政治工作的成败产生很大影响。

最近几天，直到发动进攻之前，费多尔一直坚持不懈地执行着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他不止一次地到组织科、文教科和情报科找同志们谈话，可是到处遭到抱着某种偏见的冷遇，到处都能感到约日科夫的思想影响。他下了很大功夫，总算搞到了一份整个工作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也是十足的公式化，这种缺点，直到后来，费多尔更广泛地开展政治工作后，还碰到过几十次、几百次。按照通常的格式，报告一开头先写“起由”，接着便指出初期的“混乱状态”，再接着就讲到“工作逐步走上轨道”，但在某些部队“还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报告的结尾总是说已经采取许多“有效措施”，无疑能纠正目前存在的一切缺点。

总的说来，在这些夸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各团的书刊发放工作做得相当认真负责，并且建立了许多小图书室；识字班由于战事频繁，完全停止了活动，即使有时上课，来的人也很少；各种委员会到处都已经组织起来了，但只有个形式，没有见到有关它们活动的确实报告，群众大会虽也举行，但不经常，倒是业余文艺小组，三天两头儿演出，观众也十分踊跃。报告的大体内容就是如此。这份干巴巴的动态报告，还是或多或少地提供了一点全旅政治工作的概貌；不过，现在费多尔已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自己亲自下部队，直接到现场摸情况上面了。

他曾经想召集部分政治委员开个会，但也遭到抱有偏见的抵制，他曾经指定召开各支部代表的会议，可是压根儿没有开起来；他曾经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可是政治部没有通知下

去，到会的都是碰巧赶上的，只有五六十人左右。工作很不顺利。不能让这种情况再继续发展下去。费多尔只盼着恰巴耶夫快点来，因为他相信，恰巴耶夫一来，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一团团疑云就会顿时消散。

后天就要发起进攻了。为什么恰巴耶夫到今天还不回来？费多尔派人去问军部，但是没有得到答复。明天最后一批部队就要开往哥萨克塔洛夫卡，并向波尔特-阿尔图尔运动：在发起进攻之前，他们必须进入出击阵地。

司令部在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对进攻的详细计划作一次决定性的讨论。这次进攻预定由三个点同时开始，这样布署，不完全依靠出奇制胜，主要还是依靠我们的严密组织性和武器，特别是机枪的优势。费多尔当时对于军事还不大在行，只能注意地听大家在军事会议上的发言，自己并不参预讨论和争论，同时还留神地端详着一个个“专家”的面孔，心里思忖：

“这个家伙，会不会是叛徒？他这股热情劲儿，是不是在做戏，在装相，来蒙哄我们的弟兄呢？到明天，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摇身一变，由朋友变成敌人呢？”

他屏息静气地注视着上校旅长的面孔：

“他会不会是……？”

但是旅长的面孔，并不令人觉得可怕，反而立刻博得别人对他的好感，对他的信任。

“可是你，一个政治委员，还得提高警惕啊！”

军事会议结束了。大家离开了司令部。

整整一个白天，整整一个晚上，军车一辆接着一辆，骆驼

队一队接着一队，向哥萨克塔洛夫卡进发。亚历山大罗夫-盖依的军队走完了。到明天最后一批开拔后，这儿就成了孤零零、无力自卫的村子了。

五 恰巴耶夫

大清早，五六点钟光景，有人用力猛敲费多尔的房门。他开门一看，是一个陌生人。

"您好！我是恰巴耶夫！"

费多尔的蒙眬睡意消失了，仿佛有人猛击他一下，使他顿时从睡梦中清醒过来。他迅速地朝来人的脸上瞥了一眼，赶忙伸过手去，竭力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我是克雷奇科夫。您到了多久？"

"刚下火车……弟兄们还在那里……我已经派马车……"

费多尔用锐利的目光飞快地把恰巴耶夫浑身上下扫了一眼，恨不得马上看个仔细，里里外外全看透，全了解清楚，仿佛在漆黑的夜晚，前线，前线上的警犬——探照灯在搜索，急速地把灯光刺入每一道缝隙，赶走每个角落里的黑暗，把大地羞答答的躯体，赤裸裸地暴露无遗。

"蛮平常的一个人，瘦瘦的中等身材，看上去不大壮实，一双纤细的手，几乎跟女人的一样，稀疏的深褐色头发，有几绺垂下来，贴在前额上；清秀的短鼻子老爱抽搐，细细的眉毛象条链子，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嘴唇薄薄的，下颏刮得很干净，

嘴巴上留着两撇又浓又粗的八字胡。一双眼睛蓝幽幽的，近乎碧绿。他目光敏锐，不大眨巴，充满着智慧。他的脸色发暗，但很有精神，很洁净，没有粉刺，也没有皱纹。他身穿一件草绿色的弗列奇式上衣，一条蓝裤子，脚登一双鹿皮靴子，手里拿着一顶带红帽圈的帽子，两肩交叉地斜挎着武装带，腰里插着一支手枪。他把银光闪闪的军刀和一件绿色的长大衣往箱子上一扔……"晚上，费多尔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恰巴耶夫的形象。

谁都晓得，一路上很辛苦，现在该好好地喝几杯茶，可是他茶不喝，却站着同人说话。他派一个传令兵去把旅长请到司令部去，随后他也过去了。不一会，跟恰巴耶夫一起来的弟兄们一窝蜂地乱哄哄地拥了进来，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角落里，桌子上，椅子上，窗台上，到处都是帽子、手套、皮带。手枪也是乱放一气，有的人从腰间解下白色的瓶状手榴弹，毫不在意地塞在硬梆梆的帽子和手套堆里。他们的面孔黝黑、严肃，很威武，嗓音粗重而浑厚，动作笨拙而粗犷，说起话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是很有力，很中肯。有的人讲话的样子，简直有点儿可怕，令人以为他一直在跟谁吵嘴呢：问起话来，硬梆梆地突然冒一句，答起话来，也那么生硬，好象火气挺大。房间里东西到处乱丢……谈话声和争论声震得屋子嗡嗡直响。来客非常活跃，到处"扩散"，只是没有闯到约日科夫的房间里去，因为门反锁着。

过了两分钟，费多尔看到有一个客人往他那被子没有叠好的床上一倒，跷起两脚，搁在墙上，抽着烟，向旁边抖着烟灰，不偏不倚正巧落在克雷奇科夫放在床边的小皮箱上。另外一个客人靠在一只不太结实的"梳妆台"上，咔嚓一声，把台子

压塌了，歪倒在一边。有一个人用手枪柄砸碎了一块玻璃。还有一个人把一件又脏又臭的老羊皮袄，放在桌上，盖住桌子上的面包，后来人家一吃这面包，臭气冲鼻。伴随着这一帮子人冲进来的，好象还比这帮子人进来得早一些，是一阵阵坚定有力、闹哄哄的谈话声。这声音一分钟也没有停歇过，但也没有再向高潮发展，自始至终以同等的频率嗡嗡嗡嗡地响着；这恰恰是这些精力充沛的草原人习以为常的说话风度。他们中间，谁是上级，谁是下级，你不妨分辨一下吧！连一点儿苗头也看不出：他们的称呼都是一模一样，举止作风也都是同样生硬，也都具有他们自己的风格，充满着草原上的那种豪爽而朴实的特色。真是一家人啊！然而，却看不出来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亲近的表示，也没有什么谦让客套和虚情关怀，哪怕是在最细微的事情上面，也没有表现出一点点来。同时，你又可以看到，感觉到，这是一群结合得很紧密的人，不过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是一般的纽带，而是另一种独特的形式；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团结在一起的是出生入死的、动荡不定的战斗生活，使他们接近的是大无畏的精神、个人的英雄胆略、脚踩千难万险的气魄、忠贞不渝的友谊、舍身相助的风格——一句话，是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中度过的千辛万苦的、然而又是绚丽多彩的生活。

恰巴耶夫就与众不同了。他多少有了点文化修养，看上去不那么粗野，举止谈吐也和大家不大一样，他好比一匹自己给自己套上了笼头的草原上的野马。大家对他的态度也有点两样。打个比方吧，有时一只苍蝇在玻璃上爬，勇敢地爬呀，爬呀，撞上了一些同它一般大小的苍蝇，于是就从它们身上跳过

去，爬过去，或者撞了一下，就各自飞走了。可是，后来突然碰上了一只黄蜂，吓了一跳，嗤——飞走了！恰巴耶夫的部下也是这样：他们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无拘无束，想扯啥就扯啥，有时拿帽子、匙子、靴子打来打去，甚至拿杯子里的开水泼来泼去。但是一碰上恰巴耶夫，就不敢同他这样胡闹了。这倒不是因为大家怕他，或者因为地位不同，而是出于对他的特别尊敬。他们说，他虽然是咱们一家人，可是跟咱们完全不同啊！可不能把他同大家一样看待。

这种情形随时可以感觉得到。不管他们在恰巴耶夫面前怎样放肆，怎样吵吵嚷嚷，甚至骂翻了天，只要恰巴耶夫一开口，情况就立刻改变。大家就是这样热爱他，尊敬他。

“佩季卡，到军运指挥员那里去一下！”恰巴耶夫命令道。

佩季卡立刻从人堆里站出来，一声不响跑步而去。他是一个瘦小的、黑皮肤的小伙子，专门执行“特殊命令”。

“俺过两小时出发，司令部的马要准备好！叫骑马的人先走，俺和波波夫坐雪橇。快去！波波夫，你跟俺一起走！”

恰巴耶夫威严地朝一个脸色焦黄、有点驼背的弟兄点了点头。这个人约摸三十五岁光景，一双灰色的、善良的眼睛流露着笑意，嘶哑的嗓音好象乌鸦呱呱的叫声。他体格强壮，而又敦实，但他的动作却象少女般轻柔，看起来非常不协调。波波夫象是正在讲一桩有趣、可笑的事。一听到恰巴耶夫叫他，顿时怔住了，灰色眼睛中透出的微笑，也象蜡烛一样地熄灭了。他很严肃地直盯着恰巴耶夫，并用目光来表示回答：

“是！”

恰巴耶夫接着又下达命令：

“除了波波夫，谁也不要去！还有政委也去，带上三个骑兵。其余的人都到塔洛夫卡找俺们，马不必跑得太快。傍晚赶到那里！”

“嗄……”恰巴耶夫向四周扫了一眼，看到他要找的人不在。“哦……俺已经派他走了……好，科奇涅夫，你到司令部去看一下。要是大家都到齐了，来跟俺说一声。”

科奇涅夫出去了。费多尔觉得他象个体操运动员，动作那末敏捷、轻盈、灵活和健美。他穿着一件棉紧身儿，两条袖管很短，后脑勺上扣了一顶小帽子，脚登一双半高腰皮鞋，绑腿一直裹到膝盖下面。他的年龄大概还不到三十岁，可是前额已经布满了皱纹；一对浅灰色的眼睛，显得很调皮；宽大的鼻头老是滴着鼻涕，呼哧呼噜一吸气，就往两旁歪扭，似乎有意做出一副很滑稽的样子。一口白净的牙齿，又大又长，活象狼牙；当他笑的时候，凶猛地呲着牙，好象要把人扯成碎块似的。

这儿还有一个契科夫。他那两道宽宽的褐色眉毛，两撇浓密的红胡子，一张鳄鱼嘴巴和一对蒙古人的颧骨，十分显眼。下嘴唇搭下来，好象一条吸足了血的水蛭；方形铁块一般的下颏向外突出，下颏的上面，有一只汗涔涔、鼓囊囊的大鼻子，活象泡在铁锅里的一只蘑菇；在褐绒般的眉毛下面，生着一对象煤炭那样乌黑的眼睛；他胸部宽阔，挺得笔直；一双强而有力的巨手，就象铲子一样。契科夫的年纪不过四十出点头儿。

正在烧开水，切面包的叫焦特金·伊利亚。他一面干活，一面不停地说着俏皮话，嘻嘻哈哈，还拿别人寻开心，跟大家

斗嘴皮子。焦特金是个立过功的赤卫队员，漆匠出身，为人厚道，性格爽朗，大家都很喜欢他；他爱唱歌，爱玩，爱逗乐子。他比佩季卡略大一些，约二十六到二十八岁的样子。

维赫里站在旁边，耐心地、一声不响地等待焦特金分面包。他是一个勇猛的骠骑兵，骑兵侦察队队长，有一颗火热的心，他左手少了一个小拇指，这断指成了大家挖苦他的靶子。

"维赫里，你拿小拇指捅捅这个四指老家伙一下！"

"你让我看看小拇指，我给你一支烟……"

"九指木头人……九条腿的骚公狗！"

维赫里不大轻易动火气的：他生来如此，一向如此，在打仗时也是如此。这个人能一声不响地做出好多事情来。

顶爱动手动脚，顶爱张口骂人，顶爱大吵大叫的是什马林。他穿着一件皮外套，脚上穿着一双厚毡鞋（他有病，老觉得冷），和波波夫一样，也是哑嗓子。他长着一对乌黑的眼睛，一头乌黑的头发，一张黝黑的面孔。在这伙人当中，他最年长：年近半百了。

马车夫阿维里卡是一个小鬼，这时他拄着那根马鞭子，同大家一起，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人们忙着烧茶，弄吃喝。他的脸色紫红，鼻子象颗大蒜头，一双眼睛由于霜打寒冻，老象睁不开来似的，嘴唇被风吹得裂开一道道口子；脖子上围了一条毛巾，睡觉的时候，也不解下来。

在传令兵中间，阿列克赛资格最老，他是个十分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人机灵能干，肯用心思。他跟恰巴耶夫老早就相识了。凡是需要什么东西，总是差阿列克赛去办，他准能搞得到，而且弄得妥妥贴贴地带回来。有时候要搞点儿吃的，或者

找一枚马车上的插销、一根马鞍上的皮带，再或者弄点儿常备药品，不派别人，单派阿列克赛去，因为他到哪儿都兜得转。

这里真是人才济济啊！一个人就是一种典型，你坐下来就可以写一部草原史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两个人一样的：真是人跟人各异，石头跟石头不同。然而大家合在一起，就成了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群英谱。一家人啊！而且是不平常的一家人啊！

科奇涅夫走进来报告：

“旅长已到司令部，可以去啦……”

大家悉悉索索地动起来。好几双眼睛好奇地盯住恰巴耶夫看。

“咱们走！”

恰巴耶夫朝波波夫一摆头，又用手指戳了戳施马林和维赫里。于是响起了马刺的铿铿声和打上铁掌的鞋后跟踏地的沉重的咔咔声，几个人走了出去。费多尔也跟着他们一起去了。费多尔觉得恰巴耶夫不大把他当回事，把他同自己的“随从”一样看待。这种猜疑使他在内心的深处埋下了不祥的恐惧。他想起别人对他讲过恰巴耶夫的一件事：那好象是在一九一八年的某次战斗中，恰巴耶夫和他率领的部队被敌人包围了。有个政治委员张惶失措，恰巴耶夫就在车上用皮鞭抽了他一顿……费多尔想起这件事，心里就七上八下，不是个滋味。他知道，这件事也许是瞎编的，也许是加枝添叶夸大了，可是又不能不相信；那个时候跟现在不同，那时的恰巴耶夫也跟现在不一样，况且政治委员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费多尔跟在后面；光跟在后面这一件事就已经使得他老大不高兴了。

恰巴耶夫匆匆地向旅长打了个招呼，三言两语，语调生硬，眼睛瞧着一边，而那旅长却恭恭敬敬，扫地一躬，而后两脚一并，马刺咔地一声，挺直身子，几乎连珠炮似地向他作了报告。关于恰巴耶夫的事他听到很多，但是讲的大多是坏的方面，简直把他说成流氓无赖，至于好的地方，也只知道恰巴耶夫是个怪人，而恰巴耶夫实际干的那些事儿，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草原上流传甚广的关于恰巴耶夫的英雄行为，他压根儿不相信。

爱看新鲜的人都从门里向外张望。这情景就象过去富商家里来了贵宾，“家眷们”争着从门缝里向外张望一样。看来，听到过有关恰巴耶夫的种种可怕的传说，不单是旅长一个人。司令部的办公室今天收拾得格外干净。大家各就各位，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事先都做了准备，谁也不想给自己脸上抹黑，不过还是有些担心：恰巴耶夫脾气暴躁，谁知道他发起火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当恰巴耶夫一行走进旅长办公室以后，旅长在桌上摊开一张线条标得很精细的明天进攻的作战图。恰巴耶夫把这张图拿在手里，默默地看了一下，然后又放到桌上。他拉过一只凳子，坐下来，其他跟来的人也随后坐了下来。

“圆规。”

一把旧的、生锈的圆规递了过来。他扳开，转了几下，不得心应手。

“维赫里，你到阿维里卡那儿把我皮包里的圆规拿来！”

过了两分钟，维赫里拿了圆规回来了。于是，恰巴耶夫开始用自己的圆规来量作战图。起初，他只是在图上量来量去，

后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地图，一段一段地在上面校正起来。他还不时地询问关于距离、沿途困难、水源、辎重、早晨灰暗天气、草原上暴风雪以及其它等等情况……

周围的人都默不作声。只是旅长偶尔插几句话或者回答恰巴耶夫提出的问题。地图上的条条线线，在恰巴耶夫的眼前展现出白雪皑皑的山谷，烈火熊熊的村庄，在暮色苍茫中，成纵队或成散兵线的红军战士，向前爬行的辎重车辆。在他的耳边呼啸着凛冽的晨风，在他的眼前闪过连绵起伏的丘陵、一口口水井、一条条冰封的蓝色小溪、一座座断坍的灰色小桥和一片片干枯的小树林。

恰巴耶夫在进攻！

恰巴耶夫用圆规量完后，给旅长指出计划错误的地方：一天的行程太长，休息的地点选得不妥，出发的时间过早，到达的时间太晚。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在他量地图的时候，用各种记号标出来的。旅长实在不太同意他的意见，有时还暗自发笑。但还是同意了，把意见记了下来，对标明的文字和画的路线都作了修改。在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恰巴耶夫不是问问维赫里、波波夫，就是问问什马林，似乎要从他们那儿寻找同情和支持。

"你有什么点子？喂，你是怎么想的？俺说的对还是不对？"

弟兄们不习惯在恰巴耶夫面前七嘴八舌。其实又有啥好补充的？他考虑得那么详细、那么精确，所以大家特地为他改了一条谚语：

"千万别去打扰恰巴耶夫……改条谚语对他最恰当：'三

个臭皮匠，抵不上一个恰巴耶夫’。”

这则新的谚语是大家专为恰巴耶夫编出来的，编得真是好极了。以前，他有几次采纳了别人的建议，结果懊悔死了，又是骂人，又是责怪自己。同志们不会忘记一次“咨询会议”的情况，大伙儿一时头脑发胀，信口乱讲一通，他一旁听着，听了很久，而且连连点头说：

“对，对……不错……很好……着，着，着，太，太，太好了……”

讲话的人当真以为他赞同这些意见。可是结果呢？

“嗯，算了吧，”恰巴耶夫说，“我看应当这么办：把你们胡扯的一大堆废话统统丢开，忘得一干二净。屁的用处也没有。现在你们听俺的命令！”

于是他打开了话匣子……

他一开口，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他讲的一套，跟大家刚才讨论了很久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维赫里、波波夫和什马林，他们三个人都参加过那次会议，记得清清楚楚。所以现在很少插嘴，只是在一旁默不出声。他们心里有数，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应该开口，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不应该开口。

“有时候也许应当出点主意，这样做是对的，可有时候，一句话也会闹出乱子来！”

现在大家都不吭声。费多尔几乎一直没有开口。他对军事方面的问题还吃不准，有些问题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搞明白，有些问题他还根本摸不着头脑。直到后来，经过了几个月，他才开始弄懂打仗以及前线上其它许多问题的奥妙；而现在，从

这个“老百姓”嘴里能问出个啥名堂来呢？

他倒背手，站在桌子边上，对着地图和作战图沉思着，一会儿皱皱眉头，一会儿侧过头去轻咳几声，生怕干扰这场紧要的谈话。他的神情严肃、沉着。旁观者可能以为，他在这里也是一个与众平等的会议参加者……费多尔早在同恰巴耶夫见面之前，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同他建立一种特殊的、谨慎的、微妙的关系：开始，避免同他谈纯军事方面的问题，免得暴露出自己是个十足的外行；要同他谈政治问题，在这方面，费多尔无疑要强得多，要引导他讲真心话，要他把所有的问题，包括把那些不便公开的、个人的癖好和生活细节也讲出来；要多谈些有关科学、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这样一来，恰巴耶夫势必少讲多听。以后……以后要表现一下，让大家知道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战士，这一点一定要做到，而且要越快越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在恰巴耶夫眼里，也可以说，在全体红军战士眼里，一切都完蛋了，政治也好，科学也好，个人品质也好，都将变得于事无补。等试探性的准备工作做好了，恰巴耶夫肯开诚相见，而自己对他也比较了解以后，那时就可以同他进一步接近了，然而现在——现在必须小心行事啊！但是最好不要引起别人的误会，以为他对恰巴耶夫这样尊敬，这样照顾，是为了巴结这位“英雄”（他当然知道，他的名声很响，很多人都争着和他结交，并引以为荣）。只有到以后，当他成了“精神俘虏”，乐意听费多尔的话，也许还想向费多尔学一点东西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够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可来不得半点骄傲自大，现在必须在相互关系中表现出诚恳、热忱，甚至还要带点儿粗鲁，不要让人家认为费多尔是个“白面书生”。在

前线，白面书生总是遭人怀疑，遭人白眼的。

克雷奇科夫的这一切准备工作绝不是婆婆妈妈的琐事，它帮助他通过最简便、最可靠的捷径深入到红军战士中间，开始同他们一起工作，而为了工作，必须同他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虽然还不知道，“结合”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可是他十分明白，恰巴耶夫和恰巴耶夫的部下，这些半游击作风的群众以及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一种复杂的现象，眯起眼睛去观察这种现象是不行的。这里除了优秀分子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人，同他们打交道要谨慎小心，要毫不松懈地、敏锐地注视着他们的表现。

恰巴耶夫是何许人呢？克雷奇科夫又是怎样看恰巴耶夫的？为什么他恰恰要和恰巴耶夫建立一种特殊的、微妙的关系呢？这样做究竟有没有必要？

费多尔还在后方工作的时候，当然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阅读过那些歌颂纵横驰骋在国内战争各条战线上的“人民英雄”的故事。但是当他仔细观察以后，他发现，他们大多都是农民出身，很少是来自城市工人。工人中的英雄向来都是另外一种作风。由于费多尔生长在大工业中心，看惯了纺织工人进行的有条理、有组织的广泛斗争，因此对于象恰巴耶夫这样的人民英雄所搞的那一套半无政府主义的游击做法，总是有点儿看不顺眼。但这并不妨碍他专心地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并且为他们的英雄行为感到高兴。不过，他一直提心吊胆，现在也仍然如此。

“恰巴耶夫是位英雄，”费多尔暗自思忖着，“他体现了农民们长年积压在心头的那种无法遏止的、自发的、愤怒和反抗

的情绪。但这是一股自发势力……谁知道他将来会发展到什么样子！以往我们队伍里也有过象恰巴耶夫这样出色的指挥员，可是一翻脸会把自己的政委一枪打死。难道这种事儿还少吗？再说打死的并不是什么骗子手、吹牛家和胆小鬼，而是优秀的、英勇无畏的革命家！弄不好他也许会干脆带了自己的'自发'队伍去投奔白匪……

"工人，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永远不会背叛，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背叛，当然这是指那些自觉参加斗争的工人。不消说，在工人中间也有昨天的农民，也有觉悟低的工人和由于觉悟'过高'而变成精神贵族的人……不过，只要你跟他一打交道，你马上能够看得出来。在恰巴耶夫这群骁勇善战的、游击作风盛行的好汉里，哎哟，危险性可不小啊！"

由于费多尔对自发的游击习气有着这种疑虑，他才想通过一种最巧妙的方式同这群新的伙伴建立起相互关系。他的打算是，不能跟这些人随帮唱曲，相反，要使这些人在思想上受自己的影响，首先要从他们的头儿，从他们的领袖，也就是从恰巴耶夫身上下功夫。于是，费多尔把全付精力都倾注到他一个人身上……

佩季卡——现在大伙儿都习惯这样叫伊萨耶夫了——把他那长得象鸟儿一样的小脑袋瓜儿，探进门来，一勾小拇指，把波波夫招呼过去，递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马和一切东西都正（准）备好了，请你去包（报）告瓦西里·伊凡诺维奇。"

佩季卡知道，在有些场合，在有些情况下，他不能随便往里闯，这时候，他总是写张纸条递进去。这一回，纸条递得

很是时候。事情已经商量停当，作了决定，并且签了字，命令马上就会送到各个团部。交接手续占了一点儿时间：

"俺是来指挥的，"恰巴耶夫说，"不是来同公文扯皮的。那是文书的事。"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波波夫低声地对他说，"我看，你的事情已经办完了。一切都准备妥了，可以走啦……"

"准备妥了？咱们走！"

恰巴耶夫很快地站起身来。

大家闪开一条路，恰巴耶夫第一个走了出去，就象他第一个走进来一样。

在外面的台阶旁，聚集着一群红军战士，因为他们听说恰巴耶夫到这儿来了。有许多人还在一九一八年就跟他在一起打过仗，有许多人以前见过他，当然啰，他的名字，没有一个人不是早就听说过了。大家伸长脖子，眼睛里闪烁着喜悦和惊异的光芒，脸上堆满了恭维的笑容。

"恰巴耶夫万岁！"恰巴耶夫刚走下台阶，站在前边的一个人就大声喊了起来。

"乌——拉！……乌——拉！……"

红军战士们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老百姓也围了上来。人越聚越多。

"同志们！"恰巴耶夫向大家说。

顷刻间，鸦雀无声。

"现在俺没有功夫讲话，俺要上前线去了。咱们明天在那里见吧。咱们已经给哥萨克准备了好吃的点心，明天请他们尝尝味道……有话以后再说，现在——再见吧！……"

又响起了一阵阵"乌拉"声。恰巴耶夫坐上了雪橇，波波夫也跟着跨了上去。三个骑兵也等在那里待命。给费多尔牵过来一匹乌龙快马。

"出发!"恰巴耶夫喊了一声。

马向前一冲，人群向两旁闪开，欢呼声更加响亮了。几匹马并辔徐行，一直到阿尔盖的村边。

白茫茫的雪原，景色单调，令人发闷。前几天天气转暖，小丘上的雪已经融化，露出了泥土，现在又被雪盖住了，整个草原雪封冰冻，大地咔咔直响。马儿撒着欢，轻快地奔跑着。恰巴耶夫和波波夫几乎是背靠背地坐着，别人还以为他们俩刚刚吵过嘴呢，其实他们正在考虑当前的问题，准备迎接明天的战斗。几个骑兵紧随在雪橇后面，相隔三、四步，不赶前，也不落后，总是保持着这样的距离，仿佛是固定在一起似的。费多尔骑着马靠边走着。他有时落下整整一俄里，于是又扬鞭催马赶了上来。在草原上纵马驰骋，马儿撒欢奔跑，四蹄腾空如飞，这多么令人神往啊!

"明天，"他暗自思忖，一面策马急行，身子不住摇晃。"明天就要揭开真正的战斗生活的一页……在这种卷着漩涡，滚滚奔腾的生活洪流中要呆多久呢？谁能预卜它的命运呢？谁能指出胜利的日期呢？究竟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赢得胜利？日复一日地骑在马上行军打仗，出生入死，担惊受怕……我们这些轻如鸿毛的小人物能活得下来吗？谁将重返自己的故乡？谁将永远留在这漆黑的洞穴里，留在这白雪覆盖着的荒原上?"

他心中勾起了对往日生活的回忆，眼前浮现出一张张可

亲的、熟识的面庞……他觉着自己已经被敌人打死，躺在雪地上，两臂摊开，额角上淌着鲜血。他甚至觉得怪可怜的。往常，这种对自己的怜悯总是变成了长时间的痛苦，可是现在，他将这种思想甩在一边，将它赶跑，从容地向前驰去，对死的念头，只是付之一笑。

这样走了两个半钟头。恰巴耶夫坐在雪橇里，一动也不动，后来大概有点坐腻了，于是叫雪橇停下来，让一个骑兵坐在他的位子上，自己骑上马。他催马向费多尔靠拢过去。

“政委同志，现在咱们走在一起了，对吗？”

“走在一起了，”费多尔回答说。他立刻发现，恰巴耶夫坐在马鞍上是那么牢稳，好象焊在上面一样。他又看看自己，却象是被绑在马上一样。

“要是再颠得厉害些，非甩下去不行，”他想，“可是恰巴耶夫，你瞧，人家怎么也甩不下来。”

“您老早就开始打仗了？”

费多尔觉得恰巴耶夫似乎得意地笑了一下，听口气，还有点讥讽味道。

“现在才开始……”

“那您以前一直在后方啰？”恰巴耶夫又问道。

这句话又有点尖刻。

要知道，“后方人员”在类似恰巴耶夫这样的战士们眼里，是最没出息、最不值钱的人。这一点，费多尔以前已经料到过，而最近几周来，经过同指战员们的多次一起行军，交谈，他对这一点更深信无疑了。

“您问在后方吗？我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作过

……"费多尔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说。

"莫斯科过去吗?"

"莫斯科过去三百多里地。"

"嗯,那边怎么样?情况好吗?"

费多尔一看话题转了,满心高兴。他毫不放松地抓住最后一个问题,给恰巴耶夫介绍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纺织工人,介绍了他们那忍饥挨饿的困苦生活。为什么单讲纺织工人呢?难道那里没有别的人吗?这是克雷奇科夫的老习惯,只要一讲起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他眼前就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队伍。他由于跟这支队伍息息相关而感到自豪,当他回忆起自己的同志,多少要流露出一点儿得意的神情。

"原来他们生活得很苦,"恰巴耶夫严肃地点点头说,"都是因为闹饥荒,要是不闹饥荒,哼,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可是您瞧那些狗崽子们,大吃大喝,他们全不顾……"

"谁大吃大喝?"费多尔没有弄清他的话。

"哥萨克人……他们死人不管……"

"哦,不过也不是所有哥萨克人都是这样的……"

恰巴耶夫坐在马上神经质地咕哝着。

"全一样!"恰巴耶夫叫了起来,"您不知道,俺告诉您:全是一个样!这没啥可说的……对,就是这样!"

"不会都是这样的,"费多尔反驳说,"多多少少,总有一些人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好,您等一下,"他兴奋地想起一件事来。"就拿我们这个旅来说,有一个骑兵侦察队不都是哥萨克人吗?"

“在咱们旅里？”恰巴耶夫稍微思忖了一下。

“对，对，就在咱们旅里！”

“这——准是城里人……未必有本地的哥萨克，”恰巴耶夫还想竭力为自己的观点辩解。

“我可不知道是不是城里人，不过事实明摆着……对，恰巴耶夫同志，不会是全体哥萨克人，对，不会是全体都反对我们。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为啥？你跟我们多呆一些日子，就会……”

“不，不管我在这儿呆多久，反正我不相信！”

费多尔的语调很坚决，很严厉。

“零星几个人有啥说的，”恰巴耶夫开始有点让步了。“当然，有来参加的，但是很少，难得有个把的……”

“不，不是个别的人，你说得不对……从土尔克斯坦来的消息说，那里的哥萨克部队在全州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还有在乌克兰、在顿河流域……这还能说少吗？”

“你去指望他们吧，那么有一天他们会给你点颜色看看……这群狗东西！”

“嗨，有什么可指望的，我没有指望他们，”克雷奇科夫向恰巴耶夫解释说，“你的意见里也有很多实情话……不错，哥萨克的确象一群黑乌鸦，这话很对……有谁反对这个看法呢？正因为这样，沙皇政府才对他们大施恩泽啊……可你看看哥萨克的青年人吧！他们同老头子不一样……青年人大多投到咱们这边来啦。要一个白胡子的老哥萨克甘心服贴苏维埃政权，当然比较困难……至少在眼下，当他们对苏维埃政权还不了解的时候，那是很难办的……谁知道他们对我们有什么想

法，加上他们对什么风言风语都当真：他们说，我们要把教堂变成牛棚，我们要共妻，要把大家都赶到一块儿去住，吃喝都得在一张桌子上……他们祖祖辈辈跑惯了教堂，过惯了富裕的日子，占惯了别人的劳动果实，习惯了自由自在的草原生活，他们又怎能甘心呢？”

“破（剥）削者，”恰巴耶夫吃力地说着这个外来词。

“正是这样，”费多尔忍住笑说，“事情的关键正是在于剥削。有钱的哥萨克人不光是剥削不属于哥萨克的农民和吉尔吉斯人，而且还不择手段地盘剥自己的哥萨克兄弟……这就产生了矛盾。只有老年人，虽然他们也受欺凌，但是肯逆来顺受，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而青年人，看问题比较单纯，比较大胆，所以多半就靠拢我们……老家伙们的思想扭不过来了，只有用枪杆子来感动他们……”

“对，用枪杆子，用枪杆子，”恰巴耶夫摆了下头说，“打仗是不那么容易，要不……”

费多尔不明白恰巴耶夫说这句话的用意，但是觉得他话出有因，话里有所指。他没有搭腔，只等恰巴耶夫把他的用意进一步说明，进一步发挥。

“你瞧，咱们的总部……”恰巴耶夫又吐出一句含糊的、但惹人注意的话。

“哪个总部？”

“就是那个，那里什么混账王八蛋都有，”恰巴耶夫似乎在喃喃自语，可是声音很响，费多尔听得清清楚楚。“以前，这些狗崽子们罚老子背上全付武装，在冰天雪地里站上几天几夜，可现在倒好……将军先生，这里有沙发，请坐吧，请随便下命

令吧；他们就说，子弹可以发，也可以不发，叫他们用木头棍子去打仗吧……”

恰巴耶夫触到的正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关于司令部、将军、命令和惩罚违抗命令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感到如梗骨在喉的不光是恰巴耶夫，也不光是恰巴耶夫手下的人。

“少了将军们还能行嘛，”克雷奇科夫用平和的语调宽慰恰巴耶夫说，“少了将军那还打什么仗呢？”

“咱们照样打……”

恰巴耶夫紧紧地抓住缰绳。

“不行，打不了，恰巴耶夫同志……单凭猛打猛冲是成不了大事的。要有知识。可我们哪里有呢？除了这些将军，谁能给我们知识呢？他们学过这一套，他们应该教我们……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教师的，可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有还是没有啊？问题就在这里。既然没有，就得向别人学习呀！”

“学习？对，很对！可他们能教给咱们点啥呢？教点啥呢？”恰巴耶夫激动地反驳说，“你以为他们会教给咱们真本事？……您等着他们来教吧！……俺自己在他们那个军事学院里呆过，混了两个月，晃晃悠悠，象是水里头的一条游鱼。后来，去他娘的，干脆回来了。咱们弟兄们在那里没啥事好干……有一个叫佩奇金的，是个教授，头秃得精光，就象您的膝盖一样。他在一次考试时问我：

‘你知道莱茵河吗？’他问。

俺在整个德国战线上打过仗，哪会不知道呢？可俺当时一想，干吗要回答他这个问题？

'不，不知道。您自己知不知道索梁卡河？'我说。

他瞪大眼睛，没料到会来这一着。

'不，'他说，'我不知道。你问这干什么？'

'这就是说，您用不着来考我……我可在索梁卡河受过伤，五次打过去，又五次退回来……您那个莱茵河跟俺有什么相干，管俺的屁事？可索梁卡附近的每一个土墩，俺都应当知道，因为咱们正在那里同哥萨克打仗呢！'"

费多尔哈哈地笑了起来，用惊异的目光看了恰巴耶夫一眼，心想：

"恰巴耶夫，这个人民英雄的想法该有多么幼稚啊！看来，真是各人有各人的特点。有的人喜欢学习，有的人却学不进去。一个人在军事学院里呆了两个月，竟然没发现一点好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学到。这个人也是挺聪明的，只是太粗了，需要好好磨一磨……"

"您在军事学院里呆的时间太少了，"费多尔说，"两个月里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学到手……这可不容易……"

"压根儿不去就好啦，"恰巴耶夫摆了摆手说，"俺用不着学啥，俺自个儿全知道……"

"不对，怎么用不着学呢，"费多尔反驳他说，"总有东西可学的。"

"是有东西可学，可是不在那儿，"恰巴耶夫激动地紧接着说，"俺知道有东西可学……俺也想学……可是俺要告诉您……您姓什么来着？"

"克雷奇科夫。"

"俺告诉您说，克雷奇科夫同志，俺大字识不了几个，四年

以前我才学会写字，可俺已经三十五岁的人了！俺这一生可以说是摸黑过来的。咳，扯到哪里去了，下次再谈吧……看，前面大概是塔洛夫卡了……”

恰巴耶夫用马刺一磕马。费多尔也照样来了一下。他们追上了波波夫。十分钟以后，他们来到了哥萨克塔洛夫卡。

六　斯洛米欣斯卡亚的战斗

哥萨克塔洛夫卡是一个被烧得精光的小村子，村内只剩下三间熏黑的土坯房，到处竖着烧黑的烟囱，又细又长，很难看。恰巴耶夫他们现在住下来的这间破房子挤满了红军战士，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他们歇在这里等待出发的命令。

恰巴耶夫一行人没有惊动他们，也没有赶走他们。躺着的还照样躺着，坐着的又挤了挤，让出一条板凳，而后又自动地把那些鼾声如雷、妨碍谈话的人叫醒。

黄昏，草原上腾起一片烟雾，破屋里黑沉沉的。战士们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截教堂里点的蜡烛头，放在一只油腻的茶碟上。大家围着桌子，摊开地图，研究考虑翌晨进攻的细节。恰巴耶夫坐在板凳中间。两只手放在桌子上：一手拿着圆规，一手拿着削得很尖的铅笔。团长、营长、连长、还有一些普通的战士围成一圈，有的把臂肘支在桌子上，有的俯着身子，有的弯着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看着恰巴耶夫在地图上量来量去，看着那白色的小圆规象仙鹤一样叉开两腿，跨着不规则的步

子。费多尔和波波夫并排坐在板凳上。说实在的，这称不上什么会议，只是恰巴耶夫一个人在介绍情况，讲讲步骤，谈谈注意事项。

大家静悄悄地听着。有的人在记下他的某些指示和意见。在肃穆的寂静中，只听见恰巴耶夫威严的话语声和酣睡的战士的打鼾的哨音和咕咕声。一个躺在屋角里的战士打起呼哨来就象轻快地吹着笛子。旁边的一个人用泥污的靴底慢慢地、但是很着力地在他鼻子上一蹭，他霍地跳了起来，呆头呆脑地、懵懵懂懂地睁开惺忪的睡眼，向四周看了一下，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轻一点，大萝卜！”旁边的人气咻咻地吓唬他。

“让谁轻一点？”

他那双没有睡醒的眼睛痴呆呆的惹人发笑。

有人朝他背上捶了一拳，他才清醒过来。小伙子站起身，揉揉眼睛，定睛一瞧，才知道恰巴耶夫在这儿。于是，他轻轻地踮起脚尖，注意地听恰巴耶夫讲话，一直听到讲完；可是指挥员究竟讲了些什么，他也许一点儿没听懂。

过了不久，恰巴耶夫的其余部下也从亚历山大罗夫-盖依赶来了。他们一拥而入，把一间破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恰巴耶夫继续在训话：

“……要不马上行动，那就等于白费劲了。一定要突袭！你猛地扑上去，他们就一步也动不了……两小时以后，大家就从这儿出发。明白吗？拂晓前必须赶到波尔特-阿尔图尔，趁着天不亮，摸着黑打响战斗。明白吗？”

大家向他点点头，表示同意，并且轻轻地回答说：

“明白了……当然要摸着黑，黑漆漆的，正好……”

“你们都拿到了命令，”恰巴耶夫继续说下去，“在命令里，什么地方停下来休息，什么时候出发行军，都规定了时间。同志们，要相信咱们这一仗一定能马到成功，这一点是最主要的……要是你对胜利缺少信心，那你干脆甭去……俺规定的只是时间和地点，光靠这两点还不能取胜，还得各人动脑筋，把事情办好……第一件事就是严防泄密，我们的行动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千万千万……万一走漏风声，事情就完蛋了……要是路上遇到哥萨克人或者吉尔吉斯人，甚至农民，要统统扣下来，不能放掉，以后再处理。”

“已经碰上几个了，”不知是谁在屋角里喃喃地说了一声。

“碰上，就扣起来，”恰巴耶夫高兴地接住话头往下说，“你对他，对哥萨克人要多加提防。你可知道，哥萨克是什么人，这种敌人会一下子从桌子底下跳出来。这儿是他们的老窝，每一条小路，每一条土沟，他们都清清楚楚……这一点你们也必须记住。跟他们，跟这些哥萨克人不要多搭讪，你跟他一搭讪，他就要打你的主意……”

“说得对……就是这么回事……哥萨克人总是从背后给你……”

讨论正事就到此结束了。

万能的佩季卡弄来了面包，烧了一锅水，还弄到了六小块嫐过的灰色的方糖。大伙儿高兴起来，吵吵嚷嚷，乱嘈嘈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高了。有些战士行军以后，睡得正熟，这时，懵懵懂懂地醒过来；有的是被喊声惊醒的，有的是被重重一

拳打醒的，有的是被皮靴、步枪、大衣碰在脸上给弄醒的——真是说也说不完。每个人都拿着碗匙忙碌着。经过五分钟，小桌子移到了屋子中间，大家围着桌子，凑合着坐在马鞍上、木板上或者劈柴上，有的干脆蹲下来，有的坐在地上。那截教堂里用的黄蜡烛头，闪着暗淡的光。烛光中，一个个黑影在浮动着，一张张面庞犹如一块块黄蜡蜡的斑点。

费多尔感到自己在这新奇的环境里显得很特殊。他觉得没有人理会他。有谁理会他？为什么要理会他呢？虽说自己是政治委员，但这又算得上什么呢?!在军事方面，他现在还作不出什么指示，而做政治工作，眼下又不是时候。既然这样，人家为什么要去理会他呢？"总有一天我们会合得来的，"他暗自思忖着，"现在不妨在角落里靠边站站。"

身居这个亲密无间的战友大家庭中间，他甚至感到很孤独。他看到，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人，甚至象佩季卡这样一个脏小鬼，同大家的关系，比起他克雷奇科夫来，要亲密得多，热乎得多，知心得多。他看到这情景，甚至有点嫉妒。他们对自己的恰巴耶夫是多么尊敬啊！恰巴耶夫一跟谁说句话，谁就会受宠若惊，并认为这是莫大的幸福。如果恰巴耶夫对什么人夸奖几句，那这个被夸奖的人就永远不会忘记。同恰巴耶夫坐在一张桌子旁，同他握一次手——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以后就到处去讲，讲得那么带劲，那么郑重，添油加醋，有声有色。

费多尔从破屋里出来，正想到野外走走，忽然听到屋子里有歌声。于是他又踅回来，挤到桌旁听唱歌。

是恰巴耶夫在唱歌。他的嗓音又尖又响，有些发颤，乍一

听，好象很刺耳。可是你仔细听下去，你就会觉得，当恰巴耶夫唱他心爱的歌子的时候，他那种发自肺腑的深情和热情洋溢的神态，会将你紧紧地吸引住。他心爱的歌子不多，一共只有四、五支。这些歌词，同志们都能背得烂熟：看样子，他们是常唱这几支歌曲的！恰巴耶夫能把调门拔得很高很高，叫人担心他会吊不上去，可是，他从来没有一次唱失声，有时他喊得过了头，嗓子喊哑了，于是愁眉苦脸，闷上四、五天。他不唱歌，就烦得慌，然而他又是没有一天不烦的。不问情况多么危急，行军多么劳累，不问一仗打下来多么气喘吁吁，也不问劳动以后多么想打个瞌睡，无论如何他也要挤出哪怕十分钟的时间，唱上一支歌。象他这样的唱歌迷，哪儿也找不到。唱歌对他来说，如同面包和水一样。他手下的弟兄们，一向和乐成风，爱一块凑热闹，于是也就跟着他唱了起来：

水手啊，你长得多漂亮，
你的年纪二十来岁。
快真心地爱我吧——
看你对我说什么？

这支歌从头到尾东拉西扯，很空洞，很贫乏。恰巴耶夫比较喜欢这支歌的叠句，因为它同这种游击式的、动荡不定的生活十分吻合。

航行在海上，在风浪中飘荡，
今天在这里，明天又驶向远方！
啊，航行在海上，海上，海上，

今天在这里，明天又驶向远方！

这段叠句合唱起来，就象穿过满天乌云的雷声，在草原的上空轰鸣。他们还喜欢唱歌颂斯捷潘·拉辛和丘尔金头领的歌儿，还喜欢唱：

在自由中成长起来的雏鹰，

囚在潮湿牢房的铁窗里……

大家说说唱唱，一直闹到半夜，然后，各显神通，找个地方钻了进去，一下子都睡着了。

进攻计划规定在拂晓前到达斯洛米欣斯卡亚附近，三个团从三面同时发起进攻：驻在塔洛夫卡的这个团从中间直插斯洛米欣斯卡亚镇，另外两个团向两翼迂迴，形成一个半包围圈。

驻在塔洛夫卡的这个团，预定很快地就乘大车出发，最迟不过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但是现在还不见动静，看不出一点战斗临近前的不安迹象。

费多尔久久不能入睡。他倒在地上，头枕着冰凉的哥萨克马鞍，也很想睡一下。可是，硬是睡不着啊！不知是由于头枕马鞍睡觉不习惯，还是由于在第一次战斗前的夜晚，胸中波涛起伏，狂风止不住嘶鸣呢！

他们倒不在乎！他们都已身经百战：有的多次受过震伤，有的骨头被打断了，有的脑壳被打穿过，有的身上有好几处枪眼儿——他们都毫不在乎！对他们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战前之夜——有什么稀罕啊！不少这样的夜晚，他们都是在鼾声

中度过的，在他们看来，这种夜晚同往常的平静之夜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每一个人，这里的每一个人一定都有过自己的"第一个战斗之夜"。当时，他们也必定象费多尔一样，在无法解决的内心矛盾和充满着忧虑的期待中心烦意乱，思潮起伏，任凭着一个个痛苦的念头对自己进行无声的折磨。

费多尔怎么也睡不着，不仅睡不着，而且心头还感到无法解释的、从未有过的沉重。他向四周一瞥，借着教堂用的那截蜡烛头的惨淡微光，看见战士们横七竖八，蜷缩着身躯，挤成一堆，分不清面目来。

"战场上八成也是这样，尸体东躺西卧，乱糟糟的一片。死前抽搐了一阵，身躯都蜷曲起来。有的地方成堆，有的地方孤零零地一个，而被机枪扫死的战士却一排排整齐地躺在地上。"

在昏暗中，战士们的面色显得更加苍白，活象停尸房里的尸体，他们的鼾声，有时象放联珠炮，有时象吹长哨，有时象呻吟般的长吁短叹……

费多尔觉得实在睡不着，索性走到户外。呼吸一下寒夜清澈的空气，会不会好一些呢？草原之夜，一片黑暗，万籁无声。绿莹莹的星星闪烁在高空，风是那样轻柔，那样放纵，只有草原上才刮这样的风。

在这被烧毁的村子里，全团战士都头顶青天，睡在断墙残壁之间。有些地方，隐约看见个别战士伛着腰，孤独地坐在快要燃尽的篝火旁边。他们有的是值勤的哨兵，也有的是象费多尔一样的可怜虫，被失眠折磨着，不知道如何消磨战前的漫漫长夜。他们懒洋洋地把从草原上拾来的湿木片和细树枝投

到火堆里。草原上是找不到木柴的，他们小心翼翼地拨动着余烬，生怕把篝火弄熄了，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有几处，三、四个人一起，围着火堆，忙着用锅子煮汤烧开水，那儿不时传来一阵阵哄笑，哄笑声又象远处的雷声渐渐消逝。小伙子们打着哈哈，寻开心。为了消磨行军前的时光，都在各显神通。

夜，漆黑、漆黑，阴森森的。四周在蠕动着，到处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不由使人毛发直竖，这给草原上的寂静更增添了恐怖的气氛。

高大的、毛茸茸的骆驼，象幽灵一样，从容地、庄重地在草原上、在废墟旁动来动去。令人悚然的影子在黑暗中时隐时现。一些人影忽而从黑暗中跃入颤动着的明亮的火光中，忽而又很快地消失在黑夜的深渊里。到处都笼罩着一种难以理解的、高度的紧张气氛，显然在等待着一件最终就要到来的大事：等待着战斗！

尔后，费多尔不止一次地在等待黎明的战斗中度过漫长的夜晚。这些夜晚都是一个样子：极端的肃穆、无比的深沉、阴暗而又庄严。在这样的夜晚，当你从一列列红军战士的队伍里走过去的时候，当你从正在沉睡着的红军战士的头上跨过去的时候，你就会浮想联翩，会想起我们的战斗、人间的苦难，以及这些为了摆脱苦难的牺牲者，他们将在内战的沙场上没没无闻地死去，留下一具具生蛆的尸体。

“行军劳顿的战士们正在躺着。而明天天一亮，他们就要投入战斗，一会儿散开，一会儿成纵队，一会儿匍匐，一会儿跃进，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伏倒在小坑里，这些小坑是用小铁锹三

下两下挖出来的，或者是用冻僵的手指扒出来的……许多人将要倒下去，永远也起不来了：他们将默默地、静静地躺在这荒凉的原野上……他们躺在原野上任凭乌鸦啄食。这些年轻的、孤伶伶的孩子默默无声地来到前线，又无影无踪地离开战斗的行列。他们每一个人毫无保留地、一声不响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既没有鼓声的伴奏，也不为人们知晓，更没有受到人们的歌颂。他们没没无闻地倒下了，就象喷着火焰的钢制怪物身上掉下了一颗小螺丝钉·…”

费多尔看到一个体魄健壮的鬈发青年，弯着腰在火堆上烘土豆。他把土豆翻过来掉过去，不时把土豆投到快要熄灭的篝火堆里……又不时地把刺刀插到灰堆里，把土豆戳出来，用手指摸一摸，小心翼翼地送到嘴唇旁边——这可是刚出火的啊！他咝地吐了一口，又用刺刀尖戳着土豆擦到灰堆里：他把全部心思都泡在这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现在，在他的脑海里是不是也盘旋着千万种烦恼，瞬息万变的回忆呢？……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行将熄灭的篝火，在沉思着什么呢？一定在思念自己的家乡，回忆过去的工作和为了上前线不得不抛下的往日的生活！现在他又多么想重过这种生活。啊，要是能再过这种生活，那该多么高兴，多么欢喜啊！这一夜，他想的可真不少啊！……可是到了明天早晨，说不定会被抬回这里，也许腿被打断了，也许胸膛被打穿了，或者脑壳开了花……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喘得很厉害，他咬着牙，慢慢地伸展打断了的、脆弱的四肢，但是伸不直。他的样子很难看，很怕人，遍体鲜血淋淋，浑身上下粘满了紫红色的血块……到那时，就要把那被人抚爱过的一头鬈发剃掉，剃成一个火光

头，然后用钢刀和钢针在那敏感的、鲜血淋淋的躯体上任意割呀缝呀…… ……哎哟哟……

他身旁还有一个长着火红色大胡子的乡下人，年纪已经不轻了，大概有四十来岁。他也在若有所思地坐着。两个人彼此默默无言，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他们那与大家息息相关，又与大家各不相同的生命脉搏，现在跳动得更有力，更频繁了……现在哪儿顾得上谈话，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这个长着火红色大胡子的乡下人，象是冻僵了似的，坐着纹丝不动，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肚子上，两只冰冷的脚紧紧地压在身子下面，一双昏昏欲睡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篝火出神——他在沉思。明天，他也许同现在一样，一动也不动地躺在茫茫的雪原上，躺在其他许多和他一样的冻得发黑、发紫的尸体中间，躺在洁白的、松软的雪毯上……只有在一处，唯一的一处，在鬓角旁，一股殷红的血，滴在雪地上，穿成了一个小小的黑洞……除此之外，周围就找不到其它的痕迹了。

那时，这两只干巴巴的、长满斑点的大手，就再也不会交叉地放在肚子上，而象在昏迷中，向左右甩开来，又象是有人把它们拉开，用无形的钉子钉在雪的怀抱里……昏浊的目光也将如同现在一样，凝视不动，那将是冰冷尸体的僵死的目光。

一幅幅在上次战争中留在记忆里的死亡图景，又重现在费多尔的眼前。他那时抢救和医治过许多伤兵……

"什么人？"哨兵大喝一声。

"自己人，同志……"

"口令？"

“枪机。”

哨兵把笨重的步枪换个手，冷得耸了耸肩，走开了，消失在夜幕里。

费多尔回到屋里，屋子里鼾声和呼哨声此起彼伏，犹如风啸雷鸣。他一眼看到在睡着的人体之间有一道夹缝，就巧妙地挤进去，蜷缩起身子躺了下来……躺下就睡着了。

当他们备好马，从塔洛夫卡向波尔特-阿尔图尔疾驰的时候，天色还黑洞洞的。（顺便问一下，为什么要把这已经化为焦土的小村子叫作“波尔特-阿尔图尔”呢[1]？）大家冻得浑身发抖，由于睡眠不足，一个劲地咧着嘴巴、大声地打着呵欠。黎明前，草原上又冷又静，寒气透过大衣和衬衫，象一根根细长的冰锥子扎在皮肤上。

他们策马前进，一句话也不说，只有快到波尔特-阿尔图尔的时候，漆黑的天空中升起了头几发榴霰弹爆炸的火光，这时，恰巴耶夫才回过头来对费多尔说：

“开始了……”

“是的……”

接着，又沉默了，在到达村子之前，没有交谈过一句话。他们用马刺磕马，马儿跑得更快了。心里好象压上了一块石头，并且由于那种无法解释的、不同寻常的激动而感到窒息。其实，在你走向战场的时候，总会感到激动，不管你是懦弱胆怯的，还是勇敢无畏的。泰然自若的人是没有的，硬说什么在战

---

[1] 这个村名和我国旅顺口的俄语旧译名相同。——译者注。

斗里，在炮火中，真的有那些完全泰然自若的人，那纯粹是骑士式的吹大牛，这样的木头疙瘩在人类中间是没有的。当然可以养成强作镇静的习惯，可以故作凛然无畏的姿态，也可以控制自己，不立即受外界的突然影响，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然而，在战斗中，在临战前的几分钟，是找不到真正泰然自若的人的——不，没有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无论是身经百战的战士恰巴耶夫，还是新兵费多尔——两个人的心里现在都充满着这种奇怪的感觉，既不是害怕，也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这是精神上的极度紧张，各种思想斗争的极度尖锐化和急迫心情——一种不可思议的、难以理解的急迫心情。要赶往哪里，为什么要这样特别匆忙——自己心里也没数，也不明白，然而，这些急遽的动作，这些简短的片言只语，急速而敏锐的目光——这一切都在说明，你在这顷刻之间，整个身心都处在一种自发的匆忙之中。费多尔想问恰巴耶夫几句话，想摸摸他的思想、他的情绪，但是一看到恰巴耶夫脸上那种严肃的、几乎是怒冲冲的神情，就赶忙不作声了。他们赶到波尔特-阿尔图尔村，看见许多辆辎重车停在这里，赶车的农民，仨一群，俩一伙，坐在被烧毁的村子的废墟上，他们从小锅里倒出滚热的茶，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饭，吃得又香又甜。恰巴耶夫跳下马来，爬上一堵用干粪块垒起来的残存的高墙，举起望远镜朝着榴霰弹爆炸的方向观察。清早的蒙蒙雾霭已经消散，天已大亮。他们在这里逗留几分钟之后，又跨上战马，向前驰去。迎面驶来一辆农民的大车，不知装着什么东西，上面盖着一件破旧的粗呢大衣。

“拉的啥呀，同志？”

“一个战士受伤了……”

费多尔往车上瞥了一眼，看见在大衣下面有个人体的轮廓，于是勒转马头，跟大车并排行走。恰巴耶夫继续向前驰去。

“伤很重吗？”

“很重，老哥……头和两腿都……”

“包扎了吗？”

“包扎了，这还用说，全身都裹上了。”

这时，伤兵开始哼哼起来，慢慢地把用绷带裹住的染满鲜血的脑袋，伸到灰色大衣的外面，睁开眼睛，用模糊呆滞的目光看了看费多尔，似乎在说：

“是的，老兄。半小时以前我也跟你一样，好端端的，……可现在，你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就离开了……我残废了……现在让别人去吧——轮到他们了……我问心无愧……一直战斗到最后。你自己瞧吧：我被拉回来了……”

这些想法断断续续地掠过费多尔的脑海。他心中感到难以忍受的沉重：这儿遇见第一个人……以后还会遇见其他的人……唉，那又怎样呢？以后看到那些人的时候，心头总会平静一点吧！因为这是打仗啊。但是，这第一个人，啊，你，你这刚刚受伤的第一个人，该有多么痛苦呀！

还有一些东西，也和这些思想一样，在费多尔的脑海里飞驰而过，但这已经不是思想，而是一幅幅画面。不久前，在昨天，在哥萨克塔洛夫卡，在篝火旁……也许，这个伤兵也和那个人一样吧？刚刚在昨天，不是在昨天，而是在昨天夜里，在

什么地方的篝火旁边烤着一只烂了一半的土豆，他用刺刀尖戳着土豆，不时从火里挑出来，拿嘴唇尝尝滚热的、烧焦了的……

费多尔策马飞奔，去追赶恰巴耶夫。可是恰巴耶夫大概从岔道下去了，他们在散兵线上才又见了面。

一辆辆马车，有的往前，上前线，有的从阵地上回来，有的拉着弹药，有的放空车去接伤员。迎面驶来的马车，装的都是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的东西：血迹模糊的躯体。

“咱们人离这儿还有多远？”费多尔问。

“没多远了，就在前边，大约五里路左右……”

在乌津河右岸，有几个吉尔吉斯人的屯子，哥萨克人已经被炮火从那里赶出去了。隔河望去，有两个红军巡逻兵在那里来回走动。他们察看每一块凹地，检查一堆堆的石头和干粪块，看看有没有受伤的同志埋在里面……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炮弹的爆炸声也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了……远处的散兵线已经隐约可见。怎么还会有五里路呢？说得精确点，两里路也不到。大概是因为炮火连天，那个农民就觉得路长了。

费多尔向第二道散兵线赶去，在那里遇上了恰巴耶夫。他和团长在一起走着。两个人严肃地、从容地交谈着。

“我派过一个人，他没有回来，”团长回答刚才的问话说。

“再派一个人去！”恰巴耶夫生硬地说。

“又派了，可是照样……”

“再派嘛！”恰巴耶夫坚持说。

团长沉默了片刻。恰巴耶夫心里很恼火，气得眼皮直打颤，两颗眼珠从睫毛下射出凶光，仿佛密林中的一头野兽在警觉地窥伺着。

"那边有人来过吗？"恰巴耶夫厉声问道。

"也没人来过。"

"多久了？"

"一个多钟头了。"

恰巴耶夫紧紧皱起双眉，一句话也不说，他不打算再谈下去了。费多尔明白他们在谈有关联络的事情。和一个团联络得很好，和另一个团一直没有联络上。后来才弄清楚，原来那个团里的战士对自己的团长，一个沙皇政府的旧军官，发生了怀疑。他们突然断定这个军官是带他们去送死的。因此他们不肯去，在原地耽搁了好半天，乱吵一通，刨根问底，于是把最紧张的时刻胡闹过去了。

费多尔和恰巴耶夫牵了马并肩走着。这当儿，波波夫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了，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焦特金·伊利亚，旁边还有契科夫。他们什么时候到这儿的，费多尔不知道，因为他和恰巴耶夫离开塔洛夫卡的时候，在忙乱中没有注意到，这几个小伙子当时是在屋子里，还是在唱了歌以后，趁着夜色，比他们先出发了。

这里距第一道散兵线有半里路光景。他们决定到那里去。但是突然狂风大作，是那样的突然，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这在草原上是常见的现象。跟着棉絮一般的大雪漫天飞舞，密密层层地打在脸上，叫人寸步难行。进攻停止了。可是暴风雪没有持续多久，半小时以后，散兵线又开始向前移动。

克雷奇科夫和恰巴耶夫分头到两个侧翼去，这时他们已经到了第一道散兵线。向右已经望得见奥夫钦尼科夫田庄。

"照我看，那里一定有哥萨克人的埋伏，"恰巴耶夫指着河对面说，"田庄附近必定要打一仗……"

这一回恰巴耶夫估计错了。哥萨克在强大的压力下，并没有企图据守这个庄子，他们打了一阵子枪，只是为了虚张声势，然后就不加抵抗，撒腿逃掉了。

他们快要到达斯洛米欣斯卡亚了，离这个镇大概还有一里半到二里路。这里是一大片平坦的开阔地，从镇子那面向这里打，特别方便，特别容易。可是哥萨克却一枪不发……为什么他们一枪不发？这种不祥的沉寂要比任何炮火都可怕。他们是不是在那里耍诡计，设圈套？只是在乌津河对岸有战斗，而这里，这里很平静。

费多尔骑着马，抽着烟，走在散兵线的前面，有意显示自己的勇敢：你们看，我的胆子有多大啊，骑着马走在散兵线的前面，不怕哥萨克人的子弹把我打死……

他充分显示出幼稚的逞强心理。但是在当时，逞一下强也许是必要的。首先，可以提高政治委员的威信；其次，这种年轻好胜的激情无疑能鼓舞战士们的斗志：如果有个人骑着马跑在散兵线的前面，那末后面的战士就一定会感到精神振奋，斗志旺盛，——这一点，散兵线上每一个战士都是深有体会的。当然，这种英雄好汉，只有在战斗打响之前，才可以逞一下，等到一开火，队伍一跃进，那就没多久好逞了。

恰巴耶夫马不停蹄地来回奔驰，他关注着各团间的联络，下达着运输炮弹的命令，不断询问辎重队的情况……

费多尔骑着马从一端奔到另一端，然后又回到右翼，下了马，牵着它走到散兵线中间。炮兵正在集中射击。村子里依然毫无动静。在对方还没有动静的时候，费多尔从容地走着，讲着笑话，摆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装作对这些事儿已经司空见惯。他简直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被火药熏黑了的老兵。但是要知道，这是他第一次经受战斗洗礼啊，对这样一个“老百姓”，还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咱们还是看一看，这个老兵在五分钟以后的表现吧。

哥萨克人等到散兵线离他们六百米左右的时候，就开起炮来。随着炮声，镇边的几个磨坊也响起了机枪。费多尔立刻着了慌，虽说脸上还没有显出来，但胸膛里却似乎有什么东西兜底翻了个儿，拚命往下沉，冰冷冰冷，仿佛在火热的心扉上浇上几滴冰凉的薄荷水。他还和方才一样，又继续向前走了一会儿，但是已经稍稍拉开了，有点落后了。他用马挡住自己的身体，跟在散兵线后面。

战士们卧倒了，又站起来，飞快地向前跃进，然后又卧倒，迅速地在雪上扒开一个小坑，象死人一样，垂下头，塞到坑里去。费多尔躲在马屁股后面，也向前跃进两三次，然后跳上马，飞奔而去……上哪儿？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他并不愿意离开战场，他只是想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别的地方，也许子弹不会这样嗖嗖地飞来，也许没有这种死神临头的可怕的危险……他沿着散兵线奔跑，可是现在不是跑在散兵线的前面，而是跑在它的后面了，他不知为什么朝左翼的边上跑去。这刹那间，他的面部表情非常严肃、认真。要是你碰上他，决不会想到，这个小伙子是吓跑的，你一定以为，他在

传送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通知，或者赶到危险的地方去完成一件十万火急的任务。

迎面遇上了波波夫，他正骑着马往右翼去。去干什么?也许和费多尔向左翼跑是一个目的吧？可是，谁知道他呢？在打仗的时候，这种事情是搞不清的，搞不清他是为了公事而脱离战斗，还是因为吓破了胆，晕头转向，到处乱钻，想找一个救命的地方。两个人迎面碰上，勒住马停下来，赶紧问起话来：

"有子弹吗？炮弹够不够？恰巴耶夫在哪儿？怎么才能找到他？"

提这么一连串的问题，是为了转移对方的视线。

当两匹马在原地打着圈子的时候，镇子那边已经注意到他们了，吃准这两个骑马的绝不是普通的士兵，一定是什么高级将领。于是，子弹雨点似地向他们射来，炮弹也纷纷在他们的周围开花，而且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一颗炮弹落在离他们五十米左右的地方，又一颗是三十米，还有一颗落得更近了。事情明摆着，敌人的火力已对准了他们！炮弹落下来，形成一个包围圈，圈子越缩越紧，连成了一个火环。

"快跑！"波波夫慌慌张张低声地、但很清楚地说。

又一颗炮弹在近处爆炸了。

费多尔一句话也没有回答，突然用马刺往马肚上一磕，离开散兵线，直奔后方而去……

波波夫也跟着跑去，但他又掉转了马头，迟疑了一会，后来就在右翼那边消失了。费多尔跑到一个土丘旁边，看见土丘后面躺着十来个赶车的。他在他们身边躺下来，注视着两

分钟之前他同波波夫一起打圈圈的那个地方，那里一颗颗炮弹正在爆炸。他把马拴在旁边的一辆大车上了。他躺在地上，倾听着炮弹掠过发出的咝咝的啸叫声。只要这种啸叫声一近，他立刻直挺挺地紧贴在冰雪覆盖的土丘的斜坡上，脸朝下趴好，一动也不动。过了一会，才慢慢地、提心吊胆地抬起头来，愁眉苦脸地注视着附近是不是还有炮弹咝咝地飞过来。他在这儿躺了多久——这有谁能知道呢？正是在这里，一颗流弹把同他一起躺在雪地里的三个农民炸伤了，要是他一直躺在这儿的话，说不定也会被炸死的。但在这之前，他已经站了起来，跨上马，正在立马踌躇：现在往哪儿去呢？这时好象来了个救星：有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打着马朝他飞奔而来。他气喘吁吁，神色慌张，谁也不瞧，自言自语地说：

"哪儿有机枪？这里有机枪吗？"

"什么机枪？"

"我们需要机枪，哥萨克人从左翼冲上来了……"

费多尔马上明白了，这位勇士同他自己一样狼狈。但他朝着这个骑兵所指的方向一望，只见不远的地方有黑压压的一大片涌了过来……他顿时心头一冷，头发也竖了起来。

"我到车上去找，马上拿来！"他喊了一声，一抽马，向着辎重车队的方向飞驰而去。

他跑到那里，张口结舌，不知说些什么。辎重兵们狡黠地斜溜了他一眼，相对笑了笑，大概他们已经料到这个小伙子是干吗来的。也许这是费多尔自己的感觉，说不定，这些乡巴佬根本没有理会他，他们说说笑笑，是为了叫这漫长而可怕的时间过得快一点，因为车子在这儿一停下来，不知要停多久。停

在这里干等，没有命令不准离开一步，而四周呢，炮弹在爆炸，在嗯啸，在寻找着牺牲品。流弹飞得很远，也会打到辎重车上来的。

有人开玩笑地说，派到辎重队去的都是些胆小鬼。可是你自己去干干吧！你就会知道，辎重队——这个胆小鬼的安乐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战士在散兵线里要强得多，每人一支枪。那里，成百成百的人一齐往前冲，在他们的前面还有机枪掩护，而机枪手又有炮火的支援。在散兵线里有多惬意啊！在那里，周围都是人，可以照顾照顾，到处都可以得到帮助。可是，你瞧瞧辎重队：二百辆大车，二百个乡巴佬，而二百个人的武器……总共只有十一支步枪！步枪只有十一支，子弹就更少了。有一挺备用的机枪，可是要修好才能用。再加上二百人当中有一百五十个人不会打枪，而那些会打枪的，也都是些残废人和体弱多病的，有些人连枪都扛不起来，只能干干勒勒马缰绳的活儿。你瞧，这就是辎重队！可是哥萨克人倒很喜欢辎重队：徒手可得的东西，他们为什么不要呢？百把个哥萨克骑兵猛扑过来，谁能抵抗，又有谁可以指靠，又能到哪儿去求援啊？哥萨克人在辎重队里横冲直撞，把辎重兵的头颅一个个地砍下来。十一支步枪都成了哑巴，原来都被哥萨克抢去了。你瞧，这就是辎重队，这就是胆小鬼的安乐窝。辎重兵们就这样心惊肉跳地呆在那儿，而在散兵线里就不会这样害怕。说什么辎重队里头的人都是胆小鬼，胆小鬼到什么地方都害怕，讲这种话太不应该，这是存心贬低人。要知道，在辎重队里，要比在散兵线上可怕得多啊！

克雷奇科夫的底细给看穿了，他又羞又愧，无地自容。他

无法插进来跟这些乡下佬说说笑笑。走吧，现在又到哪儿去呢？他只得尴尬地在辎重队里荡了一个半小时：一会儿借个火抽烟，一会儿又问饲料、车油、面包、罐头缺不缺，一会儿又问他们的家乡离这儿远不远，但是白费心思，话不投机。他的话空洞、枯燥，谁也不爱听；看样子，辎重兵们对他的话已经很厌烦了，他们不大客气地躲开了他，叫他讨了个没趣。时间象毒虫一样，慢慢地、缓缓地、一分一秒地爬过去，它折磨着、鞭笞着、吞噬着费多尔的心，似乎为他的怯弱、可耻行为对他进行报复。

大炮的吼声响彻四郊。轰隆的爆炸声震撼着田野，它仿佛一头被困的巨兽，到处乱窜，拚命狂吼。在炮火的鼓舞下，散兵线上的战士们，在隆隆声中，在呼啸声中，在吼叫声中精神抖擞地向前冲去。

恰巴耶夫纵马从散兵线的一端到另一端，来回奔驰着，他头戴红檐黑帽，身披黑色斗篷，迎风飞舞，好象魔鬼的两只翅膀。他那瘦削的身躯，稳稳地坐在哥萨克式的马鞍上，一会儿突然出现在这儿，一会儿又出现在那儿，到处神出鬼没。他一边跑着，一边下达命令，传达必要的情况，提出一些问题。指挥员们很了解恰巴耶夫的脾气，都简短、迅速地向他报告所需的情况，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丝毫的耽搁。

“机枪都没事吧？”恰巴耶夫边跑边问。

“都没坏！”有人从散兵线里高声回答。

“有几辆炮弹车？”

“六辆……”

“指挥员在哪儿？”

“在左翼……”

于是，他又向左翼飞驰而去。

战士们神速地向前冲去。猛然间，哥萨克人的机枪向散兵线扫来。战士们立刻卧倒，趴在硬梆梆的雪地上，一动也不动，等待新的命令。

恰巴耶夫从后面奔上来，简短、迅速、有力地下达了命令，急匆匆地听了听汇报。

他突然掉转马头，飞驰到炮兵连长跟前：

“向磨坊开炮！”

“摧毁磨坊里的所有机枪！”

“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向镇里开炮！”

说完，他勒转马头，跑回散兵线去了。大炮又发言了，炮声越来越密，火力越来越猛。镇上的敌人乱了套，赶忙阻挡跃进着冲上来的散兵线。磨坊里在吼着。突然，爆发起一阵干巴巴、象犬吠一样的刺耳的哒哒声：所有的机枪一齐开了火。双方的火力都加强了。但是，红军战士越来越逼近。炮弹的命中率也越来越高了。“敌人就在眼前，死活决定在顷刻间，一定要击溃它，要踏着敌人的肩膀冲进镇去……”一想到这些，战士们的心紧张得几乎停止了跳动。

恰巴耶夫很激动，两眼喷着火，从这一端奔向那一端。他一会儿派传令兵去查看机枪坏没坏，一会儿派传令兵看看炮弹够不够，一会儿派传令兵到团长那儿传达命令，有时他还亲自出马，战士们都看到他那瘦削的身影在到处闪现。这时有一名骑兵飞驰而来，匆匆地向恰巴耶夫讲了几句话。

“在哪儿？在左翼吗？”恰巴耶夫急忙问道。

“在左翼。”

“很多吗?”

“是……”

“机枪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已经派人去搬援军了……”

恰巴耶夫立即向情况危急的左翼奔去。大批哥萨克人正向左翼扑来,黑压压一片,人喊马嘶;已经近在眼前了……恰巴耶夫奔到营长跟前。

“不要动,散开成散兵线……排枪射击!”

“是……”

接着,他催马沿着伏在地上的战士行列走了一圈。

“同志们,别怕,别怕!不要站起来……让他们过来……听命令开火……大家原地不动……听命令开火!!!”

在这最后的生死关头,战士们多么需要这些坚定有力的话啊!他们不慌了……他们听到,他们看到,恰巴耶夫和他们在一起。他们相信是不会遭殃的……

大批哥萨克一冲到射程之内,就遭到了排枪射击,接着又是一排……机枪神经质地发出颤抖的声音……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机枪不停地响着。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排枪协调地射击着,发出清晰的、刺耳的响声。

蜂拥而上的哥萨克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慌了神,一下子呆住了。

砰……砰砰!砰……砰砰!又是一阵清脆的排枪声。过

了一会儿，那一群哥萨克人不再前进了……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掉转了马头，往回逃窜了，红军兜着屁股追着打。

哒……哒……哒…… 砰砰砰！…… 砰砰砰 ……哒……哒……哒……砰砰砰！……砰砰砰！

冲锋被打退了。战士们这才从地上抬起沾满白雪的头。有的战士，脸上还热乎乎的，露着慌张的神色，浮现着惊魂未定的苦笑……散兵线已经逼近镇子……接二连三地向前跃进……哥萨克的机枪尖叫着，向散兵线猛扫。只要战士们一跃起，他们就开排枪，机枪也象爆豆子一样，劈里啪拉地扫过来……这时，战士们已经跃过前面的几个磨坊，仨一群，俩一伙，有的隐蔽在土丘后面，有的隐蔽在栅栏墙旁边，一步一步地向镇子的纵深挺进……

突然间，响起出乎意料的喊声：

"同志们！乌拉……乌拉……乌拉！！！"

整个散兵线都震动起来，战士们抖动身子，平端起步枪，迈开矫捷的步伐，勇猛地作最后一次冲锋……

再也听不到哥萨克的机枪声了，机枪手都被就地杀死了……红军战士们潮水般地涌进了镇子……远处闪现着最后一批哥萨克骑兵的背影……

红军开进了斯洛米欣斯卡亚镇……

费多尔·克雷奇科夫又狼狈，又羞愧，骑着马从可耻的避难所里走了出来。他又向散兵线走去，他不知道现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只听见枪声越来越稀了，现在完全停息了。

"我们的部队一定进镇了，"他心想，"也许情况刚好相反，我们的人被包围了，打了一阵就投降了。说不定现在哥萨克

正在摆血腥的酒宴呢。十分钟以后，他们就会跑到这儿来抢辎重，他这个政委，也要同这些辎重一起被抢走。"啊，可耻！可耻极了！当他意识到，第一次参加战斗就成了孬种，狗一样地夹起尾巴，辜负了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和希望，感到十分惭愧。当他离开散兵线，离开战斗，离开枪林弹雨还很远的时候，他一再憧憬过的勇敢、大胆、英雄主义，都跑到哪儿去了呢？他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就是犯罪，简直羞惭万分，无地自容。他策马快步朝着他两小时之前可耻地从那里逃跑的地方驰去。他走过同辎重兵们一起躺过的土丘，他看到离土丘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弹坑，雪地上还留着一片血迹。怎么会有血的？这是谁流的血？当时他还不知道，一颗炮弹打来，炸死了三个刚才还同他谈过话的辎重兵。

土丘那边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我们的散兵线曾经在这里匍匐冲锋。现在他们在哪儿？在镇上吗？是不是已经到了乌津河的对岸？八成是被哥萨克人赶到那儿去的呢？是不是从镇上一直赶过去的呢？

他沉湎在猜想和推测中，得不出个结论来。

这时候，一个骑马的人飞奔而来。这个人，看样子也是来"找机枪"的。他吭吭哧哧，前言不搭后语，不知胡扯些什么。费多尔朝他脸上看了看，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两个人患的是一样的毛病。

"我们的人在哪儿？"那个人跑近跟前，随便地问了一声。

"我自己也在找，"费多尔不耐烦地回答说，脸上顿时发红。他们这点见不得人的底细，彼此心照不宣了。

"他们也许已经进了镇子吧？"陌生人有意打个呵欠，装出

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

“也许吧，”费多尔表示同意。

“那么，怎么样，我们也去吧？”

“上哪儿？”

“到镇上呗。”

“那儿要是碰上哥萨克呢？”

“不会吧……我们的人也许已经进去了……不过……”

“问题就在这里：要是落到他们手里，决不会轻饶我们！”

他们就这样反复商量好几次，互相劝阻好几次，互相提醒好几次，都认为冒失不得，必须打听清楚：现在究竟谁占领了镇子。

他们一边谈，一边慢腾腾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离开磨坊半里路的地方。磨坊那边如果有敌人，早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了，想藏也没地方可藏了，万一追上来，逃也未必有什么用处，因为磨坊里的机枪完全能够射到他们了。

他们缓辔徐行，由于情况不明，心里都七上八下；虽然七上八下，还是继续往前走。

在离开镇边儿间破房子不远的地方，他们碰见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

“小鬼，喂，小鬼，红军进了镇没有？”

“进去了，”小孩子高兴地，用清脆的嗓子回答说。“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去吧，去吧，小弟弟，玩去吧！这是军事机密，不能乱讲，”费多尔用长辈的口气，劝他别调皮，别乱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

他的同伴一听到危险没有了，就突然一溜烟似地跑掉了。克雷奇科夫虽然放心了，但还是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现在他缓辔向着已被红军占领了的镇上走去。一路上，不断地安慰自己，他想：大凡新兵参加第一次战斗的时候，兴许都是这个样子，以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战斗的时候，一定能洗刷自己，决不会再象现在这副样子……

费多尔确实说到做到：一年以后，他参加了一次打得最出色的战役，得到了一枚红旗勋章。第一次战斗对他是一个严峻的、意义深刻的教训。在整个内战时期，他再也没有重复他在斯洛米欣斯卡亚干过的那种事情。而且后来有时的处境要比在斯洛米欣斯卡亚，不知要复杂多少倍，要困难多少倍……他已经具备了他曾经憧憬过的那些品质：勇敢、沉着、镇定、善于掌握情况、迅速判断情况……但是这些才能不是一下子生出来的，毫无疑问，必须从头开始，走任何人都必定要走的路：从张惶、怯懦，直到培养出大家所尊敬的品质来。

克雷奇科夫一路上逢人便打听司令部驻地，他发现大家匆匆忙忙，急着要到什么地方去，不太乐意答理他似的。全镇都在动，热闹极了，紧张极了。哥萨克人打退了，赶跑了；现在，奉命追击的部队还在继续跟踪追击。这样看来，大家紧张的原因，不是由于军事上还有什么危险，也不是由于要作战斗的准备。那么是为了什么呢？

他不知不觉来到司令部驻地——商人卡尔波夫的一幢大房子的门前。恰巴耶夫同他的弟兄们，还有约日科夫，都聚在这里。约日科夫当时那一副样子，费多尔至今还记得清清楚

楚。约日科夫，很显然，已经明白了底细，因此，一见到这位逃兵，就露出矜持的笑容说：

"给后方拖住了吧……克雷奇科夫同志？"他的一双眼睛闪着金光，象魔鬼一样笑着，——这明摆着是在嘲笑他。

"是的……在那里略为耽搁了一下……"费多尔尴尬地咕哝了一句，转脸对恰巴耶夫说："向军部报告了吗？"

"我们正打算报告……乌拉尔斯克也来了捷报，说那里的部队正在向前推进，正在扫清通往勒比辛斯克的道路……"

"那太好了……我们这儿，就是萨哈尔纳亚镇的情况怎么样？"

一问出口，就觉得很难为情：他问这句话完全是多余的，连他自己在这儿也差不多要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了……

"人家在这里冒着生命的危险，冲锋陷阵，可是，我呢，对不住，两个钟头以后才出场！"

良心受到谴责，真象刀扎似的难受，他悔恨交加，面孔涨得通红。

农妇们一个接一个地涌到司令部门前。她们用手比比划划，一个劲地对传令兵和卫兵在诉说什么，想进来，但又进不来。透过窗子可以看出，是战士不放她们进来——红军战士们那一副不动声色的、笑嘻嘻的面孔就是证明。费多尔走了出来，问她们是怎么回事，才知道她们是来告状的，告新来的客人——红军战士乱抢她们的财物。费多尔立刻同她们一起到现场，询问了一阵，察看了一番，作了记录，并且答应把东西找回来还给她们。

抢东西的事情的确有——这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军

队进入居民点，发生抢劫行为，看来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后来，费多尔有机会多次地进行观察，发现无论在红军部队里，还是在敌人的军队里都有抢劫行为。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很难制止。只要战争存在一天，这种现象就不能根除。所以，抢劫行为就成了我们那个时代的战士所固有的特点，这是战士们那种极度紧张的、战时特有的破坏心理状态造成的。战时的抢劫只能同战争一起消灭。这个话是对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现在不能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即使作了斗争，也不会完全取得成功。

费多尔碰到过很多抢东西的事，都完全是无意识的，一点儿也没有发财的动机。比方说，有一次，他碰上一个红军战士抱着一个大包袱，里面装的都是破烂的东西。

“你抱的什么？让我看看。”

他不慌不忙地把包袱往雪地上一放，解开来，从里面掏出一些小孩子的衬衣、婴儿的小被子、各式各样的玩具、破布、女人的连衣裙……

“朋友，你要这些干什么？”

他一声不吭，自己也知道，这些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问你，拿这些东西去做啥？”

“大家都拿，拿了就走呗。”

“那末，到底干什么用呢？”

“我怎么知道……”

“可是有一个妇女来找我，哭哭啼啼，要找她的东西，说不定，这件衣服就是……”

“兴许，这件是……让她拿去好了，”小伙子表示同意，没

有一点舍不得的样子。

“不是让人家来‘拿去’，是要给人家送回去，”克雷奇科夫说得很诚恳、很亲切、很令人感动。

“送回去也行，”小伙子点点头说，“当然要给人家送回去。怎么能叫娘们家来回跑呢？你告诉我地方，我送去。”

费多尔问明白他的包袱是从哪里抢来的，就和他一起去了。这个红军战士把包袱送到以后，一声不响地把它放到抢劫一空的铁床上，很难为情地在床边上磨蹭了一会，就拉着门的把手，悄悄地走出去了。

费多尔还碰到一个红军战士，他头上顶着一辆藤条编的儿童推车，也许是拿去烧火的，也许是拿去随便玩玩。有时候的确这样，他们什么东西都拿来玩。

有一次，几只又粗又大的手抓住一个叫米赫留特卡的头发蓬乱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的两只大靴子很重，上面的泥足足有一尺厚，大腿上的肉有三普特，一头亚麻色的鬈发也有半普特重。几个人拖着他，硬往这样一辆小天使用的小推车里塞。米赫留特卡尖声叫着，两只脚乱蹬乱踢，狂喊乱叫，把过路的行人都给吓坏了。在镇上也好，在村里也好，在城里也好，玩的都是这么一套把戏。喊得越厉害，大家越开心：小伙子们从四面拥上来帮忙，有的捆绳子，有的按手脚，把这个小伙子结结实实地捆在童车里，绑好，又用绳子一道一道地绕了几圈，两只手也用绳子捆起来，然后找一个比较陡的小山坡，往下一推，车子带着人从坡上滑下去……一个鹞子翻身！

哈，哈，哈！这玩意儿才棒哩！

这一回的结果也是一样：小伙子毫不腕惜地把小推车交

给了克雷奇科夫，其实他并不需要小推车，只不过喜欢它那花花绿绿的外观罢了……

找到了好多东西，也归还了好多东西。于是，全镇就安静下来了。再也没有人来告状了。恰巴耶夫命令赶快把各级指挥员找来。他们到齐后，恰巴耶夫用严厉的口气命令他们进行一次大搜查。凡是拿了人家东西的，都抓起来，搜到的东西，都送到各指定地点，并成立一个专门归还委员会，把受害者请来，要物归原主。但是只限于还给穷人，至于"有产者"，一个子儿也不还。这些财物都充作各团的基金。基金保管会必须刻不容缓地建立起来！凡自动把东西交出来的，都不处分，也不抓起来……除此以外，两小时以后，还召集所有的战士在广场上开大会，通知他们"恰巴耶夫要亲临"大会讲话。他指定向下传达的命令就是这样："恰巴耶夫要亲临讲话！"

过了两小时，佩季卡·伊萨耶夫报告恰巴耶夫说，红军战士们已经在广场上集合完毕，等他去讲话。这时，有一个团长走了进来，陪着恰巴耶夫一起向广场走去。路上他给恰巴耶夫介绍了战士的情绪。

费多尔是第一次听恰巴耶夫讲话。他对这种煽动性的演说早已不习惯了。在工人听众面前，他这种讲法根本不管用，没有说服力，说不定有不少人会笑他这种讲话的方式。可是在这里，情况完全不同，甚至恰巧相反：他的演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不来什么开场白，也不说明召集战士开会的目的，开门见山就讲抢东西的问题。可是他讲到后来就扯开去了，尽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只要跟正题"沾上一点边"就行。在他的讲话里，根本没有一点条理，前后也

不一致，也谈不上思想的连贯性，反正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尽管他的话里毛病和缺点一大堆，可是给人的印象却很深刻，而且不仅是印象，也不是某种淡薄的、浮光掠影的东西，不是的，而是一种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深入人心的推动力。在他的话里充满着真诚、毅力、朴实和一种天真的、几乎是幼稚的坦率。你听他的演说，就会感觉到，这种前后不相连贯的、偶然想到的一些鸡零狗碎的话，并不是信口开河，也不是装腔作势。这是一个高尚的人的热情而坦率的自白，这是一个饱受欺凌、勇于反抗的战士的呼声，这是观点鲜明、令人信服的号召，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命令：为了真理，他不仅能够和善于号召，而且也能够和善于命令！

"俺，"他说，"命令你们以后再也不准抢东西。只有坏蛋，才抢人家东西！明白吗?!"

几千个人发出热情的、感激的、出自肺腑的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来回答这个命令。大家那股高兴劲儿简直无法形容。红军战士们纷纷起誓发愿，忠诚地向自己的领袖保证：今后决不再抢东西，倘若抓住抢东西的人，他们自己就把他就地处决。

唉，他们不知道，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只要有战争，就根除不了抢劫现象，但是，他们都忠诚地宣过誓。的确，自此以后，前线上的抢劫事件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恰巴耶夫演说中有几段话，至今我还能记得起来。

"同志们！"他那洪钟般的声音响彻了广场。"今天出的事情，俺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今后再发现谁抢东西，老子就要枪毙谁。俺要亲自带头用这只手枪毙抢东西的坏蛋！"他

有力地在空中挥了挥右手。"要是俺犯在你们手里，你们就枪毙俺，甭可怜俺恰巴耶夫。俺是你们的指挥员，俺在队列里才是你们的指挥员。平时，俺是你们的同志。半夜也好，过了半夜也好，都可以来找俺。有事，就叫醒俺。俺和你们永远在一起，跟你们唠唠，该怎么做，俺告诉你们……碰上俺吃饭，你们尽管坐下来一块吃，碰上俺喝茶，你们也坐下来一块喝。俺这个指挥员就是这个样子！"

费多尔看到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象天真的孩子那样瞎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可是，恰巴耶夫，停顿了一会，又满不在乎地大声讲起来：

"同志们，俺对这种生活过惯了。俺没念完'军事学院'，没毕业就走了。可是不管怎么说，俺总算组建过十四个团，还当过这些团的团长。俺呆过的团里纪律都不错，没有什么抢东西的事，连教堂神父的长袍，也没人拿过。你干啥想去当神父？狗崽子，你想要穿长袍怎么的？你偷它来干什么？"

恰巴耶夫声色俱厉，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又转向那边，一会儿还把身子往后仰仰。他眼光炯炯刺人，飞快地来回扫着，好象要从这几千个穿着灰色衣服的人群中找出他现在讲到的那个坏家伙来。

"谁都知道，神父净说谎，"恰巴耶夫在说明一个伟大的思想。"他专靠骗人吃饭，要是不骗人，那还算是啥神父呢？他对别人说，不要吃荤腥，可是他自己却吃起油炸香酥鹅，咬得骨头格嘣格嘣响；他对别人说，人家的东西不能动，可他自个儿却偷东西，为这个，俺们看到神父就讨厌……这都是老实话。可是，不管怎样，别人的信仰，咱们不去干涉，人家信教不

干咱的事。同志们，俺说得对吗？”

这话问得恰到好处。恰巴耶夫懂得这一点，所以一讲到节骨眼，就提出这个巧妙的问题。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们听了恰巴耶夫的演说，心头燃起熊熊烈火。长时间令人窒息的沉默，仿佛冲开出路，突然爆发出一阵狂呼。恰巴耶夫等的正是这股狂热劲儿。现在听众的心完全倒向他一边了；往下不管怎么说，成功是十拿九稳的了。

“你何苦去抢人家的东西，其实你们不去拿，这些东西还不都是你们的……等到战争一打完，这些东西不归你们，还归谁呢？统统是你们的。咱们剥夺有产者一百头牛，就把它分给一百个农民，一人一头。剥夺来的衣服，也照样均分……俺讲的对不对？”

“对，对，对……”回答的声音象隆隆的雷鸣。

一张张兴奋的面孔焕发着红光，一只只闪着喜悦的眼睛在到处搜寻……红军战士们相互间交谈三言两语，点点头，笑笑，交换一下欢快的眼色，用这些方式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支持、赞许和满意……恰巴耶夫抓住了广大群众的一颗心，迫使它同他一样地去思考、去感受。

“不准乱拿！……”他猛地抬起左手，大喊了一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又停顿了一下。“俺说，不准乱拿东西，把拿来的东西，都归拢到一块，交给你们的指挥员，从老财那儿弄来的东西，也统统上缴……指挥员把东西卖掉，卖的钱充作各个团的基金……谁受了伤，就可以从基金里领一百个卢布……谁牺牲了，他的家属每人领一百个卢布！你们看，咋个样？我讲的对不对？”

这时，大家的情绪简直无法想象。兴奋变成了狂欢，喊声变成了欣喜若狂的吼叫……

“统统要交出来，”当大家的激动情绪稍稍平息以后，恰巴耶夫开始结束自己的演说了。“人家的东西，针头线脑也要交出来。然后，咱们再研究一下，哪些东西要还给人家，哪些东西要留下，留下补助你们呀！明白吗？俺恰巴耶夫从来说话算数。你们听俺的，俺就是你们的同志；谁要是存心捣蛋，可别怪俺不讲情面！”

他在一片发疯似的掌声和经久不息的乌拉声中结束了自己的演说。

这时，一个红军战士飞也似地跳到恰巴耶夫方才站立过的那只木箱上。他转眼间解开军大衣，撩起上装，用极迅速的动作解下系在裤腰上的那条哥萨克人的镀银的阔皮带。

“同志们，你们看，”小伙子一边喊着，一边把腰带举过头顶晃着。“这条腰带我已经系了七个月了……在战斗中弄来的……我打死一个哥萨克，从他身上解下来的……现在我交出来。我不要它了……我要它干啥？让它去为大家服务吧。我们英勇的指挥员恰巴耶夫同志万岁！”

人群在热烈欢呼声中颤动起来。

费多尔看到恰巴耶夫的演说在群众中产生这么深刻的印象，有这样好的效果，心里感到高兴，但是他对“一百头牛”和“均分”衣服的这类话，一直很担心。此外，各团的什么归还委员会，也觉着不大对劲儿。

“恰巴耶夫同志，”他说，“我很想和红军战士们认识一下，还想简单地跟他们谈谈国内的一般形势。您是不是亲自对大

家说一声，就说政治委员克雷奇科夫要讲几句话……"

恰巴耶夫立刻跳上木箱讲了一声。接着，费多尔就开始讲起其它战场上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同白军的大小头目们作战的情况。他还扼要地谈了下国际形势，三言两语地提了提国内的经济状况……有些地方，他好象顺便地引了恰巴耶夫的话作例子，他在引用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加以反驳，而是作了一些"解释"，这样一来，恰巴耶夫刚才讲的那些话就变得淡而无味了。

费多尔在推翻恰巴耶夫所讲的那些道理的时候，讲得十分婉转，总是这样提："恰巴耶夫同志关于公有财产的想法是好的，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敌人说不定会曲解它，会说我们拿了东西，抢了东西，想分给谁，就分给谁，高兴分什么，就分什么……可是，我和恰巴耶夫同志并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当然也不会去这样想的。"这样，恰巴耶夫提出的那种"分配法"，就被费多尔葬送和彻底推倒了。不管怎样，他提出的那个著名的例子："咱们把剥夺来的一百头牛，分给一百个农民，一人一头……"是可以这样加以引伸和理解的。对这种提法不作解释是不行的。

恰巴耶夫曾经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厮混过，当然时间很短，加上他是农民出身，生性慓悍，行为不羁，办事不讲计划，自由散漫——这一切都使他沾染上了无政府主义作风和游击习气。

语言的力量的确是伟大的。从此以后，镇上再没有发生过抢劫、强奸和其它违法乱纪的事情。

大会一结束，费多尔就去找约日科夫，想同他商量一下，

是不是今天就在镇上建立革命委员会，还是放到明天早上再说。但是约日科夫支支吾吾，不作正面回答。费多尔决定自己单独行动：他通知居民，要他们立即到镇公所去开会；他还请了三个政工人员协助他工作，拟定了一个提纲，他决定亲自尝一尝这件新的工作的滋味，因为他从来还没有在战争地区建立过革命委员会。镇上居民来了不少，一间房子容纳不下到会的人。约日科夫听说，他不到场，革命委员会也要照样成立．他只好凑上来了。费多尔当时并不明白约日科夫要的花招，到后来才猜到了：原来约日科夫挖空心思想搜集更多材料，证明费多尔无所作为，不称职，能力差等等，希望把他调走，让他，约日科夫仍旧当师的政治委员。他本想单独把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然后再叫费多尔看看既成事实。但是他这着棋子没有来得及走。

到会的人看来都心神不定。碰到开什么会，往往都是这样的，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昨天哥萨克还在这里，昨天他们也在这里开过会，选出了自己的政权机关……今天红军来了，又要他们选举革命委员会，而明天，哥萨克也许又要回来了，那时怎么办？今天被选上管理镇子的人，到那时会不会掉脑袋呢？

谁也不愿意到革命委员会来工作，都畏畏缩缩。那些敢出头的、而又对复杂而严重的局势有所了解的人，早已离开镇子，到城里去参加红军了。

结果，费多尔只得指定自己的政工人员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接着，开始讨论工作：什么事情先做，什么事情后做，什么事情暂时可以放一放……会上又决定向今天到会的人募

捐第一批经费，谁能出多少就出多少，然后再到镇上挨户募捐。还要跟乌拉尔斯克取得联系，以便从那里得到指令，也许还可以得到物质上的帮助。

费多尔热心地向居民们解释了革命委员会的任务，附带也讲了讲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居民们一面听着，一面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和拥护……镇里的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了。在哥萨克镇公所的门口上面挂起了一面小红旗。

傍晚，侦察队一无所获地回来了。他们钻到各个地方，探听过了，搜索过了，也查看过了；但是由于契扎河泛滥，他们无法坐雪橇到乌拉尔斯克大道那边去。不错，每天早晨，这里还冻得很结实，草原上也铺着一层松软的、湿漉漉的雪，但是路面显然已经泛浆开冻；温暖的三月天气，早已把路上的积雪融化掉了。部队只好停止继续进攻，等待新的命令。在商人卡尔波夫的这幢大房子里，聚集了全体指挥人员。恰巴耶夫下令设置警戒，调集辎重队，整顿好苏维埃镇的秩序……这时，有批俘虏带了进来，他们对一个从草原上抓来的吉尔吉斯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审讯，但是毫无结果。后来才弄清，原来在离开这儿几十里的希里纳亚巴尔卡的村子附近，哥萨克人经常出没骚扰，只差把村子占领了。必须立即抽调一部分现有的兵力到那里去。大家对这个问题也讨论了半天。各种事情实在太多了，怎么能件件交代清楚呢！

黄昏时分，黑雾沉沉。指挥员们经过一天的行军劳累和隆隆炮声的惊扰，都疲惫不堪地睡下了。费多尔也睡着了。可

是不大工夫，恰巴耶夫就把他叫醒，要他签署命令。他醒过来，签了字，又睡着了。过了一会，恰巴耶夫又把他叫醒。这个怪人通宵不眠，一直坐到天亮。费多尔一醒来，总是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桌上放着一盏油灯，发出微弱的、青紫色的光。他坐着，低低地伏在地图上，手里拿着那支在亚历山大罗夫-盖依用过的心爱的圆规，量啊量啊，量完写下来，然后再量，量完又写下来。他一整夜，直到鸡叫，一面量着地图，一面听着指挥员们的如雷的鼾声。门外，哨兵正紧紧地抱着步枪，在打瞌睡，那灰白的前额直磕打刺刀的黑色刀背。

他们在斯洛米欣斯卡亚住了四天。伏龙芝经由直通电报线打来一份电报，通知他们说，要把他们这一旅调到奥伦堡前线。可是，战局的变化很快就迫使他们改变了这一决定。他们这一旅不是调到奥伦堡，而是调到布祖卢克区。伏龙芝要恰巴耶夫和克雷奇科夫到萨马拉来见他，详细讨论一下。

他们用了四分钟就收拾停当了。他们知道，不会再回到这里来了，所以把行李袋都放到了雪橇上。三匹骏马踢蹬要跑，——他们选的是最强壮的上等好马啊！

阿维里卡已经坐好，准备纵马在草原上奔驰。他挑选的那副缰绳，象老太婆的嘴皮一样，又干又结实。波波夫、契科夫、焦特金·伊利亚和恰巴耶夫手下的全班人马，全站在台阶上——他们是出来送行的。

“恰巴耶夫同志，也叫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俺一到那儿，就把你们都叫去！”

三匹马拖着雪橇向前飞奔起来……

告别的喊声，淹没在飞扬的濛濛雪尘之中。人们站在台阶上，一双双眼睛，就象一面面镜子，闪烁着惜别的痛苦。有的人尖声地喊着，有的人啪啪地甩着马鞭，有的人把帽子抛到屋顶那么高……台阶渐渐地隐没在凄怆的悲痛和雪堆之中……

草原啊，草原！傍晚的落日余辉，映照在银白色的、松软的摇篮里！

草原上微风荡漾，仿佛轻轻的呼吸，一阵阵带着寒意的、芳香的气息顺风飘来，它飘过白雪，飘过白雪覆盖的田野，消失在早春三月的碧空之中！

从斯洛米欣斯卡亚往回走，到亚历山大罗夫-盖依——这就是不久以前随同部队一起走过的那条大路。他们坐在雪橇上，一声不响。草原对于乘车行路的人，仿佛是一只摇篮，催人进入甜蜜的梦乡。

哥萨克塔洛夫卡转眼就到了。不久以前，他们还在这儿做战斗的准备工作呢！一起研究地图，用圆规测量地图，开会商讨问题，绞脑汁，计议怎样象砸核桃似地打垮哥萨克人。那天夜里，大家一起唱歌，又说又笑。而后就是死一般的沉寂，只听得见筋疲力尽、酣然熟睡的战士们发出的沉重的鼾声……

费多尔想起了一堆堆的篝火，想起了坐在篝火旁边的那个长着火红胡子的乡下人，想起了那个在火堆上翻转着烤土豆、用刺刀挑着土豆吃的那个高高的鬈发小伙子。现在他们在哪儿呢？他们还活着吗？

他一路上回忆着自己经历过的往事，默默地检点着自己当时的行为，一直到亚历山大罗夫-盖依，才中断了自己的回忆。

他们在阿尔盖没停留多久，休息了一下，吃了点东西，又上路了。

他们一路上换了几次马，沿着草原，直奔萨马拉。

七 途 中

恰巴耶夫这样的人是很容易相处的，而且能处得很融洽，但是他说翻脸也就翻脸。嘿，他一发脾气，就大吵大闹，乱吼乱骂，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什么也不顾，捞到什么摔什么，真是昏天黑地，发狂了一样，压根儿不考虑后果怎么样。过了一分钟，气消了，反而觉得有点难受。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开始回想、思考自己方才做过的事情，仔细地加以分析，从那些脱口而出的话语里和失去理智的举动中理出重要的、严肃的问题……只要一认识清楚，他就主动退让。但他并不总是退让的，也不是对任何人都退让的，只有当他自己情愿的时候，而且对方是他所尊敬、所器重的人，他才肯退让……碰到这种时刻，就要大胆地、坚持地引诱他坦白自己的看法。恰巴耶夫是容易上钩的，有时他简直可以把心都掏出来给你看。

恰巴耶夫这个人喜欢吹胡子瞪眼，很严厉，不摸底细的人怕接近他，怕他一时性起，骂你个狗血喷头，弄不好，一怒之下

还会给你两个耳光。

其实，这种事情他真的做得出来，特别是对待陌生人和胆小的人。你越见他怕，他心里就越火，因为他不喜欢胆小鬼。他这个人，从旁边远远看去，比野兽还凶，可是走近去仔细一瞧，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憨厚的、可爱的同志，他的心贴着你的心，和你共呼吸，同跳动。你仔细观察，就会明白，他把你怒骂一顿以后，皱着眉，板着脸，发过一通脾气以后，心里就什么芥蒂也没有了，从不怀恨在心——他把一肚子怒气一下子统统发泄出来了。你跟他打完交道，不管你是否同意他，但你已经知道和感觉到，问题已经谈到底了。对于恰巴耶夫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事情，是无法了结的。事情一经他的手，就算彻底了结了。他说出的话，那就是铁板钉钉。

恰巴耶夫很骄傲，头昂得老高。这都怪他的名声在草原上太响了。

这种声望迷住了他的眼睛，使他只觉得自己是一个举世无敌的英雄，使他陶醉在虚荣之中，头脑发晕。

恰巴耶夫手下的小伙子们也都当着他的面或者在背地里吹嘘他的功绩，吹得最起劲。他们乱吹一通，有些是事实，有些是瞎编出来的，他们再加枝添叶，把事情吹得天花乱坠。他们第一个出来歌颂恰巴耶夫，赞美恰巴耶夫，宣扬恰巴耶夫所向无敌的精神。当别人肉麻地吹嘘，甚至阿谀奉承的时候，恰巴耶夫本人也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地用舌头舔舔嘴唇，好象猫儿吃牛奶一样。他还随声附和，啧啧称是，甚至还为吹嘘他的人添点佐料。要是哪一个吹牛的和拍马屁的人不善于撒谎，就马上会被他赶出去，而且还要下命令再不许这个人来

见他。

在他的性格中，还有一种令人吃惊的怪脾气：象小孩子一样地轻信谣言，随便什么话——真话也好，假话也好，胡说八道也好，他都信。

比方有人说，在萨马拉每人发十磅烟叶，可是在前线连八分之一磅也拿不到，但他也信以为真。

有人说，前线司令部或是军司令部里，一天到晚大吃大喝，一个个喝得烂醉如泥；还说，那里的军事专家都是清一色的白匪军官，他们每时每刻都可以把我们出卖给敌人。这些话他也信。

有人说，炮弹、鞋子、粮食、枪支、补充人员，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吧，不能准时送到，主要是由于有几个人存心捣蛋，而不是由于物资不足、交通阻塞、桥梁毁坏等等原因。这些话他也信。

他相信：鸟儿能传染伤寒，鸟儿愈多，生伤寒病的人也就愈多；他甚至相信：白糖是整块整块从地里长出来的；还相信，马是不能打的，打了就不中用了……

他是那样的单纯，心地是那样的纯洁，还有什么能使他不相信呢？

不妨再拿波波夫同志来作个例子吧。波波夫是旅长，这个小伙子是个英雄，和恰巴耶夫共过患难，不止一次地冲锋陷阵，不止一次地挨过敌人的枪弹，负过伤。一句话，不愧是个旅长。

在战斗中，什么意外的事情不发生呢？有时候，波波夫没有来得及按时把军火运到；有时候，没有来得及去支援其他的

旅；有时候，他的队伍拉下了五里，可是后来又一憋劲儿赶上去十里……

于是马上有人对这位耳朵软的师长嘀咕了：

“波波夫是个胆小鬼……溜掉了……怪不得他没有去支援别人，原来他自己吓昏了头……这个坏蛋，整整喝了一个星期的闷头酒……他还背地捣你的鬼，说您恰巴耶夫的怪话……他嫉妒您……”

轻信人言的恰巴耶夫用心听着，贪婪地用心听着。他确实信以为真了，心头顿时无名火起：

“老子要给这个坏蛋一点颜色看看！……老子要把他的脑袋拧下来！……他滥喝酒，老子就枪毙他！……这象什么话，叫俺的人去拚死拚活，他自己倒喝起酒来了，可俺恰巴耶夫要承担……马上把他叫来！”

他怒不可遏地等着。波波夫一听说恰巴耶夫发了火，赶紧扔下手头的工作，跨上马奔来了。他进了走廊，就问：

“他在生气？”

“嘿，可凶哩……”

“生我一个人的？”

“就是你一个人的……”

“是不是有谁说了我的坏话？……”

“那可不是……”

“咳，上帝保佑，但愿平安无事……”

于是，波波夫急忙勒了勒腰带，整了整裤子，整了整手枪皮套，挺直身子，迈着军人步伐走了进去。

“您好，恰巴耶夫同志！”

恰巴耶夫眼皮也不抬，也不应声。浓密睫毛下面的一双狂怒的眼睛往下垂着。他捻着胡子，憋了足有一分钟。突然，仿佛塞子从瓶口崩出来一样，他问：

“你又滥喝酒了？”

“我没有……”

“住嘴！你他娘的又乱搞，狗崽子……”

“恰巴耶夫同志，我……”

“住嘴！……枪毙你，还算便宜你了，坏蛋！情况这么紧急，你，这个鬼东西，竟敢这样目无法纪！你搞的什么名堂？你搞的到底是什么名堂？你这不是存心拆俺恰巴耶夫的台吗？”

波波夫不吭声。他知道，气冒掉以后，瓶塞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打开了。同样，他也知道，恰巴耶夫把一肚子怒气发泄以后，就会平息下来，等到他怒气一消，你再向他报告，把事情说清楚，反驳那些污蔑中伤的谣言……一开头，他会一个劲儿地死不认账，固执地不听你的申辩，可是你必须一步一步地坚持下去，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只要他对听信的谗言稍稍有点怀疑，他就会象精白粉做的面包一样，又松又软，用亲切的眼光望着你，面有愧色地对你说：

“俺嘛，你心里是有数的……”

“我了解，我心里有数……”

“对，对，你知道不，俺这个人就有点……咳，有人说你退缩了……还有人说你滥喝酒……”

“是啊，是啊。”

“俺就相信他们的话了，又咋能不相信呢？你换了俺，难

道你会不相信吗？咋能不信。瞧吧，说不定谁听了也会相信的。”

恰巴耶夫这时已经满面笑容，亲热地摇着波波夫的肩膀，按他坐下来同他一起喝茶，他简直不知道怎样弥补自己的过错……

过了二天、三天，波波夫又遇上了同样的事情，恰巴耶夫又同前次一样完全听信别人的谗言和造谣，又大发雷霆，又是喊，又是吓唬，可是过了一会儿，又亲热起来，表示自己的歉意……

他象三岁小孩一样，爱听信人家的话。为此他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是老脾气总是改不过来。

可是，只有一件事情他是始终不相信的。他不相信敌人力量大，不相信敌人打不垮，赶不跑。

“任何敌人也经不住俺打！”他坚定而自豪地说，“俺恰巴耶夫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退却！俺恰巴耶夫从来没有退却过！你们去对大家说：俺不知道什么叫退却！明天一早一定要全线击退敌人！快把俺的命令传下去！谁敢违抗，就把他抓到司令部来见老子……老子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叫他尝尝后退的滋味！”

的确，恰巴耶夫对自己领导的工作，是个内行，是一把好手。他对自己师里的指战员都瞭如指掌，然而对师里的政治工作人员，却不大清楚，几乎是漠不关心的。他非常熟悉打过仗的那些地方的地形，有的是凭自己的记忆，或者年轻时在那儿呆过；有的是当地居民提供的情况，或者自己从各处打听来的；也有的是他和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一起拿着地图研究过。他

的记忆力惊人，什么事都记得牢牢的，就象一把老虎钳一样，把东西紧紧夹住，虽说暂时用不到，但也不肯放掉。他了解当地的居民，特别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他对城市不大关心；他很理解农民的脾气，知道从他们那儿可以得到什么，什么地方可以指望，什么地方有失算的危险。他对应当管的事情，如粮食、鞋子、衣服、食糖、枪支弹药、烟叶，他都一清二楚，心里有一本帐，不管你提出什么问题，你都休想难倒他。

可是他对其它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对于政治问题，特别是超出全师范围的问题，他就不太理解，一点也不知道，而且他也不想知道。甚至有好多事情，他都不肯相信呢！

比如，工人运动有国际性，他认为全是胡诌；他不相信，也没有想到过工人运动是有组织的。当别人给他指出事实，给他看报上的消息的时候，他只是诡秘地冷笑一下说：

"报纸嘛，咱们自己编的……要让大家打得起劲些，才这样瞎编出来的。"

"不是的，这儿有名有姓，有地名，有日期、数字，这都是推翻不了的事实。"

"数字算个啥，俺自己也能造……"

起初，他总是固执地相信自己的道理，根本不想听相反的意见，听了也只是冷笑一声。后来，克雷奇科夫同他进行多次长时间的促膝谈心，他才改变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观点，如同他在其它许多方面改变了观点一样。

再比如说，他认为同无政府主义者闹纠纷没有必要，是一种愚蠢的举动。

"应当让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活动，他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害

处，"恰巴耶夫经常这样说。

他对共产党的纲领一窍不通，虽然入党已经整整一年了。党纲，他既没有看过，也没有学习过，对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也没有进行过一点点认真的分析。

最后，还要提一下他对付"司令部"的态度。他把凡是给他下达命令、指示、调派人员、发弹药、发衣服以及一切军需品的那些机关，一概称之为"司令部"。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始终没有多少改变。恰巴耶夫认定盘踞在"司令部"里的，几乎全是清一色的沙俄将军，这些家伙"脚踏两只船，想出卖就出卖"，而"人民"在象他恰巴耶夫这样的领袖的领导下，是不会上圈套的，是抵制司令部的命令的，这样，一般吃不了败仗，反而会打赢的。他生平就是不信任中央，对旧军官怀有刻骨的仇恨。他的师里也难得收容个把潦倒的"低级"小军官。当然，也有一些军官（数量很少），在战斗中表现很好，对这些人，恰巴耶夫总是摆在心上的。他看重他们，但是……对他们也不放心。

他也看不起知识分子，他不喜欢知识分子，主要因为他们只会夸夸其谈，不肯干实际需要的具体工作。他恰巴耶夫是很乐意干这种工作的，而且是实干的行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能做点事情，但他认为这是凤毛麟角。由于恰巴耶夫对旧军官和知识分子抱着这种态度，所以他自然而然地尽力在各处安插自己的人。第一，因为这些人不说空话，埋头苦干，靠得住；第二，和这些人比较容易共事；最后，正象他多次讲过的："现在应该培养农民和工人，而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培养他们……俺命令他当参谋长，他不肯，傻东西，不知道俺是为他

着想。我又下命令，硬要他上架，整整一个星期他愁眉苦脸，可是后来俺到那里一看，他干起来了，而且干得很出色，没有哪一个旧军官比得上他的！"

到处提拔自己人——这是恰巴耶夫执行的一条总路线。所以，他这一套机构，机动灵活，得心应手，各个岗位上的指挥人员，都是效忠他的自己人，都对他万分尊敬。

恰巴耶夫性格中的这些特点，克雷奇科夫很快就看清楚了。经过仔细的观察，他更加确信，首先必须在恰巴耶夫的心目中树立自己的威信，然后才能教育他，驾驭他，引导他走上自觉斗争的道路。而他现时进行的斗争仅仅是盲目的，本能的，尽管这种斗争也能搞得有声有色、可歌可泣、煊赫一时，光彩照人。

怎样才能树起自己的威信呢？应当使恰巴耶夫成为精神上的俘虏。要唤起他对知识、教育、科学和扩大视野的渴望，而不是单纯地追求战斗生活。

费多尔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有许多长处，他早就认定，只要能唤起恰巴耶夫的觉悟，那末，恰巴耶夫的无政府主义和游击作风也就会随之告终，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谨慎地、然而又是坚定不移地向他灌输另一种思想，启发他对其它问题发生兴趣。费多尔十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十分相信自己的才干。

恰巴耶夫的确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不是一般等闲之辈。要驯服他是有困难的，就象驯服草原上的野马一样，但是……野马也可以戴上嚼子啊！……好不好让这样一位光彩夺目、独树一帜、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听天由命、任其自然发展呢？让他象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那样，去尽情发光，去争奇斗艳，

去大放异彩吧！

克雷奇科夫曾经有过这种想法，但是在伟大的斗争面前，这种想法显得很可笑、很幼稚。

现在的恰巴耶夫，就象一只蒙住了眼睛的雄鹰：心在狂跳，血在沸腾，激情澎湃，恨不得立即展翅高飞，但是……茫茫天地，他不知道应该飞向何方，他想不出来，他看不见……

费多尔决定，哪怕是稍稍启发他一下，帮助他走上正道……即使失败了，达不到目的，那也没有关系：试一下，并不是打一顿，反正不会有什么害处……

要是成功了——真是谢天谢地！革命是多么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他们一离开亚历山大罗夫-盖依，就把斯洛米欣斯卡亚不久以前的战斗和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统统丢到脑后了。他们的心头涌上了一件新的、暂时还不摸底细的巨大工作。他们为了接受这个工作，正日夜兼程地赶往萨马拉。他们此刻还没有想到，在同高尔察克作战的前线上出现了十分危急的局面，也不了解最近在乌法附近战争失利的严重性。但是，现在要他们这样火速地赶到那里去面谈，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单凭这一点，就已经很清楚了。看来，正在准备一件大事，而在这一事件中，他们肯定不会扮演次要的角色。

“您看为什么要我们去？”克雷奇科夫问。

“到萨马拉去吗？”

“是的。”

“调动兵力嘛…… 其它地方需要咱们，”恰巴耶夫很有把

握地回答说。

两个人心里都没有底儿，也不想凭空瞎猜一通……于是，谈话也就自然而然地中止了。他们就各自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些不着边的、没有说出口的心事……

他们来到沿途的第一个村子，在村苏维埃门口停了下来……农民们一听说恰巴耶夫来了，纷纷涌进屋子，你挤我推，都想看一看这位鼎鼎大名的英雄。不一会儿，恰巴耶夫到来的消息传遍了全村。街上的人争先恐后地奔跑着，都想赶到前面看他一眼。村苏维埃的台阶下面涌来了一大群人：小孩、女人，甚至须发皆白的干瘪老人也踉踉跄跄地赶来了。大家都向他打招呼问好，真象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许多人称呼他名字和父名。原来，这儿同萨马拉一样，也有在一九一八年跟随他一起驰骋疆场的老战士。到处绽放着感人的、甜蜜的笑容，一张张素不相识的灰白色的面孔，洋溢着欢乐。有的人目不转睛地拚命盯着他看，仿佛要看个够，要把这位英勇的指挥员的形象永远铭刻在自己的心间。有的婆娘站在那儿，痴痴地发楞，闹不清这儿出了什么事情，大伙儿究竟在看谁，为什么这样好奇地看，她们看见男人们朝着苏维埃跑来，也在他们屁股后面跟来了……孩子们也不象平时那样乱吵乱闹了，一个个规规矩矩地站着，耐心地等待着什么。是的，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什么；看来，他们是想听听恰巴耶夫讲几句话……恰巴耶夫的话，有人偶尔耳边刮到几句，就立刻在人群中传开了，越传越讹，传得面目全非，但还是传开去，传开去，一直传开去……

“恰巴耶夫同志，你给大伙儿讲点什么吧，”苏维埃主席对

他说。"你看，老乡们都很想听听你的精彩的讲话呢。"

"俺讲点啥呢?"恰巴耶夫笑了笑说。

"你就讲讲别的地方的生活……想到啥就讲啥吧……"

恰巴耶夫是不喜欢扭扭捏捏的。他知道，也亲眼看到老乡们是多么想听他讲话，那为啥不讲一讲呢。

趁着套雪橇的时候，他向老乡们讲了起来。这次讲话的中心思想，很难说准。他讲到革命，讲到局势的危机，还讲到饥荒的问题，都是一些老生常谈。但是这些话很合农民的心意。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说着玩的，这是恰巴耶夫亲口讲的啊！他的话东插一句，西扯一句，乱糟糟的叫人摸不着头绪，可老乡们却聚精会神地从头听到底。当他结束的时候，他们赞许地点着头，喊喊喳喳地议论起来：

"这话才讲到点子上了！"

"嘿，那还用说！"

"真行，好样的！"

"谢谢，兄弟，你说话真有道理啊……可真得谢谢你呀！"

无论他们走过多少乡镇、多少村庄，到处都知道恰巴耶夫。到处都尊敬他，热烈地欢迎他，有些地方简直是隆重极了。全村的人都跑出来看他，男人们争着和他攀谈，女人们窃窃私语，赞叹不已；孩子们不停地喊呀，叫呀，当恰巴耶夫他们离开的时候，又跟在雪橇后面跑。在有些地方，恰巴耶夫发表了"演说"。演说的成功和效果总是有保证的。这倒并不是因为演说精彩，而是因为恰巴耶夫的名气响。这个名字有魔力，它使人们知道，在恰巴耶夫的"演说"里蕴藏着极有意义的、伟大

的事业，尽管他的演说也许是空洞无物、毫无价值的。一个出了名的、享有荣誉的人物，偶然讲了一句话，有时甚至是一句愚蠢的话，但在人们看来，也比一个碌碌无闻的"凡人"提出的完全明智的见解份量要重得多——这是人们的一个怪僻的特性，但它已经习以为常了。

在中途，恰巴耶夫和费多尔互相交谈起个人的事情：家乡在哪里，过去干过什么，什么出身——一句话，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费多尔向他介绍了自己出生的那个黑烟迷漫的工业城市，在那里，他初次留下了童年的印象，第一次懂得人生就是一场严峻的斗争……后来他又度过了一段流浪的生活，一直到参加革命为止……当他讲完了自己的简历以后，恰巴耶夫就开始讲起自己的身世。费多尔怕忘掉，到了下一个村子，他就把恰巴耶夫讲的这段话记了下来。

恰巴耶夫的身世

"……恰巴耶夫向我讲了他自己的身世，"克雷奇科夫写道，"要不要相信呢，我不知道。不过，我对几个地方是有怀疑的。比如，在谈到他家庭历史的时候，他显然美化了一番。我以为在这一点上，他加上了自己的幻想。但我还是把我所听到的全都写下来了，有什么理由不写下来呢？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害处。如果谁愿意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证确凿，那末不妨到我听讲的那些地方走一走，那里现在还住着恰巴耶夫的许多亲友，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许多有关这位驰骋草原的指挥员的生活和战斗的故事。

‘您知道俺的身世吗？’今天当我们一起坐在雪橇里的时候，恰巴耶夫这样问我。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天真而神秘的目光。‘俺是喀山省长的女儿和一个吉卜赛演员生的……’

“我原猜想他是在‘说笑话’，可是他等了一会儿，见我并不感到惊讶，就继续往下说：

‘俺知道，这件事很难叫人相信，可是……真有这回事，一点也不假……他，这个吉卜赛人引诱了我的母亲，等她怀孕了，又把她抛弃了，只剩下她孤另另一个人。唉，叫这个可怜的女人到哪儿去安身呢？这儿，那儿，到处流浪，到头来，还得回到她母亲的身边。她母亲已经守了寡。俺那个当省长的“外祖父”已经不在人世了。她回到母亲身边，不久，在生俺的时候死掉了，丢下俺这个小狗崽子。把俺这个宝贝疙瘩搁到哪儿好呢？想来想去，他们居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叫来了一个扫院子的，这个人有个哥哥住在乡下，就把俺当个布娃娃似地送给了他的哥哥。俺和别的孩子一样，活了下来，慢慢地长大了。他家里也是孩子一大堆呀！俺们打啊，吵啊，简直闹翻了天……孩子时候的事情，俺差不多都记不起来了，说真的，也没有啥值得记的，乡下孩子的生活到处一个样。我快到九岁那年，他们把俺送到人间挣饭吃，俺在这人间快闯荡一生了……开头，替人家放猪，从放猪学点放牧的本领，因为人家不会一下子叫你去放大牲口的。放猪这一行熟练以后，俺就成了真正的牧童了。后来，一个木匠铺把俺招了去，教俺木匠手艺……俺和木匠师傅们一块儿干活，一块儿到各家去做包工。后来，木匠不干了，到一家商人开的小铺子里当伙计。俺学做生意，学怎样骗人，可是怎么也学不会，因为俺最讨厌这

种骗人的把戏……商人，他就是专靠骗人吃饭的。要是商人不骗人，他就一天也没法活下去。俺当时看穿了这一套，一旦看穿了，他再怎么哄俺也没有用。不愿干，就是不愿干，俺拔腿就走掉了……为啥俺现在这样恨商人？就因为俺把这帮恶鬼完全看透了。在这一点上，俺将是一个比列宁更加高明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俺从实际中仔细看清了所有商人，而且硬碰硬地懂得，必须剥夺这些坏蛋的全部财产，狠狠地收拾这些狗东西。那一次，俺丢掉生意之后，俺心里琢磨：俺这个孤儿，去干什么呢？那年俺已经十七岁了。左思右想，决计到伏尔加河、到沿岸各城市去逛逛，去看看各色各样的人，亲自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俺又买了把手摇风琴……那时，俺有一个姑娘，叫娜斯佳，她跟俺在一起呢……"娜斯佳，"俺说，"咱们到伏尔加河流域去吧！我一边唱，一边拉琴，你来跳舞。这样，咱们俩可以看看伏尔加河，还可以到各个城市里去逛逛！"俺们说走就走了……俺们到了好多地方，冬天来了，俺和她找了个地方住了下来。为了糊口，俺们开始做工，其实那算啥做工呢，给阔人当跑腿，干一些冬天的活儿……一到四月天，大地返青了，太阳也暖和了，伏尔加母亲河开始解冻，冰块向里海漂去。这时俺们也不怕饿肚子了，一个劲儿地沿着伏尔加河岸走啊，走啊……俺拉着手风琴，云雀在空中啾啾地叫着．娜斯佳在哪儿，歌声就在哪儿……啊，你啊，俺忘不掉你，永远忘不掉你！你，美人儿在春光里翩翩起舞！'

"恰巴耶夫忽然垂下头去，欢快的声音顿时消失。他悲痛地说：

'四月里都是大晴天，太阳虽好，可是地面潮气很重……

俺没有照顾好她——俺的心上人，使她受了风湿。她象一片绿叶似地枯萎了。只剩下俺那孤独的手风琴……俺把俺那心爱的舞蹈家埋葬在沃利斯克附近的河岸上……那只手风琴也叫我卖给了一个吉卜赛人，光剩下俺光杆一个人……唉，老天爷总是看中俺这样的人，俺被它看中了：俺已经到服沙皇兵役的年龄了……既然到服役年龄，那就去当兵吧，哪知道一当了兵，就打起仗来了……打那时起一直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我过去的生活就是这样……'

'您结过婚没有？'我问恰巴耶夫，'记得您以前提到过孩子……'

'嗯，结过……那时在战前……我确实娶了个老婆，可是没在一起过多久，和德国人刚一打仗，俺就被抓了壮丁……有一次，俺回家短期休假，有人说俺老婆不正经……我又信又不信，就去问她：你告诉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影儿的事，瓦夏，'她说'这都是人家糟践我。'

'尽管她说是人家糟践她，可俺还是处处留心，后来真给俺打听清楚，她是干了不要脸的事儿。'好吧，'俺说，'你这条毒蛇，虽说老子爱过你，可是现在你给老子滚吧，你这条母狗，老子一辈子再也不想见你了。孩子，老子管……'当时俺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痛苦啊！俺已经两年没有见到她了。别的女人，俺连手指头也没有挨过一下，俺从来不干这种事情……俺一直盼啊，盼哪一天能回去见到她，俺在外面安分守己，完全是为了她。可现在到了这个地步，怎不叫人心痛呢！男人回来了，可她竟干出这种丑事！'

'俺又回到前线去了，带着满心的苦恼，在炮火下钻来钻

去。心想，自己一生处处倒霉，倒不如一死了事……后来，俺挣了四枚圣乔治勋章，当了下士，又升到上士，可子弹始终没有要俺的命……伤，俺倒也不止受过一次，可是一次一次都活下来了……只有一件事很糟糕：俺只会打仗，斗大的字也识不了一箩筐。俺心里很苦恼，很难为情，也很眼热别人。弟兄们会念，能写，俺什么也不会……记得有一回，准尉当面叫俺'蠢鬼'，俺把他臭骂了一顿，他这话刺痛了俺的心……这么一来，他们就把俺肩章上的红道道全拉掉了，俺又成了一名下等兵。这倒好，俺就开始学习了，读书写字全都学，学得还不差。那时候，战争没完没了地拖下去；革命爆发了，俺被送到萨拉托夫，在一个警备团里当兵。'

'俺心想，俺算个啥东西呢？周围的人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他们明白别人在讲些什么，懂得究竟为什么会爆发人民运动。独有俺一个人不晓得。好吧，俺也加入一个党派吧……俺去请教了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撺掇俺加入了立宪民主党，可是不久俺退了出来，又加入了社会革命党，俺看到，他们那伙人是想干点儿事业……俺跟社会革命党人混了一个时期，也参加过他们不少的会议。后来，俺又听说有无政府主义。俺想，他们这样干才象个样呢！人们一下子要什么有什么，无拘无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时，克伦斯基正把塞尔维亚人编了一支义勇队，他们让俺当队长，可俺把这个队完全搞垮了，又亲自率领全队转过来反对克伦斯基。这一来，俺这个可怜虫又被降了级，被派到普加乔夫去当连长。可是，当时的形势怎么样呢？普加乔夫这地方已经有了自己的人民委员会，这个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是个年轻人，一句话，是个蛮好的小伙

子……看得出，他很喜欢俺，俺也很满意他！俺听了一番开导，就很想做一个有头脑的人。他开始教育和启发俺这个人民委员。打那以后，俺考虑问题就完全两样了。俺把无政府主义抛到九霄云外，自己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俺看的书也完全不同了。俺变成一个书迷。俺识了字以后，打仗的时候，俺也躺在战壕里看书，一个劲地看书……弟兄们都笑俺，他们说：你念这么多书，可以去到教堂唱圣诗了。俺听了笑也不笑。俺读过描述丘尔金首领、拉辛、普加乔夫·耶麦尔克、叶尔马克·季莫菲耶维奇等英雄人物的书，俺也弄到过一本写汉尼拔的书，俺还看过意大利加里波第和拿破仑本人写的书……您知道，俺最喜欢的是：一个人会打仗，而且在节骨眼上豁得出自己的一条命……这些人物俺都知道。再有，俺别的书也看过……听说屠格涅夫写的东西很好，可是没有搞到，果戈里书中的人物俺都记得，我还记得那个叫齐契金的……唉，要是俺的文化程度再高些，那俺的脑袋瓜儿就更好使唤了。可现在有啥法子，落得个无知无识！过去两眼一抹黑，现在还是两眼一抹黑……'

'话又说回来，俺也捞不到时间学习，在普加乔夫的时候，整天要睁大眼睛，提防着哥萨克窜进来……有时候还得出去搞粮食，或者去平定叛乱——碰到这种差事，总是派到俺头上。'

'恰巴耶夫在吗？'

'在，'俺说……

'你去一趟吧。'

'话不用多说，也不用教我怎么做，我自己都知道……'

恰巴耶夫谈自己的经历，一直谈到十月革命那时候为止。

他说的是否句句实情，我又从何知道呢？他喜欢吹嘘，这是他的一个老毛病。也许，他说的时候，为了加强效果，故意拉扯上一些东西……不过，即使添了些东西，也是很少很少的①。

他的经历似乎是最平凡的，并没有丝毫出众的地方。可是，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你可以看到，他的家境，个人所受的痛苦，个人生活的遭遇，都促使他对现实不满，促使他进行反抗。"

费多尔还记下了其它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就到此搁笔，不必再去引证费多尔对于恰巴耶夫的各种看法了。十月革命以后，恰巴耶夫又有哪些经历呢？这方面的材料很多，众说纷纭，有些神乎其神。说什么他象旋风一般，在草原上出没无常。今天在这个村子里看见他，到了明天，他已经到了几百里之外了……哥萨克一听到恰巴耶夫的名字，就浑身发抖，总是躲着他，不敢同他交战。由于恰巴耶夫百战百胜，敢拚敢冲，骁勇无比，他使哥萨克人象中了邪似的，闻风丧胆。

从阿尔盖到萨马拉，一共走了四天。一路上经过不少大大小小的村庄。无论走到哪儿，只要一提恰巴耶夫的名字，到处都同样叫得响。恰巴耶夫自己也总是摆出一副无法仿效的自负不凡的神气。有一次，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子，已经夜深

---

① 关于他讲他的妻子是"酋长"女儿那件事，大概完全是虚构的，后来大家对此都有怀疑。——作者注。

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打听不到村苏维埃在什么地方。他们本想敲开一家的房门去问一声，可是天太冷，不乐意走下雪橇，于是迳直向教堂奔去，心想在“广场附近”总能找到苏维埃的。

终于，迎面碰到了一个行人。

“同志，村苏维埃在哪里？”

“就在那边，过了深谷……”他指了指他们刚才来的那个方向说。

他们掉转马头，一会儿就到了。是一幢又高又大的房子，样子象一座堆房．破旧，荒凉，空荡荡的，它座落的地方也是十分荒凉的——在村子边上，深谷的后面，一看就知道，这所房子是无人问津的……他们敲了半天门，好容易才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风烛残年的聋老头。

“有啥事啊，年轻人？”他说。

“值班的哪儿去了？”恰巴耶夫气冲冲地问。

“一个人也没有啦……都回家了，白天才有人来……一个人也没有……”

“马上把主席喊来……”

遇到这种场合，尽管他强迫命令，吹胡子瞪眼，可费多尔从来不加干预，因为在那个年月里，要是过分客气，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有时人家见你婆婆妈妈，就存心欺负你，不把你放在心上，什么东西也不给你……时代是严酷的，如果要想办点事情，就得采取严酷的手段，而不能光磨嘴皮子。

他们派了人去找村苏维埃主席。村主席在路上就听来人说，这是“恰巴耶夫亲自”叫他来喊的，所以他畏畏缩缩地走到

跟前，脱下帽子，鞠了个躬。

“你这苏维埃怎么搞的，老弟，是个猪圈怎么的？”恰巴耶夫一见面就严厉地责问他，“为啥你把它摆到这么远的鬼地方，难道村子里找不到一块地方，啊？”

“老百姓不给，”村主席怯生生地说。

“什么老百姓？不是老百姓，是富农不给。这跟老百姓毫不相干……瞧你，倒很好说话……”

“我本来想……”

“你想啥？”恰巴耶夫打断他的话说，“要去做，不是想……你这叫什么政权……明天就把苏维埃搬到广场上，占一幢好房子，你就说这是恰巴耶夫的命令，明白吗？”

“明白了，”村苏维埃主席嗫嚅地说。

“俺从萨马拉回来的时候，还要经过这儿，你小心点，要是再让俺见到这个鬼地方……”

这个不大会说话的村苏维埃主席，看来是个不中用的“傀儡”。他赶紧东跑西颠，给恰巴耶夫他们张罗马匹去了……他们根本不打算在“这种村子”里过夜，连夜又动身了。

到了萨马拉，恰巴耶夫和费多尔就去见伏龙芝。伏龙芝亲切地邀请他们晚上到他房间里，详细地讨论一下当前的战役。他们去了。伏龙芝讲了讲前线的形势，指出现在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说明在这紧要关头需要什么样的指挥员……这时，恰巴耶夫因为有事出去了，大约五分钟后才回来，伏龙芝趁这工夫就问费多尔：

“局势很严重，克雷奇科夫同志……我想叫恰巴耶夫担任

师长。你看怎么样？我对他不大了解，只是听别人说起过他的情况，你是了解他的……他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你多少同他工作了一段时间……”

费多尔把自己心里的想法都对他讲了出来，谈了恰巴耶夫的许多优点，也着重指明他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

“我也有这样的看法，”伏龙芝最后说，“他无疑是个杰出的人才……可以派很大的用场，只不过他身上的游击习气还相当严重……你要好好地下一番工夫……他脾气暴躁，这没关系，暴躁的人照样可以弄得服服贴贴……”

费多尔扼要地告诉伏龙芝，说他正在这方面对恰巴耶夫做工作，而且确确实实已经博得了他的同情和信任，他认为，今后同他的关系会搞得更亲密些。

恰巴耶夫走进来了。他们又简短地谈了谈，伏龙芝就把任命他当师长的事通知了他，并且说，现在必须马上赶到乌拉尔斯克，在那里听候命令，因为这次战役的总计划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他们向伏龙芝告辞后，就出来了。两小时以后，他们离开了萨马拉。临行前，恰巴耶夫要求准许他到自己的故乡——维亚左夫卡去一次。伏龙芝同意了。他们就直奔维亚左夫卡去了。

“您在维亚左夫卡还有什么人吗？”费多尔问。

“都在那儿呢……两位老人：养父、养母……两个小子，一个丫头，他们住在一个寡妇家里……寡妇自己还有两个孩子，六个人住在一起……”

“寡妇跟您很好吗？”

“是的，很好……好得很呀，”恰巴耶夫狡猾地笑了笑。“俺

的朋友死了，抛下她。朋友留下遗嘱，要她跟俺……”

在维亚左夫卡，他们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欢迎。苏维埃主席立即召开欢迎贵宾的会议。会上，恰巴耶夫发表了自己的“演说”……晚上，“当地文艺大军”在以恰巴耶夫命名的“人民之家”里，演出了节目。他们演得一塌胡涂，可是劲头儿个个都很高，都想博得恰巴耶夫的称赞……他们在维亚左夫卡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启程到乌拉尔斯克去了……

费多尔发觉，恰巴耶夫对他的几个小家伙并不亲热，他就问起这件事。

“是的，”他说，“自打家庭关系破裂之后，俺对什么都没感情了，自己亲生的骨肉，也差不多看成外人的子女了……”

“您打算怎样教育他们呢？”

“哪里还谈什么教育，俺这样还忙得不可开交。谁知道他们在这儿怎么受教育，这种事，俺连问也没问……俺把自己的薪饷寄一点来——别的什么都不管了……”

“可是薪饷并不多……”

“俺知道不多……再加上十一、十二连着两个月没有拿到……十一月早就过去了，眼下已经三月半了。薪饷还是发不下来……”

“情况很糟……”

“现在每个人都得牺牲一点，克雷奇科夫同志，每个人，”恰巴耶夫严肃地说，“要知道，没有一点牺牲，怎么能谈得上革命呢？有的人毁掉了家产，有的人丢掉了家庭，还有的人断送了自己的学业，而咱们呢，咱们说不定连性命都要送掉。”

"是啊，"费多尔沉思了一下。"说不定连生命……这倒也真有点意思：战争没个尽头……一批又一批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到处都有危机……我和您在一起还能跑多久呢？新的进军不是又要开始了？……"

"这件事俺想都没有想过，"恰巴耶夫一甩手说，"谁知道战争什么时候打完……有的时候俺陷入了绝境，简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可突然又死里逃生了。未来的事最好不去想它。有一回，那是在一九一八年，俺跑错了地方，车子闯进了捷克人占领的村子……俺还以为是自己的村子呢。司机是死人不管的，你叫他往哪儿开，他就往哪儿开……一开进去，我的天哪，都是捷克人！我对司机说：'喂，巴巴耶夫，赶快掉头开！'您知道，俺手里有一挺机枪……我说：你在街上掉头，俺开枪掩护……要是你掉得过来，咱们就得救了，要不，就一块回老家了……于是他一面打弯，俺一面开枪，他一面打弯，俺一面开枪……车子刚刚掉过头，刚刚挂上挡，有十五、六个骑兵向俺们冲来。车子在前边跑，他们在后边追……俺回头一看，车后卷起一股尘土，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枪声和马蹄声，他们朝俺们打，俺一个劲地朝他们打……两条子弹带都打光了……嗐，万一轮胎放炮，那还有俺活命？捷克人已经悬赏要俺的脑袋，他们说：谁把恰巴耶夫的脑袋送来，就赏黄金……我手下的小伙子们看到这张告示，就笑话那些捷克人。有一次，他们写了一张便条：'请到斯捷潘·拉辛团来吧，咱们不要黄金，就送给你们……'他们写好，装在信封里封好，叫一个乡下小孩送去了……俺经历的惊险事可多着哪！"

"咳，一条命总算保下来了……"费多尔说，"怎么保下来

的，是碰运气，还是因为您自己机警呢？这只有天晓得了！这种九死一生的险事，您碰上的，大概不下几十次吧！”

“可不是！”恰巴耶夫兴致勃勃地回答说，“真有几十次，甚至有几个几十次呢。俺常给自己提这样的问题：俺怎么这样命大呢？有什么人特意在保佑俺？碰上别人，只要一颗子弹飞过来，就扑地一声，没命了。”

“哦，这是怎么回事？”费多尔问，“您自己究竟怎么想的？是碰运气呢，还是有别的道理？”

“不，哪里是什么碰运气，到处都得用脑子……嘿，真得要好好地用脑子啊！要知道，有时候，总共相差一分钟，你就把命送掉，不光是你一个人，百把个人的命都要给你送掉……有一次，俺们在一个村子里蒙头睡大觉，捷克人突然闯进来，抓走了几个人……当时，我住在村子的另一头，穿了一条裤衩子从床上跳起来，一个劲地喊‘乌拉—乌拉’……可俺们手里啥也没拿，什么武器也没有，弟兄们咋唬闹喊，拚命冲上去，一下子把敌人手里的家伙夺过来了。不但把咱们的人抢回来了，而且还俘虏了他们几个人……克雷奇科夫同志，机智很需要，没有机智就会在战争中一下子完蛋。”

“可谁又乐意完蛋呢？”费多尔开玩笑地说。

“也不都全是这样想的，”恰巴耶夫严肃地回答说，“您以为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命吗？不是的，不光不爱惜，有的人，有时候简直拿命当儿戏。就拿俺来说，俺当初是个丘八，俺的命算个啥？打死不打死，对俺来说吧，还不是一个样？俺不过跟虱子一样，有谁用得着？象这样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俺自个儿也把自己的命看得不值一个皮钱……敌人的战壕离俺们

的不过三百步，可俺竟跳出来，拉开嗓门喊：来，朝老子这儿打……有时候，就在土堆子上跳起舞来，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过死。后来，俺一瞧，上面看得起俺了，这一来，俺也就象个人的样子了……克雷奇科夫同志，您现在也看得出，俺升得越高，俺也就越珍惜自己的命……俺跟您不要花枪，打开天窗说吧，俺现在对自己的看法不同了：精灵鬼，你不是个臭虫，你是一个真正的人，你要真正象人那样活下去，体面地活下去……这并不是说，俺越来越怕死了，而是理智越来越多了。现在俺再也不会跳到战壕上面去跳舞了，这是胡闹。老弟，俺不想白白把命送掉……"

"可是打起仗来呢？"费多尔问。

"打仗吗？俺可以对您起誓，"恰巴耶夫激动地说，"随便起什么誓都行。打起仗来俺不含糊，永远不会做一个怕死鬼……只要一打响，俺把私心杂念统统丢光……您有点啥想法？"

"没啥，我没啥想法，问问罢了……"

"真的吗？八成司令部里议论过俺吧？"

费多尔没有听懂他说这话的用意。

"跟那些上校先生一块议论的吧？"恰巴耶夫继续说道，从他的话音中感到有一股几乎抑制不住的忿怒。"在那里，当然……"

"绝对没有，我郑重地对您说，"克雷奇科夫安慰他说，"我没有跟任何一个'上校先生'议论过您。我干吗要这样做呢？"

"要不他们讲了俺的坏话……"

"他们不喜欢您?"费多尔问。

"他们可恨死俺哩,"恰巴耶夫一字一板地说,说得很有力。"俺给他们拍了不少电报,写了好多信,骂得他们要死,他们要把俺送到军事法庭……要不是在打仗,要上法庭去受审呢……他们坐在司令部里,可舒服啦,光动嘴巴说:你去卖命吧……俺可不替你们去卖命,不管你是什么人……哼,真不知从哪儿找来这批官老爷……你需要弹药,对不起,他们没有,可是下起命令来啊,嘿,一道一道,可多呢……俺也不卖帐,来个硬顶,他们就说,俺是流氓,是流寇,指望他能干什么……"

"恰巴耶夫同志,"费多尔很惊异地问道,"您是不是认为,咱们的红军都操纵在这帮上校先生的手里呢?"

"那还能有谁呢?"

"还能有谁?还有革命军事委员会、我们的政治委员、红军指挥员……"

"'革命军事委员会'有时啥也不懂,人家怎么说,它就怎么信……"

"不,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费多尔表示反对说,"您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认识不正确……在那里工作的都是自己人,而且都是知情达理的人。您的这种想法不对……"

"那好吧,等进攻开始的时候,您就会看到了,"恰巴耶夫轻声地回答说,但是他的口气已经不那么自信,不那么固执了。

费多尔告诉他,革命军事委员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有什么意义,有什么职能,它的组织机构怎样……他发觉,恰巴耶

夫对这些问题一点儿也不懂，这些情况对他说来，完全是个新发现……恰巴耶夫听得特别仔细，一句话也不放过，都记在心上，几乎把一字一句都记在心上。他的记忆力真是没话说……费多尔一直对他的记忆力感到惊讶：他连最最细琐的事情也记得很清楚，并且在谈话时还经常引上几句。

费多尔喜欢和他进行长时间的、无休止的谈话。经过不断的交谈，他知道，种子正撒在肥沃的泥土里。近来他发现，恰巴耶夫在和别人谈话的时候，常常无意中把他的想法当作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费多尔还发现，在恰巴耶夫的心目中，他已经是个"有学问"的人了，所以他决定要利用这种交往做好工作。他们谈起来，往往从指挥军队、科学技术，一直谈到对恰巴耶夫说来最伤脑筋的问题：关于他的文化程度低的问题。后来他们谈妥，只要时间和条件许可，费多尔就教他学文化……两个人真是天真啊！居然想在硝烟迷漫的战火中学习代数呢！当然，他们一天也没有学成，但是他们到后来一直有这种想法，也常常谈到这件事情；有时，他俩一块儿到阵地上去，谈着，谈着，就扯到这个题目上来了。

"咱们还想一块学文化哩，"费多尔说。

"咱们想的事情多着呢，可不是件件都能办得到啊……"恰巴耶夫很痛心、很惋惜地说。

费多尔看到恰巴耶夫如饥似渴地抓紧学习每一个新名词。对他来说，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入党已经整整一年了，照理对宗教总应该认识清楚了，可是克雷奇科夫有一次突然发现恰巴耶夫在划十字。

"你这是怎么啦，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他问恰巴耶夫，

“共产党员信上帝，你疯了吗？”

（经过两星期的交往，他们彼此开始称呼“你”了。）

恰巴耶夫一下窘住了，但是又挑战似地回答说：

“俺认为，要是自个儿高兴，共产党员也可以信上帝。你不信，你别信好了；要是俺信，那对你有什么坏处呢？”

“不是对我有坏处，我不是在说自己，”费多尔紧逼着说，“我觉着你这人很奇怪：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信上帝呢？”

“也许俺并不相信。”

“你不信，为什么要划十字呢？”

“那是……我想着要……就划了个十字……”

“咳，那怎么行……难道这种事能开玩笑吗？”克雷奇科夫严肃地劝导他说。

于是，恰巴耶夫向他讲了一段幼年时代的“历史”，并且肯定地说，正是由于这段历史，他才开始信上帝的。

“俺那时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他讲了起来，“有一次，俺偷了摆在圣像面前的一枚两戈比的铜币，俺家的那个圣像可灵验呢……偷了就偷了……俺拿去买了个西瓜吃，一下子就吃光了，刚刚吃完，就害起病来了，一病就是六个星期……发烧，发冷，泻肚子，病得厉害，简直要进棺材了……俺母亲知道是俺偷了那个两戈比的铜币，她接长不短地向圣像献钱……她说，一次十个戈比，凑在一起总献了三个卢布。她还老是替俺祈祷，央求圣母饶恕俺……终于圣母感动了，到了第七个星期俺的病就好了……打那回起，俺一直在想，一定有一种什么力量，是不能冒犯它的……打这之后，俺再也不拿人家

的东西了，别人家园子里的苹果，也不敢摘来吃……俺心里害怕……枪林弹雨俺倒不在乎，可是动人家东西，俺没胆子……俺不敢……"

这一次费多尔没有多谈什么，后来他几次和恰巴耶夫谈到宗教问题，谈了宗教的起源，谈到所谓上帝的问题。从此以后，恰巴耶夫再也不划十字了……而且不光是不划十字，有一次他向费多尔坦白说，"在闹不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是个大傻瓜，一旦明白过来，那就完全两样了：好比吃了蜜糖，再也不想吃黄连了……"

经过几次淡话，恰巴耶夫完全改变了对信仰、对上帝、对教堂以及对神父的看法，况且他原先就痛恨神父，不过心里多少有点怕他们，总以为"他们比我们更接近上帝，尽管他们是一帮地地道道的大坏蛋。"

日子越长，费多尔就越发深信，恰巴耶夫，这个坚如铁石、严酷无情的游击英雄，是可以象小孩子一样，弄得服服贴贴的。他这个人，就象一块蜡一样，可以捏成各式各样的形象，不过要谨慎，要善于接近他，必须知道什么东西他能"接受"，什么东西他不愿意马上接受……特别容易吸引他跟你走的东西，就是科学。这一方面，他很感兴趣，很乐意接受新鲜的思想。但也只限于这一方面。在别的方面，他很难弄，很顽强，有时还很固执。以前，生活条件使得他"两眼一抹黑"，而现在，他看见了，懂得了，在他的面前有一条新路，各种事情有了新的解释，他对这些新事物开始思考。他慢慢地、悄悄地、怯生生地走近那神秘的、关闭着的大门，那大门也是那样慢慢地向他敞开来，给他展现出通往新生活的道路。

八 进攻高尔察克

他们留在乌拉尔斯克待命已经十天了，每天无事可做，闷得要死。现在他们闲呆在驻在此地的乌拉尔斯克师的师部里，跟自己师的一个旅保持着联系，当时这个旅还没有调到布祖卢克区。他们太寂寞了，一点劲儿也没有。费多尔和安德列耶夫只见过一次面，而且时间很短。安德列耶夫一直在前线上跑来跑去，只是偶而忙中偷闲地到乌拉尔斯克来一趟。他瘦了，脸色也黄了，一双美丽的蓝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几乎变成黑色的了，显然是由于经常睡不足觉，操心的事儿太多，大概饮食也不大好。克雷奇科夫是在师部的走廊里遇上他的，虽说他只是半个小时前才到这里的，但现在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出发了。两个朋友彼此端详了好久，似乎在问：

“哎，新生活给了你什么新的东西：你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看来，两个人都发现了对方的新的东西，这就是接触过战斗生活的人在眼神里、面容上、举止中铭刻下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他们一边走，一边谈，只谈了几分钟，就互道再见，分手告别了……

恰巴耶夫异常暴躁——他在没事干的时候总是这样：有

时候，为了等什么事情，工作不得不停下一二天，恰巴耶夫就焦躁不安，判若两人。在这种情绪下，他对谁都不客气，为了一点小事就骂人，还用惩罚来吓唬人……

他的内在的潜力、旺盛的精力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发泄的机会，一旦它在工作上得不到使用，那末它也要无端地发泄掉，而且非要发泄掉不可。

当时乌拉尔斯克师布防的战线是在勒比辛斯克附近。仗打得不好，也不坏，也就是说，没遭到重大的失败，但也没有取得显著的胜利。突然，发生了一桩不幸的事件：一次战斗失利，牺牲了很多人。勒比辛斯克附近的战线发生动摇，濒于崩溃，新乌津斯克团和穆斯林团也被打垮，只好赶紧派库里洛沃团去援救他们。真是大难临头，而且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宛若晴天一声霹雳。大家没有想到，也没有估计到，事先连一点迹象也没有。乌拉尔斯克师师长是一个头脑冷静、经过考验的指挥员，连他也手忙脚乱了，没有立时控制住局势，开头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才好。他跑来找恰巴耶夫商量，共同决定对策。

但是这条战线已经无法重建了，乌拉尔斯克很快就被敌人包围起来，它在敌人的围困中坚持了几个月……

伏龙芝一接到前线惨败的消息，马上转到中央，然后下令立即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失败的原因。恰巴耶夫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费多尔被指定为委员会的主席。恰巴耶夫显然感到受了委曲：为什么不叫他当主席，而叫政治委员当主席。但是这种情绪直到以后才表现出来。恰巴耶夫并没有考虑到，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如果不说很大，大概也不能算小吧！显然，中央对这个问题有这

样的看法，所以才委托克雷奇科夫领导这项工作。

他们马上动手搜集各种材料、文件、各项命令和指示的副本、战报、电文……恰巴耶夫从费多尔那里拿到一份旅部的命令，这份命令说明了进攻麦格涅夫斯基村惨遭挫折的原因，从这个命令中也可以找到发生这次事件的线索，因此，克雷奇科夫对它特别重视。恰巴耶夫也仔细把它研究过了，心里琢磨好“自己的批评意见”，然后坐下口授给打字员打出来。这时费多尔走了进来。

“这个命令你看过啦，瓦西里·伊凡诺维奇？”

“嗯，看过了，咋的？”

“我也充分考虑过了……咱们一起讨论一下，”费多尔提议说。

“你自己看好了，已经打出来了……”

从恰巴耶夫的话音里和神态上，可以感到一种隐藏不住的鄙夷和不满，当时费多尔对这种态度还完全不理解。

“你念一遍吧，”费多尔说，“咱们一块推敲推敲，说不定还有什么地方要修改的……”

“没有啥可改的，”恰巴耶夫毫不客气地说，“你改你自己的吧，俺咋地写，就咋地发出去。”

“这是为什么呢？”费多尔觉得很奇怪，恰巴耶夫的不友好的回答，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这是因为……你既是‘主席’，你报告你自己的意见好了……俺，是个‘专家’……俺只不过是一个‘专家’……”

他怀着委曲的情绪，把这个词接连重复了两遍。

“咳，你胡扯些什么啊？”费多尔难过地说，“你平白无故瞎

扯些什么？何必要分家呢？咱们还是一道商量，一道发出去吧。”

“没有这个必要，”恰巴耶夫固执地说。

克雷奇科夫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纠缠下去。

“好，你念吧，”他在椅子上坐下来。

恰巴耶夫把自己的批评意见念了一遍，他对乌拉尔斯克师的那个旅部命令，分析得很有道理、很透彻、很认真。费多尔把话岔开了，不讨论他的意见，他决计把自己的意见单独发出去。

“你有啥说的？”恰巴耶夫问。

“我看蛮好嘛，”费多尔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你是想说不好吧？”恰巴耶夫突然提高了嗓门说，“说不好是有不好的，但那不是俺……对！俺知道俺是干啥吃的，可是那些不三不四的蠢货在那边……这群狗娘养的……”

费多尔不明白，恰巴耶夫说的这些雅号是送到谁的头上的。

“这些坏蛋……”他愤恨地继续说，“总想着把别人排挤出去……处处刁难人……哼，俺们会找到讲公道的地方，俺们会把要说的话说出来！……”

恰巴耶夫破口大骂的是“万恶的司令部”，他认为司令部里的人是一大帮寄生虫、胆小鬼、钻营家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

“算了吧，恰巴耶夫，你出哪家子洋相？”费多尔半开玩笑地说，“无缘无故，真是活见鬼！你吃了迷魂汤还是怎么的？”

“俺早吃饱了，快撑破肚皮了。”恰巴耶夫的话里充满着责

怪的语气。"撑得要死了……你抓不到俺什么……老弟，你找不到俺的碴儿，俺恰巴耶夫不是吃白饭的……"

"你说的是什么呀？"

"俺说的还是那件事，就是俺没有念过军事学院……俺不进军事学院……俺靠土办法也照样干得出……俺没有戴过将军的肩章，谢天谢地，还是不戴那玩艺好，戴了的，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成为俺这样的战略家……"

"别吹了，别吹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自己吹自己，多不好意思……还是让别人去讲你……自己么……"

费多尔把一个手指往嘴唇上一按，表示叫他住口。方才那种不快的感觉，又涌上他的心头。他恨不得用什么办法挖苦恰巴耶夫几句，也就是说，报复他一下。用什么办法呢？费多尔知道，不承认他的勇敢、他的才能和军事天才，最能刺痛他的神经，特别是再略微扯上点"司令部"什么的，那就更来劲了。可是现在不是时候，你不去触他的痛处，他已经跳得够高了。

"说到战略，你最好少开口，"费多尔脱口说了出来。

"什么叫少开口？你自己少开口吧，"恰巴耶夫气得全身抖了一下。

克雷奇科夫抑制住自己，竭力装出安然自若的样子，轻声地对他说：

"你听我说，恰巴耶夫……你是一个出色的军人，勇敢的战士，优秀的游击英雄，但只不过如此而已！咱们坦率地谈谈吧。你自己要有勇气承认：在军事才略方面你还不行……嗐，你称得上什么战略家呢？你自己想一想，你凭什么当一个战

略家？"

恰巴耶夫气得浑身直哆嗦，一双灰蓝色的、如狼一般的眼睛里射出凶恶的火光。

"蹩脚的战略家?!"他几乎朝费多尔吼叫起来。"俺是蹩脚的战略家？你这么说，你就去见你的鬼吧！"

"你安静一点吧！"费多尔幸灾乐祸地说。他很得意，因为这一下子多少触到了恰巴耶夫的痛处。"你干吗跳脚呢？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事工作者，要懂得战略的科学原理，你可知道，那必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你以前抽不出时间，好啦，现在你还不明白……"

"俺一点也不明白……一点也不明白……"恰巴耶夫打断他的话说，"你给俺一个军，俺照样指挥得了。"

"给你一个方面军呢？"费多尔开玩笑地说。

"一个方面军也指挥得了……你咋想的？"

"哦，要是叫你当总司令，你也不会推辞罗？"

"怎么，你以为俺对付不了？摸摸情况，熟悉熟悉，照样能干。只要俺想干，俺就能干。你明白吗？"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费多尔已经没有刚开始谈话时的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了，甚至也没有提问时的那种讥讽的口气了。恰巴耶夫这种对自己无限才能的自信，着实使他感到惊讶……

"你相信自己的力量，这很好，"他对恰巴耶夫说，"没有这种信心，什么事也干不成的。不过，你是不是太自负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你刚才说的话是不是放空炮？你说话不知道分寸，这很糟！"

恰巴耶夫越发光火了，眼睛里闪着恶狠狠的凶光，他怒不可遏，但还是等费多尔把话讲完。

"俺？……"他喊了出来，"俺放空炮？是谁在草原上同哥萨克厮杀的？没有子弹，赤手空拳。是谁？"他逼近费多尔说，"妈的，他们算什么东西？一帮混帐王八蛋……俺是不是战略家为啥要他们承认……"

"我也不承认你是战略家，这样一说，我不是也成了混帐王八蛋了吗？"费多尔抓住他这句话说。

恰巴耶夫一下子给问得张口结舌，不知怎么回答才好，面孔顿时涨得通红；他突然显得可怜巴巴的，好象他做了一件可笑而又幼稚的蠢事，被人当场抓住了一样……

费多尔故意把问题这样一转，主要是想把恰巴耶夫的话头岔开，不叫他任着性子乱骂街……不仅是因为这样乱骂"不象话"，而且对恰巴耶夫自己也很不利，要是被他的冤家对头听了去，怀恨在心，以后一有机会就会指出证人，拿出凭据，来将他的军，到那时，赖也赖不掉，处境就会十分尴尬。虽说这样，还是经常可以听到恰巴耶夫乱骂一遍，司令部也好，革命委员会也好，契卡也好，特勤科也好，政治委员也好，凡是对他可以多少使用一点点权力的，他都要骂。他大吵，大骂，诅咒，威吓，统统都是毫无缘由的：只要你给他解释清楚，他就明白了，而且表示赞同，有时还肯放弃自己的意见——尽管很慢、很勉强、很不情愿。对于自己讲过的话，他也不愿意轻易收回。顺便说一下，他对自己下的命令也是从来不肯更改的。这就是他的命令具有特别令人信服的力量的原因。

现在，恰巴耶夫的话柄被抓住了，费多尔决定把教育过程

进行到底，所以他先走开，让恰巴耶夫好好地考虑一下。"让他再怀疑怀疑，伤伤脑筋吧，这样以后可以记得牢靠一些……"恰巴耶夫经他这么突然一问，头脑有点清醒过来了。他就向费多尔解释，说什么"俺的话不是指……俺说的只是他们"等等……费多尔听他这么说，也就告辞走开了。

克雷奇科夫半夜回来的时候，正碰上恰巴耶夫坐在他的房间里。他坐在那里神态很窘，手里揉弄着一张什么纸头。

"喏，您拿去看看吧，"他把一张用打字机打好的便条递给费多尔。每当他内心焦躁，受了委曲或者等待受委曲的时候，他就常常用"您"来称呼别人。费多尔现在注意到恰巴耶夫对他的称呼，并且在纸条里也看到这样的称呼。

"克雷奇科夫同志，"便条上这样写着，"请您注意俺给您写的便条。您这样一走，俺十分难过，您以为俺的话是冲着您说的。关于这一点，俺现在要和您说清楚，您还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害俺的事情。俺这人是直肠子，火气又有点暴，在您面前说话又没个检点，思想上对某些人有反感，就一古脑儿倒了出来，结果惹得您生了气。为了消除咱们之间的误会，俺不得不给上级打个报告，要求撤掉俺的职务。这样，总比和自己最亲的同事闹别扭要好。作为一个朋友，俺把这件事预先告诉您。恰巴耶夫。"

这就是那张便条，现在逐字逐句地复制出来了，没有丝毫改动。它本来可能引起最严重的后果，因为报告已经写好了，过了一会儿恰巴耶夫也把它给费多尔看了。要是费多尔对这份报告挑毛拣刺，或者闷声不响，那末，事情就会闹到"上面"

去。到那时，谁知道后果会怎么样呢？看来，恰巴耶夫似乎完全不珍惜自己这个师，要知道，这真有点叫人纳闷。这个师里都是普加乔夫团、拉辛团和多马什金诺团的人啊，都是他最信得过的英雄团啊！不过，这件事也说明了恰巴耶夫性格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哪怕是为了芝麻大的一点小事，他也会轻率地、不加思索地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一下子抛弃掉。

如果这当儿再火上浇油，说不定会闹出更荒唐的“事件”来。

费多尔看完了便条，回转身，满脸堆笑地对恰巴耶夫说：

“算啦，亲爱的恰巴耶夫，我根本没有生气。要说我刚才情绪不好，那完完全全是由于别的原因。”

费多尔没有再讲下去，到了第二天才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了他。

“来了电报，”恰巴耶夫把电报交给费多尔。

“哪儿来的？”

“司令部打来的。命令咱们明天就要去布祖卢克……奥伦堡不去了……把事情了结一下，咱们就动身……”

他们想了想，决定不拖到明天早晨，现在马上把各项事情办完，连夜出发。乌拉尔斯克师作战失利一事要彻底审查，一天之内反正是结束不了，因为还要到现场了解情况，以及搜集一些文件等等。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他们立刻赶到师部，找来了几个有关人员，商量了一下。一个半小时以后，他们就离开乌拉尔斯克，直奔布祖卢克而去。

在那些日子里，在通往萨马拉的路上，忙乱得难以想象。列车从四面八方向基涅利驶来，有的开得飞快，有的慢腾腾爬

行。它们有的从乌法开来，有的从奥伦堡开来，有短途的，也有远程的，有的列车运送部队、弹药、军粮、装甲车……有的列车往回开，有的是空车，有的是救护车，其它的列车上装的也尽是部队，部队，部队……一列列辎重车从乌拉尔斯克接连不断开出，部队也从那里源源地调往前线。

兵力的重新部署在仓促进行：调动了大批部队，新的精锐部队调了进来，那些疲沓的、士气不振的、或者暂时还用不上的部队撤回后方。高尔察克已经占领了乌法，并且向伏尔加河步步进逼。战局十分危急。萨马拉受到威胁，伏尔加河沿岸的其它大城市也受到了威胁。局势严重，红军可能被迫向伏尔加河撤退，这对俄罗斯来说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红军统帅部不甘心这样撤退，在紧张地采取防御措施，无论如何也要顶住，扭转目前的战局，把主动权从敌人手中夺过来，并把敌人从苏维埃国家的中心地区赶回去。在布祖卢克地区已经准备好一个强大的突击兵团，要从这里给敌人第一次的迎头痛击。恰巴耶夫的第二十五师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从正面打击高尔察克，然后在其它各师的协同下把敌人从伏尔加河流域赶出去，当前的目标是收复乌法。

除了从斯洛米欣斯卡亚调来的几支部队，除了由天才的年轻指挥员西佐夫指挥的、曾经在乌拉尔斯克作过战，又被仓促地调到布祖卢克附近的索罗钦斯卡亚区的那个旅以外，第二十五师还配备了一个旅，指挥这个旅的某军官，两星期后就投奔白军去了。这个旅是在离萨马拉不远的克罗托夫卡区组编起来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团就隶属于这个旅。

高尔察克拉开广阔的战线，同时向佩尔米、喀山和萨马拉三个方面齐头并进，总共投入了十五万白军。双方的兵力几乎旗鼓相当，我们集结的兵力比高尔察克略为少一点。高尔察克妄图在占领佩尔米之后进攻维亚特卡，与英国军队会合，占领萨马拉，与邓尼金会合。他急于要把苏维埃俄国扼杀在致命的铁桶般的包围圈中。

高尔察克在通往萨马拉的铁路线上遭到了第一次沉重打击：他在这里丧失了主动权，他的几个师和军团的部分兵力被打垮，部队的士气开始低落下来。遭到第一次打击之后，无论是军官营，无论是训练有素的老兵，无论是精良装备，任什么也无法阻挡他的部队向乌法溃退，再由乌法退到西伯利亚，直到最后覆灭。号称白军之花和白军希望的卡佩尔军团，参加了别列别依之战，它们和其它白军部队一样，也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红色的浪潮奔腾向前，势不可挡。饱受苦难、家破人亡的百姓们，扶老携幼，热烈欢迎红军。

铁路线上的大小车站，好象一只只装满蚂蚁的瓶子：蚂蚁都在急匆匆地爬呀，爬呀，你推我搡，滑下来，又爬上去，然后又急匆匆地爬呀，爬呀，爬呀……几列火车开进来，成群的红军战士，象发了疯似地从车厢里跳下来，向四面八方奔去，一堆一堆地挤在砖砌的小棚子旁边，排着队，叮令当郎地敲着水壶，等着灌开水。他们急不可耐，嘴里骂骂咧咧，直发脾气，不住地跺脚。另外一些战士哄地散开，在车站上，或向邻近的村子跑去，买火柴，买烟卷，买鲜鱼——看到什么买什么，有的向摊贩买牛奶喝，有好些人买了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面包……有一大帮人围住军运指挥员，吵吵嚷嚷，不肯散开。他们提出

强烈抗议，咒骂站上的规章制度和混乱不堪的秩序，把这个可怜的军运指挥员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们要他去做办不到的事情，咒诅莫须有的东西，期待着实现不了的要求：一会儿要求立即派出“乘务组”，一会儿要司机，要新的机车，一会儿又要求派暖棚车，或者把暖棚车换成客车……如果军运办公室通知他们说：“没有，不行，办不到”，那末顿时就会爆发出抗议声和漫骂声，中间还夹杂着威胁和恐吓，发誓要来跟他们算帐，不亲自来，就叫他们的厉害的指挥员来。

突然响起了铃声。

“第几遍了？”

“第三遍了。”

于是，抗议的人群从军运办公室的栅栏窗口一哄而散，顺着铁路发狂似地飞跑下去，不时地撞倒迎面过来的行人，惹得人家又是惊叫，又是咒骂，又是吆喝。

三遍铃声……汽笛一声长鸣……军用列车开动了。三三两两的，或是单个的没赶得上车的红军战士，在车后追赶着，追了好久。追上的人，有的脚踩踏板吊着，有的抓住小梯子和扶手，有的爬上车顶……有的红军战士追得筋疲力尽，一甩手，索性坐在铁轨上，只好等候下一趟途经这里的列车，也许要等上一天，也许要等上两天，谁知道要等多少天——一趟列车开过来没有注意到，第二趟车又上不去，第三趟车一下又从鼻子底下开过去……

暖棚车里一片漆黑：没有蜡烛，没有电灯，也没有马灯。红军战士们躺在光光的车板上。树皮鞋和皮靴子踩得车板满是泥浆，油污的行军锅，汤汤水水把车板弄得一塌糊涂，到处是

唾沫，到处是扔掉的马合烟头。夜是多么漫长啊！他们用破破烂烂的、满身窟窿的军大衣，略为遮遮身体，把帆布挎包枕在头底下，睡下了，久久地睡在寒冷的黑暗之中。每到一个车站，车子就来回拖个不停，不是重新调车，就是换车，要么同别的车接起来，要么同别的车子摘钩，缓冲盘撞击得震天响，脑袋瓜都快震裂了……一些人手里提着小马灯，在黑暗中咋呼着，对骂着……列车被拖到后面老远老远的道岔上“靠边站”。但是那里也已经停满了这样的列车，车上也照样挤满了红军战士——他们有的从上面的小窗口里往外探望，有的在往车下跳，有的往外跑，也有的往车里钻，往车上攀。在“冻结了的”军用列车附近，整天整夜熙熙攘攘：有的人忙着去“办事情”，有的人出来随便跑跑，暖和暖和身子，也有的人出来查看一下，看有没有藏得不严实的枕木、木柴、木箱子，一句话，看看有没有可以拿来烧火的东西；还有一些人“悠哉悠哉”，整夜地在车站附近吊儿郎当地闲逛，找寻各种刺激。

路上走了好多天，历尽了千辛万苦，经过了无休止的停车，吵嘴，打架，甚至相互开枪，现在总算到达目的地了！他们打开货车的车门，把一件件行李、包裹麻利地扔下来，垒成一大堆，然后留下两个人拿着枪看守，其余的人都到别处去帮忙。在那里，一匹匹战马正在沿着跳板从车上牵下来，马腿绊上绳索，拴在一起，一群群地赶走，马群周围跟着人，看守好，怕它们乱跑。大炮、装着各种物资的辎重车、汽车、其它的一切东西也一件件地慢慢地往下卸……

车卸完了。卸空了的列车，孤单单停在那儿，无人照管。空荡荡的暖棚车，现在变得更冷了。到处是喧哗声、吵架声，

乱七八糟，一片混乱，偶然有人发出几声含胡不清的口令，可是谁也不去理会它。听，现在是真正的口令了：

“准备出发！”

大家奔跑起来，慌慌张张、急急匆匆地寻找自己的连、排、班……最后，队伍整好了……出发了。几列纵队，摇摇摆摆地向前移动，队形很宽，很整齐。辎重车把地面压得轧轧作响，站了好久的马儿喷着响鼻，嘶鸣着。枪支相碰，发出铿锵的响声。这儿，那儿，不时地传来零星的枪声……头几里路，队伍整齐；头几里路，精神抖擞，步伐有力，歌声嘹亮雄壮，可是越往前走，掉队的、筋疲力尽的、生病的一个个坐上了辎重车，队伍也就乱了套，再也听不到歌声了。现在，大家都巴不得赶快停下来休息……队伍终于停下来休息了。有的人不到一二分钟就呼呼地睡着了，发出如雷的鼾声，有的人闲不住，就唱着歌，随着手风琴，跳起轻快的俄罗斯舞——一面喊着，一面蹲着跳，“漂亮极了”……队伍从一个休息地到下一个休息地，从下一个休息地到再一个休息地……直到进入战壕。

战斗生活开始了。

开到布祖卢克附近的一个旅由波波夫接管；索罗钦斯卡亚旅由西佐夫指挥，过了不久，师部把那个无耻投奔白军的旅长所指挥的旅交给了什马林。全师都集中起来了。其它各师也都集中起来了，各个军也集中起来，作好了一切准备。整个战线，一片沉寂，等待着第一次的反击。

“生死存亡，在此一举”——这就是当时许多人赋予第一次的反击的重大意义啊！

“如果我们不能夺得主动，如果我们被迫撤到伏尔加河对

岸，而高尔察克得以南北合围，形成一个致命的包围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到那时，苏维埃俄国还能不能生存下去呢？”

是的！危机四伏的局势，当时确实比许多人所设想的更严重，更紧迫。维亚特卡、喀山、萨马拉、萨拉托夫已经初次溅到了白匪掀起的恶浪的飞沫。对高尔察克来说，通往萨马拉的铁路线，是最迫切需要的，是关系重大的，是生死攸关的，因为从这里到俄罗斯的心脏最近。难怪在他们的火车车厢上写着：

“乌法——莫斯科”

在布祖卢克附近已经出现了敌人的先遣侦察队，前几天布古鲁斯兰也失守了。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敌人越来越逼近，局势更加危急了。

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就绪，有些东西还没有运到，有些部队还没有赶来，炮弹也不足，再加上春天道路泥泞，行动不便——可是不能再等了，乌云一天密似一天，可怕的黑色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红军已经作好战斗准备，一个个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各团、各旅、各师都已枪上膛，刀出鞘……正在等待信号……单等信号一发，就全线出击，昂首挺胸，向高尔察克猛扑过去，在殊死的一对一的决斗中，考验自己的力量……

四月二十八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开始了一个重大的行动：红军向高尔察克进攻了。

九　战斗之前

布祖卢克人压根儿没有考虑向后方疏散。他们动员了一切力量——准备进行殊死搏斗。党委会、执委会和各级工会紧紧地团结在驻扎在本地的这个师周围，拼出全力支援红军打仗。这里"一切为了前线"——这一庄严口号，正在坚决贯彻执行。大概，在其它被包围的中心城市里，这个口号也曾上百次地这样执行过了。

布祖卢克已经受到威胁：敌人的骑兵游动哨常常窜到离城只有几十里的地方。那些还没有被高尔察克骑兵游动哨抓走、没有被本村白匪奸细出卖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三三两两地从四面八方，主要是从布古鲁斯兰跑到这里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一到这里，马上加入红军，当一名普通战士。以后又随胜利进军的部队一起打回自己的家乡，重又做起原来的工作；另外一些人，干脆留在部队里，以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身份跟随部队一起开到遥远的地方。

在充满紧张情绪、在充满血腥和硝烟的气氛中，人们感到一个时代、一个新的时期、一个伟大的日子就要来临了，从这一天起，一个伟大的新纪元就要开始了。最后准备的命令下达了，大家立刻忙碌起来，集中到一起，向着共同的目标奋勇前进。在这个本来是冷落而沉寂的小城里，响起了摩托车的突突声，汽车在飞驶，骑兵向四面八方奔驰，一队队的红军战士

踏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向前开去。

师司令部设在市中心两条大街相交的拐角处。这里，白天黑夜，一片繁忙景象。它象个焦点，把最近几天的紧张、喧嚣和忙乱的生活全都集中地反映出来了。

恰巴耶夫和费多尔这对亲密的朋友、形影不离的伙伴，很少呆在自己的住所。他们的全部生活都是在司令部里度过的。中央常常有命令和指示发来；地方上和各部队也不断有各种报告和请示送来；直通电话里有没完没了的“话”要谈……当然罗，拖得最长、最纠缠不清的谈话，不外乎围绕缺这少那进行谈判。然而当时，问题成堆，物资奇缺，两者严重的程度简直不相上下。因此，同各部队（中央也在内）打交道时，往往免不了要提高嗓门，有时要劝说，有时要央求，有时还得用“采取其它措施”来威胁。恰巴耶夫总以为只要给“当地各国民经济委员会”加点压力，那么一切必需品马上就会大批运来。只要他一看到或者一听说哪里有二、三十辆车子，四桶车油；只要他一晓得什么地方的仓库里有一、二百米毛料子，有几顶皮帽子、几双毡靴、几件短皮袄，那他就立刻瞪起眼睛，硬逼着人家把这些东西交给部队。“一切为了前线”这个口号，他理解得太肤浅了，竟以为单靠这点零零碎碎的，少得可怜的破烂就能使我们几百万大军吃饱穿暖。经济遭到破坏，必然引起物资短缺，这个问题，他已经讲过多次了。但是，他显然并不能从本质上去具体地认识这个问题，也不善于从自己讲的话里得出什么结论。每当他自说自话，信口胡诌的时候，克雷奇科夫总要劝阻他，应当说，劝阻他，并费不了多大劲儿：要想叫恰巴耶夫默认某人的意见，只要举出两点充分的理由就

行了。

默认，只能是默认！要想使他放弃或者收回自己讲过的话，承认自己有些话说得不对，并且公开声明——那简直是妄想，恰巴耶夫是永远不会这样做的！再有，你举出的理由一定要过硬，一定要有说服力。他最厌烦那种说话哼哼哈哈，含糊其辞的人，不管这种人的话有多大意义，他也是不予理睬的。

他喜欢坚决、果断、有力的言语。他更喜欢坚决、果断、机智的行动！

过两天，西佐夫那一旅的人就要出击了。要去看看他们。他们离布祖卢克只不过四十里路。

旅长西佐夫连续行军打仗，吃苦受累，再加上两次受伤，他已经丢失了冷静思考和从容谈话的能力。他才二十二岁，看上去倒象个老头儿了。

还在一九一七年，他就丢下乡下的那点家产，参加了赤卫军。不久，天缘巧合，他遇上了恰巴耶夫。恰巴耶夫见他这个人说话有道理，办事麻俐，胆子大，什么都豁得出去，所以一见就放心满意，马上派他当了步兵侦察队的队长。有时候，西佐夫带上三、四个人，敢爬到酣睡中的哥萨克人的屋里，而爬到捷克人那里，更是家常便饭。他一进屋，先啪啪几枪，把敌人打懵，然后缴下武器，瞧，一下子就赶回十五、六个俘虏。这类事，他不知干过多少次。他这种大胆的、神话般的偷袭，正是恰巴耶夫自己常干，而且喜欢干的。在伊尔基兹、在古西赫，同捷克人打仗的时候，西佐夫的一条腿被打穿了，折腾了不少日子，总算能下地了。伤口刚一封上，他就回到部队来了，在部

队没呆多久，在一次新的战斗中，一只胳膊又被打穿了。受伤他不在乎，动手术也不怕，疼痛和折磨人的治疗——在他统统算不了一回事，而最使他难受的是离开自己的战友。所以这一次也没等把伤完全养好，又提前归队了。

在乌拉尔斯克战线上，接连不断的残酷战斗耗尽了他的最后一点精力，本来已经衰弱的神经，这一来弄得更加错乱了。他那肌肉结实、饱经风霜的脸上，一会这儿，一会那儿，不住地抽缩跳动，宽大的鼻孔，象野兽的一样在翕动，淡褐色头发又硬又乱，那胀红的宽额头，唉，刻下了一条条皱纹，沾上了墨水，弄得很脏很脏。一双灰色的、网着血丝的眼睛闪着严厉、冷酷的光芒；两只劳动惯了的大手，长满了厚厚的老茧；衬衣领子总是敞着，好象很热，闷得出不来气似的；嗓音很不平稳，一说话，声音颤抖，有时尖得刺耳，嗓子象是裂开了一样。每当这个时候，他那筋骨健壮而又富有弹性的瘦精精的身躯，也跟着千姿百态地动起来，合着拍子左右摇晃着脑袋，跺着脚，同时又敲着拳头。西佐夫很知道自己的身价，因此从来不肯受气，任何人，即使是自己的指挥员，他也不买帐。

恰巴耶夫在草原上赢得的那种草莽传奇式的荣誉，使他动心，也使他烦恼。由于眼热，他头脑发昏，由于热切的渴望和企求，——他简直要憋得喘不过气来了。

"我为啥不能成为第二个恰巴耶夫呢？"

由于他一直抱有这种情绪，现在，他们见了面，就没有先前那样真挚和热情了。不久以前的那种纯洁的友谊，也蒙上一层淡淡的阴影。恰巴耶夫已经发觉西佐夫起了变化，但他决不肯把西佐夫放走，因为他知道，他个人的荣誉是由于有了

西佐夫这些人，才闯出来了，才保持住了，才发扬光大了。而西佐夫呢，也不肯撂下恰巴耶夫，因为恰巴耶夫的荣誉的光芒也照射到他的身上，为他开辟了宽阔的道路，他也满怀一种不可抑制的奔放豪情向往着这条道路。

两个人这次见了面，还是很亲热。他们一分钟也不耽搁，马上在桌子旁坐下来，看地图，看命令，发电报，打电话……派传令兵去请各团团长、后勤主任、医生、政治委员……情况估计得很准确。一切的一切，好象都已预先安排妥当了，什么也不该再打乱，只要按照谱好的曲子演奏就成了——不过，要真能按谱子演奏，确实非有大行家不行啊！而西佐夫在这方面是个出类拔萃的行家。三天后就听说他把敌人一个师打得稀里花拉。他们坐在那儿量了又量，量过就讨论。讨论时又发生争论，有的问题意见不一致，就相互指责，后来争来争去，总算找到一个双方都认为可行的方案，才达成了协议。

"现在要召集各团指战员开个大会！"恰巴耶夫说，"有些事儿也要跟他们讲讲清楚……"

"好哇……马上集合！"

西佐夫站起来，命令各团团长立刻把战士们带到那座最宽敞的电影院去……

"告诉同志们，就说恰巴耶夫同志要作报告！"他追着喊了声，"叫他们马上来听……"

搞不清他为啥要讲这句话：他讲这话是真心诚意，还是在开玩笑，还是嘲笑恰巴耶夫喜欢作"报告"？单凭他的口气是分辨不出来的，因为他开玩笑和下命令的腔调都是一样的。

过了半个小时，在电影院的宽大、潮湿、坐位不太舒适的

大厅里，挤满了穿灰大衣的人，挤得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了，实在挤不下，有不少人只好留在门外。台上摆了一张桌子，桌上照例放着一只长颈凉水瓶，一只玻璃杯，还有一把发亮的木柄手摇铃……恰巴耶夫刚一露面，立刻响起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有的人赶紧咳嗽两声，把帽子戴正，想装出一副挺神气的样子。当他刚说出第一句强有力的、大家爱听的三个字："同志们"的时候，这黑压压、轮廓模糊的一群人，挤得更紧了。他们屏声敛气，聚精会神地等着听他们想要听的话。

"同志们！"恰巴耶夫对他们说，"现在咱们就要去打高尔察克了。咱们大伙儿在草原上打死的哥萨克有千千万——胜仗，咱们打的可多啦。这回，高尔察克将军也逃不脱咱们的……"

鸦雀无声的人群这时突然暴发出一阵欢呼、狂叫和震耳欲聋的掌声，简直象急风骤雨，势不可挡。大厅里的气氛登时白热化了。又过了两分钟，恰巴耶夫的话产生了更深刻更突出的效果：原来一文不值的话，现在能值三个戈比了；原来只值三个戈比的话，现在能值一个卢布了。恰巴耶夫有几句话是他的撒手锏，他不看准时机，是不肯抛出来的。这些话，说实在的，并没有什么稀奇，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精采之处，然而对于这些单纯、热情、易受感染的听众来说，却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效果。

"同志们，俺不是旧将军……"恰巴耶夫抗议似的愤愤地说，"旧将军往往在三百里以外下命令，非要部下拿下某个小山头不可。部下报告他说，没有炮兵支援，接近不了那个山头，那里有三十道带刺的铁丝网……可是他，这个白毛鬼，竟

发出这样的命令：你们学过体操吧？你们会跳高吧？那你们就跳过去嘛！……”

他讲到这种地方时，听众总是哄堂大笑，又喊又叫，向他表示同感。这种纯朴通俗的形象性话语，很合听众的胃口，正讲到点子上了。

“俺不是什么将军，”恰巴耶夫舐了舐嘴唇，用力拧了下胡子，接着说，“俺跟你们在一起，俺永远冲在最前头，如果有危险的话，俺第一个碰上……头一颗子弹先打在俺头上……可是人总是想活着的，哪个乐意死呢？……所以俺挑选的地方，总叫你们大家安全保险，俺自己也不愿白白送死……同志们，咱们的仗就是这么个打法……”

他的报告，自始至终用的是这一类词句，保持着这样的口吻。可是话又说回来，他的确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那就是他不喜欢多讲废话；这倒不是他没这个本事，而是他懂得讲短话的好处。

他讲完以后，西佐夫就很难再讲什么了，就是费多尔来讲也留不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讲话以后，就是文娱晚会。演出的都是一些即兴节目，但非常精采。只有在那些日子里，大概，只有在前线上才能看到这种节目。

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刚一讲完最后几句话，似乎这几句话还在空中回荡，大家还在等着听下面几句的时候，手风琴就响起来了。这位手风琴手是打哪儿来的，又是什么时候跳到台上的？谁也没有留意，但毫无疑问，他一定是遵照某个人的无声无形的指示而来的。他拉了一支什么曲子呢？“喀马林舞曲”……拉得节奏分明，铿锵有力，听了不禁令人舞兴大发，两

条腿不由自主地动弹起来。恰巴耶夫摆出一副花花公子的架势蹦到台子中央，两脚踢踢踏踏地起舞了……先是屈膝、弯腰、转圈，接着就顿脚、踏步。直到那千把人的观众发狂般地喊叫、喝彩、鼓掌的时候，他才用左手扶住那把漂亮的镶银指挥刀，利索地蹲下身，两腿一伸一缩地急速跳起来，只听见马刺咔嚓咔嚓地响，帽子歪到一边去了。手风琴手该有多么幸运啊！他是维亚特省的人，身高体壮，还很年轻，一只鹰钩鼻子油光发亮，宽大的脸上，长着一对跟大象眼睛一样小的眼睛。他拼命地拉着手风琴，恰巴耶夫本人在他暗哑琴声伴奏下尽情地跳舞呢。

最后一个动作，最后一个漂亮姿势表演完了，恰巴耶夫纵身一跳，跳到旁边去了。他掏出一块沾满油腻的、质量很不赖的烟色手帕，擦着汗涔涔的面孔，显得又愉快，又得意……

台子整整占用了一个小时，没法腾出来；这时跳舞的人不再是单个独舞，而是三五成群地一块跳了。跳舞迷实在太多了，简直成了一场跳舞比赛会。那些时间跳得过久的，被人家不客气地赶下台去："你跳够本了，"那人说，"该让别人跳跳了！"

跳舞以后，接着就是讲故事：其实都是胡诌一通，听了只能叫人绝倒。那时在前线上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小册子和文集，也没有革命歌曲。这些东西难得送到前线来，红军战士看到的东西很少，他们只能唱唱自编的快板和大众军事歌曲……

讲好故事，歌唱家们放开喉咙唱了起来：究竟唱什么歌，他们也没有多加思索，想到啥就扯着嗓子唱啥。真是瞎胡闹

啊！……但这是愉快的、有声有色的、丰富多采的、发自肺腑的瞎胡闹。战士们经过行军打仗，熬受战壕里紧张枯寂，饱尝半饥半饱的生活，这么休息一下，该是多么开心，多么适意啊！打这以后，他们无论在小木屋里，或是三三两两在溶雪的泥泞大街上闲逛；无论是围着桌子吃饭，在马棚里干活，或是闲来嗑葵瓜子，只要一聊天，就聊那个愉快的晚会。他们谈论和回忆的中心，就是恰巴耶夫，他们众口一词地说：这样的指挥员真了不起，战士们都敬爱他……今天他迎着朝霞，在寒风凛冽，浓霜弥漫的田野里指挥着散兵线和纵队去出击，冲锋，搏斗，而到了晚上，他竟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和战士们一起嗒嗒地跳起"喀马林舞"来……看来，当时确实需要这种从农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有机地体现着农民一切特点的指挥员。群众的觉悟提高了，也就没有这个需要了。即使在当时，拿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工人组建的那个团来说吧，他们就不需要恰巴耶夫这类人物了。在那里，他那一套粗俗的讲话是不会受欢迎的；在那里，有觉悟的沉着比英雄好汉的蛮勇重要得多；在那里，参加座谈会和群众大会比参加跳"喀马林舞"更有兴趣；在那里，跟恰巴耶夫谈话，象跟碰头碰脚的人一样，不会受宠若惊，也不会浮现出幸福的笑容；恰巴耶夫不大喜欢到伊凡诺沃纺织工人团去，因为他们不肯动辄狂欢雀跃，也不肯轻易献上凯旋桂冠的。

费多尔初次来到师政治部的时候，发觉人家的态度很冷淡，很不友好，显然，对他有些成见。"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有点莫名其妙，根本没想到这是政工人员把对待"流寇和莽

汉”恰巴耶夫所抱的敌对态度，也机械地搬到他这个“恰巴耶夫的政委”头上来了。

还有一点，就是政治部的人都知道克雷奇科夫和恰巴耶夫的关系很好，他们认为这道理很简单。要么“是我们的政治委员”受了恰巴耶夫的影响，巴结这位英雄，甘心当傀儡，人家叫干啥就干啥，根本没有自己的主见；要么就是“我们的政治委员”根本用不着受什么影响：他自己本来就是个“流寇”和“绿林好汉”……

有的人这样看，有的人又那样想，但他们都一致地认为应当一开始就得“给政治委员一点颜色看看”。因此，当费多尔来到师政治部以后，政治部主任雷日科夫对工作、对困难、对计划，一字不谈，而只是幸灾乐祸地把一张纸条塞到他的手里，带着讥讽的神情盯着他，想看看他对这张纸条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原来这是一张传票，是军事法庭来传克雷奇科夫这个“被告”出庭的。他一下子懵了头，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于是哈哈大笑起来……雷日科夫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很明显，他本来期望的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有点问题要到法庭去一趟吧！？”他望着克雷奇科夫，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来。

“我知道……小事一桩……用不着去……您瞧，碰上这么一档子事。上次我同恰巴耶夫到萨马拉来的时候，路两边都是雪堆，路面又窄又狭，除了往雪里撞，非在路上挤着走不可……忽然，有个公子哥儿，乘着雪橇，冲过来了，大概是哪个通讯部队的政治委员，我记不清了……他那一副娇生惯养的样子……显然是钻进党里的投机分子……这个坏蛋，雪橇赶

得飞快，简直是玩命！他把我们挤到一边，逼着我们往雪里跳，要不然，就得做蹄下鬼……哼，真不象话，我一气之下打了他一记耳光。他勒住马，跳下雪橇，盘问了我一阵，把恰巴耶夫的名字也记下来了。嘿，就是这么一点事儿……他竟告到军事法庭去了……”

费多尔满不在意地讲着这桩极平常的事件，雷日科夫脸上那种得意的、幸灾乐祸的神气渐渐消失了。本来，这个“事件”已经够无聊的，根本用不着幸灾乐祸，而他却以为：“我们这位政治委员原来是这么一号人……一定干了什么坏事……军事法庭才来传他……”真是乱弹琴。从另一方面看，费多尔的态度既直爽又和气，挺有风度，而且他的谈吐也证明他完全“不是什么流氓和莽汉”。雷日科夫对费多尔的看法，第一次见面后，已经开始动摇了，随后就彻底改变了：如果说，起初的态度不友好，有疑心，那么，后来的态度却是真诚的，推心置腹的。

费多尔答复军事法庭说，那是小事一桩，他没空去，仗就要打响了，他认为这里更需要他。

“但是任何缺席裁决，”他写道，“当然，我认为我理应服从，然而，我应当把此案经过的情形告诉你们……”

他把这件案子的全部经过情形，从头到尾，详细地写了一份材料。军事法庭了解了真情，相信并且同意了他的意见，——此后再也没来找过他。倒是听说那个告费多尔的公子哥儿，是个投机分子，清党时终于被清除出去了。

不久，克雷奇科夫和雷日科夫，又通过雷日科夫跟全体政工人员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克雷奇科夫很快使他们相

信，他们听到的那些关于恰巴耶夫的流言蜚语都是凭空捏造的，实际上他根本不是那一号人！

只有一次，而且是在开头的时候，克雷奇科夫与雷日科夫谈不拢，争了起来，争得面红耳赤。那是谈职权的问题。关于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之间的职权范围和具体分工，在整个内战时期一直是界限不明、始终纠缠不清的问题之一。现在雷日科夫和费多尔为了这个问题吵上那么一会儿，那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雷日科夫坚持政治部要完全自主，直接同军部发生联系，用不着向政治委员汇报，只同意跟政治委员通个气。可是费多尔恰好相反，他对这些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引证了各种指令和决议。这些文件，他在萨马拉时搜集了一大批，经过仔细研究，领会很深，现在就以“合法的根据”无情地驳斥雷日科夫的主张。这个问题后来很容易地就解决了，但不是通过辩论，不是根据这样那样的论据，也不是依照什么形式上的原则、引证某种“条款”，而是靠着战斗生活本身解决的。费多尔刚来几天就觉着忙不过来了：比如说，他要领导宣传鼓动工作，要考虑政治工作的组织问题，要指导在居民中开展系统的周密的工作，要审核每天的报告，检查统计与情报部门的工作，联系各个支部，总管涉及面很广的文教工作，——他哪有三头六臂？他哪来的时间呢？

其实，这都是政治部，也就是政治部主任的份内工作。作为政治委员，常常要到各旅去跑跑，往往一去就离开师部五、六天，因为只有他才能及时实地发现在做什么和怎么做，需要做什么和需要怎么做，什么是当务之急，什么是次要的，什么

可以再拖延一下，哪里需要人力，何处去调人，当前应当把人力集中在哪件工作上。

费多尔考虑了师内外的这些情况后，他对政治部就只限于提一些主要的问题，指出一些迫切工作，同时，按照这个精神，给政治部下达各种指示。他们接到指示后，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办法，通过自己的机构去贯彻执行。费多尔不仅同政治部不再闹矛盾，反而更加接近了。直到最近一天，他们还不曾发生过一次冲突，甚至连意见分歧也没有出现。他懂得了，不应当对政治部发号施令，只能去帮助它，并留意政治部执行主要指示的情况。

政治部象一大块海绵，常常吸收到许许多多的情报、事实、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些经验是从各部队和各郊区居民中吸取过来的，然后在内部，经过各种会议以及个人的思考来加以消化，再通过分散在各处的组织和宣传干部，运用大量的传单、号召、指令和守则又把它推广出去。

政治工作做得好也罢，坏也罢，但总一直在做，不只是对自己的作战部队，同时也对前线附近的居民。担任宣传鼓动工作的共产党员们，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有的坐着“红色马车”，到各镇各村去向居民宣讲红军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建立红军是为了什么，苏维埃俄罗斯情况怎样，苏俄以外又有什么情况等等。他们自己往往也知道得不多，因为他们没处去打听，所以讲起来常常不能自圆其说，但是主要的情况总还能够传达出来的。在当时，他们是灯塔，是消息的传播者，又是群众的老师……有的人演戏，有的人不知打哪儿弄来了一架幻灯，鼓捣一阵，就放起幻灯片来。在那穷乡僻壤的小乡村里，

有一半是糙粗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到三、四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过，所以幻灯这东西就成了稀罕玩艺了……

对红军做政治工作比较容易：他们经常集中在一起，政治上有训练，有组织，从智育的发展来说，乡村居民哪能和他们相比呢？即使没有政治部，他们自己的党支部也去对战士们进行政治工作。它只需要政治部供给学习材料，而且要新鲜材料。至于具体工作，他们自己也搞得来的。

团部又做些什么工作呢？那就各不相同了：要看这个团驻在什么地方，正在做什么。在后方，休整时期，是一种情况，可以系统地学习，把文盲一天天扫掉；可以安排一些牵涉面不太广的大课，按规定的时间组织阅读，在这里可以做的工作还少吗？而且都在做呢。但在行军打仗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往往几个星期拿不到一份报纸，也顾不上上大课、开大会。打仗嘛，就是打仗，哪里还谈得上别的？休息的时候，就得赶紧躺下，快点睡着，美美地睡上一觉，养好精神；要么就是补一补破了的皮靴，扎一扎脱了线的靴底，整理一下行装，准备明天一早行军。

每次到各团去巡视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各行其是，——他们早已有了默契，不必事先商量了。这样，费多尔往往来不及和所有的指挥员交谈，而恰巴耶夫也来不及了解各支部和政治工作的情况。但是他们两个人当中，一个人来不及做的，另一个人一定来得及做。在他们离开这里到另一个团去的路上，相互一交流，那这个团的全部情况就马上了如指掌了。他们两个人既能友好、融洽地在一起生活，又能融洽、友好地在一起工作。

当开始向高尔察克发起总攻的时候，雪已经完全溶化，河里的冰也开裂解冻了。在小山上，不久，又在山谷里，很快也露出了地面，小溪小涧的水溢了出来，把道路冲坏了。在掺着雪的烂泥里，在薄冰上，不仅炮兵无法通行，就是骑兵，甚至有些地方连步兵也过不去。春天已经当令了。

部队的行动遇到极大的困难。这一点多少也可以说明红军当时进展缓慢的原因。但这只是原因的一部分，另外还有其他原因。起初经过几次接触以后，高尔察克的先头部队停下来了，好象在犹豫观望。但在这时，各个方面的打击一个接着一个，纷纷落在他们的头上，"塔拉斯·舍夫钦科团"哗变，投诚了我们，这就打乱了他们的部署，鼓舞了在这里作战的红军部队。红军各部队没容敌军清醒过来，立即协同配合，勇猛顽强地向敌人扑过去。敌人的阵线动摇了。我们夺取了主动权。现在，不单单是眼光敏锐的人，而是任何人都觉察到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希望在增长，力量在增强，正在发展中的进攻注定要取得胜利。

十 打到布古鲁斯兰去

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这一天，我们在全线发起了总攻。在这以前，零星的小战斗，自然一直没有间断。

前线上是没有中间歇息的。

四月二十号左右，复活节前后几天，我们初次和敌人接了几仗。敌人而后又乘胜从布古鲁斯兰向布祖卢克进犯。西佐夫这一旅把三个团分别布署在鲍罗夫卡河左岸，顶住敌人的压力。各团开到这里来，真费了好大的劲儿啊：冰雪溶化了的道路和春潮四溢的急流，阻挡着他们的去路。不仅大炮拖不过去，就连机枪要运，也得拆散装在麻袋里。他们刚到鲍罗夫卡，战斗就打响了。这场战斗一直打到乌法，始终没有停过。

在布古鲁斯兰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西佐夫本人差点儿落入白匪军的魔掌，多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逃脱出来。他和维霍里，率领七十名左右骑兵插到敌人后方，发现深谷里有一连炮兵正在行进。他们打马扑过去，直到靠近了，炮兵军官们才弄清这些骑兵的来历，马上命令用榴霰弹对准他们射击。他们看见在大炮旁边的炮手拒绝开炮，当官的就用军刀背和手枪柄乱打他们，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西佐夫立刻派了大部分骑兵去包抄敌人，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他自己和维霍里带上几个骑兵从另一个深谷插了过去，飞也似地扑到大炮跟前。那些惊慌失措的军官刚要举起毛瑟枪，已经来不及了——维霍里飞驰过去，把一个家伙的脑袋劈开，又催马把另一个踩倒，而敌人自己的炮手乘机将其余的军官打翻，踏在地上，或者反剪双臂捆了起来。这活儿干得非常麻利；“炮手们”好象就在等骑兵窜到这里来似的。那几个抓住军官的炮手，用央求的眼光讨饶，其余的举起双手呆呆地站立不动。当官的一个也没留，当兵的一个也没碰。这个连的炮兵本来是派去兼程增援一个团的，这个团一看到情势无望，就向进攻他们的红军部队投降了。维霍里留下来指挥战斗，西佐夫本人又带领十

多名传令兵，直奔敌人的辎重队驰去。他们奔到那些装满鞋子和军服的大车的旁边，眼看这些东西马上就要落入红军之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辎重兵没有抵抗：有的人因为情况来得太突然，惊呆了；另外的人还糊里糊涂地把骑马来的人当作“自己人”，以为有什么“任务”要把他们转到别处去，就这样，一支由几百辆车子组成的辎重队竟成了穷红军的外快。

离辎重队不远的地方有个敌人的师部，那里立刻乱作一团。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把袭击的规模设想得很大，掀起的惊慌和混乱就是明证。它使“袭击者”不花什么代价就能获得胜利，而且常常还可以缴获大批战利品。这次也跟往常一样：谁也没有想到去组织人力、物力，谁也不去想办法，也不设法去观察一下，去了解一下。这当口，每个人想到的只是保住自己的一条命。第一个往外逃的是师长佐洛托祖鲍夫上校，他和师里的神父一起跳上值班的轻便两轮马车，就溜之大吉了。师部里到处是人，乱跑乱撞，乱叫、乱喊，乱成一锅粥了，焦躁的咒骂声和吆喝声响成一片。

十多名红军骑兵在吓破了胆的师司令部人员中横冲直撞，有的呐喊，有的开枪，有的喊话要敌人投降，这一来，本来已经无法控制的混乱局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西佐夫纵马去追那个师长，眼看追上了，正要举起马刀，那位“大人”忽然转过身，从马车里开了一枪，子弹打中了西佐夫那匹马的前腿，一条腿瘸了，跑不快了。这时马车也停下来了，上校跳到地上，举起毛瑟枪又一枪。第二发子弹打中了马头，马儿摇晃了一下就倒下去，在马倒下去的时候，西佐夫赶紧甩镫离鞍，跳下马，往近旁的一个小树林里跑去。在树林的边上，碰见了

一个农民，赶着一辆大车，套着两匹健壮的力马。西佐夫跑过去，顾不上多罗嗦，只把枪口朝他一指，跳上紧靠身边的那匹马，斫断边套，往回飞驰，向同志们停留的地方奔去。但是那边的混乱已经平静下来，敌人已经搞清，这次袭击并不怎么可怕；看来，留下的几个同志大概已被他们赶跑了，说不定已经被他们打死了，那边一个人也没有；当西佐夫从白匪司令部的小木屋旁边经过时，才看到一个传令兵，没有骑马，腮帮子上全是血。他向传令兵奔去，喊他跳到自己这匹大马的宽大的屁股上面。传令兵没多犹豫，——纵身就跳上去了，抓住西佐夫，差点儿没把他从马上拉下来。

于是他们两个人扯掉红军的符号，同骑着一匹马，从辎重队后面，从村舍后面跑过来，一直向远处的一个高岗奔去。西佐夫估计，他自己的部队此刻该开到高岗附近了。前面有一队骑兵，停在路当中，没别的路可绕了。这是些什么人？跑近一看，原来是自己人；他们离开了辎重队，迷了路，现在不知道怎样穿过林中空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向着在横穿平原，隐约向这边开来的自己的部队靠拢过去。西佐夫这匹马虽说挺壮，但骑它来突围是不行的。最出色、最勇敢的传令兵亚什卡·加拉赫很懂得这一点。

“指挥员同志，”他说，“骑我的马吧，我下来步行，万一被他们抓住，我就说被动员来的，也许他们不会来碰我，有时候他们也会放过……”

没什么好考虑的。西佐夫跳下那匹高大的骒马，让一起来的那个传令兵仍旧骑在上面，自己换上亚什卡那匹敏捷的骗马。大家排成一字队形向前飞奔，只剩下亚什卡·加拉赫

一个人，慢腾腾地往回走，向辎重队走去。（三个星期以后，他才回来。他说，他混在敌人的辎重队里，当辎重兵的庄稼汉没有动他，也没有去报告；但是他没能马上跑掉，因为他已经被赶到那几辆躲开了红军部队的大车上去了。）

西佐夫这一队人马在田野里奔驰。子弹嗖嗖地飞过来，象蜜蜂一样嗡嗡乱叫。有两个骑兵被敌人撂倒在辽阔的草地上，其余的人都跑回来了。西佐夫也跑回来了。很快从一个侧翼调来一支骑兵侦察队，叫它跑在本团的前头，去拦截跑掉的辎重队。一部分辎重队已经逃脱了，但是大部分都落到这个团手里：西佐夫这个旅当时就用这批物资把那些光着脚丫，穿得褴褛的指战员很好地装备起来了。…………………………

……………………………………………………………………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各团、各旅和各师都不乐意把自己的战利品上缴，去作"统一分配"——一般都要打埋伏，自己用，有时存货过多，简直用也用不光（这种情况不多），而交到"上面"去的，不消说，当然是根本用不着的、多余的累赘东西。不仅衣服、鞋子、粮食是这样，就连步枪、子弹、机关枪，甚至……大炮也是这样。有时竟会出现这种怪现象，一个团勉勉强强只能凑个十来挺机枪，而在另一个团里，好家伙，一下子就可以搬出上百挺。他们守口如瓶，从来不讲自己有上百挺，甚至在上级来检查的时候，他们也能藏得严严实实，在各种"统计和报表"中，根本别想知道确实的数字。这种密保得可严呐，甚至没有一个旅长肯对"恰巴耶夫本人"说老实话。可话又得说回来，恰巴耶夫从来也没有要求他们讲这种老实话。在他下达命令的时候，尽管他没有公开讲过各部队里有

多少多余武器，但他心里有数，各部队至少有二、三十挺多余的机关枪，有时还会有那么一门“没上过账”的大炮。这门大炮，可能是他偶尔发现的，也可能是团里那些笨蛋说走了嘴被他听到的。报表里所写的现有武器的数字，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照旧不变。但可千万别以为他们从来没有损失，损失是有的，只是向上级报告了没好处，反而有失体面。所以受了损失都不响，就用他们那些秘密的、用之不竭的“储备”来补充。既然受了损失一概不响，那么得到战利品也不可能和盘托出。这里他们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远见”：他们并不追求昙花一现的荣誉，而情愿为扩大“储备”，把战利品的数字减少二分之一，三分之二，有时候还要多，这要根据需要来决定。

这些积存的东西都放到哪儿去了？怎么报销呢？

经常出现的是各种各样的“次品、废品、劣品”：上交给师部的净是实在没用的东西，稍微好点儿的必定自己留下来。当费多尔知道了这套把戏以后，碰到下面有人向他哭穷，说缺这少那的时候，他就不再那么着急了。他知道这种哭穷是一种“事先打招呼”。离真实需要还很远、很远，他们就开始大嚷大叫了。对他们的话只好这样来理解：

“师部啊，帮帮忙吧！就得动用到我那秘密储备啦！……”

果真，哭穷以后，真正需要就随之而来了，增长了，紧迫了。

现在西佐夫这个旅也几乎把所有的战利品都在内部均分了，上交给师里的微乎其微，至于军部，那连提也甭提了。

只是在西佐夫这次胜利之后，费多尔·克雷奇科夫才把这些情况全部弄清了，第一次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第一，”他想，“以后每次估计兵力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一点，第二，我要尽力使指挥员少说谎。”

这里，我们要先交待一下。约摸过了半年光景，他确实在这方面作出了点成绩，不过总的来说，成绩不大，很小，很小。那时候他又注意到另一种情况：旅长西佐夫带领一队传令兵钻到敌人后方干了一家伙。不错，干得很成功：摘掉一个炮兵连，加速敌人一个团的覆灭，冲得辎重队稀里哗啦，差一点儿没把白匪师长活捉了来。

这都很好，不过……顿时他的思路又“不过”地一转，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无可反驳的、令人心服而又明确的结论：一个指挥员任何时候都不该把全部精力贯注在个别工作上，他永远要有全局观念——要考虑整个战役、整个部队，至于个别的任务，应该派别人去执行。西佐夫逞个人英雄主义很可能导致悲惨的结局，倘若真被那个佐洛托祖鲍夫一枪打死，而他的副手，譬如说，又不善于指挥，那末，他的整个旅也许会全部完蛋。

当时，费多尔很坚持自己这个看法，但好象是在概念上坚持，而在实际行动中，他自己也不止一次的违反了这种看法。有人想冒失地蛮干一下，尽管他的干法很荒唐，但只要能成功，他也不去反对。这说明建立特殊功勋的魅力有多么强烈啊！

一听说西佐夫搞出乱子来啦，恰巴耶夫和费多尔、科奇涅夫、佩季卡·伊萨耶夫就带了十五、六名骑兵来看他。单独一个人到他那里去是不行的——敌方那些狂妄的骑兵侦察队到

处都可能出现，还有，乡下的富农对红军战士也不轻饶，更何况是“首长”呢！

这一天过节，天朗气晴。各村年轻轻的小伙子和姑娘，穿着鲜艳的无袖长衫、花花绿绿的衬衣在游逛、在唱歌、在打闹——看到这情景，简直有点奇怪。几个驼背的老太婆坐在墙跟前的土台上，哼哼唧唧；由于今儿过节，天气蛮暖和的，她们才穿了沉重的老皮袄，象癞蛤蟆一样从洞里爬出来，东竖几个，西戳几个的，犹如一座座黑色大理石雕像。在村苏维埃附近聚集了许多人，他们不知道怎样来消磨这空闲的时间。恰巴耶夫给他们指出了一条摆脱节日无聊的正路。当时各村有不少小河，溢出水来，冲出好多积水很深的深沟，从四面八方把大路切断了，旅部的马车陷在积水沟里的不下几十辆，拉断轭索，扭坏了车轮……他们每到一个村子就把苏维埃主席叫来，指示他们赶快动员人去修路……庄稼人吵吵嚷嚷，直提抗议，不肯去干，但在他们返回的时候，已经看到路面平整过，修好了。这样，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整条大路都修好了，最后直通到驻扎在远方的部队那里。

他们在司令部里碰上西佐夫。他按照常规，按照习惯，立刻把一张用颜色笔标满记号的地图摊在桌上，根据最新的情报，指出敌人驻扎的各个据点。不一会儿，有十多名骑兵来到司令部，翻身下马，他们浑身湿透，满是泥浆。看来，他们已经累得够呛了……原来这一队人马是由旅政治委员布罗夫率领着去侦察的，他们到过河岸这边的四个村子，甚至还泅渡到河的对岸，搞来不少重要的情报。布罗夫解下系在脖子上的一

本笔记本——怕过河弄湿，才把笔记本系在脖子上——向在座的人有条不紊地介绍河对岸的情况。敌人赶在红军进攻之前，抢先作了准备，集中了兵力，调来了炮兵，重新布署了部队，急忙向各方面派出大批装满了物资的辎重队。小小笔记本，揭露了许多大事。他们把得到的情报，通过师部往上转报到军部去了……

费多尔喜孜孜地望着这位政治委员，感到无限骄傲。这位政治委员高大，壮实，满脸是泥。他原先在彼得堡当钳工，还是在去年，一九一八年，才自愿上前线来的。

他们两个人走到一边去谈话了。

“政治工作搞得怎么样？”费多尔问。

“有啥说的，”政治委员一摆手，“老实对您说吧，克雷奇科夫同志，我什么也没做，真的，什么也没做。您骂也好，不骂也好，实在没有时间啊。到底做啥好呢？是渡河去侦察？还是给他们讲党纲呢？……当然渡河侦察更重要。”

“是啊，”费多尔说，“我讲的不是这个……情况不许可，谁又能反对呢？不过，如果有时间的话，不还是可以做点政治工作吗？”

“一点时间也没有！”布罗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一面用手指卷着纸烟。

“这您未免太……”费多尔反驳说，他有些不太相信，“未免太过份了吧？……如果说时间有多余，这当然也不切实际，但只是要善于挤时间……”

“您试试看嘛，去跟我们那些小伙子们去打打交道！”布罗夫笑了笑。

“这是另一码事……”

“什么另一码事……您去试试嘛，”他诚心要将克雷奇科夫军似的，“这活计可那个，我告诉您吧，可真那个……”

于是他意味深长地竖起一个指头，象是出了个谜语，等着人家去猜。

“难办吗？”费多尔关切地问。

政治委员默默地点了点头，随后不加考虑地说：

“不单是难办——简直是行不通！根本行不通！他们说，俺们是来打仗的，念书的事儿，以后再说……等仗打完，俺们有书念哩！这就是……”

“那您的工作，就从这儿做起嘛！”克雷奇科夫没容他说完就接碴儿说，“政治委员正是要说服人家，使人家相信：不懂得政治就不能打仗……如果一个军队不知道到哪里去打仗，为什么去打仗，那这还算什么军队？做这些工作，总可以找到时间的……我不信行不通……您试试看……试过一次，您就会体会到，是能做的……只是要发动大家——各个团的政治委员，支部……主要还是您自己……靠您——对，许多工作要靠您……”

“我嘛，您瞧，”他指着自己那件湿淋淋的、溅满了泥的短上衣说。

“不单是要这个……”费多尔很严肃地一摆手说，“这还不够。这儿正是您和指挥员的分水岭。假使您只是做这类工作，那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您只不过是个会打仗的武夫，其他什么也谈不上了……”

“可他们认为这是主要的，”政治委员想说服费多尔，“你

不跟他们一起干，哼，他们要你有个屁用。他们会说，'嘴上一大套，实际不对号，自己说……'。"

"好，您等一等，等一等，"费多尔制止他说，"我再重复一次：您那样是必要的……但是需要做的不止是这一件，不止这一件……除了我们，又有谁去教育部队呢？您必须懂得，只做一名勇敢的战士还不够，还应该做一名有觉悟的……"

他接着对布罗夫讲了许多道理，证明即使在最复杂的情况下，也必需并可能进行政治工作。

布罗夫没有再反对，但是看得出，要他干这个工作，是搞不出多大名堂的……当指挥员呢？是啊，他会是个出色的指挥员。

不久，就派这个同志去当指挥员了，政治委员这个位子派另外一个人来接替了。

他们谈过话，又回到桌子旁边。西佐夫正在讲述昨天的那桩事。

"'……有十五、六个同志……穿着跟平时一样，就是分不出级别：清一色的战士。只是指挥员有一颗红五星，也摘下来装在口袋里了。我们进了村子，直奔村苏维埃：'主席在哪里？'那儿聚集着五十来个庄稼人，一看见我们，叽叽喳喳地向旁边闪开，很害怕……

'你们是高尔察克的人，是当兵的吗？'他们问。

'是高尔察克的人，'同志们说。大家想冒充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你们来干啥呀，打仗吗？'

'来打仗，哥儿们，我们来搜查红军：谁知道红军在哪里？'

于是同志们七嘴八舌地问开了：这里的红军是哪部分的，他们刚才住在什么地方，开到哪里去了，待庄稼人怎么样……

老乡们一听都搭拉下脑袋，不肯讲一句真话：

'嗐，叫伊凡·帕尔费内奇来讲吧，他什么都知道，他是主席……'

伊凡·帕尔费内奇在门口出现了，这家伙块头好大，足足有十一普特重……西佐夫用两只手围着肚子一比划，表示伊凡·帕尔费内奇有多么肥胖。

大家哄堂大笑。

'真的，是真的，'西佐夫肯定地说，'在这儿的苏维埃里，象这类货色到处都可以碰上……农民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都胆小怕事……这样，就把乌龟王八旦都推出来了……'

于是这位主席从台阶上走下来……这位伊凡·帕尔费内奇眼睛眨也不眨，一点也不害怕，他向'高尔察克的部下'稳步走来。他一出门就点头哈腰，连连举手行礼，满脸堆笑地说：'您们好哇。'

'你是主席？'同志们问。

'不错，'这个狗崽子说着又笑起来了，'穷鬼们硬逼着我干，'他说，'我只好干……我们一直盼你们，亲人呐，上个星期就……如今，谢天谢地，总算把你们盼来了……他们可把我给折腾死了……'

同志们假装不相信的样子。

'你怎么回事，你跟我们装什么傻，说真个的，"你们的人"在哪里？'

'算哪家子我们的人呢？'主席瞪大眼睛说。

‘哼，什么哪家子，红军在哪里？说，你这个红鬼。’

主席扑通跪下来，赌咒发誓地表白自己，从人群里找出三个证人（都有八普特重）；这三个人直帮他说好话。

‘哪儿的话呢！他们说……伊凡·帕尔费内奇可是个好人，他从来不和那些人拉扯，都是这帮乡巴佬硬要他到苏维埃来。’

同志们下了马，走进苏维埃，把他讲的话都写下来，叫他签字，说要把这些材料送到长官老爷那里去……

这家伙竟签了字，狗东西……当时把他和那三个辩护人一起装上马车，拉到这里来了。等他一明白过来，立刻大号大叫；他说，‘上帝在上，我自己也是布尔什维克……’‘老乡们可吓坏了，不知道说啥好……老百姓全吓怕了，’”西佐夫讲完了一摆手说。

“现在他们在哪儿？”费多尔问。

“四个人都送到法庭去了……前线附近的老百姓都给弄糊涂了，这是实情：一个星期里总要有军队来往四次，不是白军，就是红军，人们也分不清，谁个先来，哪个后到，谁欺负他们厉害，而谁根本没碰他们……马给赶走了，多的弄不清，大车也弄坏了，板房给烧了，锅碗瓢勺砸碎的砸碎，抢走的抢走，这些事还是不去想它好。农民倒是学会了一套藏牲口的办法：他们把成群的牛马赶到密林深处去，放在那儿，也不往回赶了，夜里把草料送去。军队来的时候问他们：‘马弄哪儿去了？牛呢？’

‘全给赶走了……一个也没剩。’

‘谁赶走的？’

如果来的是白军，他们就讲是红军，如果来的是红军，他们就讲是白军。这么一说，总还能应付一阵子。但不是总能应付过去的，后来这套办法被军队打听出来，就派侦察队到树林里去找……找到牲口群就赶走，全村人就呼天抢地……在鲜血都不值一钱的时候，眼泪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恰巴耶夫他们在去各团的途中，顺路走进一个村子。

"苏维埃有吗?"

"苏维埃?"老乡们怯生生地说，"从前有过……"

"在什么地方?"

"啊，多半是在这幢房子里，"他们指着一幢门窗都钉死了的大房子说。

"那现在在什么地方?"

"现在?谁知道……在村里……在那儿吧……在村那头……"

"乡亲们，你们怎么啦，真的不知道吗?"

"我们哪里知道……不，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你们到村那头去吧，那里，兴许会有人告诉你们……"

"那你们——不都是本地人吗?"

"可不是，我们都住在这里呀!"

"住在这里，竟不知道有没有苏维埃?"

"应当有的……"

"村长有吗?"

"村长也有。"

"牛奶有吗?"

"牛奶也有。"

"那好吧，给我们来一壶，快一点，要冷的！"

"这行……瓦纽什卡，喂！"

他们叫来这个孩子，打发他去拿牛奶；自己却不知道怎样才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们当中有两个人认出了恰巴耶夫。但是过了好半天，还怎么也不敢相信来的这些人"不是白匪军官"。最后，根据各种表现，看到一些事实，凭着一般的回忆才相信了。说话也多了，也不拘束了。从谈话中流露出他们同情红军，但是他们厌倦了，太厌倦了……他们已经吓破了胆子……这种惧怕心理是长期的，慢性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

老乡们说，他们希望"过过太平日子——战争无论在哪儿打，遭殃的总是老百姓。两方面都使他们吃足了苦头……"

恰巴耶夫一行人在这里休息，跟乡亲们聊了一个多钟头，临走的时候，老乡们热情地送他们，象同志一样，说些送别的话儿……

米海洛夫率领他那一团人住在鲍罗夫卡河岸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要想到这个村子来，只能沿着河岸走。而在河对岸，敌人拉成散兵线，躲在小土岗子后面，不断打枪；只要他们看见岸上有人，就一个劲儿地往这边打枪……离村子已经不远了……已经看得见粮囤了，这时，敌人加强了火力……子弹吱吱地乱飞，一个同志的腿被打穿了。大家拼命打马，向前飞驰……十几匹马拉成一行，相距约廿步左右。这时费多尔想起他在斯洛米欣斯克战斗中逃跑的情景，马上觉得现在大

不相同了：此刻已经不象当时那样惊慌失措了……虽说那时是炮弹爆炸，现在是子弹横飞；可是有时候子弹比炮弹更可怕。两者都有它可怕的地方："子弹杀伤人体，榴弹惊心动魄。"他纵马飞奔，说什么也不相信子弹会碰上他。"旁边的人——当然……可能……，可我……那还不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他自已也不知道。

在向前飞驰的时候，有两匹马受了伤，一个传令兵的帽子被打穿了……他们赶紧躲在很高的干草垛后面，下了马，一个跟着一个，从一垛干草奔向另一垛干草，从一座粮囤跑向另一座粮囤，这样跃进着向村里飞跑。恰巴耶夫跑在最后面。费多尔想看看恰巴耶夫是怎么个跑法的，他躲在一旁注意地观察着，只见恰巴耶夫先向前一冲，撒腿跑了几步，接着又突然往回一拐，躲在一堆干草后面。过了一会儿又跑出来，但不是笔直往村子里跑，而是往相反的方向，兜着圈子跑。他是最后一个到司令部的……

费多尔心里纳罕：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你怎么呐，好象有点害怕了？象个胆小鬼似的在粮囤后面躲来躲去？"

"俺最讨厌流弹，"恰巴耶夫很认真地回答说，"俺恨死了……俺不乐意糊里糊涂死掉……在战斗中——来吧，俺不在乎……可在这里……"他狠狠地使劲啐了一口唾沫。

要到司令部来可不容易：站在河对岸小土岗子上，整个村子都在火力的射程之内。他们一发现有人在房子中间的夹巷里走动，立刻就向这边开枪，一排一排的子弹，不停地飞过来。红军战士也不是好惹的：他们爬到粮囤上去，躲在房顶上、篱

栅后，或是在仓房的墙壁上挖许多小洞，警惕地观察河对岸的动静。只要看见黑影一晃，跳出个人来，或是土岗子后面什么地方伸出个脑袋，也照样开枪。在这里并不是打仗，而是互相在狩猎，狙击"偶然的目标"。可是说来也奇怪，村子里的姑娘们，仍旧穿着花花绿绿的节日盛装，到处游逛，有些地方，她们还唱歌，打闹……弟兄们也绝不错过机会，围着姑娘们打转转，随着姑娘们唱歌，竟然还有个人拉着手风琴来献殷勤。

应该说，这里的河面并不宽，从小土岗子后面，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走动的是战士还是农民；是姑娘们在跳呀蹦呀，还是……朝小巷飞来的子弹是专对着红军的。老乡们在街上来来往往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坦坦然然，不慌不忙。如果不是双方在相互射击，只凭老乡们那种神态，简直很难想象到周围几乎每秒每分都在死人；村子好象是在大后方，人们十分平静地过着自己传统的复活节……

恰巴耶夫他们想要米海洛夫派侦察队到河对岸去，其实他一清早就已经把侦察队派出去了，现在正掐分算秒地等待他们回来。不一会儿，侦察队果然回来了，两个侦察员在对岸牺牲了，是临回来前几分钟走到浅滩时被打死的。在前线想做点什么，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听了侦察队的报告，开了会，决定当夜进行偷袭。他们知道，这个浅滩一定有敌人防守，必须在天黑以前另找一个可以蹚过去的浅滩。这次偷袭由米海洛夫亲自指挥。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主要是因为有一半白军部队，通过各种宣传，已经争取过来了。这种宣传工作是别出心裁的，既简单又有创造性：十多个共产党员几乎从村中心，肚子贴着地皮爬出去，穿过那些通道，虽然村里的

白军正在对准这些通道向着红军不断地射击。他们爬呀爬，不抬头，不摆动，不向两边拐，慢慢地朝着一个方向往前爬。爬到木障子跟前——头天夜里已经拆出几个豁口，急急钻过豁口，再向岸边爬去。在木障子前，有的人搞了点伪装，而有的人在没爬的时候就在村里伪装好了。其实伪装也蛮简单的：每个人浑身上下插一些树枝子、树杈子、小松树棵子；再挂上些破布条子，为的是叫敌人看上去不象个人的样子。于是这些四不象的动物就向河岸爬去。有的还放上些干草，加点麦秸，披上蒲席，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十个或者十五个这样的怪物从不同的方向慢慢地向河岸爬来，有的靠近小土岗子，有的挨近灌木丛，有的爬向河边一些能隐蔽的地方，突然拉成一行，开始喊话：

"士兵们！……白军士兵们！……同志们！你们要打死那些当官的！……到我们这边来！……你们受骗了！……他们赶着庄稼人来杀庄稼人。当官的是老爷……他们是你们的敌人，我们是你们的兄弟。到我们这边来吧，同志们！……打死当官的！……到我们这边来吧！……"

这一段河面并不宽，对岸听得很清楚，趁着露水，声音更加响亮：宣传员爬出去的时间，当然是在黄昏，或者是在晚上，或者是在拂晓。在这种时分，他们的行动，不大容易察觉……河对岸的军官骂着下流话，骂的那个下流啊，那个下流啊，一直骂到再也找不出更下流的话来对付布尔什维克宣传员时，就乱打起枪来，可你向哪里打呢？打谁呢？哪儿也看不见一个人影！

骂归骂，可他们还是不敢把部队过久地留在河岸上，不管

情况怎样，总是时常调防，老是担心，生怕发生哗变。对岸传来的喊话，是那样朴实、那样有说服力，说到白军的心坎上了。后来听说，白军军官因为偷听到士兵们背地谈论"布尔什维克弟兄们"，就枪毙了几十个。分化瓦解工作做的时间越长，在白军士兵里收到的效果也就越大；这些被迫当兵的农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悲惨境遇，知道自己是被赶来反对自己的事业，反对自己的劳苦弟兄。宣传员的工作终于瓦解了白军部队，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红军斗争的困难。

白军军官啪啪地打了一阵子，也就罢休了。宣传员呢，还是那样，慢慢地、悄悄地、毫无声响地爬回村去。

在夜袭的前一天晚上，宣传鼓动工作做得特别成功：在某些地方，白军士兵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和宣传员对喊起来。他们提出各种问题，诉说过来有困难，监视非常严，惩治很残酷。

夜里，米海洛夫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按照预定的计划开始行动。

第二天旅部接到米海洛夫的电报：

"挑选了二百名，夜间涉水，一部分人靠仓促搭成的圆木浮桥，到达鲍罗夫卡河对岸，立即对睡梦中的敌人发起突袭，俘虏一百五十多人，缴获四挺机枪、一批步枪、子弹、炊具、辎重……"

"活捉一百五十个人，"恰巴耶夫大声说，"这只是活捉的，可就地消灭了多少呢？……你写！"他对着那个正在写捷报的参谋说："俘虏一百五十人，就地砍死二百人。"

"喂，这是怎么回事？"费多尔惊奇地望着他说，"哪来的两百人？"

“绝不会少，”恰巴耶夫回答说，一点儿也不觉着难为情。

“这是哪来的两百个人啊？你怎么啦，我的老兄，要瞎诌吗？”

“俺什么也没诌，”恰巴耶夫生气了，“要是米海洛夫这个马大哈忽略掉，难道我不应该把关吗？”

“但要等一等再写呀……我看，最好先问一下，然后再补报上去，要是现在……那就是谎报，瓦西里·伊凡诺维奇！”

“这有啥？”恰巴耶夫满不在乎地笑着说，“也要让他们高兴高兴吆。”

“让谁高兴？”费多尔反驳说，“这有什么可高兴的！要是你这套把戏给他们晓得了，那他们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他们晓得不了，”恰巴耶夫还想开个玩笑支过去，但是费多尔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让把这两百个“死人”列进去，恰巴耶夫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他们回到司令部以后，看到上级发来的命令：立即出发，随身携带一件或两、三件东西。命令指明了地点和任务：这是把他们这个师调给别的军。这次发起进攻以来，这样的调动已经有过好几次了：一会儿塞到这儿，一会儿又弄到那儿，有时把一个旅调开，过后又调回来。一句话，怎么好就怎么办，完全根据当时的形势。恰巴耶夫碰上这种大调班，就满肚子火气，乱骂一通，认为这样搞不是心血来潮，就是他的某些“冤家对头”出的坏主意。在这种场合，他的思想真是单纯得要命，要不是他的口吻和态度那样认真，有时简直会使人把他的想法当作开玩笑。

调动之后，环境并没有什么新的变化，离原来的驻地也没有多远。因为当时几个军靠得很近，结成一条连绵不断的战线，一个部队的胜败，马上就影响到另一个部队。消息传得很快；这些消息有的使人沮丧，有的激起人们的希望。恰巴耶夫听到西佐夫那个旅打了胜仗，心情显得特别高兴。

"好小子，有两下，没白有学问，"他在司令部里得意洋洋地把西佐夫夸了一通，还立刻给他发了一份电报，电报里谈了一些公事，顺便表示自己对他的祝贺：在当时，专拍贺电是不许可的。

进攻发展得很顺利，红军占领了许多大小据点。恰巴耶夫一伙人象发狂一样在前沿上奔来奔去——到处都要跑一跑，指示指示，帮助帮助，提醒提醒，有时还要亲自参加战斗。费多尔把其中一段战斗情景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标题是："皮柳金诺之战"。现在把这篇特写全文照引如下。

皮柳金诺之战

1、出　发

我们是一清早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发的。朝霞已经映红了东方，太阳还没有把大地晒热，草地散发着夜露的潮湿气息，天空中笼罩着黎明时的一片紧张沉寂。我们的部队一个接着一个地走上辽阔的田野，排成纵队，不声不响地，不喊，不唱，也不闹，静悄悄地朝着那个把前面不远几个村子遮住了的小土岗子行进。我们向各个方向派出了先头部队；骑兵侦察队向前飞驰，很快就无影无踪了。我们——恰巴耶夫、旅长和我，骑着马走在部队前面，不时地派出传令兵，有的传送新得到的

情报，有的去探听最新的消息。从左面，从另一个小土岗那边传来沉重的炮声，是在基涅利方向；我们有一个旅要向那边运动，任务是插到敌后，当我们把敌人从皮柳金诺赶走时，切断他们的退路。到底是哪一方面在开炮，弄不清，炮声很远，约莫在二十到二十五里以外的地方；这沉闷的炮声，只有在晨曦中才能清晰地传到这里，要是在白天就很难听得这么清楚。

插到敌后，突然一家伙，估计可以打得敌人张慌失措，然后趁着混乱的机会，消灭他们的炮兵。关于这支炮兵的情况，侦察队已经报告过了。河对岸的炮声，说明敌人已经发觉并清楚地知道了我们的策略，——这一来，成功的希望就不那么大了。

我们策马跑上土岗的斜坡。下面有个小村子，叫斯科别列沃；我们要从这里向皮柳金诺发起进攻。侦察队飞快地赶来报告，说敌人昨晚已经放弃了斯科别列沃。我们走近村子，老乡们靠在自家房前，胆怯地望着开进村来的军队。

“今天白军，明天红军，”他们数落着说，“过两天又是白军，再过两天又是红军——到哪天才是个头儿呀……粮食吃光了，牲口赶走了，搞得我们精光，……”接着又搔搔后脑勺，逆来顺受地补充说：“唉，有啥好说的，现在是打仗嘛，我们知道，这怨不上谁……可日子更难过了，一点力气也没有……这万恶的战争，几时才能了结啊？快一点吧，该让我们喘口气了。”

“等我们打赢了，”我们回答他们，“不打赢是完不了的。”

“这要到什么时候呢？”他们一个个都用疲乏的、无神的眼睛望着我们。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你们肯帮忙，那很快就……要是咱们一条心，那他，高尔察克，还经得住咱们打？”

“哪能经得住！……”老乡表示同意地说。

“这么说，该帮忙喽……”

“是该帮忙，”他们仍然表示同意，“可你倒去帮帮看！俺们帮了他们的忙，你们却把村子占了……刚要靠近你们，他们又把村子夺回去了。你瞧，俺们两边挨打。俺们斯科别列沃村的人见得可多哩；你们也有不少人，好多次追着俺们打……说来说去，还是躲在地窖里最稳妥，——不向着那边，也不向着这边……”

因为急着要去追赶前面的队伍，我们一边走一边向乡亲们解释，指出他们错在哪里，说明高尔察克的军官老爷政权是什么货色，苏维埃政权又是怎么回事……他们倒听得懂，也同意，看得出来，以前很少有人和他们讲这类问题，有人讲，也讲得不多，所以他们对这些道理并不真正懂得，一谈起来，总是一个心眼儿地在“太平日子”上兜圈子。

其实，也并不是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只是在偏僻荒凉的地方，象斯科别列沃这种闭塞的小村落才是这样。在那些大村子里，一般明显地分成誓不两立的两派：白军一来，有一派便神气活现，对另一派进行侮辱、迫害、出卖；红军一来，另一派也就扬眉吐气，对自己的不共戴天的仇人，自然也毫不留情……

部队通过村子，一个跟着一个跨过了一座小桥，在草地上散开，拉成散兵线。皮柳金诺的白军就向草地开起炮来……

然而第一列散兵线已经跑到右边去了，其他的散兵线也

跟在后面拉成了，都是长长的，疏稀的队形，象一条带子。原来的那一堆人不见了，消失了。对这些人瞄得准确，是很困难的，因此炮弹的命中率很低。

我和恰巴耶夫走进一户人家，要主人拿点牛奶来。一个被炮声吓得失魂落魄的女人，拖着瘦弱有病的身子，捧出一罐牛奶，上面还放上一大块面包。她体贴地、热情地、关切地为聚集在这里的红军战士张罗吃喝，一边诉说刚才炮击的时候，她多么害怕。等吃完，付给她牛奶钱的时候，她说什么也不肯收。

"我，"她说，"没你们这几个钱，也能活得下去，可谁晓得你们还要再打多久呢？"

她硬是不肯收钱。我们把钱塞给她的孩子；他们紧靠在妈妈身旁，拉着她的衣襟，好象一只只小动物似的，亮晶晶的小眼睛一直在这些带着步枪、手枪、军刀和手榴弹的人身上滴溜溜地转来转去。

"你们总是给钱，"女主人说，"其实我并不等钱用，你们一定要给，那我就收下吧……你们的人无论拿啥，干草也好，麦子也好，拿啥给啥钱……可是那帮子人，把你的骨头都啃光了，可连根麦秆钱也不肯付……还把瓦纽什卡，我的儿子，连同马一起赶走了……他还能回来不？谁又晓得……"

听她的口气，看她的神情举止，不象是故意奉承，而是讲的真心话。当然，她并不知道，我们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也不是每趟都付钱的。但是，她晓得"高尔察克那帮人"，到哪个庄，哪个村，都是一个样：他们见啥拿啥，一个钱也不给，抢得你精光光……"

我们坐在老乡的小屋子里，从窗口望出去，看得见炮弹在

二、三百丈[1]以外的草地上爆炸的情景。浓黑的小烟团，忽儿在这里，忽儿在那里，一个接着一个地从地面上升起，烟团一升起，空气就颤抖一下，地面也随着震动起来，窗上的玻璃象手鼓一样发出一阵咯啷啷的响声。这是敌人在向我们的散兵线开炮，但打得并不准，只是瞎打，一点杀伤力也没有，都是超越目标几十丈的远弹。我们暂时停止前进，等待自己的炮兵，只等炮兵一到，我们就立刻开始冲锋。我走出屋子，登上一个小山岗，刚卧倒，突然跑过来一个妇女。她向四周张望了一下，从围裙里掏出个什么东西来塞给我：

"喏，拿去，快……"

我一看，原来是个鸡蛋，我弄不懂是怎么回事，睁大了眼睛，莫名其妙地望着她：

"要多少钱？"

"你这是什么话，亲爱的，"她生气了，"看你，饿成这个样子……给什么钱呢，吃你的吧……"

从她的讲话和举动中看得出她很慌张。她一边讲，一边回过头张望：生怕村里人看见，要是看见，白军来了，一告密，那她可就要遭殃了……

"你这是为什么呢？"我问她。

"我有个兄弟，跟你们在一块……我的嫡亲兄弟……跟你们一块打仗……也在红军里面……有人说，白军把你们打垮啦了，好象把萨马拉也占领了，是真的吗？"

"没影的事，亲爱的，这不是真的，"我回答她说，"完全是

---

① 俄丈，每俄丈等于二。一三四公尺。——译者注。

胡说。你亲眼看见了，到底是谁打哗啦了谁。”

“看见啦，看见啦……那好，你多保重吧！亲爱的……”

她讲完这句话，就一溜烟地从斜坡跑下去，躲躲藏藏、东张西望地消失在农舍中间了……而我坐在那里，感到格外奇怪和喜悦。我看着鸡蛋不由漾起笑容，眼前浮现出那个可爱而又纯朴的妇女的形象。“到处都有自己人哪！”我心想，“就连在这个闭塞的斯科别列沃村里也有自己的人。虽说他们也许懂得的道理并不多，可是他们本能地感觉到红军跟白军不一样。就拿这个妇女来说吧，你瞧，她一直在盼……总算盼来了……她多高兴呀……眼下竟不知道怎样来表达自己的喜悦……结果，塞了个鸡蛋……”

2、在散兵线里

炮兵来了。我们指明了路线，马儿绷着劲，闷着头，拖着笨重的大炮沿着谷地走下去。我们看见几个炮兵连在散兵线后面摆开阵势，也看见了头一发炮弹一闪而过的火光：砰砰……轰……砰砰……轰……接着就不停地轰隆起来。散兵线上的战士们听见自己的炮声，就更加欢腾了……我们骑着马，带着几个兵，一直向前奔去。奔上山岗，从那里俯首一看，皮柳金诺尽收眼底：笔直过去，还不到三里路。我们兵分两路：恰巴耶夫向右，我向左，沿着两翼，奔向散兵线。

“同志，”一个传令兵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你看，我们的部队是不是退下来了，八成……朝这儿……逃来了吧？……”

我望了一眼，那里确实有点乱纷纷的……红军战士奔来

奔去，散兵线一会儿缩短了，一会儿又拉长了……于是我们就向那边奔去。到那里一看，事情很简单：散兵线正在变换队形，调了一个方向。

这儿地里种的是向日葵；我们好不容易才从粗大刺人的秆子里穿了过去。到了阵地前沿，下了马。传令兵跟我一起又走了约摸三十步光景，我自己就卧倒在散兵线里。左右两边趴着两个年轻的小伙子，黑红的脸膛，宽阔的肩膀，敦实个儿——一个叫谢尔格耶夫，一个叫克利莫夫。每次进攻的时候，散兵线上都是静悄悄的，听不见说话声，只有口令声和咳嗽声，或者是什么人吐唾沫的声音。很少有人讲上一两句话。这是思想极度集中的时刻：在炮声之下，在嘘嘘呼啸的弹雨中，每时每刻都在担心枪弹打穿你的头盖骨、双腿、胸膛，你哪里顾得上说话、聊天。这时你的脑子里充满了复杂的、瞬息万变的、常常是模糊不清的念头。你集中了精神，沉默不语，几乎变得很凶狠。思绪万千，恨不得一下子回忆起许多事情来，而且想很快回忆起来——要在一刹那间，什么也不忘记，什么也不漏掉。结果，恰巧把主要的东西给忘了，要赶紧、要加快地回忆……

跃进，越来越频繁……敌人离我们更近了……已经很近了……再过一分钟，就不用跃进了，最后一次跃进之后，接着就是冲锋……正是为了这可怕的一刻，这即将到来的冲锋，现在才赶紧地、尽快地把一切一下子回忆起来……到了一跃而起的时刻，就是到了极限，到了黑暗的深渊……

我默默地伏在两个战士中间。他们向两边让了让，很随便地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有问，还是照原来的样子，一声

不响地趴在那里……我在那里趴了一会儿，也一声不吭，但那死一般的寂静叫人非常难受，我摸出烟包，卷了一支烟吸起来。

“想抽口烟吗，同志？”我问旁边的人。

他抬起头来，好象没能马上明白我的意思，对我问的这句话，感到有些诧异；更使他诧异的是，在这里，在这时，竟出人意料的突然听到有人讲话。他沉思了一下，我看见他的眼睛闪出了光彩，流露出高兴的神色。

“这敢情好，来一口吧！”他把烟包接了过去。“喂，老兄，”他马上对一个叫谢尔格耶夫的说，“你干吗还啃土？来吧，还是和我们一起抽抽烟吧……”

谢尔格耶夫和克利莫夫一样，也是慢吞吞地抬起头，用一种忧郁、严肃的眼光瞧了瞧我们，而后卷了一支烟，抽了几口，立刻也笑逐颜开了……我们没有谈什么，只是偶尔说上两句：“真潮湿……扎得生疼……烟熄了……看，炮弹飞过去了……”

“跃进！！！”传来了命令。

大家腾地跃起。整个散兵线，好似橡皮做成一样，嘣地一下子跳起来了。战士们并没有马上挺直身子，而是佝着腰原地待命。

“跑！！！”紧接着又传来了新的命令。

战士们两手端着步枪，急速地向前奔去……我也弓着身子，趺趺撞撞，一瘸一拐地跟着跑。敌人的机枪哒哒地吼叫起来，排子枪也一齐开了火。

“卧倒！”立时又传来了一声命令。

大伙儿都伏倒在地……一伏下去，就是好半晌，一动也不动。然后才微微动动身子，把头稍稍抬起，朝四下张望张望。冲在前面的，现在往后缩一缩，跟大家看齐，掉在后面的，悄悄向前爬爬，头紧挨着地面，谁也不想单独抢在前面，或是落在后面。

克利莫夫跑得快一些，抢在我们前头了，现在正象大虾似的往后缩，要不是我向旁边闪了闪，他那双美国大皮靴的厚实鞋跟会一直踹在我的脸上……

我们趴着，一声不响，等待新的命令。我们也不再想抽烟了，就连三言两语也懒得讲了。克利莫夫和谢尔格耶夫并排趴着。大概克利莫夫想起了几分钟之前，同别人聊聊天，心情轻松了好多，所以现在，又听见他和谢尔格耶夫攀谈起来：

“谢尔格耶夫……”

“你要干啥？”

“你看，这里有只小甲虫，”他用手指点着草说。

谢尔格耶夫一句话也不说：他阴沉着脸子，紧锁着双眉，闷声不响。

“谢尔格耶夫，”他又纠缠不休地说。

“嗯，有啥话？”谢尔格耶夫爱答不理地说。

克利莫夫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叹了口气，接着，象是理了理思路，悄声地说：

“柳班卡嫁到普罗尼诺去了……”

看来，他想起同村的一个姑娘来了，也许是他的心上人吧，谁又知道呢！这次，谢尔格耶夫还是没答理他。克利莫夫晓得没希望了，也就不作声了，看来，他不乐意跟我交谈；他伸

伸身子，贴紧地面，用手指拨弄那些刚出土的嫩草。一会儿又一捻那只小甲虫，看着它在自己那又脏又粗的手指上抽搐死去；一会儿又抓了一把土，放在手指上，一粒粒地往下筛，直到这把土全部筛完为止……

"跃进！……跑！！！"

我们嗖地一跃而起，向前猛跑，眼神发狂，面孔歪斜，鼻孔张得很大，直冒热气。我们在等待，跑一会儿，等一下，跑一会儿，又等一下……眼巴巴地等待那个"卧倒"的命令。

命令一下，大伙儿刷地伏倒，象死人一样，直挺挺地趴在地上。一个个屏声敛气，缩拢身子，象乌龟一样，把头缩回，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向后退，一点点地蠕动，抬起那惶恐、担心的眼睛，向四下里张望。

这里，还有个叫玛鲁霞·里亚比娜的姑娘，才十九岁，也端着一支步枪，昂首阔步，不甘落后。她，我们的亲爱的朋友，哪里会想到几天以后，她永远地倒下去呢？那是在扎格利亚金附近，也和现在一样，参加进攻，蹚水过河，敌人的子弹刚巧射中她的前额，把她打倒，一具温暖的尸体随着基涅利河的寒冷的、鲜血染红了的波涛漂走了……现在她也挂着笑容，很亲切地对我喊了一声，由于离得太远，听不清楚……

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看见自己那几个老同乡了，就连洛帕里和包奇金到了这个部队，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乌拉尔部队调过来的，在别的团里打仗，他们打腻烦了。这一次还是没有见着包奇金。洛帕里从水洼子那边挥动尖顶军帽向我打招呼，还摇晃他那头浓密的大红色卷发……

周围都是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孔……但已经没时间等

了——离那一排粮囤只有百来丈远了。每秒钟里都可能从那边突然射出子弹。这是前线上最惯用的一着：隐蔽起来，屏息不动，枪口瞄准，放敌人走得很近很近，再猛地一下扫起机枪，一打出排枪，打得狠，打得猛，一停不停，敌人的尸体一排排，一堆堆地躺在你面前。只要看到敌人一动摇，往后一缩，撒腿逃跑，那就赶紧打呀打呀，砍杀那些惊慌失措，晕头转向，四散逃跑的敌人。

我们做好对付一切的准备。忽然从右面发出两阵短促的枪声，紧接着又响起激烈的机枪声。传令兵骑马奔过去看个究竟。过了两分钟，回来报告说，是我们右翼部队的火力侦察，诱敌人还击。但是毫无反应。估计，村子里的敌人已经走光了。由于过去的沉痛教训，我们散兵线上的战士还是悄悄地、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向粮囤前进。几个机枪手，还有几个战士帮他们抬着机枪，跑到最近的一个粮囤，迅速地把机枪架好，准备射击。还是静悄悄的……在右翼上，远处响起低沉的"乌拉"声。这是我们的部队发起了冲锋，几乎没有经过战斗，就把留下来防守村子的那一部分敌人全部活捉了。山后左面，接连响起了三发炮声……炮弹的隆隆声和啸叫声低下去了，渐渐消失，接着就听见轰、轰、轰三下爆炸声，爆炸后又隐隐地传来了回声——根据这些声音，可以判断，这不是红军在向皮柳金诺开炮，而是敌人向侧面的某个地方射击。敌人打的是从左翼边缘迂回包围他们的部队。他们把火力转向那边，不多久就撤退了，只留下不多的一部分人来对付我们——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而在当时，还有许多情况没弄清楚，摸不准会有什么转折，会发生什么后果。当机枪手在粮囤旁边

布署停当，我和营长也走过来，想问问，他们是不是看见，或者发觉打谷场上有什么动静。但那里仍然是静悄悄的，白军也好，居民也好，没有一个人露面，这个空无一人的村子好象全死光了。我们小心地向四下里张望着，盯着草垛、粮囤和仓房的后面，慢慢地前进。没有音响，没有动静，没有人讲话，也没有枪声——在这样的寂静中，比在疾风骤雨的炮火下更可怕。战线上的沉寂，太可怕了，太折磨人了。

在我们后面的不远处，有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部队。他们帽子上的红五星在粮囤和干草垛中间到处闪来闪去。他们很急迫，很焦躁，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迟迟疑疑地向前运动，每分每秒都提防突然射击的火力。

远处，有个女人的身影一闪：大概是个农家妇女……要赶紧打听一下……

我快步跑了过去……

3、占　领

那个农家妇女站在地窖门口，用一种呆滞、混浊、惊慌的目光盯着我。她的眼神里，反映出一种刚刚遭过苦难的恐惧；反映出一种疑惑、一个紧张的、折磨人的、急待解答的问题；反映出她在等待一个逃不脱，躲不开的新的灾难的降临，仿佛她在等待一个打击，她本想挡开它，但是办不到。“快了吧？”那疲惫的眼神象是在问，她这个饱经忧患的农妇，决不是第一次，也不光是对我一个人这样问：“快了吧？”在她旁边，在小房子附近，还有另一个女人，推起地窖的顶盖，向外探望。她的脸也是那么疲乏、灰白、半死不活的：眼下浮肿，呈青紫色，嘴唇

干裂，头上包了一块破布，露出一绺绺乱发。在她那悲伤的眼神中，充满着疑问和哀求。

“这儿有没有白军？还是走了？”我问她们。

“走了，逃跑啦，亲爱的，”那个从地窖里向外探望的女人回答，“亲爱的，我们可以从里面出来吗？你们还打枪不？”

“不，不，不打啦，你们出来吧……”

于是她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地窖里钻了出来，都是女的，没有一个男人。还有几个小把戏也爬了出来；他们身上裹着被子、蒲席、面口袋，兴许他们以为面口袋挡得住榴霰弹哩……妇女们拉着两只又长又干瘪的胳膊，拖出了一个老人。老人的一双眼睛是灰色的，湿漉漉的，苍白的胡子，连鬓络腮。他的腰上拴着一根很长的绳子，大概就是用这根绳子把他系到地窖里去的。

人们鱼贯地爬出来以后，又一个跟着一个，扶着篱障，畏葸地东张西望，跌跌撞撞向自己的家门走去。这景象真是凄惨极了。他们沿着篱障，影子似地移动着，紧张而又肃静，象在坟墓里一样。他们依然惊魂未定，战战兢兢，吓得麻木不仁了，在冰冷潮湿的地窖里，已经冻僵了！

在一个角落里聚集着一群农民，他们同样也不清楚，仗究竟打完了没有，不知道是留在这里好呢，还是再躲到自家的房子里或是仓房和澡堂里好。

“同志们，你们好啊！”我对他们喊着说。

“好啊……同志，你好！”他们很亲热地回答，“总算把你们盼来了，谢谢上帝……”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们说的这些欢迎话。保不定在

看到白军的时候，他们也来这么一套，省得找他们的麻烦，这完全是出于胆小怕事的缘故。但我端详他们脸上的神情，发现这种喜悦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是无法伪装的，是装不象的。于是我也高兴起来了。

我们到了村中心。在那里又遇上一群人，但看上去不象是庄稼人。

"你们怎么，弟兄们，是不是俘虏？"

"是啊，是俘虏。"

"是被征来的，还是怎么的？"

"是啊，是被征来的。"

"是哪儿的人？"

"阿克莫林斯克省的。"

"你们这里有多少人？"

"约摸三十来个，有的在仓房里……看，从菜园子里往外跑的也是。"

"这么说，你们是留下来的？"

"是啊，是自己留下来的。"

"你们的武器呢？"

"都放在那边，板墙旁边。"

我到那里一看：果真有一堆步枪。立刻派了自己的同志来看守武器和俘虏，命令他们好好看守，一直到把武器和俘虏送到师部为止。

这些俘虏显得可怜巴巴的，穿的破破烂烂——有的穿着破旧的短皮袄，有的穿着破粗呢外套，有的穿着千孔百洞的破大衣；脚上穿的也够瞧的——有穿着毡靴的，也有穿着树皮鞋

的，都穿得稀巴烂了。他们根本不象军人，简直是一群叫化子。这真叫人闹不懂：高尔察克的军队有外国的给养装备，穿着相当不错，为什么这些人却穿得这样破烂不堪呢？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他们，“弟兄们，高尔察克给你们穿的不是太破了吗？难道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吗？”

“不，只有我们这些人。”

“这又是为啥呢？”

“大伙都不肯去……我们开小差的人太多了——有的跑回家，有的跑到红军那里去了……”

“这么说，你们是不情愿跟高尔察克干了？”

“我们跟他干个啥……他自己人穿的镶金挂银；可我们呢，你瞧，就是这副屌样子……”他们指着那些破洞累累的烂衣服。“可是一打仗，就把我们赶在前边，去挡枪子儿。他说，‘这些废物，没什么可惜的……’”

“你们早就该跑嘛……”

“跑不掉啊，他派了心腹人跟在我们后面——这些家伙不是打仗的，是专来监视我们的，怕我们逃跑……”

“那这一回你们怎么跑成了呢？”

“这回大伙儿都躲在菜园子里……在垄沟里藏着……趴在那里等着，一直等到有了机会，这才跑出来的。”

“如今打算投奔哪儿呢？愿意在红军里干吗？”

“正是，我们正是为了要参加红军，才留下来的。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好去的呢？我们就是要参加红军。”

谈话到此结束。

我们沿着村子，纵马向那座山奔去，向敌人逃跑的那个方

向奔去。看来，我们的部队已经沿着斜坡爬上去了，挤在一座小桥上，正在翻越那陡峭的砂质山梁。

"刚才这里的白军很多吗？"我一路上不断地打听。

"有千把人……"农民们回答说。

但是千万不要一下子就相信这"千把人"的说法：有时"千把人"会变成五、六千，可又有时，顶多不过二百人。只有到后来，把几十个情报和俘虏的口供互相对照，才能比较准确地估计出个数字来。不管怎么说，根据敌人的辎重来判断，这里敌军的人数是相当多的。敌人之所以没有象往常那样，长时间顽强地死守皮柳金诺，大概是由于发现我军在左翼迂回包抄，他们慌了神……

"白军早就逃了吗？"

"没多久，"农民们回答说，"在你们来之前刚刚跑掉的。多半还在山里，走不多远……"

但我们的部队都累坏了，不能再追击了。只好派一些骑兵去试一试，可是我们的骑兵并不多——也不能对他们抱什么希望。

那些跑在前面，已经爬上山的部队，还没有丧失截获敌人辎重的希望。但他们只截住落在后面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辎重车辆早已经走远了。

皮柳金诺座落在山脚下。山很陡，很险峻。过桥以后，要花很大的劲才能攀登到山顶上去。在这里，正当大家爬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却发生了一桩悲剧性的误会：先头部队沿着陡坡一直往上爬，刚到山顶，发现对面有一列散兵线正在匍匐前进。于是就开了火，对方也立即还击。双方对射起来；真是大

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结果打死两个，五个受了伤。如果不是左面山头上来的那个团的团长及时判明情况，结局恐怕还要不堪设想；这位团长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挥着手帕和帽子，从田野里朝着开枪的人迎面跑去，跑到以后立刻讲明情况。我们在山上碰上六十几名骑兵，他们纷纷下马，在汗水淋淋、口吐白沫的战马旁边站定。我们命令他们分成两队：一队向左，探听一下我们迂回部队的情况，另一半往右，去追赶敌人的辎重。跟迂回部队一直没联系上——原来那里出了类似叛变的事件，不得不把几个人逮捕，送交军事法庭。可是我们当时一点也没有预料到，甚至还抱着希望，以为只要我们的迂回部队在敌后一出现，给敌人一点小小的打击，就可以取得战果。然而这些部队并没有在敌后出现，所以敌人从从容容，不受惩罚地就拖着辎重退走了。派到右面去的骑兵侦察队，刚走出约莫三百丈光景，就遭到敌人退却的散兵线射来的一阵猛烈火力，不得不隐蔽到山沟里去，穿过灌木林前进。

第一个机枪手乘着载机枪的车子爬上了山。我带领他一起奔到前边，那里可以看得见缓缓移动的敌人散兵线。他们正沿着一马平川的林边草地，朝着树林里撤去，他们很慌张，唯恐我们的骑兵追击，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几乎是没有骑兵的。我们当然无可奈何他们，但还是存有一线模糊的希望，希望在敌人的后方马上响起枪声，那我们从这里即使只要用这一挺机枪，也就使敌人更加混乱，完全丧失战斗力，可以乘机把他们的辎重夺下……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我们跟踪撤退的敌人，追击了约一里半路；侦察队从左面，我们从山上不

停地向逃敌打枪。他们一边还击，一边向森林退去，直到消失在森林里为止。我们只好空着两手回来了。

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团已经在山上隐蔽好了。当我和机枪手走近的时候，发现有几名战士把步枪放在膝盖上，正对着我们瞄准，象是等我们走近些再开枪。我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挥动手帕，告诉他们是自己人，总算把一场新的事故防止了。这几个战士站起身朝我们迎来，当认出是我以后，才连连摇头叹气，责骂自己莽撞。我们下了山，进了村。

在村里我遇到了恰巴耶夫，他正在巡视各部队。他亲自参加了粮囤前的那次冲锋，而后打那里进了村子。我勒转马头，又和他一起向山上跑去。

村子热闹起来了。家家户户都住上了红军。婆娘们挤在水井边，跑来打水，又赶紧摆上茶炊，请住进来的同志们喝茶。现在他们不再认生，不再畏畏缩缩了，而年轻人更是打打闹闹，没有一点儿拘束。村里的姑娘们马上就跟红军战士厮混熟了，快得简直叫人希奇。

现在你来瞧瞧这副景象吧！

山上，我们的散兵线摆开阵势，在那不远的密林深处，敌人的部队正在撤退，空中的硝烟还没有散净，而从农舍敞开着的窗子里，已经传来了诱人的手风琴声。琴声一起，人们立刻兴冲冲地聚拢来，有战士，也有姑娘……马上就跳起舞来——不跳舞是不行的……

老百姓所以这样高高兴兴地欢迎红军部队，不仅仅是因为红军没有抢掠，没有强奸——就连打人、骂人的小事儿，一

件也没有发生，主要是因为他们以同志的身份出现，来到同志们的家里，相互尊敬，大家心贴心，一家人。

农民的房子少，部队多，好多人住不进去，只好露宿在辎重车旁的空地上……

我们找到一家结构比较好的、比较宽敞的农舍，安排旅部和师作战处住了进去——作战处在近一时期里一直跟着我们，形影不离。他们架上电线，安上电话机，就通起话来了。不一会儿，桌上摆上了一只茶炊。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围着桌子坐下来。每个人都抢着谈自己在战斗中干了些什么，看到了什么，有些什么感受。大家七嘴八舌，你争我抢，一个没有讲完，另一个插了进去；一会儿讲这，一会儿又扯那，吵吵嚷嚷，都想把对方的话压下去，硬要人家听自己说，可是谁也不愿听别人的，都想讲自己的：因为每个人的亲身感受仍然历历在目，憋在心里不讲不行。大伙儿好象一点也不累似的……足足有半个小时，就这样东拉西扯，吵吵闹闹地过去了。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我们对视了一眼，不知出了什么事，猛地跳了起来，径直朝门外跑去。说不定有人在扔炸弹吧？

接着附近又是连着三声巨响……是在打炮？可是从哪儿打来的呢？

正在这当儿又传来了一声枪响，之后，接二连三——枪声顿时乱成一片。三一堆，五一伙，坐在大车旁边休息的红军战士，纷纷跳了起来，向着四面八方奔去。场地上一下子空无一人了。这时，我们看见头顶上有一架敌机，平稳地、慢悠悠地，象一只银白色的天鹅，向着湛蓝的远方飞去。炸弹都扔在邻

近一座大花园里，那儿连一个红军战士也没有……

不多一会儿，又安静下来，恢复了原来的状态……苍茫的暮色，渐渐变浓，宁静的、繁星满天的春夜也随着悄悄降临。村子里万籁俱寂，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使你想得到，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战斗，残酷、贪婪的死神曾经到处搜索、寻找自己的牺牲品。然而到了明天，太阳刚一露面，我们又要踏上征途。那时候，我们又会象灯火旁飞舞的飞蛾，旋转在生与死之间……

“啊，今天又会怎么样呢？”每天一早，你总要向自己提出这个痛苦的、折磨人的问题。“谁能活下来？谁将死去？我们将和谁披着朝霞一起出发，经过今天这一仗以后，将和哪些人永远永远再也见不着面？……而今后，还会有无数次的行军作战，每日每时，都会有激烈的战斗……春天……刚刚开始……动摇的只是高尔察克的先头部队，但需要消灭的却是整整几十万大军。这要付出多少代价啊！到秋天，还不知道将会有多少人牺牲，现在仍然和我在一起的这些同志，还不知道要少掉多少！”

在这次记叙得非常详尽的战斗以后，到布古鲁斯兰去的道路打开了。布古鲁斯兰，也和大多数城市一样，是用迂回战术占领的。不仅这几次战斗是这样，一般来讲，在整个内战时期都是如此。在大城市里，很少打过巷战。主要的战斗，最后的和决定性的战斗，通常都是在城郊进行。防守的一方如果在这次战斗中打败，那他们常常是一撤了事，不发一枪地把城市留给胜利者。布古鲁斯兰也是这样占领的。

十一　到别列别依之前

恰巴耶夫这个师进军神速，而其它部队由于一些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原因，都给甩在后面了。他们的迟缓行动，把协同进攻的统一计划全部破坏。恰巴耶夫师远远地跑在前面，从正面冲击敌人，打的主要是追击战，没能消灭和俘虏多少敌人。久经征战考验的战士们，吃大苦、耐大劳，没有任何要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和任何条件下，说打就打，真叫人叹为观止。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经过长途行军之后，战士们累得站都站不起来了，这时突然又打响了。他们象是一点儿倦意也没有，顶住敌人的压力，主动发起进攻，冲向敌阵，跟踪追击……但有时候也有这种情况，由于天天行军战斗，跋山涉水，实在累得不行，在到达头一个休息地点后，倒头便睡，直挺挺的跟死人一样，常常连必要的警戒也不放，大伙儿统统睡着了——指挥员，战士，还有哨兵……

他们翻越高山，穿过小径，涉水渡过一条条河流——敌人撤退时把桥炸毁了——头淋大雨，脚踩污泥，踏着晨露，顶着夜雾，一天饱，两天饥，衣破鞋烂，有的磨破了双脚，有的生了病，大多是负了伤，但从不掉队，照样胜利地从一个村子向另一个村子挺进。他们是无法抵挡的，不可战胜的。他们忍受一切艰难困苦，防御时，巍然屹立，毫不动摇；进攻时，猛打猛冲，威震敌胆；追击时，咬住不放，坚定顽强。打起仗来，个个

是英雄，牺牲时不愧为红色的骑士；一旦被俘，经得住酷刑拷打，象殉道者一样，视死如归！拥有这样一支可靠的力量，是不可能不打胜仗的——需要的只是善于指挥。恰巴耶夫恰好具有这种高超的指挥天才——也就是说正好在那个时刻，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具备指挥那样一批群众的天才。这批人很英勇，但都是没笼头的野马。局势是紧张的，战斗是激烈的，有许多事，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情况特殊的借口下，都没有深究。这伙人简直象发狂一样，他们的情绪难于用言语表达出来；这种情况想来以后是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它的出现是由于一连串的事件——是在国内战争以前或战争过程中的各种大小事件的基础上产生的。伏尔加河水不会倒流，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也不会再现，因此，那种现象也不会再产生了。将来会出现新的时刻——美好而又内容深刻的时刻，但那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恰巴耶夫式的人物只能在那个时期里出现——在别的时期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物；有那样的群众，才有他这样的人，他是在那个时期，又在那个特定的情况下诞生的，因此他才能得心应手地指挥“自己的”师。他把光荣的第二十五师称为自己的师，恰巴耶夫师，是很有道理的，尽管他自己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恰巴耶夫身上集中了，并象镜子一样反映着那个时期半游击作风的军队的基本特点——剽悍异常，行动果断，吃苦耐劳，还有必要的残忍和冷酷。战士们把恰巴耶夫看作英雄主义的化身，虽说在当时，人人都看到，他在行动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英雄主义；他本人所做的事，好多人也在做，但是好多

人做的事，没一个人知道，而恰巴耶夫做的事，却是家喻户晓，还晓得的很详细。这些事经过夸张渲染，有神乎其神的细节，有捕风捉影的虚构。他恰巴耶夫，在一九一八年是个出色的战士；到了一九一九年，他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但已不是一个战士，而成了一位英雄，一个组织者了。然而他这个组织者，要附加某个特定的含义：他最看不惯"司令部"，他把不拿枪打仗的机关，什么供应处、警卫处、通讯处，统统都看作司令部。在他眼里，只有拿枪的战士才算打仗，才能赢得胜利。他不喜欢这些司令部，还因为他不大了解它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去组织过它们；他一到司令部，多半是训斥一通，很少指示、帮助和开导。

他所以能称之为组织者，仅仅在于他能把自己个人，深受爱戴的、享有崇高威望的个人，同自己的师结合在一起，结合成一个整体，以英勇精神和炽烈的热情去鼓舞人们勇往直前，激励人们去夺取胜利；在战士中间发扬并巩固英雄传统，这些传统，比如，"决不后退！"就是战士的神圣天职。拉辛、普加乔夫、多马什金等团的战士，都保持着这种战斗传统，经受了不可思议的困难，承担了极其艰苦的战斗任务，顽强坚持，力争胜利，而决不后退一步：如果斯捷潘·拉辛这个团队后退了，那就是说，他们永远玷污了自己英雄的战斗声誉！

这是多么动听，又是多么谎谬、多么有害和危险啊！

打恶仗，恰巴耶夫最起劲。战斗一沉寂，他就苦闷、急躁、无聊、心事重重。沿着战线，从这头到那头跑来跑去，是他最喜欢干的事……有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必要，他也会找个借口，骑上马，跑到五十里、七十里、百把里以外……当他到了某

个旅的时候，要是邻近的旅知道他在那里，马上会打电话来："快点来，这里有急事……"于是恰巴耶夫又跨上马奔向那里。"急"事，当然是没有的，只不过是他的朋友们，那些指挥员们想跟自己的头头坐上一会儿，聊聊天。正是他们——恰巴耶夫的伙伴们宣扬并广泛传播了恰巴耶夫的功绩、恰巴耶夫的荣誉。没有他们，他——任何其他人也是如此——永远也不会有这么响亮的声誉。而要赢得崇高的荣誉，往往光有丰功伟绩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批为你吹喇叭的人，他们盲目地效忠你，信仰你的伟大；你的伟大使他们眼花缭乱，使他们受到鼓舞，他们在为你唱赞歌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

我们对一个"英雄人物"，总爱超乎实际地夸大一些；而对一个有功的，甚至建树了特殊功勋的"普通一兵"却往往估价不足。

他们——恰巴耶夫手下的指战员们，由于自己是恰巴耶夫的战友而感到幸福（我们不怕"英雄主义"这个词，它完全有权利存在，只是必须知道，这是什么权利），因为照耀着恰巴耶夫的那些荣誉的光芒，也反射到他们身上了。在斯捷潘·拉辛团里有两个英雄，他们在战斗中失去了双腿；一个拖着残腿爬，另一个拄着拐杖，勉强能够走几步——他们两个谁也不愿意离开自己这个远近驰名的团队。恰巴耶夫来的时候，那怕同他们讲上三言两语，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幸福。他们不是这个团的包袱，两个人在战斗中都是机枪射手。

我们这些英雄的岁月，一旦过去，这桩事会有人不相信，会把它看成神话。其实确有此事。真的有两个失去双腿的红军战士，在战斗中当机枪射手。还有个盲人，一个双目完全失

明的战士。有一次，他请自己的战友代笔给师部的报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我手里。我把信附在这里，虽说不是全文：

一个盲人红军战士的信①

编辑同志：

请您把俺的不幸遭遇——俺冒险从乌拉尔斯克的哥萨克统治区逃到布尔什维克同志这边来的一段经历登在消息报上。俺先简单地说一说：俺家住在哥萨克和红军之间的乌拉尔斯克火车站上。在哥萨克和红军打仗的时候，俺的两个哥哥是在火车上跑车的。

四月二十日（新历五月三日）叶尔莫辛科同志向乌拉尔斯克、向谢米格拉弗纳·马尔火车站发起第一次进攻的时候，——四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五月六日，军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征调住在乌拉尔斯克省城的农民当兵。俺的哥哥是征调的对象，可是他俩不肯拿着武器去打红军，他们坚决表示，绝不去反对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因此在六月二十三日夜里十二点钟被哥萨克枪毙了。只剩下俺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俺的爹娘五年前就死了，哪儿也没有亲人了。再加上俺两眼全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两个哥哥被枪毙以后，俺便找到军政府，要求他们收留俺；军政府对俺说，你的两个哥哥不肯去打红军——那你也去找你的布尔什维克同志，让他们去收留你吧！当时俺回答他们说：无辜者的血，你们大概永远也喝不够吧！你们这群喝人血的野兽！就因为这句话，我就被关进监狱，等他们枪毙；在监牢里蹲了十五天，他们又把俺放了。俺在城里呆了几天，没有一点吃的，就打定主意来投奔自己的布尔什

① 个别用词和语法上的错误，我们保持原样未动；但有些地方，为了便于阅读，加上了标点。——作者注。

维克同志。别看俺两眼全瞎了，俺下决心，到自己同志这边来，那怕是迷了路，死在沙漠里，也比在哥萨克手里活受罪强。有一个朋友把俺秘密地送出乌拉尔斯克，送到大路上，告诉我：顺着那个太阳照着你后脑勺的方向走，就可以走到俄罗斯。俺和朋友分了手，就上了路。走了几里路，俺迷失了朋友指给俺的方向，自己也闹不清在往哪儿走。这时候，俺想起俺两个哥哥的惨死、穷困、苦难、不幸、痛苦的折磨……在沙漠里走了六天，又饿又冷，第六天，俺的力气全耗光了，嘴唇都是血，因为没有面包，没有一滴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解渴。一路上洒着辛酸的眼泪，心想，这条命是没有指望了。于是俺就大声喊道："亲爱的哥哥！你们安稳地躺在地下，抛下俺受苦受难。你们把俺也带走吧，别再让俺遭罪了，俺就要饿死在沙漠上了，有谁来搭救俺这个苦命的泪人儿呢！哪儿也不会有人来……"突然俺听见前面有汪汪的狗叫声和孩子们的说话声，我朝着那声音走过去，问孩子们这是什么庄子——是哥萨克的还是农民的。他们告诉我，这是农民的庄子，叫红塔里，离哥萨克的边界有七里地。一个老乡把俺领到他家，给俺喝的吃的，填饱了俺的肚皮，第二天早晨又把俺送到乌拉霍夫各村，俺从那里又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走到佩特罗夫斯克区……

接着他又讲述到了苏维埃俄罗斯，人们怎样热情地接待他，怎样体贴他，照顾他。

苏维埃主席伊凡·伊凡诺维奇·杰维增热情地欢迎俺，他很欢喜，很高兴。如今，俺来到布尔什维克同志身边，忘掉了苦难，感到自己有了保障……他们把俺安置在一间很宽敞的房子里，给了俺一套柔软的被褥，扒掉俺那一身破烂、肮脏的衣服和鞋袜，财经部门和食品供应部门给俺换上了一套干净的新衣服……现在俺过上了真正"资本家"的生活，俺太感谢了，太感激了……

接着他又举出他要感谢的一些人和单位的名字。信的末尾是这样写的：

> 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万岁，列宁同志万岁，不可战胜的英雄恰巴耶夫同志万岁，区苏维埃，财经部门和食品供应部门万岁！

这不是一封信，而是一篇完整的史诗。这个为苏维埃政权受尽苦难的盲人红军战士，认为恰巴耶夫的功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是最出色的宣讲员、最崇拜恰巴耶夫的扳都拉琴手。他演唱的故事，有些是真有其事，有些是自己的杜撰，他更相信自己杜撰出来的东西，因为这是自己的创作，是自己加工润色的。哪个人有勇气来否定自己编出来的东西呢？……

恰巴耶夫名声越来越响，已经远远超出红军的范围以外。我们这里还保存了另外一封信，是一位苏维埃工作人员从新乌津斯克写来的。你们读一读就会看到，人们是多么相信恰巴耶夫是无所不能的啊！这些人不仅把他看成领袖、战士，而且还把他看成他所属各部队曾经路过和打过仗的那些地方的全权主人。这封信是用蜡纸打印的，包得很严实，派专人送给恰巴耶夫的。这是一个名叫季莫菲·潘捷列伊莫诺维奇·斯皮奇金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向他控告新乌津斯克地方当局徇私枉法，请求帮助。他相信，这个问题，只有告到恰巴耶夫手里，才能得到迅速而公平的解决。他这样写道：

> 急件。
>
> 呈师长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恰巴耶夫同志
>
> 新乌津斯克苏维埃人民审判员主席

季莫菲·潘捷列伊莫诺维奇·斯皮奇金谨上

愤怒的控诉

恰巴耶夫同志，恳请您对这个控诉给予特殊的、豪迈的关注。两年以来，在乌拉尔斯克战线上，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忠诚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可是有一批坏人，也就是新乌津斯克的盗窃犯们，却百般给我抹黑，诬蔑我是疯子，想使公众不重视我对这伙盗窃犯的控诉。事情是这样的：有十六名盗窃犯偷了……（下面列有盗窃犯的姓名和他们每人盗窃财物的数字）。当我，斯皮奇金，把这桩盗窃案件向萨马拉提出报告的时候，那十四名尚未逮捕的盗窃犯（有两名已经逮捕），胡说我斯皮奇金是疯子，要求医生对我检查。医生们承认我神经健全。可是那十四名新乌津斯克的盗窃犯竟说："我们不相信，"要把我送到萨马拉省执行委员会找精神病医生检验。但是，我深知，现在这条战线上的真理和正义都在象您恰巴耶夫同志这样的英雄的红军战士手里，因此我，斯皮奇金向您紧急呼吁，请您速下命令，协助把上述十四名新乌津斯克的盗窃犯逮捕归案，送交萨马拉革命法庭依法惩处。您这样做，居民百姓将对您感恩戴德，您在人们的心目中，将作为一个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共和国与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享有崇高的荣誉。恰巴耶夫同志，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请您保护我不再受那十六名新乌津斯克盗窃犯的诬陷。

季莫菲·斯皮奇金

一九一九年四月廿五日

在"附件"里，斯皮奇金告诉恰巴耶夫到什么地方和怎样去"发掘"全部材料。最后几句话是这样写的：

我恳请您立刻毫不留情地把所有逍遥法外的盗窃犯抓起

来……我要再重复一次，把人民从这些肮脏的、剥削成性的恶棍手下解救出来，您光辉的名字将会更加光彩照人……

斯皮奇金的"申诉书"同样十分出色。他写这封申诉书，显然是由于受了那十四名"剥削成性的恶棍"的迫害结果。

恰巴耶夫同志，您是全民公认的英雄，您的光荣的名字远扬四方，就连三岁孩子也有口皆碑。我，斯皮奇金，也是大家公认的英雄，但我精通的不是军事艺术，而是民事艺术。我也抱有建功立业和英勇献身的满腔热情。请您相信这一点！您会在我的行动中得到证明。我，斯皮奇金具有火一般的精力和苦干实干的精神。如我能亲自见到您，如您不弃草芥，肯同我斯皮奇金结识，那我将感到莫大幸福！我这个人生来纯朴耿直，我热爱人民，我为人民献出了全部心血（我会亲自把我建立的功绩告诉您）。我恨不得马上追随您的左右，为完成您的军事伟业，打垮大家切齿痛恨的匪徒——高尔察克，贡献我的火一般的精力。

请您立刻接受我当一名红军的志愿战士，到您那个光荣的斯捷潘·拉辛团去服役。

新乌津斯克苏维埃人民审判员主席

季莫菲·斯皮奇金

斯皮奇金的"愤怒控诉"和"申诉书"充满了矛盾和不确切之处，确实给人一种热病呓语的印象，但是里面所讲的一些夸大的事儿，在恰巴耶夫的实际生活中，却是屡见不鲜，只不过形式不同，说法不同罢了。最突出的是他——恰巴耶夫对这类事儿一向是来者不拒，必定要管。他总喜欢亲自把这些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把各种各样无赖和坏蛋揭发出来。这两封信是在进攻最激烈的时刻送来的，因此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但他老是惦记着，始终没忘，总想亲自到那些地方走一趟就地弄清楚。然而当时他能做到的只是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对那些“犯罪分子”大发了一通雷霆，哎呀呀，不经任何审讯，恰巴耶夫就缺席判决这“十四名盗窃犯”为十足的坏蛋。他对什么事情非常容易轻信；同时，他对什么事情，又很轻易不相信，他只有对打仗的事情和有关军事问题不是这样：在这些问题上，他刚好相反，完全凭“自己的才智”办事。

恰巴耶夫是不是具有某种特殊的“超人的”品质，才使他获得了不朽的“英雄”荣誉呢？你稍稍想一想，你就会发现，他的品质是很普通的，完全是“一般人”的。有许多可贵的品质，他甚至根本没有。他的最大特点只在于他具有一种惊人的活力，头脑清楚，思想敏锐。他很善于发挥自己的这些特点：他出身在未开化的、半游击习气的农民群众之中，他能把农民群众的情绪激化到极点，能用农民群众所希望，所要求的东西来满足他们，因而他自己就成了他们的核心。

恰巴耶夫所以获得荣誉，与其归功于他的英雄事迹，倒不如归功于他周围的那些人。这样说，一点儿也不会降低恰巴耶夫个人在内战时期所起的巨大作用。然而要知道，要记住，在每一个英雄人物的名字周围，神话般的传说总是比历史的真实要多一些。不过人们要问：为什么偏偏关于他恰巴耶夫，人们编造了这么多的传说，为什么偏偏是他的名字这样深受欢迎？

这是因为他比其他许多人更充分地体现出“他手下”那些粗犷、英勇的战士群众。他的所做所为，正合这些人的胃口。他具有这些群众的一切长处，特别是他们认为宝贵而崇高的

长处——个人的英勇、大胆、无畏和果断。他身上的这些长处不比别人多，甚至还比别人少一些，但是他却很善于在自己的行动中发挥这些长处，而自己那些亲密朋友又善于帮助他，结果他的行动肯定无疑地会发出豪迈的芬芳和神奇的光彩。有许多人比他更勇敢，更聪明，在指挥部队方面更有天才，在政治上觉悟更高，可是这"许多人"的名字被遗忘了，而恰巴耶夫却活在，并将长久长久地活在人民的传说中。因为他是人民群众中土生土长的孩子，而且在他身上非常完美地结合着他的战友们各自独具的个性和特征。

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战役一个一个地加以描绘，更没有必要详细地叙述那些作战命令，评论它们的长短，谈论我们的成功和失败；这些将由专门的军事论文去论述。我们这篇特写，在事件的叙述上，不求全，不求准确的顺序和正确无误的时间、地点、人名……我们只不过是对那个时期所发生的，而且具有那时期特点的战斗生活作了个粗略的勾勒。从目前来说，在向别列别依进军的路上，我们就不去留意纯属战役发展的进程，而只是选出两三幅展示当时实际生活的画面。

西佐夫旅攻占了布古鲁斯兰以后，就从德米特罗夫斯克村向鞑靼人的康迪兹挺进。在那里打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敌人丢掉布古鲁斯兰以后，硬不肯相信他们在丢掉这个城市的同时，也丢掉了自己的主动权。他们的胜利进军已经结束，而今人家要反过来尾随追击，他们只有防卫，只有退却了……现在他们集中全部力量，以猛烈的突击来抵挡红军的进逼。但

已经太迟了——抱有必胜信念的高昂士气已经从白军那里飞走，飞到红军身上来了，激起他们的勇气，鼓起他们不知疲倦，猛打猛冲的精神，这种精神只有在对胜利充满信心的时候，才会产生。

主动权从一方转到另一方的时刻，通常是很明显，很触目的，只有瞎子才看不出来。这一时刻，一方突然黯然失色，搭拉脑袋，萎靡不振；另一方却好象喝了长生不老的仙露，昂首挺胸，毛发直竖，目光炯炯，气派出奇的雄伟，姿势异常威武壮观。这时刻，那个正在衰落的军队变得那样软弱无力，毫无生气，萎靡不振，它唯一的结局，就是死亡。当内部长期亏损的过程显之于表面的时候，那已经是人命垂危了。曾几何时，这位白匪海军上将麾下的大军还是生龙活虎，无往不胜，但在布古鲁斯兰打败仗的日子里，它已经成了注定必死的活死人了。历史的无情巨掌，已在这支军队的低贱、罪恶的额头上，打了一个卑鄙而死的可耻印记。

而红军呢，却是那样机动灵活，那样伸缩自如。各工厂、工会、党支部源源不断输送来的新鲜血液，使它立刻恢复了生机。在那些日子里，它仿佛是一个久睡初醒的勇士，头脑清新，精力充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任何邪恶势力在他面前，只能销声匿迹。

恰巴耶夫师充满了这种情绪，西佐夫旅也是带着这种情绪在俄罗斯的村庄和鞑靼人的康迪兹痛击敌人。

伏龙芝来到旅部，很快地把情况了解了一下，详细地询问了西佐夫最近打的几次胜仗的情况，立时在木头房子里写了一份嘉奖令。这一来，更加提高了战士们打胜仗的士气，而西

佐夫本人，受到嘉奖以后，劲头儿也更足了，发誓要再立新功，夺取新的胜利。

“喂，既然这样，”恰巴耶夫对他说，“你别空发誓啦。你看见那一片山林吗？”他从窗子里给西佐夫随便指指前面一片山林，既没有说出地点，也不说出河流和村庄。“你能把它们统统拿下，俺向你保证：俺把这把镶银军刀送给你！”

“好哇！”西佐夫很高兴地笑起来了。

他们郑重讲妥后的第三天，两个人差点儿没动起手枪来。费多尔·克雷奇科夫那时正患重感冒，躺在床上，他派了助手克莱纽科夫代替自己陪同恰巴耶夫一起去前沿巡视。就在第三次出去的时候，发生了这场“风波”，但是谁也没有对卧病在床的克雷奇科夫讲起这件事，他只隐隐地听到了一些风声。恰巴耶夫也不响，话头触到这件事时，他就沉着脸规避开。费多尔病一好，就到旅部去找西佐夫，西佐夫自愿地把这件事源源本本地告诉了他。

“克雷奇科夫同志，这是一个误会，真正是个误会，”他告诉费多尔说，“两个人都有点克制不住自己……糊涂……一句话，屁大的一点儿小事，根本不值一谈，好，说就说吧，我是喜欢回忆这种荒唐事的……他就是这么个人——是一团火！你拿他有啥办法？他一发起火来，唉，您瞧，简直把自己都烧着了……本该有人照看着他点，可那时候您又不在……您的那位助手，是个老好人，只会笑，不敢去劝他，唉，恰巴耶夫也不是什么人都买账的……事情闹到这般地步，那吵就吵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我累极了，两条腿酸的要命！……一点劲儿也没有……心想，让我打个盹儿，也

许会好一些……我一倒下去，就把什么都忘了！瓦西卡那个小鬼，喏，我那个传令兵，你还记得吗？可调皮得很呐！他号了一间鞑靼人的小木房子：这间房子又小又脏，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靠墙钉着的一条长木板。我往木板上一倒就呼呼地睡着了。临睡之前，我吩咐瓦西卡说：‘你这个捣蛋鬼，明天一早给我把小鸡炖好，知道吗？’‘知道了，’他说。真是活见鬼，我不知道做的是什么怪梦……我梦见拿一把叉子，好象不是叉小鸡，而是在叉高尔缪克。我一叉，他一低头……我再一叉，他又一蹲，这个狗东西，还扭过头来嘿嘿直笑……可把我气坏了——我就拿叉子使劲去敲他的脑壳，却把我的军刀敲成两截。原来我是用军刀敲的，不是用叉子。我抓住半截军刀，敲啊，敲他的头。不一会儿他的头变成了一根电线杆，电码一个接着一个，象小寒鸦似的，从“休斯式”电报机上跳出来。我知道，这是恰巴耶夫在给我下命令，可我不同意他的命令。他说：‘你把敌人打垮，叫别的旅去追击！’滚你的吧，我心想，你晓得个啥；我们流了血，我们不该去报仇？在山上我牺牲了上百人，谁来补偿我？‘库尔金，’我喊道，‘来拟个命令……’库尔金总是手里拿着纸，耳朵上夹着铅笔，他怕临时抓瞎。我还没来得及眨眨眼，他已经起好了头。我告诉他，命令这样写：把敌人一打退——就要追着打，追到十五里以外！‘你懂吗？’他回答说，‘懂了。’他和瓦西卡一听到我的语气，马上就懂得我的心思，两个家伙，一个赛过一个。我知道，我准得挨恰巴耶夫一顿臭骂。既然他弄出这么个纰漏，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给他挂了个电话，想和他谈一谈，解释一下，可是师参谋长普列什科夫那个老混蛋，根本就没有喊恰巴耶夫听电话。他说，命

令已经下达，不能再讨价还价……去你娘的吧，我想：你说不能就不能？我肩膀上也扛着自己的脑袋呀！库尔金把命令写好了，我签了字，这场戏就开场了……我清楚，这件事不会太太平平过去，恰巴耶夫最不喜欢人家改变他的命令。我又睡下了，睡啊，睡啊，做着各种各样的乱梦。突然我从木板上跳起来……瞧，这时太阳还没有出来……天色昏暗……可是恰巴耶夫已经到了，他按捺不住，连夜骑马赶来了。

'你想干啥？狗崽子！'他说。

'我不是狗崽子，恰巴耶夫同志，'我说，'您说话要注意点儿……'

他伸手去摸枪。'老子枪毙你！'他刺耳地吼叫着。他的手刚拨到枪套，我已经把自己的手枪抽出来了，对他说：'我的子弹已经顶上了，来吧，咱们对开……'

'你甭当旅长了！'他吆喝着，'俺马上撤你的职……你写个报告，让米海洛夫代理你的职务。米海洛夫接替你，你给俺滚，滚！你算个什么指挥员！我说不要追，可你们偏偏跑上十五里。这象什么话，算个啥名堂，啊？旅长就是这么个当法，啊？'

他左一个狗崽子，右一个狗崽子，骂个不停，但手枪始终没有掏出来。我也就把枪放回去了……没什么好说的了：'库尔金，'我喊，'来写个命令……'他按恰巴耶夫的意思把命令写好……

'马上叫四名传令兵……'

他们骑马跑来了。

'这是给米海洛夫的命令，送去，快送！'

眼看着他们一溜烟地飞驰而去……我们坐到那里，一声不响……一阵急风骤雨过去了，要说的话都说了……我坐在木板上，恰巴耶夫没地方可坐，就靠墙站着……碧蓝的眼睛，显得很凶，闪着光。我思忖，没关系，我的小鹰，你气消了，就会平静下来……正在这当儿，瓦西卡把头伸到门里来，尖着嗓子说：

'鸡已经炖好了……'

吵归吵，但是还得让一让啊。

'恰巴耶夫同志，请吧，'我说，'到花园里去吃鸡吧！'

那里有个小花园。

'好吧，'他说。

他的口气虽说听来还是冷冰冰的，但已经不那么凶了。本该露出点笑容的，兴许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来到小花园里坐下，仍然一言不发。

'西佐夫，'他说，'把几个传令兵追回来。'

'追不回来了，恰巴耶夫同志，'我回答他说，'他们跑得老远了，上哪儿去追他们？'

'派几个最好的骑手，'他喊叫起来，脸又胀红了。

'没有最好的了，他们就是最好的……'

'你把那好上加好的派出去嘛！你难道还不懂俺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怎么会不懂呢？都懂。'我心里暗自说：让我也来刺刺他，他为什么骂我'狗崽子'？

'为什么，'我说，'为什么要骂我狗崽子？我也有自尊心。我犯了什么过错，你尽可以处理，把我送交军事法庭，让他们

枪毙我，可你不该骂我狗崽子……’

‘俺是一时发火了，’他说，‘你也不要太那个……’

于是，又命令备马加鞍，这回派出六名传令兵。他们鞭子一扬，鸟一样地飞出去了！过了一小时，两批人马都回来了。追的人开了枪，前面那批人才停下来了……

我刚要把刚才下的几道命令全撕碎，扔掉……

‘你那个命令甭动了，’他说，‘让他们去追击吧，成命是不该收回的……还是俺把自己的命令斟酌改一下……’

这场风波到此结束，再没有什么了。我们把鸡吃光，谁也没有再对谁讲过一句难听话……‘克雷奇科夫同志，我们老是这个样子，’西佐夫讲完了这段经过又说，‘我们吵啊，吵啊，吵完了又坐下来喝茶、聊天……’”

“啊，都讲完了？”费多尔笑了笑说。

“那可不，”西佐夫咧着嘴大笑起来，“‘不过当我把战斗全部结束，将那几个山头拿了下来，赶着前两天转送到师部去的那批俘虏往回走的路上，他又来了。

‘好哇，’他说，‘西佐夫！’他满面笑容，兴致挺好。

‘你好，’我说，‘恰巴耶夫，你身体好吗？’

他没有答话，走到我跟前，抱住我，连着吻了三下。

‘喏，拿去吧，’他说，‘这把刀该归你了。’

他摘下镀银军刀，挂到我肩上，站在那里，一声不响。我看他身上光光的，怪可怜，就把自己那把普通战刀送给他，我说：‘拿去做个纪念吧！’

‘他只要许下诺言，就一定兑现，这点你是知道的……’”

谈话就到此结束了。西佐夫去听电话，团里有事找他。

费多尔自己也没再问起什么，当时的全部情况大概就这么些了。没什么要紧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在当时，他那个火暴脾气一发作，说不定真会闯出一大堆乱子来。真需要经常有个人照管，严防不懈；一旦照管不到，保不定真会同人家打个折胳膊断腿呢！

第二百二十二团打进特里福诺夫卡村以后，就在这个村子宿营休息。当红军战士走进村头一间小草房的时候，看到地上满是斑斑血迹，不由大吃一惊。大家觉得事情蹊跷，纷纷追问房东，可是房东不吭声，死不开口，什么也不肯讲。战士们向他保证，只要讲出来，决不会难为他，"万一有什么事"，他们自己会去向指挥员和政委求情，不过一定要讲真话，讲清楚是怎么回事，是怎样发生的。房东没再犹豫，就把他们领到一间敞棚底下，那里有一堆粪，他稍稍把粪堆拨开，指着一摊血淋淋的、不成形的、肮脏发红的东西说："就是这个！"战士们相互看看，困惑不解，走拢一些，才看出这堆不成形的、血淋淋的东西，原来是人的躯体。他们立时用刺刀、军刀，用手把粪堆扒开，拖出两具还有点温暖的尸体：这是两名红军战士。

忽然有一具尸体的胳膊动了动，拖他的那几个战士浑身一哆嗦，本能地向后一跳，又把他扔到粪堆上去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看到这具尸体的一条腿也随着手臂动起来，先是一屈，继而一伸，又屈了回去……眼皮也抽动起来，一只眼睛在那黑色肿胀的眼皮下微微睁开，那呆滞的，锡灰色的目光说明，他已经没有知觉了……这个可怕的发现，立刻传遍了全团。战士们都跑来看，可谁也闹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

七嘴八舌，胡乱地猜测着，纷纷追问房东。房东不再执拗，一五一十地全讲了出来。

有两位红军战士是国际团的炊事员，几小时以前，由于迷了路，来到这里。他们误把白军占领的特里福诺夫卡村当作自己部队驻扎的某一个村庄了。他们催马来到这家农舍跟前，打听供给处在什么地方。坐在里面的几个哥萨克跳了出来，吼叫着向两个吓呆了的炊事员扑过去，把他们拖下马来，连推带搡地赶进屋里去。开头先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部队驻扎的地点和番号，每个部队有多少人。他们满嘴许愿说，只要讲实话，就不动他们一根汗毛。不管是真是假，两个炊事员还是对他们讲了点东西。哥萨克边听边记，紧追着问下去。这样搞了有十来分钟。

"你们再也不知道什么了吗？"一个坐着的哥萨克问。

"再也不知道了，"两个被俘的炊事员说。

"你们帽子上是啥玩艺儿？五星帽徽？苏维埃政权戴在脑袋上啦？狗娘养的！看你们，还戴这……"

两个红军战士站着不吭声，大概已经发觉事情有些不妙。在场的几个家伙，情绪很快地改变了。在审问的时候，并没有嘲弄他们，可是一看到"五星帽徽"，又是吓唬又是骂，有个哥萨克还朝一个红军战士的腰部狠狠地捅了一拳。

"你做过饭？"

"做过，"一个炊事员低声地回答。

"做给布尔什维克吃吗？狗东西！"

"大家吃，"那个炊事员回答的声音更低了。

"大家吃？！"一个哥萨克跳起来，"我们懂得，你们是怎

样做给大家吃，混账王八蛋！你们什么都破坏了，到处糟蹋……"

他乱骂一通，越骂越火，把手一抡，朝着红军战士的脸上，啪地一巴掌。血从鼻子里冒出来……这是一个信号，别的哥萨克正在等它呢：随着这一巴掌，几个家伙也跟着动起手来了。见了血，他们那野蛮的、疯狂的、嗜血的兽性马上发作，腾地从座位上跳起来，手边有什么，就抄起什么，朝两个红军战士劈头盖脑地乱打，打倒在地，又踢又踩，还呸呸地唾他们……

最后有个坏蛋想出了一个狠毒的刑法。他们把两个不幸的人从地上拖起来，放在椅子上，用绳子捆起来，开始从脖梗子周围割肉，一块一块，鲜血淋淋。割下一块，在伤口上撒些盐，再割一块，再撒些盐。两个人疼痛难忍，大声地惨叫，象发疯了一样，但他们的惨叫只能进一步激怒这些狂暴的野兽。这样割肉、撒盐……足足折磨了好几分钟。后来有个家伙用枪刺戳进一个红军战士的胸膛，另外一个家伙也要戳……但被其他的人拦住了 怕一下子戳死，倒让他们少受了罪！……当中一个还是被他们戳死了。另一个勉强还有口气，这就是现在死在全团战士面前的那个……

几个钟头前，白军从特里福诺夫卡仓皇逃窜的时候，把两个受尽折磨的炊事员拖出来藏在粪堆里了……

这就是全部经过……

全团战士阴沉着脸，默默地听完这段骇人的惨事。他们把这两位受难的同志摆在大家面前，做了些必要的整理，准备向他们致最后的敬礼后，就下葬。

正在这时候，费多尔和恰巴耶夫来了。他们一听说出了这么一件事，马上把战士集合起来，简短地说明这种残酷行为毫无人性，提醒大家不要对俘虏严厉报复。

但是红军战士个个怒火满胸，愤恨得不得了。他们把受难者埋了，放了三排枪，这才散开去……在第二天早晨的战斗中，没有一个俘虏送到团部来……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怎么保证，在战斗中总还是免不了要报复的：在战场上只能以血还血！……

这件事对费多尔本人，虽说影响不大，但肯定也有一点儿：就在第二天，他第一次判处一个白军军官的死刑。

关于这件事，看来还是值得讲讲的。

事情的全部经过是这样：

他们骑马到一个俄罗斯康迪兹来找西佐夫。他那旅在今天早晨冲锋的时候，抓到了八百来个俘虏。俘虏抓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看管。

"您放心吧，他们不会跑的，现在用棍子赶，也不能把他们赶到高尔察克那里去了！他们当了俘虏，才高兴，才开心哪！"

"怎么，西佐夫，又抓来俘虏啦！"费多尔向俘虏那边摆了摆头问。

"那可不，"西佐夫呵呵笑着说，"我刚想拿刺刀逗逗他们，可他们哇哇哇地叫起来了，他们说：'我们乐意当俘虏，看在上帝面上，饶了我们吧。'就这样，我把他们赶来了。"

"有军官吗？"

"军官也有……可他们不愿意当俘虏，他们说——在咱们这儿不自在……"

西佐夫意味深长地瞅了费多尔一眼，费多尔也没有再问下去。

“也许，还有军官混在里面吧？”

“作兴有，不过他们都不吭声。”

“难道当士兵的不检举他们吗？”

“您瞧，”西佐夫解释说，“这些士兵乱七八糟，哪个部队的都有，谁也不认得谁，全是临时补充进来的……”

“那好吧，”费多尔说，“咱们一块去盘问……不过我先要对俘虏讲讲话，各种问题都讲一点。”

费多尔开始讲的时候，许多人不仅听得很注意、很感兴趣，而且简直不大敢相信。他们的脸上和惶惑不动的目光中流露出惊讶神情。显然，许多问题，他们还是生平第一遭才听说，过去根本不知道，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现在克雷奇科夫对他们讲的这些事，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把什么事都对你们说明白了，”费多尔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说，“我没有夸大，也没有隐瞒，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兜底翻了出来。下一步该怎么办，靠你们自己拿主意了。你们知道，你们宝贵什么、你们的切身利益是什么：是在高尔察克那里看到过和没有看过的那些东西，还是我刚才对你们讲的那些东西。不过大家要知道，我们需要的只是那些勇敢的、真正的、有觉悟的苏维埃政权的捍卫者，只是那些永远靠得住的人……你们好好想想。谁要是想和我们一起来战斗，那就说一声，我们永远不会拒绝你们这些被骗到高尔察克那里去的人……”

他的话讲完了。下面你一句我一句地提出好多问题，有

政治和军事的问题，还有加入红军的问题……顺便说说，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加入了红军，成为红军的一名战士，直到后来，西佐夫对于把这些人吸收到自己光荣的团队里来，从来没有后悔过。

这些人按照口令排成两列横队。克雷奇科夫绕着队伍巡视了一遭，看看他们的衣服和鞋子，提了一些问题。有几个人引起他的注意，很明显，他们不是工人，也不是普通农民；于是就让他们站到一边去，等会儿到司令部里，再另行详细地查问他们的身份。有一个人特别值得怀疑。他站在那里，以傲慢和挑衅的目光注视着检查和盘问的整个过程，脸上露着恶意的冷笑，象是要说：

“哼，你们这些灰鬼子，还配来盘问我们！”

他那一身穿戴，有一半倒象个普通的士兵，但还是露出了破绽：裤子和靴子相当考究，可那件衬衫却很破，尽是窟窿，一看就明白，那是别人身上扒下来的；他那养得又壮又肥的身躯，勉强才套上去了，领子完全不适合他那厚敦敦猪后臀一样的红脖子；头上戴着一顶普通的士兵帽，也一看就知道不是他的：他戴在头上不相称，而且他根本不会戴这种帽子。就是戴上它，也不象个普通的士兵。

开头，费多尔从他身旁走过去，没说话，回来时，却在他面前站定，直盯着他，出其不意地问道：

“您可是个军官，对吗？”

“我不……不是，我是列兵，”那个人慌慌张张、局促不安地说，“您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为什么，我认识您，”克雷奇科夫巧妙地回答说。

“您认识我，在哪儿？”那个人盯着他看。

“认识，”费多尔逼近他说，“但是我告诉您：我们用不着在这里来回忆。我再问您一遍：您是不是军官？”

“我再回答一遍，”那个人挺直身子，高高地昂起头，“我不是军官……”

“哼，好吧，您只能怨您自己了……”

费多尔叫他从队列里站出来，同时把另外几个人也叫了出来，就领着这一帮子人在士兵的行列前走了一趟。在这之前，费多尔对那些高尔察克的士兵简短而又热情地讲了几句话，告诉他们白军军官在劳动人民反抗自己的敌人的斗争中干的是什么勾当，白军军官既然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那就应该把他们消灭掉。

他一边在行列前走，一边把这帮子人指给士兵们看，问他们谁认得出这几个人里面哪个是军官。当那个吃得肥头大耳的老爷被拿掉帽子以后，马上就有几个人认出他来了。

“这还用说，我们认得，他肯定是个军官……”

接着他们说出了这家伙指挥的那个部队的番号。

“两天前还见过他呢，怎么会不认得……刚刚他把领子翻上来，帽子拉得低，所以没能认出来。现在怎么会不认识呢。他就是……”

士兵们“认出了”这家伙，显得挺高兴。这次一共认出好几个，但只有他一个人是军官，其余的都是地方官吏、职员、办事人员……

“喂，怎么样？”费多尔转过头来对他说。

那家伙看着地面，顽固地不吭声。

“士兵们讲的对吗？”费多尔又问他一句。

“不错，讲的对。对，那又怎么的？”他大概知道情况的严重性，决心保持刚才那种傲慢、无礼的态度，也就是费多尔第一次问他，而他又隐瞒着不讲时的那种态度。

“我可是问过您……也警告过您……”

“我不愿意嘛，”他断然地说。

费多尔本想立刻把他同其他官吏一起送到司令部去，但突然想起还没有搜查过。

“喂，下命令搜查一下，”他对站在那里一声不响的西佐夫说。

“还下啥命令，”西佐夫脱口而出，“我亲自来……”

于是西佐夫动手搜他的口袋，把各种东西都掏了出来。

“还有东西吗？”

“没了。”

“也许，还有吧？”西佐夫问。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军官很粗暴地打断他。

他这种傲慢的、轻蔑的、挑衅性的口吻，使人非常生气。西佐夫掏出了一封信，打开交给费多尔。费多尔一看，才晓得这个军官以前读过教会学校，是个神父的儿子，反抗苏维埃政权已经有一年多了。这封信，大概是他未婚妻写来的。寄出地点是在附近的一个白军刚刚被赶跑的城市。信上这样写着：“白军不会再撤退了，没多久了，你忍耐点儿……红军来了，我们是没法生活的……愿上帝保佑你，你自己也要保重，好向布尔什维克报仇……”

费多尔觉着有一股热血直往头上涌来。

"够了！带走！"他大喝一声。

"毙了吗？"西佐夫盯着费多尔极其单纯地问。

"毙了，毙了，带走……"

军官给带走了。过了两分钟，响起一排枪声——把他枪毙了。

换上别的时候，费多尔一定不会这样行事的。可现在，那两个受非刑而死的红军战士的尸体，他们那被割下的一块块肉、那撒上盐的深深伤口，还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中……

还有，那个军官的顽固态度，那种傲慢挑衅性的口吻，最后，他未婚妻寄来的那封非常逼真地勾画出她这个未婚夫军官丑恶嘴脸的信……

克雷奇科夫忐忑不安，整天里心烦意乱，锁着眉，沉着脸，没有一丝笑意，没说过一句笑话，话说的少，也不想说，只想一个人单独呆着……但他只是当天这样，第二天一早，就象是什么事儿也没有似的。是啊，要是在前线上，老是为这些事儿长时间地痛苦难过，那未免过于蹊跷了。因为在前线，你天天会看到，时时会看到非常触目惊心的情景。在那里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几十，几百，几千的人都不免要牺牲……

军队踩着斑斑的战争血迹不断地向着战争血迹前进。这战争的血迹——血肉模糊的尸体，残缺不全的肢体，烧毁的村庄，无家可归、死于饥饿的居民——根本不容你为了战争中千百件悲惨图景中的一幅画而而长久的难过。这一幅画而会被其他悲惨画而遮盖掉。费多尔也是这样：到第二天早上，他回想起昨天他第一次下命令枪毙人这件事就不怎么在意了……

"你真是少见多怪！"恰巴耶夫笑着说，"如果一九一八年

那阵子你和俺们在一起的话……那时候不枪毙人怎么行呢？俘虏了军官，没人看管。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战士都要去冲锋陷阵，不能用来看俘虏。只好把成批成批的人干掉……其实都一个样——你以为他们会轻饶咱们吗？哎，老弟！”

“恰巴耶夫，你还记得第一次判决枪毙人时的心情吗？”

“嗯，也许第一次记不大清楚了，可俺知道，枪毙人是不那么好过的……开头总是难哪，以后也就习惯了……”

“习惯什么？杀人吗？”

“是啊，”恰巴耶夫率直地回答说，“杀人。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从哪个骑兵学校来了个学员，他会告诉你这么砍，那么杀……嗬，这龟儿子，朝空中挥舞砍杀，蛮利落的，妈的，真干净利落！可是真要他去杀人，他那一套学问就见鬼啦：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一塌糊涂。没什么了不得的，弄弄就好了。第一次总不会那么顺当的……”

费多尔和其他经过锻炼的老战士也谈起这个问题。他们异口同声地肯定说，不管你怎么去杀人，砍人也好，是下命令枪毙人也好，或者是自己亲自执刑也好，也不管你的神经怎样，心肠如何，第一次你总会觉着有些胆怯，心乱，良心受责备；可到后来，特别是在打仗的时候，战场上到处是腥风血雨，这方面的感觉也就迟钝了，无论用什么形式消灭敌人，那几乎都成了一种机械的动作了。

“斯捷普金，我那个通讯兵，”西佐夫对费多尔说，“也险些儿给枪毙了，枪毙他的命令还是我亲自下的呢。”

“怎么会险些儿枪毙了呢？”费多尔诧异地问。

“是这么回事……”

于是西佐夫就讲起他在乌拉尔斯克战线上差点儿把那个通讯兵枪毙、结果并没有枪毙的经过。

“他那时是个机枪手，”西佐夫叙说着，“这个小家伙跟大家一样，也很受信任。有一次，在一个镇子上，我看见几个人抓住他，说他强奸了一个小婆娘。我说，‘同志们，别忙，这是真的吗？把那个婆娘叫来，我要问问她。斯捷普金，你也留在这里，我要一起审问你们。’斯捷普金坐在那里闷声不响。我问他，他只是摇头，哼哼哈哈地讲不出个道理。直到最后，那婆娘快要来到的时候，他才说‘是真的，真有这么回事。’正在这当儿，婆娘已经跨门进来了。他倒挺会拣好的吃，挑了个蛮壮实的哥萨克女人，年纪不过二十四、五岁。政治委员来了，人都集合起来了。我说，‘没别的法子，只得把斯捷普金枪毙，使别的人不敢再犯……红军是来解放人民的，可他却来强奸妇女；因此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办法只有一个……过去也有枪毙自己人的先例；斯捷普金又怎能幸免呢？如果我们饶了他，我们该好好考虑考虑，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不等于说：同志们，你们去胡闹吧，我们是不会惩罚你们的！考虑到后果，明摆着必得这么办；可我一看到斯捷普金，我又可怜起他来了。小伙子打起仗来真是刮刮叫……政委已经给执刑队下了命令，执刑的人来了：

‘带哪一个？’

‘先等等，我们正在审问，’我说，‘斯捷普金，你强奸女人，承认吗？……’

‘怎么，’他说，‘我没有承认吗？’

‘你为啥干出这种事来？’我对他吼叫着。

‘我……’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不记得了……’

‘斯捷普金，你可知道，干出这种事，你会有什么下场吗?!’

‘指挥员同志，我不知道……’

‘要枪毙你，糊涂虫！枪—枪—毙！……’

他却轻轻地说：

‘随您，’他说，‘指挥员同志，该着这样，那也只好这样了……’

‘斯捷普金，不能不枪毙你，’我解释给他说，‘你自己该明白，你这么干，全镇的人都要骂咱们是流氓……人家骂的有道理呀……如果我们乱搞女人，那还算什么红军呢?’

他站在那里，一声不响，头垂得更低了。

‘要是宽大你，那就得宽大所有的人，是这样吗?’我问他。

‘看来，是这样。’

‘都懂了吗?’我说。

‘是，都懂了……’

‘唉，斯捷普金呀，你这鬼迷心窍的傻东西！’我生气地说，‘你干吗看上这个女人呢？你老老实实坐在机枪车上，什么倒霉事儿也不会……这一来，多糟啊！’

他挠着后脑勺——还是不吭声。这时我又对那个婆娘说：‘他对你怎么来着?’

这是个俊俏的女人，挺爱说话。

‘什么——怎么来着？一把搂住我，按倒，就那么……我又哭又叫，我朝他那张鬼脸吐唾沫，可他——这个鬼东西……你怎么拗得过他。’

‘这么说，是真……’

‘可不是，就是真……’她说。

‘我们要惩治他哩，’我说。

‘是该惩治，下流胚，’这个哥萨克婆娘哇啦哇啦地说个没完，‘看他那副嘴脸，就不是好东西……该好好整治整治，好让他知道……’

‘不，我们不是整治他，我们是要枪一枪一枪毙他……’

这女人一听到这话，吓得坐了下去，张大嘴巴，瞪大眼睛，两手一摊……

‘是啊，一点不假，我们要枪毙他！’我再次对她说。

‘哎哟哟，怎么能这样呢？’哥萨克婆娘把两手使劲一拍说，‘我的天哪，上帝啊，难道可以杀人吗？……咳，这是怎么啦，上帝啊！’她吓得六神无主，绕着桌子乱转，呜呜地哭了起来……

‘是你自己控告的嘛，现在已经迟了，’我说。

可她说：

‘我控告什么来着，’她说，‘我控告过？……我只是说他追我……他追我，但没追上……’

‘你的意思，是说……’

‘我是要说，他没追上我。这坏蛋到底打啥主意，那我怎么知道呢，’她说，‘我哪知道他想搞……我又没钻到他脑袋里去……’

我瞅着她的脸，知道她在撒谎，可我并不去阻止她，让她撒就撒呗：说不定，对，还可以让斯捷普金留下一条命呢……只要她不声张出去，不使我们丢脸就行了。至于他们俩个到

底搞了些啥名堂，那干我个屁事！兴许是她自己勾引……我心想，她既然哭着为他求情，那她也会对全镇的人去说，她是扯谎，她想叫斯捷普金好看……我又吊她的胃口说：

‘算了，’我说，‘算了，小娘们……事情明摆着，得把他拉出去……’

‘把他拉到哪儿去？’这婆娘又哭又叫起来，‘我不准你们把他拉出去——我就是不准……’

她说完就向斯捷普金扑过去——拖着他，偎在他的怀里，哭哭啼啼，自己直骂自己，说什么也不肯走开，身子好象风吹树叶那样直打哆嗦。

‘你是可以救他的，只怕你自个儿不肯……你的丈夫已经死了两年，瞧你还年轻轻的，脸蛋儿象红苹果……要是你肯嫁给他，这件事就马马虎虎了，否则……绝对不行……’

‘为啥要嫁给他呢？我不想嫁人！’

‘你不想，’我说，‘那我们就不得不照自己的办法办啦。’我说完从椅子上站起来，装着要走开的样子。

‘可他不肯到教堂去举行婚礼呀！’哥萨克女人含着眼泪对我说，‘说不定他连上帝也不信哩。’她嘴里这么说，可还是搂紧斯捷普金不肯放。

而他呢，象条小牛犊，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一动也不动，好象我们讲的事儿跟他毫不相干似的……

‘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管，’我回答说，‘我只要你干脆一句话：和好还是不和好？……’

她松了手，放开自己的未婚夫，笑逐颜开，嘴巴都咧到耳朵根上了……

‘不和好，我们还要吵一场吗？……’她说。

他这个鬼东西也笑了：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晓得有了转机。

我怕节外生枝，就打发他们俩出去，我对他们说，‘你们小夫妻俩还呆在这儿干啥。’大伙儿站在桌子旁边瞅着他们笑，给他们出了各种各样的主意……果不其然，斯捷普金这天晚上又美孜孜地享受了……第二天早上，我把他叫来，对他说：

‘斯捷普金，你听我说：我们让你糊里糊涂地娶了个媳妇，可明天咱们就出发了。就算你们俩真有点难割难舍，你也不能带上这么个小娘们……为了让你赎罪，我给你一个任务：你要立功……只要一有战斗，你就得争取立功，否则我决不会原谅你，一碰到什么事，我就要把你当坏分子来处理……’

‘是，’他说，‘我一定立功……’”

“那么，立了功没有？”费多尔问。

“当然立了：他得了一个银烟盒……用来装马合烟……他干得很出色，一家伙俘虏了二百人——全靠他那挺机枪……他的腿也被打穿了，从那以后他就编入非战斗部队……送到我这儿，整天蹓蹓跶跶……”

“跟那个哥萨克女人后来怎么啦？”

“他跟那个女人有啥呢，”西佐夫笑着说，“那天夜里，他呆在她的家里，她给他烙了饼，让他行军的时候吃，又请他喝了茶……”

“婚礼呢……”费多尔笑着问。

“谈啥婚礼……”西佐夫一挥手说，“这桩事儿，提都没提，还有啥婚礼！她把自己看作他的救命恩人，坐在那里一个劲儿

叨咕她怎样救了他的命；可他呢，闷着头又吃又喝，一个人顶上四个人，一句话也不说，要说，也是乱弹琴……第二天一早队伍刚出发，他正好准时赶到……”

话头转到性欲问题上，都说前线上强奸的事是难免的。他们举出了一些例子，回忆了一些往事。恰巴耶夫对这个问题顶感兴趣，他一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战士能不能丢开女人，在前线呆那么两、三年……接着他自己下结论说：“一定要做到，否则他还算个什么战士呢？”

他们离开西佐夫，来到什马林旅部。如果西佐夫羡慕恰巴耶夫的荣誉，想和他并驾齐驱，那他的确有充分的理由立这样的壮志，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真正的、了不起的英雄。而什马林，这个人真是瞎卖力气。他总是忙个没完没了，很少休息，跑来跑去，每分每秒都在考虑这个，惦记那个，甚至在睡着了的时候，脸上也流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最糟的是他专爱吹嘘自己那些无中生有的功绩！每次碰到人，大概总要吹上一通。的确，每次讲的时候，说法有所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总跳不出什么受伤、遭暗算、冲锋这一类情节，只不过有时少一些，有时多一些。一般地说，他有六、七件功绩背得滚瓜烂熟，吹这些功绩，那是他最大的乐趣。他讲的时候，简直上气不接下气，自己也陶醉在那急剧发展的事件中，赞赏那些事件的迂回曲折，惊叹自己刚刚虚构的那些事件的意外离奇。在讲的时候，他总是奇怪地揪着自己一绺浓密的黑发，弯下身子，挨近桌子，低得鼻子都碰到了桌面，用两个手指——中指和食指，不知为什么使劲地合着讲话的节拍，敲打着桌沿，敲得很响，

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他不是对在座的人，而是对这张桌子在说教，在训斥，在指导。

起初，什马林讲什么，有人要听，甚至也有人相信，可是到后来，知道他讲的话里假的要比真的多上三倍，于是就不再听他瞎吹了，也不再相信他讲的话了。不过你可别以为他讲的都是凭空杜撰的东西。不是的，他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实际发生过的事。他糟糕的不在这里，而是在别处：如某人刚好在某次战役中表现得很勇敢，或者很有天才，结果呢，这些事都成了什马林亲自干的了。然而后来一查，这些事是在左翼发生的，而他什马林当时正在右翼转悠呢！当时表现出卓越天才的是个营长，而什马林指挥的却是一个团，喏，都是这么一类杂七杂八的事情……他这个人就喜欢把别人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不过，这种人，费多尔看到的也不算少了，何止什马林一个呢。他们认为窃取别人的英雄事迹，据为己有，冒充自己的来炫耀，是最便当，最省力的事，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一到什马林这里，他就要拉开话匣子！他信口胡诌，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你就洗耳恭听吧。他可以从头天晚上一直讲到第二天早晨！他讲的一定是被敌人"包围"了，一定是从哪里向哪里"突了围"，尽管大家都知道，昨天在他那一段防线，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战斗。他的两翼一直受到"严重威胁"，友邻各旅从来不支援他，甚至还给他增添麻烦，他们总是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抢夺他的胜利果实，赢得表扬、赞许、甚至奖赏。可他什马林这个真正的英雄，却被人们遗忘了，不理会他，不表扬他，很明显，把他看作一个碌碌无能的小人物了。人们哪里知道，正是他什马林，才是那些被别人窃去并据为己有

的丰功伟绩的缔造者。

现在我们的几位朋友从西佐夫旅来到什马林这里，告诉他西佐夫俘虏了一批敌人。什马林用心地听着，突然把那个大巴掌急速地往那没有洗干净的黄脸上一按，好象在沉思中漫不经心地说：

"是啊，是啊，是这么回事……嗨，他们还能往哪儿逃呢？我早就料到，他们无处可逃……"

"谁无处可逃？"恰巴耶夫问。

"就是西佐夫抓的那批俘虏呀。恰巴耶夫同志，您可知道这些俘虏是打哪儿来的吗？我早就把他们打哗啦了。我的右翼战线上发生过战斗，您还记得吗？没错吧？我把他们打得那样惨，他们还能往哪儿跑？只好当俘虏……"

什马林有个很坏的习惯：喜欢贬低别人的功绩，即使得不到一点好处，他也要这样干。

恰巴耶夫一看什马林又要吹嘘"昨天的成就"，就向他提出了一个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使他无法逃避，也无法搪塞：

"你们旅的防线上有啥情况？"

他们走进司令部一间小屋子，被烟熏得黑漆漆的，发着一股又酸又臭的味道，好象人们就光在这里抽烟，用烟臭熏屋子似的。在什马林旅部工作的是一些精明干练的同志，他们帮助他工作，不是因为怕他，而是出于自觉。什马林虽是个瞎忙的牛皮匠，危险的幻想家，但他对师部交下来的任务一贯执行的还不错。作为一个执行者，他确实不坏，只是没有一点儿创造性，没有什么主动精神，自己不善于创造出任何东西，只会坐等现成的命令。他的眼力也不行，碰上什么情况，他看不见

关键性的或重要的问题。

旅部的人员都是经过锻炼的，他们摸透了恰巴耶夫的脾气，把情况讲得详详尽尽，用不着什马林再来补充什么。弄清情况以后，恰巴耶夫立即决定去巡视这个旅的三个团，三个团都在进攻。什马林留下副旅长，自己也跟着去了。

在旅部听了敌我双方人数的汇报，查看了地图上标出的河流、道路，绿色的森林，栗色的丘陵——恰巴耶夫把这一切都非常清晰的印在脑海里了。他边走边向什马林下指示，小土岗后面应该布置些什么，附近森林后面应该埋伏多少兵力，大概在什么地方涉渡。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很清楚。他们走到十字路口，两三条道路交叉在一起，恰巴耶夫用不着多想，就能选定一条路策马走下去，他很有把握，就象走在某个小城市里的熟悉的街道上一样。他很少走错过路，几乎可以说从来没有过，只有走进环形路或碰上死路，他才要稍费周折，即使这样，他也能毫不费力地兜出去：向四面望望，踏上几步，琢磨琢磨，回忆一下各个转弯抹角的地方，路上的各种标记——那就走吧！夜间辨别道路比较困难，白天几乎是从来没有出过错。善于在各种情况下分析判断，这是他不容置辩的天才，我们这里没人比得上他，所以恰巴耶夫说了就算数。

他们来到第一团。第一团分散在一个个刚刚挖好的又小又浅的掩体里。其实这算不上什么掩体，只不过是一些很单薄的工事，就象用硬纸板搭起来的玩具房子一样：上面堆上一小堆土，土堆上插些松枝，把头藏到里面，分不清是藏在松枝下面，还是藏在小土堆后面，这些小土堆就象树林里田鼠洞旁边的小土堆一模一样。也许敌人把有些地方的树枝干脆当作了

灌木丛，也许敌人根本不想来惊动我们，不想挑战，所以丝毫不动声色，没有开枪，虽说他们离的很近，就隐蔽在土岗后面。

炊事兵爬着把饭菜拖到掩体里。他们肚子贴着地面，双手伸到前面，捧着饭盒或汤盆，象条虫似的向前爬呀爬，从厨房开始就用两肘和双膝着力，一伸一缩地向前爬。战士们吃好饭，休息一会儿，又发起进攻。休息的时候，有的捧着书，有的拿着报，都是些老掉牙的旧报纸，已经快揉烂了，上面尽是斑斑油污。他们伸开四肢，趴在地上，把头藏在树枝下面，面孔严肃，神态自若，将书或报捧在鼻子跟前阅读，阅读的神情跟平时差不多，就象在乡下过节时，为躲避着七月的炎热，藏在自家园子的角落里看书一样。

恰巴耶夫、费多尔和什马林从散兵线后面走上来，可敌人并没向他们开枪。这使恰巴耶夫不由得思索起来。

“敌人真的在土岗子后面吗？有谁知道？也许刚才在那儿，现在走了？”他对什马林说，“喂，去侦察一下！”

侦察队从几个方向爬了过去。有两个侦察兵已经爬到土岗，爬到顶上去了，开头身子稍稍抬起一些，再抬起一些，再抬起一些……直抬到整个身子全站立起来了。他们回来报告说，山坡上一个人也没有，敌人一定是从土岗后面的小树林里溜走了。

他们又往前走去，爬上最高点，举起望远镜向四下观察。

“你们看，”恰巴耶夫指着说，“看到树林尽头了吗？依我看，他们想从那里迂回我们。”

“他们迂回不了的，”什马林说，“我们一连追了他们三天啦，还敢再回来？他们但求上帝给他们的脚底下抹上点儿油

呢！”

“他们到第四天也会给你抹上点油，”恰巴耶夫很严肃地对他说，一面继续转动望远镜向四下瞭望。

“他们是回不来的，”什马林仍然很轻率地坚持说。

“要是他们回来了呢？”恰巴耶夫严厉而又很不满意地说，“如果他们的指挥员不是个傻瓜蛋，他就会懂得，假如在你的后方搞一家伙，就是逃跑也会便当得多。等你把部队集合起来，你到哪儿去找他？真是个饭桶！你可要多钻研钻研，多动动脑子啊！你以为敌人会象一粒豆子那样，在你跟前滚来滚去吗？”

什马林张嘴结舌，一声不响。恰巴耶夫指示他要做些什么，预防敌人迂回包抄，并要他留在这里，情况不弄清，不要离开。他和费多尔要到另外两个团去了。

不管走到哪里，不管碰上什么事情，他都能发现该纠正什么，怎样纠正，什么地方该给以帮助，怎么帮助。当他们来到什马林旅最右翼的第三团时，什马林派来一个传令兵报告，发现敌人果然在迂回运动。但是敌人知道自己行动早已被发现了，又沿着来的方向缩回去了。什马林最后在自己的字条里郑重地写了一句话：

“我毫不迟延地粉碎了敌人的全部罪恶企图，没有损失一兵一卒……”

大家想想看，这根本用不着去“粉碎”：因为乌云已经自行消散了。

他们在第三团停下来过夜。团部设在一个村子里，四面派出了哨兵。有一队红军，按散兵线布置在村外，对着敌人

方向，挖了一条半圆形的战壕，防备敌人夜袭。几个人住在一间简陋的农舍里，点着一盏破油灯，要费老大的劲儿才能看清对方的面孔。大家累坏了，都懒得讲话，有的蜷缩在屋角里，有的躺在床板上，都想找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睡上一觉。他们象黑色的幽灵，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蠕动着。

正在这时候，带进来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团部的人要审问他，怀疑他是探子。开头问他："你是干啥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去干什么？"男孩说，"他爹妈都没有了，在上次战争的时候，死在什么地方了。他自己是从波兰逃出来的难民，现在编入'红军志愿队第三营'"。当时谁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营，因此对他更加怀疑了。

"你叫什么名字？"

"热尼亚。"

"你不是说过你叫阿廖沙吗？"有个人想捉弄他一下。

"请您不要乱讲，"男孩很坚定的，而且是带着一种天赋的自尊心说，"我从来没对您说过我叫阿廖沙。这是您自己瞎编的。"

"嘿，小家伙，你的话太多了！……"

"我有话为啥不说呢？"

"别废话，说正经的，是从白军那里来的吧？喂，快说，你装什么蒜。你说了就没事儿。"

"我什么也不说，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他颤抖着声音顶撞逼问他的人说。

"哼，哼，别撒谎了。你讲的什么营，这里根本就没有……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你还是讲出来好，你是干什么的，到哪

儿去?"

就这样试探着问了好半晌,想弄清楚他是什么人,敌人派他上哪儿去,去干什么的。

他们又威胁又吓唬,还说要枪毙他。

"哼,好吧,你们枪毙吧!"热尼亚含着泪水说,"只是不该……我是自己人……你们搞错了……"

费多尔决计要过问这件事。他一直躺在那里听,想看看这次审讯怎样收场。现在这男孩子是不是自己人,他不管了,他想救他,留在自己身边,必要时,对他进行再教育。他叫他们不要再审了,拉过这个面露喜色的小家伙和自己并排睡在地板上。(后来费多尔真的把热尼亚教育成一个优秀的、有觉悟的青年;在旅部和团部担任通讯联络工作。)

团部里又静下来了。油灯在冒着黑烟,睡着了的人们从角落里发出呼呼的鼾声和嘘嘘的哨声。窗外那些为了防备万一没有卸下鞍鞯的马儿喳喳地咀嚼草料。在大家准备睡下的时候,什马林从团部骑着马赶来了,他决定去"巡视"一番,看看是否都已安排妥贴。他从房子里走了出去,究竟去了多少时间,后来谁也记不清了,但到快天亮的时候,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向敞开着的门里大声喊叫,象说绕急口令一样:

"快啊快,敌人进攻了!!!"

大伙儿腾地跳起来,霎时间都上了马。

"敌人的散兵线到山上了,只二百丈左右!"什马林气喘吁吁地说,一只脚怎么也踏不进马镫里去。烈性的战马,象陀螺似地直打转转,不肯就范。什马林一扬手,使劲地朝马脸上打了一下……

他们打着马冲出大门。幢幢人影在朦胧的晨曦中向着四面八方窜去。他们到底往哪儿跑呢，简直弄不清；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是向各处乱窜。跑出大门，立时分道扬镳，连一句话也没说，确实连说句话的功夫也没有啊。有些人沿着大路飞奔下去——那是逃跑，逃活命……恰巴耶夫迅速想出对策，他向驻扎在不远的一个预备营奔去。什马林，还有克雷奇科夫，他们向迎面攻上来的敌人散兵线冲去，他们猜想红军散兵线在敌人的压力下一定正在往后退。克雷奇科夫和什马林一起朝上冲的目的，是要阻止退下来的红军，并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励士气。这时克雷奇科夫脑海里刷地一闪，猛然回想起当初在乌拉尔斯克和安德列耶夫争论的情景，他们争论的是在慌乱中散兵线、防御、参加战斗等问题，想到这里，立刻充满了骄傲、喜悦的心情。

"一场虚惊……弄错了……山上是自己的散兵线！"

"停下！"什马林突然放开嗓门喊道。

这命令究竟是对谁下的，闹不清楚，因为他身边也没有什么人了，只有几个战士在四下里跑来跑去。他们立即派人去追恰巴耶夫和向大路奔去的人。追的人又叫喊，又打枪，才使这些人勒马停下来。过了十分钟，大家又集合在一起了。

这一阵混乱、叫喊、枪声，全团都听见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还以为被敌人抄了后路，要采取紧急措施了。战士们竖起耳朵听着，低声地议论着，作着准备，还打算向各方面再派出侦察队，后来接到正式通知，说这是一场虚惊，才放下心来。大家又都回到屋子里，虽说时间还早，但已经不想再睡了，围着桌子坐下来瞎聊，大伙儿骂骂咧咧，到底骂什么人，谁也说

不清。骂什马林？不能骂他，他既然已经发现有危险，那就有责任把大家喊起来，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去核对一下。

是骂自己吗？不能，也不能怪自己，听到敌人的散兵线已经攻到眼前，还有谁在屋子里坐得住，那岂不成了怪物？末了，都认为惊慌是难免的，所以也就不再追究了。尽管谁也不该负这个责任，但都好象有点难为情，有点尴尬：说话迟迟疑疑，三言两语，彼此不敢正眼对看，眼睛只朝对方的头上望，朝旁边望，望着窗外，望着那黑洞洞的空间……

“差点儿乱成一锅粥，”什马林说，他伏下身，就着桌上的油灯抽着烟。“真搞不清，到底是谁骗了咱们……”

“是谁告诉你的呢？”恰巴耶夫问他。

“我从团部出去……迎面碰上……”

“碰上哪个呢？”

“就是记不得了，我不认识……他从我身边跑过去了，我一看，真有散兵线冲过来，还看到了点什么……大概，我想……”

“不能‘我想’，应当弄清情况！”恰巴耶夫严厉地说，“俺们也遇上过这种情况，你知道吗？不是现在，是和德国人打仗的时候，在喀尔巴阡山上。那是真正的山，不是这种小土岗子：只要一爬上去，下来就不那么便当……俺们就那么爬呀爬呀，可是奥地利人埋伏在每一个洞子里，有的还躲在岩石后面，藏在灌木丛中，趴在沙堆里。一句话，他们是呆在自己家里，该躲藏在什么地方，用不着你教他们……俺们把队形拉开，象逛市场一样。他们从屁股后面敲打俺们，把辎重全劫走了……要是有大炮，也会给抢去的。那一次，俺们把所有的辎重和大炮夹在当中，四面护卫着，就这样向前走。马不够用，只好用

牛，可牛这个鬼东西，在夜里一叫，那就等于给敌人自送情报……你还不能用枪托打它，一打，它叫的更凶…… 如果有面包，你塞给它一小块，可以叫它安静一会儿……面包一吃完，又糟了。这次是在夜里翻大山，要到第二天早晨……侦察队报告说，'没有什么，可以走。'大家集合好就出发了，把牛拉的辎重车都夹在中间……在这种漆黑的夜里走山路，走过的都知道是个啥滋味。有啥好说的，没有比这更倒霉的事了。你看见前面黑糊糊一大片，那是夜色，什么也……我们静悄悄地走着，只听得见石块顺着山坡往下滚，一直滚到底……夜里走路，什么幻觉没有啊！好象有人趴在树底下等你。好象也有人坐在树上……明明是块大石头，可你却以为有个人站在朦胧的夜色中……嗨！真见鬼，不管你的胆子多么大，你还是直打哆嗦。夜里走路是很吓人的，说不定什么地方会钻出什么东西来：要开枪，看不见目标，要跑，又不知道往哪里跑，好象落到包围圈里了……指挥吗？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个指挥法！只好坐下来等吧，等敌人来揍你的后脑勺。要是换个地方，你自己撞上敌人，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你闹腾一阵，就可以撒腿溜啦……可是一到山里，两眼一抹黑，有啥办法？俺们就这样走啊走的，正走着，不知道前面哪个人象是发现了敌人……他啪地一枪，可是没有反应。他又打了一枪，这一枪，马上乱了套，自己人打起自己人来了……山路很窄，俺们是一个跟着一个走的……前面响起枪声，后面也乱放起来。不大功夫，人们突然从山上往下跑，跑啊跑啊，因为已经有人被打死，倒下去了，可枪从哪儿打的呢，看不清……大家都往山下跑，山下是辎重、马匹、牛群，牲口受了惊，也奔跑起来。人畜一齐往

山下涌……往回里一反冲，就跟后面的人马车辆撞在一起……相互践踏，乱作一团，骑马的和步行的都走不过去。又没有别的路可走，没有地方可躲，只好从人身上踏过去。而那些在下面的人，以为山上冲下来的是敌人，就对着他们开起枪来，一边跑，一边打枪。回头一看，就是一枪。哎呀呀，死的人可真邪虎啊！但到底因为啥呢？就是因为一场虚惊……是谁告诉你的，他对你说了些什么，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情况——你去看一看，不能马大哈，不该乱叫：'哎呀呀，不好了，敌人的散兵冲上来了！……'"

"为什么要喊，绝对不能乱喊，"什马林顺口答音地说，好象他不懂恰巴耶夫就是冲着他说的，"一喊，什么乱子都会出来！"

"着啊，着啊！'一喊'就要……"恰巴耶夫见什马林在要花枪，很不自在，随即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

"我以为，"费多尔插嘴说，"碰上这种情况，怎么也免不了发生惊慌……怎么也免不了……不管你当时怎么想，怎么做，那都不行……就拿你刚才讲的情况来说吧……"

"是啊，那次简直是死路一条，"恰巴耶夫同意说。

"死路一条……这是自己找的死路！"费多尔继续在讲自己的想法，"打仗不能惊慌失措，要反对惊慌失措，要防止惊慌失措。那么该怎样防止呢？鬼才知道！每次都有它的特殊原因……就拿喀尔巴阡山的这次事件来说吧，我认为应当把出类拔萃的战士派在前面，最出类拔萃的……侦察队也要派出类拔萃的，派那些在夜里什么也不怕的……而且应该事先规定好，怎么打枪，各种标志、信号……只能按信号行动，不能随

什么人乱来……"

"问题完全不在信号上，"恰巴耶夫打断他的话说，"信号……那些马啊牛啊的都吓惊了，信号顶个啥用？问题是不该把它们夹在当中……夜间行军不能这样干……真的，这种行军根本不该干。"

"这不对。为什么不该干呢？完全可以嘛，只要事先组织好……"

"嗨，都组织好了！"什马林笑起来了。"组织得再好没有了……"

他的怪笑和驴唇不对马嘴的答话，打断了恰巴耶夫跟费多尔谈话。他们既不想睡，也不想坐，而且再也没有必要留在这里……天已蒙蒙亮了。外面还是跟夜里一样冷，四周静悄悄的。村里的老乡在深更半夜也跟着受了惊，这时都安稳地睡着了……恰巴耶夫站在台阶上，等着勤务兵把他那匹未卸鞍的马牵过来。费多尔自己在备鞍子。几分钟以后，他们扬鞭打马，又顺着昨天来的那条路出发了。

十二　前　　进

恰巴耶夫师正从北面迂回别列别依，但并没有奉命占领这个城市。当时，所有的指挥员都有这样一个弱点：喜欢攻打较大的据点，而且总想显示一下自己是积极参加占领这些据点的。在内战时期，作战的目的，不总是为了歼灭敌人的有

生力量，多半是为了扩大地盘，特别是想占领重要的、有名的城市。其实，这种倾向本身不仅有军事意义，而且也有政治意义：每一座大的中心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同时也是一个广阔地区的政治中心，它落到白军手里或是红军手里，对这个区域的政治情绪的涨落，都不是没有关系的。正由于内战时期的政治是军事行动的基本动力，因而双方都想尽快地占领中心城市。

别列别依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中心城市，然而，它是联接其它城市的战略要冲，所以有一定的意义。恰巴耶夫师右翼的一个旅正在双方决战的关键时刻逼近了这座城市，投入了这场战斗，和友邻师一起进了城。一进城，两个师就吵了起来，互相提抗议，争个不休：这个城市实际上是谁夺取的，是谁第一个进的城，是谁表现了机智、勇敢、天才等等。既然两支部队同时占领了同一个据点，这种争吵就没完没了。恰巴耶夫本人不参加这些争论，他把这桩麻烦事交给了旅长波波夫，波波夫很起劲，出色地显示了他的外交艺术。

部队部署在乌先河的北岸，待机行动。河这边是红军，河对面是白军。这样对峙了几天。大家在休息，养精蓄锐，准备决战。恰巴耶夫等得很不耐烦，骂起街来，骂个不停，他很不满意，认为在乌先河上停下来是犯罪。

“干啥要休息？”恰巴耶夫大喊大叫。“有哪个笨蛋在前线休息的?!究竟有谁需要这种休息？八成就是司令部需要吧？”恰巴耶夫刻薄地说，他暗示，司令部里有人可能会叛变，有人故意拖延红军部队迅速、胜利地向前推进……

红军的行动确实也不怎么快。总是停停歇歇，一会儿作

准备，一会儿又重新部署，一昼夜平均走个八到十里路；有几个多事的人，专作这种统计，把数字告诉恰巴耶夫，使他更加恼火。

"老子不乏，老子不累！"他用拳头敲着桌子吼着。"俺要求休息的时候，再让俺休息，现在应当前进……敌人在逃跑，要'跟踪'追击，不该在河边歇腿……"

"嗳，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有人对他说，"你只谈自己一个师……你这个人真怪……可是别的师呢？他们需要整顿、调换、补充，前线上要做的事很多哩。你不能光在自己一个师上'打算盘'，以为你一个师能包打……"

"你以为包不了吗？"恰巴耶夫目光炯炯地一闪眼说。"有谁帮过俺什么忙？见过谁帮过俺哪怕一丁点儿忙……哼，去他妈的，帮个屌！……俺一个师保管能拿下乌法，只是别来碍手，别来干涉……"

"你指谁——别来干涉？……"

"谁也别来干涉。俺自己干，"他回答的口气已经有点儿软下来，好象恍然大悟，发觉话说得不大对头似的……

这种大大小小的别扭，闹得真不少。在到达乌法以前，尽管恰巴耶夫师节节胜利，可是他对战役的进展并不满意。他总觉得他没有充分的用武之地，别人夺了他的主动权，不倾听他的呼声，不考虑他的意见。

"他们在那儿看啥，看地图？"他在自己人面前嚷着。"咱们可不是在地图上打仗，咱们是在地面上……咱们是在地面上打仗，活见鬼！"恰巴耶夫愈讲愈激动。"咱们全都知道，咱们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咱们只需要援兵，用不着什么指示！"

“你又错了，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克雷奇科夫劝他说。“一切行动必须协同，必须配合。”

“那你去配合吧，”恰巴耶夫打断他说。“谁不让你去配合啦？俺是说，不要干涉俺……现在应该是跑路的时候，可你瞧，咱们却在乌先河上过起什么节日来了……”

“过什么节……算了，少说这些话吧，”费多尔反驳他说。“由于急躁，已经出了不少乱子了……经验教训啊……”

“就这样坐着吗？”恰巴耶夫气冲冲地责问说。“就坐在河边干等吗？眼看着高尔察克撒腿溜掉吗？好吧，老弟，这样的仗你自己去打吧，俺可打不来……居然有人想叫各师的部队大调班，难道现在是调班的时候吗？”恰巴耶夫埋怨说。“难道这是战士们的要求吗？是他们有意见吗？哼，见鬼！……俺不干了，俺还是去指挥俺那个支队……到那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这儿……”他使劲地啐了一口唾沫。

“你对调动不满意，”克雷奇科夫还想劝说他。“真是个怪人！那是有道理的，在这个节骨眼上，上面不是凭空一想，就来个大调班……也许大伙儿真的累坏了，困倦到了极点？……”

“嘿，嘿，嘿……”他把手一摆。“谁也不累……昨天俺遇上一个红军战士……一个人在树林里一颠一拐地走着，俺一看，他从头到脚都裹着绷带，又瘦又小，象条咸鲱鱼。‘你怎么啦，上哪儿去？’俺问他。‘我呀，’他说，‘回部队去。’‘那你怎么走起路来象个瘸子？’‘挂彩了，’‘为啥不去治疗呢？’‘没有时间呐，’他说，‘同志，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啊，要打仗……将来打死了，’他说，‘躺在坟墓里，那儿没事可干了，我再去治疗……’他自己笑着说。俺端详了他一番……嗨，俺心想，这小

鬼，有种……俺把手上的表摘下来，递给他……'喏，给你，'俺说，'戴上吧，记住恰巴耶夫。'看样子，他一时没认出俺来……他顿时高兴起来，瞧，他直摇手，不肯接表……好半晌才接过去……俺走了，他还站在那里，望啊，望啊，直到他看不见我……你看看，这些个疲劳了的人……有这样疲劳的人，一定能把高尔察克那群王八蛋打个鼻青眼肿！……"

"是啊，这样的人不少，"费多尔赞同说。"也许，还占大多数，可他们也还是会疲劳的……"

然而，要想说服恰巴耶夫是非常困难的。你就是抬出伏龙芝的话来，也不顶事，虽然他对伏龙芝非常尊敬。

"可是命令不经过伏龙芝点头，不会发下来吧！这可不是单单那些将军一签字就算数的！"

"说不定，就单单是他们呢？"恰巴耶夫低声地反驳说，又象是在猜想。

"那怎么会呢？"

"就会嘛……咱们的命令，高尔察克比咱们人知道得还早……你看看吧……"

"这些话你从哪儿弄来的？"费多尔惊奇地说。"也许，咱们的命令，有一两件，确实落到了高尔察克手里，可是，你也不能因此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呀，瓦西里·伊凡诺维奇……"

但是，同他争辩是没有用处的。恰巴耶夫依然固执己见：要改变他对"司令部"的看法是不可能的，他至死也不会相信他们……

清晨，他们穿过茂密的树林，向达夫列卡诺沃进发……一

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蹚过一条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沿着稠李飘香的小径，军马碎步前进。宁静的山路，已经洒上点点阳光，虫鸣鸟语，充溢着春天早晨清新的气息……他们从密林中穿出来，到各旅各团去看望红军战士，战士们身上很脏，生了虱子，吃不饱，穿不暖，显得非常困倦……离乌法愈近，敌军愈是拚命地抵抗。凡是在有利的地带，他们总要抵挡一阵，尤其是在山区，他们集结一小股一小股突击队，进行反冲锋……他们不肯丢弃辎重，把它摆在前面，事先运走，并派大部队护卫：显然，他们不愿意用这批辎重供应红军！

部队前进，一天比一天困难。破获了一批间谍：为高尔察克效劳的有他自己的密探，有富农，经常还有鞑靼人，鞑靼人受了骗，轻信了许多谣言，相信什么布尔什维克是特地来推翻他们的真主，拆毁他们的清真寺……当红军部队进入鞑靼人的村子时，常常有人从窗子里朝他们开枪，开枪的是当地的鞑靼人，他们不是什么有钱人，而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穷人。抓了一些……怎么处理呢？办法各种各样。有的就地枪决，打仗可不能讲客气啊！有的交给鞑靼族的红军战士“谈心”。这些战士用很短的时间，就对同族人讲明了红军为什么打仗，常常有人听了一番简短的谈话，就自愿地加入了红军……红军经常抓到间谍……

在达夫列卡诺沃，红军战士报告费多尔，说在团部的辎重车上有一位姑娘，是路上抓来的，她要求把她带到乌法附近，她要和红军队伍一起进乌法城，她的母亲、姐妹和亲戚都在城里。

“把她带到我这儿来！”克雷奇科夫命令说。

那位姑娘被带来了。她大约十八、九岁……瘸腿。刚从中学毕业……穿得很破……她讲了好多乌法的情况……她想快一点到乌法去……丝毫没有可疑的地方。但是克雷奇科夫却本能地感到有点儿不对头——没有任何理由，任何根据，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他决计试探试探，他想："我弄错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把她放了，也就完了！"

他同她谈了好半天，扯了些无关紧要的闲话，突然盯着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

"您受伤很久了吗？"

"很久了……那怎么说呢……不……您怎么以为我受过伤？"

"您走路一瘸一拐，"费多尔肯定地说，并且死死地盯住她的眼睛。

旁边坐着军政治部主任特拉林同志，他坐着，默默地看着这一场别开生面的审讯。

"嗯……是啊……"她吞吞吐吐地说。"腿么……是……但已经很久了……很久了……"

费多尔明白：必须迅速地、接连不断地向她提问题，打乱她的思路，不让她思考怎么回答，不让她蒙混过去。

"在哪里受的伤？什么时候？"

"去司令部送公文的时候……"

"战斗离得很近吗？"

"很近……"

"您干过他们的密探？"

"没有，没有干过，我干过打字员。"

“胡说，撒谎！”他突然大喝一声。“告诉您，我全都晓得了。懂吗？全都晓得！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我们的侦察员把您的情况全都告诉我了。把您的证件交出来，马上交出来……就是用一张小纸头写的——知道吗？……”

“什么纸头？”她胆怯地问。

“就是那张很薄很薄的……您知道，象香烟纸一样。嗯……快！快交出来。他们怎么给您写的，我们的侦察人员都知道。快一点！……”

费多尔死盯着她，对这意料不到的结果感到惊奇。这姑娘一听到纸头的事，完全慌了手脚……大家知道，当密探的都发一份用一小片薄纸做的证件，他们把它藏在衣服褶子里，鞋后跟缝里，塞在耳朵里，嘿，藏哪儿的都有。

姑娘掏出来一个烟嘴，拧了三下，从里面取出一片纸头，这片纸头是卷起来紧贴在烟嘴壁上的。上面写着她的姓名、父名……

这个战果不小……

接着对她正式审讯：先是在师部，后来又交到军部。当时伏龙芝同志正巧来到军部，也审问过她几次。她供出了许多重要情报，她还说，红军里有些侦察人员同时也为白军情报机关工作。这批两面派很快清除了。她提供的许多材料，都很有用……

这样的案子破获过好几起，就是都不如这一次重要，不如这一次顺利……有一回，有个上校的老婆，因间谍嫌疑，被关在浴室里。随后又把一名能干的共产党员推了进去，叫他冒充白匪军官，这个“蠢婆娘”跟他乱讲，泄漏出不少重要消息。

部队向奇什马挺进。很明显，这样重要的据点，敌人是不肯轻易放弃的：这里是两条铁路支线的接轨点，一条是萨马拉-兹拉托乌斯京斯克线，一条是伏尔加-布吉利明斯克线。离车站十里路远的地方，挖了几条又深又整齐的堑壕，并构筑了十分牢靠的掩蔽所，有几条暗壕直通山谷，还有几条弯弯曲曲的交通壕通到山脚下。一片小树林已经砍光了，场地也清除干净了，准备让骑兵埋伏在这里，堑壕前的空地上围起了带刺的铁丝网，象是长满了爬山虎……无论是在布古鲁斯兰近郊或者别列别依，都没有这样的工事；特别是那些堑壕，挖得这样讲究，构筑得如此坚固，已经很久没有碰到了。看得出，敌人作了充分准备。

攻打奇什马的是西佐夫旅——也就是拉辛、多马什金诺和普加乔夫三个团的战士。在最后的几里路上，战斗接连不断，愈来愈频繁。愈是逼近奇什马，战斗愈是激烈。几次冲锋都被打退了，敌人也三番五次发起反冲锋。然而，敌人已经预感到这场战斗的胜负已成定局，甚至在他们打得最凶最猛的时刻，他们也没下夺取胜利的决心，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们缺少趁胜扩大战果的拼命精神。他们只是回过头来咬一口，而对于夺取胜利连想都不敢想。

你们可能见过吧？有一只小狗垂着头在街上奔跑，后面另有一只蛮厉害的大狗有恃无恐地扯住了它的尾巴，紧紧地追，猛扑，咬住不放……在前面跑的那条狗，压根儿没想回头拼个死活，它只能回过头来咬一下，有时会咬到一口，甚至咬得很凶，但这毕竟不是决斗：一心想跑，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高

尔察克军队在奇什马这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正是那条回头咬一口的小狗。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反冲锋，似乎都只是为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撤走辎重车……好象作战的只有后卫部队和阻截部队，他们掩护着那些已经撤退到前面某个地方的部队。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参加战斗的是大部队，基干部队，主力部队。但是，他们在布古鲁斯兰战役之前就失去了主动权，现在怎么反扑也夺不回来了。那种致命的“瓦解”的局面在高尔察克军队里扩大了，加深了。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笼络、惩罚、镇压，都已经不能制止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在白军的所有部队里，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迅速瓦解的局面，但在高尔察克部队里，出现这种局面，除了共同的原因之外，还有它的特殊原因，这就大大地加快了这种瓦解的过程。首先，高尔察克“不加选择地”强征居民当兵，过于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其次，他想利用一小撮忠于他的干部，来维系、团弄这支匆匆忙忙纠集起来的大军，他也必然会放手让这一小撮人去镇压自己的“军队”。种种虐待士兵的老办法，在高尔察克部队里重新使用起来，而且比在白军其他任何部队里都更加厉害。军队成分的复杂、军官的残暴，是促使高尔察克军队加速瓦解过程的两个原因。

有一次战斗之后，克雷奇科夫弄到满满一包敌人的文件，其中有高尔察克司令部的电报、命令、指示和调查报告。文件上写着：“在最短期间，将未达训练标准的士兵，全部集中一地，准备用火车运走，务派军官押送……”“务派军官”这四个字妙极了：证明他们对自己的“虔诚基督军”怕得要死。

然而，白军的处境更加严重，更加困窘：原来，对军官也不

能一味的信赖，说不定，他们也会投降红军。有过这样一个例子。十来个红军骑兵突然和敌人的散兵线迎面遭遇。敌人方面有一百二十名士兵，两名军官，一挺机关枪。看来，不要费多大的劲儿，就可以把这些骑兵俘虏，或者一下子把他们从马上撂下来！可是结果呢？两个军官对自己的士兵喊道："不准开枪！"他们迎着骑兵跑过来说：愿意带着全体士兵到红军方面来……请你们注意：那正是拼命宣传"布尔什维克残忍"、对白军军官毫不留情的时候，可他们并不害怕，下定了决心，投奔了红军……

嘿，回来后，骑兵们替他们向自己的指挥员那个苦苦求情啊，好象自愿投诚的人真的会遭到什么危险似的。

两名军官中，有一个是办事员，另一个当过乡村小学教员。他们讲了好多关于高尔察克军队的"纪律"的情况。军官和士兵谈话，稍失检点，就要枪毙；要严格遵守军人礼仪和军队等级制度，如有违反，就要严惩。高级长官怕自己的"部队"简直怕得失去了理智，军官和士兵哪怕是随便闲聊，他们也认为是恶意"宣传"。在下级军官中，人心不稳，他们和上级明显不和，矛盾重重，而且日益加深。这两个军官所讲的情况，无疑是确实的。费多尔把他们所说的话和缴获的文件作了核对。

一个师长在一份命令上写道："我命令监视弗拉索夫中尉"。在他的另外一份命令上说："军官马尔科夫、朱克、利津佐夫曾企图和士兵们交谈，要严密监视"。还有对军官的函询、询查的材料，这些都是用特务手段搞的。

高尔察克军队内部，显然不妙。即使在军官中，纪律也松松垮垮，不少电报说到军官不听话，不执行命令。为了保持军

队的"士气"，高级长官采取了恶劣的欺骗手段：把红军的胜利说成是自己的胜利，在命令里和传单里，把红旗至少已经飘扬了一个星期的那些城市和乡村说成是"自己的"。他们的军队当然会弄清真相，这样一来，甚至对完全确实的消息也就根本不相信了。

一句话，高尔察克军队十分明显地、毫无疑问地正在分崩瓦解。红军有力地加速了这种瓦解的过程。他们把一车一车的宣传品运到白军后方，通过居民、空投和自己的宣传员，散发了几百万份宣言、通告和各种号召书。红军宣传员深入到敌人控制的内地，直接打入白军士兵里去，大胆地、一心一意地开展自己的豪迈的工作。

说是这么说，可是战斗有时候还是很激烈，很残酷，这就推翻了对白军已经开始瓦解的种种估计和猜想。投入这场激烈搏斗的是白军中最死硬的部队；他们与一般的部队相比，人数并不多，但是打起仗来刮刮叫，武器装备也刮刮叫。奇什马一仗，非常猛烈，红军的各个团里，有些连队只剩下了三、四十人。他们打起来不顾死活，个个争先，猛打猛冲！他们拿着手榴弹扑向装甲列车，铁路上躺满了尸体，他们高喊着"乌拉"，追赶这种钢铁怪物，象甩小球似的，把一个个厉害的白色瓶状手榴弹，向装甲列车投去。当装甲汽车出现时，散兵线上的士兵，都脸朝下，趴在地上，把头贴着地面：装甲汽车不打"倒在地上的人"，就这样，避免了伤亡……装甲汽车穿过散兵线，到红军的背后转了一圈，扫射了一阵，但是一无所得。可是当它回头跑的时候，战士们也象追赶装甲列车一样，跟在后面，向他们投掷白色瓶状手榴弹。

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简直到了发狂的程度，在奇什马战斗中，不少红军战士牺牲在装甲汽车和装甲列车的机枪火力下。

在奇什马，战斗结束后刚过二十分钟，战场上硝烟尚未散尽，四下还不断传来敌我伤员的呻吟声，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奇什马象往常一样，又恢复了生机。那些被枪炮声吓坏了的农民，都从地窖、地下室，从仓库、堆房，从炉灶底下，从阁楼里，从旮旮旯旯钻出来，围着困倦不堪的红军战士忙碌起来。女人的叽喳声和水桶的相撞声交织在一起，茶炊扑扑地喷着热气，杯子和匙子、罐子和碟子，叮叮珰珰地响成一片。家家户户，人声嘈杂，有的在讲故事，有的在交谈。回忆过去的生活和所见所闻，闲唠这些日子里的遭遇和希望……吃饱了饭，喝足了茶，有些地方，竟玩起跳背游戏来了，你会以为：聚到这里来的不是刚刚打完仗的弟兄，而是从远近村子里赶到这里来欢度盛大祭礼节日的……

晚上，斯捷潘·拉辛团里举行合唱晚会。有二十五名歌手，里面有许多人嗓子很好，糟糕的是：一个劲地打仗、行军，没有功夫练嗓门！大伙儿都顶喜欢唱，每次打下来，那怕是停下喘口气儿，这些歌手用不着召集，就自动地凑在一起，围在他们敬爱的指挥身边唱了起来。那些爱好唱歌的也围拢来，不一会儿，团里几乎有一半的人都来了……这时候，再不能让几个人唱下去了，得唱大家会唱的歌儿，于是全团齐声唱起来了……他们唱了好多首歌，但是最爱唱的是赞美斯捷潘·拉辛和叶尔马克·季莫菲耶维奇的两首歌子。他们也哼了几首快乐的舞曲。这时候，有个专爱尖声尖气唱假嗓子的人，调皮

地挤挤眼，狡黠地皱皱眉，用最高的调门唱了起来：

> 你呀，我心爱的杜尼什卡，杜尼娅！
> 你呀，我心爱的杜尼什卡，杜尼娅！

接着，一阵宏亮的合唱：

> 哎哟，你呀，杜尼娅，杜尼娅，杜尼娅……
> 杜尼娅，我心爱的杜尼什卡，杜尼娅！……

大伙儿随着节奏拍着手，踏着脚跟，不过这只是在"原地踏步"。有的人没等把第二段唱完，刚唱到：

> 哎哟，你呀，杜尼娅，杜尼娅，杜尼娅……

突然有两三个跳舞迷按捺不住，一下子跳到中间，跳起舞来……跳得满头大汗，晕头转向，差点儿晕倒……一批接着一批，不停地跳着……

唱歌还不算，又拉起手风琴来了……跳起舞，拉起手风琴，往往把合唱挤掉了，这多半是因为唱够了，嗓子唱哑了……

跳得特别来劲的是部队的"知识分子"——粮秣管理员、后勤人员、文书……但是，营长和连长也不示弱，跳起来也很厉害！

唱、跳常常轮换交替，唱呀，唱呀，到唱得声嘶力竭了，就跳；跳得精疲力尽了，喘口气再唱。这样，直到他们的嗓子和两条腿实在累得不行才罢休。

最近几个月里，他们唱熟了两支新歌，他们最喜欢里面的副歌，唱起来劲儿十足，精神振奋。谱是旧的，词是新的。第

一段副歌是这样按旧谱写成的：

> 演奏家，响亮地奏一支胜利曲吧，
> 我们胜利啦，敌人逃呀，逃呀，逃呀……
> 为了人民委员会
> 我们高呼：乌拉——乌拉——乌拉！

第二段副歌传遍了整个红军：

> 为了苏维埃政权，我们勇敢地投入战斗，
> 万众一心，为了她，在斗争中牺牲……

主歌歌词并不怎么样，好的歌曲还没有出现，可是这支副歌……这副歌非常动听。

“来吧，唱一支《万世流芳》的歌，”人群中有人提议说。

歌手们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难道真的要唱吗？”

“为啥不……”

“领唱的人过来，领唱的！”

一个身材高高的，背有点儿驼，脸上有几颗麻子的小伙子，从人群中挤出来，站在中间，没有说什么，就用浑厚的低音唱了起来：

“上帝保佑，太平幸福，祛灾除难，逢险化夷，万事如意，打败敌人，赢得胜利，我的上帝！”

他停住了，向周围扫了一眼，好象说：“喂，该你们唱了，”站着的人拉长嗓音欷歔歔歔地唱：

“上……帝，保……佑……”

“全俄罗斯社会主义红军，她的领袖和同志列宁，”领唱的接着有力地唱下去，“第二十五步兵团全体英勇的指挥员，斯捷潘·拉辛第二百十八团全体人员，万一世一流一芳！”

齐声合唱：“万世流芳”……

“……炮兵、骑兵、电话兵、摩托兵、机枪手、爆破手、迫击炮手、飞行员、侦察员、步兵、传令兵、炊事员、屠宰员和全体辎重人员，万一世一流一芳！……”

接着又齐唱“万世流芳”——唱得和谐、愉快、宏亮。大家都很高兴，脸上露出了微笑，两眼射出得意而又自豪的光芒，说：“这不是从哪里抄来的，是我们团自己谱写的！”

领唱人把嗓子压得低低的，用更加阴沉的调子唱道：

“上帝保佑：西伯利亚的最高统治者、迫害全体劳动人民的暴君、白军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将军阁下和他那些上帝庇护的圣徒——耶苏会总主教、大主教、主教、强盗、间谍、特务、贪官污吏，佩带金肩章的将校，以及他那些党羽，白色高尔察克崽子，受愚弄的混蛋，奉承拍马的走卒……捷克老爷们，长眠地下，永世安息……遗一臭一万一年！……”

这支用嗡嗡的鼻音，拖长声调的大合唱，简直变成了送葬曲。听来令人恶心，仿佛真的闻到一股死尸的臭味。

“所有反革命分子，”领唱人打断了大家的歌声，接下去唱最后一段。“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形形色色的白色社会党人、野心家、保皇党人以及其他冒险家、叛徒、奸商、投机分子、怠工者、抢劫犯、逃兵、大腹便便的银行家，让这帮混蛋，从早到晚，永世安息，遗一臭一万一年！”

站在这里的红军战士也同合唱的人一道，拖长声音，唱起

了“遗臭万年”。

唱完以后，大伙儿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好象等着谁来喝采似的……在团里，大家都以能唱这首赞美歌感到非常自豪，大家也很爱听这首歌，有时候，接连听上三四遍。

他们唱呀，跳呀，一直闹到深夜。第二天早晨，天朦朦亮，又出发了！夜里没有睡好，也无所谓：他们踏着习惯的步伐，轻快地前进了！

奇什马是乌法的咽喉。通往乌法的道路现在扫清了。一切情况表明：敌人要退到白河彼岸，而且要在那里进行顽强抵抗。

红军部队更迅速、更坚决地追击退却的高尔察克军队。

“现在乌法逃不脱咱们的掌心了，”恰巴耶夫说，“只要右边不拆台！”

他指的是从右翼进攻的几个师。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大家问他。

“因为高尔察克再没有什么可抓挠了，他只好滚到西伯利亚去。”

“可是咱们曾经有萨马拉可抓挠呀，”有人反驳恰巴耶夫说。“后来不也跑啦！”

“咱们是有过抓挠……唉，那是因为啥呢？”他表示同意，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他不知所措，想找一些理由，但又说不清楚。他回答说：“去他娘的，管它咱们有过啥抓挠……可是他们是没的抓挠了……咱们准保能拿下乌法……”

大多数人都有这种胜利的信心，尤其是普通的战士，信心更足。每当各团提出和讨论关于目前可能发生的情况和战斗

结局等一类问题时，战士们只是估计日期和时间，向来不分析敌人的有生力量、技术装备、训练程度、抵抗能力。他们只是这样谈论和估计的：

“星期二早晨进入这个村子，傍晚前到达河边。如果桥没炸毁，晚上就可以到达对岸……如果炸毁了，最快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到达……星期三晚上就应该通过那个火车站，星期四就……”等等。

他们好象是一般行军，前面没有敌人，准确地计算了日期和时间，什么时候应该到达什么地方。他们的估计很少有差错，到达的时间，一般总是比预计的要早。占领乌法的日期，就比事先规定和预计的要早。

红军行动之快，有时是惊人的。红军战士吃苦耐劳的精神，令人叹为奇迹。战士们不知道什么是障碍，他们不让任何东西阻挡他们前进。在奇什马战斗中，他们拿着手榴弹冲向装甲列车，这充分表明了红军战士是难以阻挡的。由于攻打奇什马有功，现在上级发来了奖赏，要分配给各团。但是，出了一桩怪事。那个英勇顽强、战功特别卓著的团，不要奖赏。那些该受奖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说，他们全团指战员都同样勇敢地、忠诚地保卫了苏维埃共和国，在他们中间没有好坏之分，胆小鬼早就没有了，假如有这种人，弟兄们自己就把他们收拾了。“我们不要任何奖赏，”他们说，“我们团里，大家都一个样……”当时，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精神如此振奋，情绪如此高涨，真是令人惊讶！他们看问题好象特别简单，直接了当，一点儿私心也没有：

“为什么我要突出？让我和大家一样。我的同伴哪一点

不如我，又哪一点比我强？他要是不如我，就帮他改进，他要是比我强，就帮我改进，不就得了。”

早在一九一八年，在普加乔夫团里，有三百名战士组织了一个特殊的“公社”。他们没有什么私人的东西；所有财物——衣服、鞋袜，都是公用的，每个人只穿戴他当时最需要的衣物……军饷和他从家里捎来的一切物品，也都交公……在战斗中，这伙人特别齐心，紧紧地抱在一起……由于他们打起仗来完全不顾死活，现在这些人当然有的已经牺牲了，有的已经残废了。

这个团拒绝接受奖赏，是他们轻视特殊的最明显的反映这种态度是他们全师的特点，其中包括大大小小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那一天，至少是那些聚集在政治部里的同志，他们一致要求和他们完全打成一片的克雷奇科夫向党中央委员会发一份反对奖励制度的抗议书，说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原则性看法。大家议论了一下，发了下面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当我们给一个英雄团授奖的时候，红军战士们提出抗议，拒绝接受奖赏，他们说，他们大家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同样地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因此不需要任何特殊，全团战士愿意一律平等。这种高度的觉悟，使我们共产党员应该通盘考虑一下红军中建立的特殊制度。任何时候也不可能选出优秀人物来，因为不可能定出一个统一的评定标准。有的人表现非常主动；有的人有先见之明，拯救了几百人的生命；有的人英勇、坚毅、沉着；有的人无比勇敢；有的人工作一贯细致，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等等，难道能一一列举出来吗？

坦率地说，奖常常发得莫明其妙。有时候，是用抽签方法决定的。为争奖，打过架，斗过殴，发生过流血冲突。我们认为，奖赏会产生极端恶劣的影响，会起瓦解部队的作用。它使优秀的战士彼此嫉妒，甚至憎恨，它使人们互相猜忌，诽谤中伤，会引起流言蜚语，说什么搞复旧，走老路，等等。

它使得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干出卑贱、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事来。我们还没有听到一个受奖的人说，他因为得了奖而高兴，他珍惜这种奖赏，高度重视这种奖赏。这样的事没有过。随便和谁交谈，指挥员也好，普通的战士也好，他们都对这种奖赏制度感到愤怒，提出抗议。当然，如果以后还要发奖，就只好按老办法处理。如果把它彻底取消，请你们放心，绝不会有人惋惜，只会感到高兴，而且会舒畅地松一口气……

这封信发到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这封信里有许多提法是不正确的，天真的；不是从国家全局看问题，调子拔得太高，有点矫揉造作。但是，这一切都是真心的，发自肺腑的，是符合时代精神和时代特点的！

刚过了几天，又给中央委员会发了第二封信，紧接着又发了第三封，——关于第三封信，以后再说。

第二封信的口气和第一封信一样。内容是关于新定的军饷等级问题。原来在向乌法挺进的时候，虽说部队有时要挨饿，但总的来说，粮食供应完全可以过得去，因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可以从居民那里搞一点。只有在因为某种原因，运输完全中断，而部队的进展又快，部队经过的那些地方又全被破坏，烧光，杀光的时候，部队才吃不上饭。是的，这时候确实够呛！

在前线，往往根本没有地方好花钱，对于那些不特别喜欢钱的人来说，钱倒成了累赘。在那些岁月里，精神境界都很高，思想品质看得非常重要，大家处事对人，都谨慎小心，一丝不苟，即使是地位很高的大干部也不例外，他们对最细琐的小事也从不马虎。

一个政治委员，穿得和普通的红军战士一样朴素，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行军时，和战士们一样受累，在战斗中，总是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冲在前面！优秀的政治委员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但是，偶然也混进一些投机分子，这些家伙抱着自私的目的、贪生怕死、完全不能适应这种特殊形势，他们也就自然地从红军中淘汰出去了：有的被赶跑，有的被调走，有的干脆公开地或者偷偷摸摸地开了小差。共产党员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这不是不费力气轻易获得的。凡是最艰巨的工作，最复杂的战斗，共产党员总是一马当先，而且有任务又多半落在他们身上。我们知道，在一次不大的，但是打得很激烈的战斗中，死伤的有十五到二十人，其中有一半或四分之三是共产党员。

因此，我们再重复一遍，那时的“平等”倾向相当严重，甚至是最合法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拒绝领取特别津贴，把多余的钱交给团里的出纳，自己用的和战士们领的一样多，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常见的。要求“平等”的情绪太强烈了，有一次，费多尔和恰巴耶夫竟然很严肃地讨论了用什么方式使全师的人在谈话时，彼此以“你”相称。

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是：

当时地位较高的负责人，几乎经常用“你”来称呼红军战

士，这并不是抱什么轻视态度，而是自然地认为，在战斗的、严峻的、残酷的环境中，用“您”称呼，完全是一种多余的世俗客套。这种“客套”话乍听起来，甚至有点荒唐，至少在那时候是很不合适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自己就是工人或农民；他们长期在工厂或农村，对待自己的伙伴一向随便惯了，所以对待战士，自然也很随便，哪还用得着贵族老爷们的礼貌！他们随便，所以战士们对他们也随便。

在团里，平常大家彼此称“你”。可是对团以上首长，情况就不一样了：虽然上级首长对红军战士还是称“你”，可是，战士本人似乎就“不敢”用同样口气回答了。因此，恰巴耶夫和费多尔就“平等”这个问题，召开了会议，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设想和打算，但始终没有得出结论。

当全师都知道，要一律增加军饷……一律增加，就是……没有红军战士的份……现在你们想想看，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首先反对的就是政治工作人员。他们之所以要反对，因为他们确实不愿意把自己与战士们区别开来，还因为各种各样的非难和猜疑总是先落到他们头上，而且比对其他什么人厉害得多。这时候，战士们会对他们说：“你们瞧，嘴巴上讲平等、讲团结，实际上怎么样？”

这些非常简单，极其平常的问题，似乎不应该使他们感到不安，也不一定非要去理采不可，然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政治工作人员自己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也是红军战士，遇上这种情况，他们也要起来反对，不仅不去说服全团的人，而且要担负起办“交涉”、提“抗议”的责任，等等。

听到要增加军饷的消息，各团都骚动起来，抗议书，一张

接一张地送到政治处。费多尔在全师各单位巡视的时候，耳边嗡嗡的尽是对“高军饷”的怨言。你们不要以为真的加了多少，不是的，只加了一丁点儿，可是，在那时候，要知道，任何一点小数目看来都是了不起的。

那些日子里，正在召开全师党的工作会议，由于日益逼近乌法，有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赶快抓紧讨论……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要求费多尔再向中央委员会发一份抗议书，费多尔了解了大多数指挥员也有这种看法以后，又给中央委员会发了一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我现在代表我们师的政治工作人员和一部分优秀的指挥员给你们写这封信。对于你们这次给我们新规定的军饷级别，我们非常不满；非常气愤。军饷定得过头了，太高了。我们要钱干什么呢？往哪儿花呢？除了挥霍以外，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更不用说卢布贬值，物价飞涨等等。有了钱，我们自己就要学会讲排场，摆阔绰，挥霍浪费，或者相反，学会存钱，积蓄大量款子，做个守财奴……可是，尽管如此，红军战士却连半个戈比也没有加。这个情况，党知道吗？是否有异己分子在挑拨我们与红军战士的关系？一直隐藏在红军战士心里的怨言，如今愈来愈清楚地说了出来。在彼得堡和其他饥饿的战线上，也许需要高军饷，可是我们要它干什么呢？这里的面包和黄油几乎跟白送一样。好不好划分几个地区，按地区定军饷标准呢！我们甚至想把政工人员和红军战士的军饷拉平，现

在反而又给我们增加了军饷。狼肚子，无论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也填不饱的，可是我们用不着填，即使挨饿，也不会离开战斗。

这封信还是很诚恳、很热情的，但不够严肃，有些话肯定是过头的，如"讲排场，摆阔绰"。其实，在前线上怎样讲排场，在行军和战斗中又怎样摆阔绰呢！

这封信只是一点儿小小的暗示，希望能有所改进，而这些"带刺的话"，当然只能理解为"俏皮话"。再说说中央委员会吧。为什么他们把这个问题直接提到中央委员会，而不提到军部，不提到前线机关，不提到红军中央机关呢？显然是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普遍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师或者是一个军的问题。再有，他们最信任中央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到了虔诚的地步，相信他们的请求一定会成功，甚至马上就会有答复……

另外，他们在信上加了一段附言，叫人看了莫明其妙。这说明他们多么天真幼稚呀！

附言说的是军里演出节目和举行音乐会缺少材料的问题。结尾是这样写的：

务必敦促有关单位"生产"新的剧本、优美的歌曲以及用散文和诗歌形式写的真正艺术作品。如果已经出版（我们尚未见到），就请同志们催他们赶快发到前线来！

这里看出，他们只相信中央委员会万能，而对某些军事"最高机关"完全失去信心。多么天真啊！那时候，他们蹲在前

线上，可不懂得文艺作品是不能下命令“生产”的，它需要“孕育”，需要发育成熟，到一定程度才能创作出来。但是，要等着按常规“生产”文艺作品是等不及的，也没有这种耐心。既然没有办法，他们只好遇事走着瞧，做到哪里算哪里。工作中常常发生分歧，争吵，多余的干涉，不必要的抱怨、威胁和惩罚。

拿红军中的“妇女问题”来说吧。关于这个问题，不知说了多少遍，下过多少次书面的和口头的命令，结果怎样呢？实际上，总是“斟酌办理”。曾经有过命令——不都是公开的和正式的——要把所有的家眷和妇女干部从军队里统统撵走。这种突然刮起的“清除”风，是有充分的正当理由的：不仅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带老婆，而且各团红军战士也有带老婆的，她们成群地跟在部队后面，带上一大堆家俱，有的还拖着孩子……这一批庞大的“后方部队”都要乘坐公家的马车啊！想想看吧：要有多少辆农民的大车经常被这种非生产性的工作所占用！另外，还有这样的理由：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女人们经常争吵，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大吵大闹，这样的事在军队里简直无法避免。既然军队不得不成年累月地过着特殊的、与外界隔绝的生活，许多必不可少的东西又得不到，她们怎么能不吵呢！

其次，妇女，特别是妻子，常常逼着丈夫花不少时间去关心军事问题以外的事情，关心与行军、打仗毫不相干的私人事情。同时在女人中间又常常混进间谍和密探。总而言之，有很多原因，不得不就妇女问题发布一些特别命令和指示。但是，当这些命令要开始贯彻的时候，又引起了一场风波。首先起来反对的是各团里的人，特别是当他们知道师里的妇女一个也没有动以后，闹的更凶。最后，好歹总算解决了。接

着，开始清理机关，但是，要赶跑这部分妇女，可和团里清除几百个红军战士的老婆完全不同啊。怎么能把工作上需要的，而且确实没有人能代替的女工作人员赶跑呢？怎么能，又为什么要把团里的那些女卫生员、那些象普通战士一样拼死拼活地去战斗的红军女英雄赶跑呢？为什么要把那些工作需要的，而又不够用的女政工人员、女共产党员、女护士、女军医赶跑呢？可是命令一下来，就要求确切理解，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有一回，几个出身于纺织女工的红军战士，气喘吁吁地跑到费多尔这里来，要求他主持公道，因为团里要把她们赶出来。她们急急忙忙地对他说，她们里面有四个“不要脸的烂货！”但她们已经自动地把这四个人开除出去了，并且把她们打发走了。费多尔只好亲自到团里去，向有关的人说清楚，把她们留下，不要清除她们。

这个问题，连师的领导人自己也没有闹清楚，可想而知，它已经复杂、混乱到何等程度了！

西佐夫旅抢在波波夫旅前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克了奇什马。进攻奇什马的任务本来是由波波夫旅承担的。波波夫率领三个团一直溯捷马河而上，沿着列利-库利湖前进，当奇什马攻克时，他已经靠得很近了。

在前线，从别人手里抢得一个不大的胜利，往往会成为一场重大惨祸的肇因。有些指挥员冒险蛮干，想通过一次突然有力的袭击，获取意外战果，因而把友邻部队所担负的一部分任务抢了过来。他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打乱了整个部署。这

种胜利，倒不如没有好！胜利不一定总意味着成功，它可能带来恶果。

比如，本来的意图是由两翼向敌人纵深迂回，以便完全包围和全部俘虏敌人，这个时候，突然有个愣头青，迎头猛打敌人的正面，把敌人吓跑了，打乱了全部行动计划，自己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无疑会使更大的、更重要的策略遭受损失。现在，同样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当西佐夫冲进奇什马的时候，在他的后面，在捷马河岸上，却留下了敌人的几个团。要不是波波夫率领自己的部队及时赶到，西佐夫会遭到敌人一顿痛打。恰巴耶夫师的互助精神非常突出，一个部队能坚决、迅速地援助陷入困境的另一个部队。但是，并非时时处处都是这样，也有相反的。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当然是惨重的。

波波夫一经弄清情况，立刻投入战斗，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趁敌人内部陷入混乱，把敌人一步一步直逼到河边。炮打得十分猛烈，三门炮都打坏了。敌人被赶到捷马河对岸去了。撤退时，他们把所有的桥梁都炸毁了，看样子，他们是不打算回来了，拚命地向白河①逃跑。那边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落脚点，奇什马是最后一个据点，在向乌法撤退之前，高尔察克部队本想在这里抵挡一阵，可是他们的情绪，看来，已经一蹶不振了，往后只能有组织地撤退，不敢妄想在这个河岸上为"扭转败局"打基础，可是他们并没有停止叫嚷，对扭转败局依然抱有希望，就象当初红军指挥员在布祖卢克和布古鲁斯兰近郊时一样。

---

① 乌法位于白河岸上。——译者注。

十三 乌　法

敌人退到了河对岸，炸毁了所有的渡口。各师各军在又高又陡的乌法河岸上，架起了大炮、机关枪，子弹上膛，刺刀出鞘。在这里集结了很大兵力：高尔察克不甘心放弃乌法地区，他占据白河右岸的有利地势，居高临下，严密监视着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红军各师。

红军指挥部预计从两侧合围，占领乌法。右翼各师的任务是插入敌后，直捣阿尔汉格尔斯基工厂。但是，前进遇到了困难，这时候还没有一个战士渡过白河，而其他部队已经抵达河岸。

恰巴耶夫师逼近了乌法。它的右翼波波夫旅已经停在一座横跨白河、直通市区的大桥前面；它的左翼插到了红亚尔村，这是白河下游大约二十五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庄，到达这里的是什马林和西佐夫两个旅。

当左翼部队在红亚尔村渡河直逼乌法城的时候，波波夫旅应该从大桥附近渡河支援他们。这座大铁桥依然完整无缺，但谁也不相信，敌人会留下不动它；大家估计，桥上一定埋下了地雷，因此，不要从桥上通过。从陡峭河堤下来，通过大桥的一条铁路，有几个地方被炸毁，桥中间停着几节车厢，上面装满了碎石和垃圾。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渡河，只是在后来，战士们不知从哪里弄到几只小船，又拖来一些圆木

和木板，捆在一起，搭了几只不大结实的轻便木筏。

决定还是从红亚尔村方面进行主攻。维霍里的骑兵驰上河岸。这时，在离红亚尔村不远，有一只拖船和两只小火轮正在白河上慢悠悠地行驶。乘客中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最多的当然是军人，其中有三十来个军官。他们那种无忧无虑的神情，令人难以理解，使人感到奇怪，好象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人从岸上袭击他们，也许压根儿不知道红军已经近在咫尺了。红军骑兵看到甲板上有戴肩章的"老爷"，也不由一楞。这些军官一下子也没弄清楚，准是把红军当成了自己人。

"停住！"岸上下了命令。

"干吗停住？"船上喊道。

"把船停住，要不就开枪啦！……船靠过来！"骑兵吼。

这一下，船上的人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拚命加快速度，想朝着一片烂泥塘驶去，因为岸上的骑兵去不了那里……骑兵一发现这一着，威胁地吼叫起来：

"停住，停住！！！"

船继续朝前行驶。甲板上首先开了枪。骑兵也开枪还击。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打响了。战士们扛着机枪赶到了，哒一哒一哒地扫射起来。船上的人号叫着，拚命地往船舱里钻，哪儿能躲，就躲在哪儿。轮船靠岸了。军官们不愿意活着当俘虏，几乎都开枪自杀了，也有的跳进滚滚波涛……这几条小船真正成了红军的宝贝，它们在红军横渡白河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使红军指挥部一下子摆脱了困境。他们把船藏了起来，不让敌人发现这样的宝贝已经落到了红军手里。

在进攻的前两天，伏龙芝、恰巴耶夫和费多尔乘汽车来到

这里，立即召集各级指挥员、政治委员开会，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当前战局的特点，估量和权衡各种可能性，反反复复地核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夺取胜利的把握。

伏龙芝有一个出众的特点，这个特点首先能帮助他从看来最紊乱、最复杂的事情中找出头绪来：他经常召集有关人员，开不拘形式的座谈会，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最主要的问题，而把次要的问题暂时搁一搁，激励大家各抒己见，引起大家争论，引导讨论纳入正轨。等大家都说完了，最后，伏龙芝自己再来估量一下刚才提出的各种可能性，综合一下，协调一下，然后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个办法，看来很简单，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用得好，而伏龙芝在任何场合都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现在，师的头头们都集聚到红亚尔村来了，除了要考虑技术装备、兵力数量之外，还要估计此地的特殊情况，考虑兵力的质量。最后，决定由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团担任这个任务。这个决定不是偶然的。西佐夫旅属下的几个团固然获得过不朽的战斗荣誉，论打仗，他们名列前茅，但是，眼前这场战斗，单凭奋不顾身的冲冲杀杀显然是不够的，必须选派觉悟很高的红色纺织工人团来担任。

会议结束了。他们纷纷上马，朝着开始渡河的地方驰去，在离渡口半里路的地方下了马，顺着沙坡，徒步走去。他们注视着对岸，以为敌人马上会向他们打来一阵排枪。但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他们爬上斜坡，举起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对岸，选中了渡河地点，又准确而详尽地商定了渡河的细节，而后就骑上马回来了。不一会儿，两只小火轮开到了将要渡河

的地点；另一只搁浅了。接着，往船上装燃料，钉踏板。

又整整地耽搁了一天一夜，最后的时刻才来临了……经过商定，红亚尔村的渡河事宜由恰巴耶夫亲自指挥，费多尔前往大桥那边，那儿波波夫旅已经进入出击阵地。费多尔将指挥这个战役，直到打进城去为止。他同恰巴耶夫分手了。

从晚上起，红亚尔村边的河岸上异乎寻常地忙碌起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竟能保持肃静无声，也是异乎寻常的。人们象影子一样窜来窜去，一会儿聚集在一起，一会儿消失不见了，一忽儿又集合在一起，但又消失了，这是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团在准备渡河。两艘小火轮上，人挤得满满的，再也装不下了。一批运过去，又来运另一批，又运过去，又返回来。就这样，在一片漆黑里，把全团人马都悄悄地送过了河。午夜早已过去，黎明已快来临了。

这时，驻扎在红亚尔村的几个炮兵连开炮了。他们开炮轰击离得最近的敌人战壕。这条战壕是傍着白河形成的半圆圈挖出来的。几十门大炮一齐向敌人开火。射击的角度早已调正好了，马上显出了成效。在这样猛烈的炮火轰击下，战壕里无法再待下去，敌人发生动摇，陷入混乱，纷纷向下一道防线逃去。侦察员一报告这个情况，炮兵立即停止炮击，逼近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战士们发起了进攻，追击敌人，一直追到新图尔巴斯雷村……敌人狼狈逃窜，已经没有能力在沿路的什么地方设防抵抗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战士们，紧紧咬住溃退的敌人，尾随进入了图尔巴斯雷……部队在这里停下来，需要等一下，至少要等一支援军先渡过河来，一个

团孤军深入是极其危险的。他们在村子里构筑了工事，在同一个时间，普加乔夫团的战士们沿着河岸向亚历山大罗夫卡发起进攻……

拉辛团和多马什金诺团都上了船，他们必须赶快增援先头部队。四辆装甲车运过了河，可是有三辆一下子都翻倒了，撂在路上；后来，骑兵们把它们翻过来，摆好，又继续向前开去了……

这时候，被赶到上游去的敌人，已经喘息过来，又开始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团进攻。当时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光景。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团固守图尔巴斯雷，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佯攻，把敌人赶出了村外。眼下子弹全都打光了，几乎成了赤手空拳，他们不指望很快会得到弹药补充，他们牢记指挥这里整个渡河部队的西佐夫说过的一句话：

“不准后退，记住，后备力量就是刺刀！”

是的，现在，那些纺织工人手里，除了刺刀，什么也没有了。因此，当敌人不再佯攻，而是真正发起全面进攻的时候，散兵线动摇了，战士们顶不住，退了下来。而今指挥这个团的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布罗夫：他是从政治委员职位上调到这里来的。他的政治委员是尼基塔·洛帕里。他们俩骑着马，沿着两翼边跑边喊，要那些后退的人停下来，急匆匆地告诉他们，没路可退，背后是河，渡不过去，必须顶住，坚守，要向敌人冲锋。开始动摇了的战士立刻停了下来，不再后退了。正在这当儿，有几个人骑着马奔到散兵线这里，翻身跳下来。原来是伏龙芝和军政治处主任特拉林，还有几个亲密的……伏龙芝手持步枪一边向前跑，一边喊：“乌拉！乌拉！同志们！冲啊！！！”

所有旁边的人，都认出他是伏龙芝。这个消息象闪电一般，迅速地传到各条散兵线。战士们立刻士气大振，勇猛地向前冲去。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他们稀稀落落地打几枪，子弹不多了，一个个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向着潮水般涌来的敌人扑过去。这种无比高涨的英雄主义精神，如雷霆万钧，冲得敌人的散兵线稀里哗啦，敌人顶不住，扭头逃跑了……西佐夫派自己的几个传令兵寸步不离地跟随伏龙芝左右，他命令说："万一被敌人打死，一定要把他从战场上背回来，背到渡口，送上船！"

几辆马车把子弹从岸边已经运上来了；散兵线刚刚在图尔巴斯雷村外卧倒，就有人爬着把子弹送上来了。在奔跑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正打中特拉林的胸腔。两个战士把他扶起来，架着他下了战场。现在，正是在他那一小块受了伤，而又差点儿致命的地方，有一枚红旗勋章闪闪发光。

战局扭转了，原来的态势恢复了。伏龙芝离开了这个团，和西佐夫一起到了另一个团——普加乔夫团。他们登上小丘、山岗，观察了地形，讨论如何更好地展开战斗，一次又一次地研究地图，细看每一个小点，把它同实地观察到的地点进行对照。普加乔夫团继续沿着河岸推进。拉辛团和多马什金诺团的两个营开始靠拢；他们沿着大路齐头并进。中午，下达了继续发起总攻的命令。普加乔夫团应该继续沿着河岸前进，拉辛团和多马什金诺团的两个营在中间，左翼边缘上的是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团；那时候，他们已经占领了旧图尔巴斯雷，在就地休息。正在这当儿，发现了敌人有几个纵队从北面绕过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团，直向我军心脏插来，威胁我正

准备进攻的中路部队。

“这兴许是牲口群，”有的人猜测说。

“哪里是牲口群，刺刀还一闪一闪的呢！”有的人看出来了。

刺刀的闪光是否看清了，还很难说，可是，谁也不再怀疑，过来的是敌人的部队。有许多问题将取决于这一场战斗。伏龙芝也想参加这一场搏斗，但是西佐夫劝他到渡口去催促另一个师的三个团迅速渡河。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比较好，于是伏龙芝骑上马向渡口去了。没过多久，一颗炮弹在他附近爆炸，他的马被炸死了，他自己也被严重震伤。他虽然受了伤，却没有丢开河岸上的工作，他催促部队渡河，帮助出主意，使一部分炮兵渡过了河。

首先把赫列勃托夫炮兵连调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团。炮兵连配置在散兵线的后面。当敌人第一次攻上来的时候，散兵线屏声歇气，愣着不动。突然，大炮吼叫起来，战士们听到自己的炮声，精神大振，向敌人冲去……

这次进攻没能展开，从北面过来的那一大批敌人，径直向拉辛团和多马什金诺两个营压来。双方兵力十分悬殊，要顶住和击退敌人的进攻，确实十分困难，拉辛团动摇了，退了下来。有一个营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这个营里老战士很少，大多数是新兵，没打过仗的年轻人；全营从阵地上跑下来，撒腿向河岸奔去，其他各营有少数战士，也跟在他们后面奔跑。其余的战士，一边朝逼近的敌人开枪，一边慢慢地后撤。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团在图尔巴斯雷附近拖住了。这时有一部分敌人向他们扑去。西佐夫骑马赶到赫列勃托夫跟前。

“赫列勃托夫，拉辛团正在撤退，要支援他们一下！把炮调过头来，狠揍右边那些追击我后退部队的敌人！……”

赫列勃托夫开炮了。这位久经考验、久经锻炼的炮兵专家，以杰出的智慧，高超的技术，准确的目力，一举创造了奇迹：炮弹象雨点似地落在敌人纵队密集的地方，落在敌人的心脏……敌人陷入混乱，不再追击，就地停下来，而且渐渐向后撤退，可是，炮火愈来愈猛，愈打愈密，仍旧准确地落在敌人的队伍里，一片一片的敌人被炸倒。敌人的进攻被挡住了。拉辛团战士的士气又振奋起来。这时候，米海洛夫正在河那边协助恰巴耶夫指挥渡河。他看到一大群红军战士向河岸跑来，知道事情不妙，跑到恰巴耶夫面前，准备报告，但是恰巴耶夫已经全知道了。他刚刚和西佐夫通过电话。

米海洛夫结结巴巴地正要向恰巴耶夫报告看到的情况，恰巴耶夫已经向他下命令了：

“米海洛夫，听我说！咱们刚刚才渡过一个营……那边需要兵力……一个营不够……要把那些退到岸边的赶回去……懂吗？都象他们这样，只有死路一条。你去，把他们带回去，叫他们跟着你。懂吗？”

“是！”说完，米海洛夫就过了河。

他没有多说，而且也没有功夫多说。他对那些往回逃的人，不是用鞭子乱抽，就是晃着手枪拦阻，边堵边喊：

“不准跑！哪里跑，往哪里跑？站住！要活命，只有向前冲！少废话，跟我来！谁敢逃跑，子弹就进谁的脑袋！看到有人逃跑，旁边的人就可以把他打死！跟我来，同志们，冲啊！！！”

这简单干脆，而在当时又非常需要的几句话，制止了混

乱。逃的人停住了，不再在岸边乱跑了，他们向米海洛夫靠拢来，惶惑地、胆怯地、而又抱着希望地望着米海洛夫：

"好厉害的指挥员，你真的能救我们吗？"

是的，他真的救了他们。在这样危急的时刻，不用鞭子和子弹是不行的。他制伏了他们，又带着他们前进。队伍按建制编好，乱哄哄一群人，又变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军队。现在，往下退的拉辛团两个营和多马什金诺团的战士们碰上了他们，欣喜若狂地喊叫起来：

"救兵来了，救兵来了！"

在这紧要关头，倘若说出实情，就意味着犯罪。他们真的说是救兵来了。于是，退下来的几个营调过头来，发起进攻……但是没有取胜。只不过是把敌人赶跑了，刚把他们赶跑，敌人的主力又追上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团。这个团突然受到严重压力，敌人用几个团的兵力，发起四次冲锋，都一次一次地被他们打退了。战斗中，战士们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他们守住了阵地，顶住了敌人的冲击，没有后退一步，一直坚持到自己的部队赶来增援，这才使严重的局面有所缓和……

必须把沿着河岸前进的普加乔夫团调回来，免得被敌人切断。他们接到了命令，开始往回走。敌人本来一直保持沉默，大概在诱他们深入，这时候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冲锋。普加乔夫团遭到一些损失，且战且退…… 他们同敌人不断厮杀，不断打退敌人，但是并没有进行反冲锋，因为急于要尽快退到自己部队的防线。

当所有的部队重新拉到大路上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

说恰巴耶夫头部负伤，现在西佐夫受命指挥全师……沉痛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各个团，弄得大家垂头丧气……在这里打仗，战士们虽说没有看见恰巴耶夫，但是都知道他在这里，这里的每次冲锋、进攻、退却，这里的一切，都是他在指挥调动。不管局面多么困难，他们总是相信，会有办法的，困难局面会过去的，象恰巴耶夫、西佐夫这样的指挥员，是不会把他们领到绝路上去的。

听说恰巴耶夫受了伤，一时，大家好象更加沉默了，更加忧愁了……这时候，进攻已经停止了，黄昏来临，双方不得不停止射击。一切都静下来了。部队上空一片寂静。四下都放出了警戒，各处都派出了巡逻队。各个团都在休息。预定第二天黎明以前，开始总攻。

恰巴耶夫在渡口，每隔十分钟，要和西佐夫或者和各个团的团长通一次电话。通讯联络搞得呱呱叫，没有这样的通讯联络，战役不会打得这样漂亮。恰巴耶夫随时都能准确地掌握河对面的情况。对岸部队由于炮弹、子弹不足开始着急的时候，恰巴耶夫已经知道这个情况，船一到，马上把需要的东西先送过去。他经常了解各团的情绪，敌人的活动规律，抵抗力如何，大约有多少炮兵，军官多不多，部队的一般编制情况，他对这一切都很关心，都要衡量一下，都要考虑一番。他时时刻刻掌握着部队行动的线索，通过电话，扼要地提些意见，不时地派出通讯兵下达指示，这证明了他对每个时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敌人的飞机一时搞得他很急躁，但并不是惊慌，而是愤恨：我们的飞行员没有汽油，无法起飞迎敌。大发雷霆又

有什么用，自己的飞机还是照样不能动弹。岸上的一切工作，只好在敌机炸弹的爆炸和机枪的扫射下进行……毫无办法……地面炮火迫使敌机飞得高一些，但是它们并没有飞走。敌人飞机的扫射，给我军造成不少损失。恰巴耶夫也是在敌机扫射时受的伤。子弹打进了他的头部，卡在骨头里……取了六次，都没有取出来。恰巴耶夫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哼地忍受着疼痛。最后，只好给他包扎了一下。送到了离乌法大约二十里的一个小地方阿弗顿。这是八日傍晚的事，预定九日早晨发起进攻……

河岸上的工作顽强地进行着，炮兵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联络工作搞得十分出色，船渡坚持不停，非常迅速，这一切都说明了这次战役协调一致，很有组织，很齐心，很坚定。这里没有个人的功绩，而是体现了集体夺取胜利的意志。这个意志明显地表现在每一项命令和执行命令的过程中，表现在指挥员、政治委员和普通战士的每一个具体步骤和行动中……

夜晚，有一个工人被带到西佐夫这里。他是从白军那边跑过来的。他一再说，明天一大早，有两个军官营和卡佩尔团要来攻打，攻打普加乔夫团，想从这里插进来，切断红军其他几个团，把他们包围，在北面的其他部队支援下，消灭他们。他发誓说，他是乌法工厂的工人，他同情苏维埃政权，冒了生命危险跑过来，特意把这个危急的消息报告给自己的红军同志。他得到这个消息完全是偶然的，当时，他正在白军开会的一间屋子里干活。他发誓说，他说的全是实话，随便用什么担保都可以。大家对他半信半疑。为了以防万一，西佐夫把进

攻时间推迟了整整一个钟头。加强了巡逻。摆好几十挺机关枪，准备迎接敌人。他们把这个工人看管起来，并且对他说，如果消息是假的，白军根本没有进攻，就把他枪毙……

漫长的黑夜，令人难熬。这一夜，几乎没有一个指挥员去睡觉，尽管一天忙碌，已经疲困不堪了。工人说的，大家都知道了，都做好了迎敌的准备。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

两个军官营和卡佩尔团排成几路纵队，悄悄地，既没有说话的声音，也没有武器碰击的响声，黑压压地扑上来了……他们在田野里展开队形，一下子占了很大的面积。看来，他们是想偷偷摸摸地逼近困倦的、睡得正香的红军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大砍大杀，乱扫一通，引起混乱，趁势消灭红军……

这场战斗惊心动魄……红军放两个军官营走近。一声令下，几十挺准备好了的机关枪一齐开火……打得痛快，象刈草似的，撂倒了一大片……一行一行地倒下去，消灭了……战士们从战壕里、小坑里跳出来，向前冲去。军官营被撂倒的死尸一排排地躺在地上，卡佩尔团仓皇逃窜，红军追了他们几里路……这一意外的胜利，使红军各个部队大受鼓舞，充满了胜利的希望。

他们把那位被看管的工人放出来了，热烈而隆重地把他送到师部，大概，又从师部送到了军部……

后来，西佐夫详详细细地给费多尔述说了整个这一段经过（费多尔当时正在桥头波波夫旅里）；还讲述了，获得这次胜利以后，各部队不停顿地、胜利地向前推进；九日傍晚，已经兵临乌法城下。

费多尔和恰巴耶夫分手以后，带了几个同志，骑上马直奔波波夫旅的防地。从阿弗顿方向，大约从二十里以外，就可以看到乌法砂山，山坡上的建筑物，就象一个个小黑点，烟囱象高高的柱子矗立着，教堂的金顶，在太阳照耀下，闪闪发光。他们策马奔驰，踏上一片广阔的林边草地。敌人的炮弹已经可以打到这里，这片草地，敌人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到这里有什么动静，就开火。费多尔他们不再挤在一起，而是鱼贯而行，彼此相隔七十来步，一个接着一个飞快地驰向波波夫旅指挥部。他们越过铁路路基，这里有许多烧毁的、炸毁的、弄坏的车厢，有的歪倒在铁路两旁，有的停在轨道上。这里在小丘后面，有炮兵在向乌法开炮，在树林的后面，有机关枪发出清脆的哒—哒—哒声。

他们来到波波夫这里。波波夫旅部设在离河岸约摸二三里远的一个小站上。这时，指挥员们正在开会，商量渡河的最好办法……讨论决定：什么时候渡河，完全要根据其他两个旅的进展情况，不能轻举妄动，如果从桥上冲过去，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桥一定会爆炸。他们还谈了谈渡河的器材问题——一点儿没有着落，大家分头到各处去找，真的找到了一些。

白河这边的岸上，有两座岗楼；岗楼里摆上一台电报机，架起了电话线。部队隐蔽在大桥两旁河边的草丛里。在他们的后面，小树林那边，有炮兵阵地。决定在这天夜里摸摸敌情，彻底了解一下大桥的情况：是否真的埋设了地雷（旅部得到情报，说乌法工人不准白军炸毁这座桥，也不让他们做炸桥的准备工作）。到夜里十一点，一片漆黑的时候，有一支工人抢修队要到达这里；他们是自告奋勇到这里来抢修大桥的，清除堆积

的车厢，修复拆毁的铁路……已经是十一点、十二点了……工人抢修队还没有到来！直到三点才到，黎明前的黑暗开始渐渐消失……隐蔽在小树林后面的炮兵，得到工人抢修队已经靠近的消息，立刻为他们“扫清”道路，以便开始工作，几个炮兵连瞄准对岸一齐开炮，想把敌人赶出第一道战壕，造成混乱，转移他们对工人抢修队的注意力。但是，估计错了。敌人用更加密集、更加猛烈的炮火回击我方炮火，当第一下敲打铁轨的榔头声刚一响，对岸的重炮就隆隆地轰鸣起来。敌人的瞄准器很不错，瞄得很准，看样子，白军为了迎接红色客人，在这里演习了很久了，认真做了迎战的准备。头里两发炮弹落在桥前面的石柱附近，似乎是为了试探一下目标，用炮火来指示第三发炮弹应该命中的地点。指得很准。第三发炮弹正好落在第一个桥孔的枕木上。轰隆一声巨响，铁轨炸断了，枕木的碎片向四处乱飞。工人们急忙往后一退……他们没能够摸到前面那些黑糊糊的车厢……他们刚刚跑开原来的地方，敌人就迅速、准确地向目标射来。炮弹都倾泻在桥上，正好落在枕木和铁轨上，铁路一下子就炸毁了。工人抢修队退到了岗楼后面，不久又回来了，虽然做做停停，总还是有进展。

当敌人的炮火延伸到这边时，费多尔、卓娅·帕芙洛芙娜、两名女护士和二十多个战士，沿着阶梯爬上去，有的贴着梯子站在梯蹬上，有的趴在堤坡上……突然，他们头顶上方轰地一声巨响，震得他们栽了下来。这一次总算幸运，只有两人受伤；护士立即给他们包扎好，但是两个小伙子不肯离开，坚持要留下来。这伙人从地上爬起来，本能地奔到岗楼跟前，贴着墙，躲在岗楼的后面……一颗颗炮弹从他们头上掠过去，发出嗖嗖

声，吱吱声和隆隆声，当榴霰弹爆炸时，弹片纷纷落在岗楼上，打得楼顶啪啪直响，弹片有的穿透楼顶，有的从顶上弹了回来，噗噗地落在脚旁边。起初大家好象都楞住了，目瞪口呆地站着，一响不响。我方炮兵从林子边上发射的炮火，也从他们头上掠过，他们全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自己的炮弹发出的尖厉的啸叫声，当敌人的炮弹飞过去的时候，他们听得更加仔细。

"是落到这儿还是落到远处？"一个极可怕的念头钻着每个人的心。

啸叫声愈来愈近，愈近愈响，变成一种可怕的、刺耳的轧轧声……就象两块巨大的铁板，互相摩擦，摩的很快，愈来愈快，尖叫着，呻吟着，刺耳的声音令人难受……

"这一颗落在咱们头上还是飞过去？"

突然，炮弹就在头上尖叫。这尖叫声穿过脑袋，停留在耳朵里，象一阵飓风冲进肌肉、血液、神经，使它们急促地颤抖起来。大家不由自主地，赶紧把头一缩，伛腰向旁边一闪，互相靠得更紧了。他们用手把脸蒙起来，好象手掌能挡住灼热的飞快的炮弹似的……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大家一抖，浑身仿佛僵直了一样，四肢一动不动，足足有一分钟，象是在等待紧接着而来的一次甚至更加可怕的爆炸。弹片打在岗楼顶上，它们飞到树叶里，发出刷刷的响声，打断的树枝，噼噼啪啪地掉在地上，掀起一阵急促的旋风。大家屏住呼吸，死一般的寂静，这样过了几秒钟，然后才有人挪动一下，用不大自然的语调说了句笑话：

"过去啦……吸口烟吧，伙计们……"

说来也怪，可怕的一刹那过去以后，几乎总是要说一通笑

话，几乎也从来不谈别的。随后又沉默了，静候着下一次爆炸。这样，足足等了几个小时，一直等到天亮……波波夫几次从那边的岗楼跑到这里来，费多尔也几次跑到他那里去，而后又回去观察情况……始终放不掉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能够断定，这座桥确实是完整无损，哪怕有一个团冲进城去，来它个突然袭击，打得敌人乱了套，就可以支援从红亚尔村进攻的几个旅……

天麻麻亮，炮声停了……他们转到司令部所在的小站上。整夜没合眼，累得要命，很快就睡着了。到了暮色茫茫时分，他们又来到桥边，继续进行试探：大桥是否完整？侦察员已经走到桥当中，但被敌人发现了，机枪喷出了火舌……费多尔和团政委也朝着桥上的车厢走去。他们前进了二百来步，唱起了《国际歌》……看来，高尔察克士兵觉着有点蹊跷，所以没有开枪扫射。费多尔可嗓门地从桥上喊道：

“同志们！……”

他刚一喊出口，机枪又响了起来。他们趴在铁轨上，往回爬……总算顺利。他们爬到最后一孔桥面，顺着梯子上去，跨到岗楼里，又沿着埋伏着散兵线的河岸走去……战士们沿着草丛向四下散开，有的向小树林里爬去，几个人凑在一块，在那里抽起烟来；有的贴着地皮爬到河边，把饭盒盛满水，回来后，一个挨一个地轮流喝着，喝一口水，吃一点面包。常常可以看到，他们从河岸爬下去，把头钻在尖硬的菖蒲里，饭盒盛满水，端在手里，在鼻子跟前直晃荡。

这一夜和前夜一样。接到通知，知道两个旅已经从红亚尔村到达河对岸，这就是说，这里也要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了。

一个又一个侦察队企图潜入对岸，或者即使摸到那些堵塞道路的车厢跟前也行，但是，敌人警觉地守卫着所有可能被人潜入的空隙、缺口……夜，黑沉沉的……河对岸，只有几盏微弱的灯光，一点儿也看不清敌人的动静。两点左右，炮声停止了……四周寂静异常……东方已经朦朦发亮……

突然，一声可怕的巨响，桥被炸毁了，巨大的铁板飞落到水里，明亮的火焰在波浪上闪烁……照得如同白昼……

站在岗楼旁边的人纷纷跳上堤岸，仔细观察河对面，都想弄清敌人在那里干什么，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敌人把大铁桥炸毁？可见，有点蹊跷……兴许敌人已经在撤退？兴许，我们那两个旅已经逼近乌法城？……

大家都心急火燎……时间在消逝。只是在知道两个旅确实逼近乌法城时，才发出渡河的命令。不知从哪里弄来几只小木船，又从草丛里拖出几条绑好的小木筏，放到河里；又推下去一些圆木头，有些人骑在上面，朝对岸浮去……

敌人不断打炮，但是乱打一通。看来敌人非常惊慌，说不定已经陷入混乱。我们的炮兵加强了火力，轰击敌人沿岸的战壕……红军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一个，两个，三五成群地向前浮去，浮呀，浮呀，浮到河边，跳上岸，赶忙在沙地上垒起一个小土堆，趴下去，把头躲在土堆后面，各自为战地开枪射击……

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烤得人要死。汗水如注，渴得不行。

红军散兵线逐渐扩大、增多、壮大，炮火愈打愈猛；敌人的抵抗愈来愈弱，束手无策，士气一落千丈。

“乌拉!!!”战士们一跃而起，向前冲去……攻占了敌人的

第一道防线的战壕，敌人有的被打跑了，有的被活捉了。战士们又伏在地上……俘虏也跟他们趴在一起，这些缴了枪的俘虏，慌慌张张，吓得要死。这样，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离河岸渐渐地远了，愈来愈向城里深入……

红军从四面八方涌进市区……到处是成群的工人，他们欢呼跳跃，表达自己无比喜悦的心情。他们载歌载舞，向英勇的红军部队致敬，他们乐呀，笑呀，禁不住流出幸福的泪水……人们跑到红军战士跟前，拉住他们的衣服，——虽说素不相识，但却是那么亲热，——热情地拍着肩膀，紧紧地握着双手……这一幅幅动人图景，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

穿着油污工作服的人们，一排排站在马路两旁，站在人群的前面；所有这些胜利的幸福，主要也是他们的幸福……可是，在那些穿着工作服和衬衫的人的后面，在人行道上，在胡同里，在栅栏上，在打开的窗口上，在房顶上，在树上，在电线杆上，到处都是解放了的乌法城的市民，他们兴高采烈地欢迎红军。那些满肚子不高兴的人，都跟着高尔察克溜走了。红军部队一个团接着一个团在大街上通过。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刺刀闪着自豪的寒光。他们神态自若，充分意识到自己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他们那风尘仆仆、疲惫不堪的脸上，露着沉着、威严、安详的神色，永远令人难忘！

现在，首先应该马上到监狱去：是否还有人活着？难道都杀光了吗？沉重的监狱大门打开了，生了锈的门转轴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沿着过道……向牢房跑去，向单人牢房奔去……找到一个了，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快，同志们，赶快出去！多么激动的场面啊！被关押的人扑过去，搂住自己解放

者的脖子，那些身体极度虚弱、受尽折磨的人抑止不住，突然号啕大哭起来……这里也象在监狱高墙的外面一样，有喜悦的欢笑，也有喜悦的眼泪。监狱的阴森森的景象却给这次战友相会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深刻的、神秘的、象征着光明的力量……

为了逃避红军部队的追击，白军军官没能来得及把剩下的俘虏全部杀掉……然而，这只是剩下来的……乌法城的黑夜和高尔察克的宪兵——只有他们才能说出我们的大批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每天夜里，他们把我们那些悲愤的同志，成批成批地弄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一去不返了。死里逃生的人后来说，在监狱里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受尽了折磨，那帮该死的白军军官，动不动就侮辱你，毫无人性地、粗暴地拿你开心取乐，而且每到黄昏，你就耽心今天这一夜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

把牢里关押的人放出来以后，立即在四处布置了岗哨，城里派了巡逻队，城郊设了固定哨。没有发生抢劫、强奸以及胡作非为、违法乱纪的事情，因为进城的是红军，红军纪律严明，他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着革命的重任。

就在当天，工人和各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接连派来了代表团，有的是来向他们祝贺，有的是因为城里平静，秩序良好特来向他们道谢……犹太社会主义党派来了代表团，他们来诉说高尔察克军队在这里时犹太居民的悲惨遭遇。没完没了的凌辱和镇压，无缘无故地被关进了监狱。那些佩戴金肩章的流氓，认为在大街上殴打犹太人，是一种最好玩的、又不受惩罚的娱乐……

“如果你们要撤离这里,”犹太社会主义党的代表说,“我们一个人也不留,全跟你们一起走……贫困、饥饿的莫斯科,也比这豪华、富裕的魔鬼世界要好。”

就在这一天,犹太青年开始组织一支志愿队,加入了红军队伍。

师政治部开展了最广泛的工作。在头几个小时内,就散发了大量说明当前局势的传单。满城张贴墙报,师部日报从第二天早上开始就按时出版了。城里各个地方连续不断地组织召开小型群众集会。居民们热烈欢迎演说的人,在集会上,当场把许多演说的人抬起来,向上抛,这并不是赞扬他们的演说才能,而完全是由于太高兴了,感情太冲动了。师部文工团在市大剧院进行演出;全部工作都由不知疲倦的卓娅·帕芙洛芙娜一手包下来了,她忙着搞道具,到处去借服装,张罗演出,自己也登台表演。剧院里场场坐满了红军战士。过了几天之后,受了伤的恰巴耶夫到乌法来了,他到了剧院,代表全体战士上台,向卓娅·帕芙洛芙娜献花,表示祝贺,整个大厅都欢呼起来,拚命地鼓掌,向自己敬爱的女工作人员致敬,这是红军战士给予她的最高奖赏,至今,她念念不忘。

城市立刻活跃起来,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些在白军军官“自由天地”里过着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的人,说到这一切,感受特别深。

其它几个师离开乌法城继续追击高尔察克去了,第二十五师停在这里休息。他们在乌法地区休息了两个多星期,并没有让时间白白地过去。部队经过长期艰苦的行军打仗,在这

里进行了整顿。各级司令部和机关也加了一把劲，处理了一些紧张行军时期积压下来的、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部不懈地工作着；现在由苏沃罗夫接替雷日科夫领导政治部的工作，苏沃罗夫是彼得堡工人，看上去，很文静、很腼腆，但却是一个优秀的、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经常呆在政治部，随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大概他也在政治部过夜。费多尔的助手克莱纽科夫和苏沃罗夫很要好，一有空，就到政治部来，实际上是他们俩一起，趁停留在这里的两个星期，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费多尔只是帮他们出点主意，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他的时间主要都用在处理师的其它机关的工作上，别列别依战斗之后，他和恰巴耶夫才第一次在这儿过问其它机关的工作。

不久，乌拉尔斯克前线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在那里，哥萨克军队接连打胜仗，只是还没有能冲进被包围的乌拉尔斯克城。这些消息都是来自报纸、战报、电报和信件，从信件上得到的消息特别多……红军战士们听说，野蛮的哥萨克强盗洗劫了他们家乡，捣毁了他们的家产。凡是儿子、丈夫、兄弟加入红军的家属，都遭到屠杀和残酷的折磨。各团战士焦急不安，纷纷请求到乌拉尔草原去，发誓要用十倍的力量去打击祸害百姓的乌拉尔地区的哥萨克。

恰巴耶夫和费多尔常常谈起这件事，认为把师调到那里去是必要的，有益的，只是不要有什么特殊情况妨碍调动。他们曾经多次和中央谈起这个问题，向伏龙芝汇报了战士中间产生的思想情绪，除了调往乌拉尔斯克前线以外，到其他任何前线都是不利的。这时候，从那里又逃来一些难民，或者是一些自愿参军的人，他们只肯到“自己的师里”，而不愿意到其他

部队去服役。这种情绪愈来愈严重。中央考虑了这个情况，不久，恰巴耶夫接到了调往乌拉尔草原的命令。各团无比欢欣鼓舞，他们准备行军，就象准备去参加一个盛大、欢乐的游园会一样。恰巴耶夫的高兴劲儿也不亚于普通的战士：他曾经在这个草原上纵马扬刀，转战过好几个月，那里的一切他都熟悉、都了解，感到特别亲切，不象在这里，不象在肮脏村落里那样。全师飞快地集合完毕，随即踏上了征程。

十四　解放乌拉尔斯克

乌拉尔斯克在它的解放者恰巴耶夫师到达之前，长期被困在哥萨克人的包围圈里。保卫乌拉尔斯克的英勇战斗，将以光辉的一页载入国内战争的史册。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乌拉尔斯克的保卫者，光荣地经受了哥萨克的围困，英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自己也不断出击，从各方面牵制了敌人。一批又一批的乌拉尔斯克工人，争先恐后地自愿参加保卫城市的部队，他们挨饿、受累，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是从来不发一句怨言，更没有想到去投降得意忘形的敌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人都知道，要么死，要么活，半死半活是不可能的，当哥萨克的俘虏，实际上就意味着残酷折磨、非刑拷打和枪杀……城里破获了几桩阴谋暴乱的案件，就地潜伏的白卫军，通过当地城防部队的一个头头，偷偷地和哥萨克军队挂上了钩，接受哥萨克的指示，并且向哥萨克司令

部报告城里守军的情况……炮弹、子弹已经消耗殆尽，粮食也快吃光，也许用不多久，红军英雄们就得拼刺刀了，但是一切并没有把他们吓倒，被围困的人们，依然精神振奋，沉着勇敢，充满了必胜信心。当他们得知恰巴耶夫师前来解围的消息，连一点点怀疑的影子也都消失了，更加坚决地、英勇地打退了敌人最后几次冲锋。

在驰援乌拉尔斯克的途中，虽说零星小接触每天不断，但是并没有打过大的战斗。哥萨克军队早在一九一八年就知道恰巴耶夫部队的厉害，因此不大乐意跟他们面对面硬碰，宁肯撤退，找机会搞一家伙。在退往索波列夫镇的路上，哥萨克军队把骑兵部署在两翼，用两辆装甲车开路，直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团扑来。他们的算盘是，在装甲车的扫射下，红军战士支撑不住，必定拼命奔逃，到那时，骑兵就可以纵马扬刀，大显身手！但是，结果稀松平常，甚至完全落空：红军部队向两旁闪开，一动不动地卧倒在地上，让敌人装甲车开到自己的后面，然后，用机枪对准怕死的敌人骑兵连猛扫……这时候，红军炮兵也朝这两辆制造死亡的装甲车，射出炮弹，越射越准，弹着点越来越近。两个怪物怎么来的，只好又怎么滚回去了。红军甚至毫无损失。他们非常沉着，很有组织，从容迎战，不费吹灰之力打垮了敌人的突击。

在索波列夫镇附近的一个地方，一连红军士兵由于同大部队失掉联系，被哥萨克包围，一连人几乎全被吃掉。派出一个连去增援，也遭到惨重伤亡。又派了一个连去，还是遭到相同的命运。到这时候才明白过来，这么零零碎碎地派援军，根

本起不到增援的作用，只会白白断送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后来派去了一个团，果然，一下子就把敌人收拾了。恰巴耶夫知道了这件事，大为恼火，骂了一通，严厉地说：

“你哪是个指挥员，简直是个大笨蛋！要永远记住，哥萨克打仗一窍不通，只会滋扰胡缠。他把你缠住了，把你一个连一个连地吃掉。哼，你这个木头疙瘩！‘照理’该把你关起来……”

虽然每天不断同哥萨克接触厮杀，但是，部队的进展还是很快：一昼夜，两条腿要跑上五十里。

每到一个村，一个镇，老百姓总要出来迎接自己的解放者——红军士兵，欢迎他们，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们，拿出自己的好东西慰劳他们……对恰巴耶夫本人的接待，更是热情，那时候，他确是名符其实的“当代英雄”。

“只求你告诉我们一句话，”庄稼汉央求地说，“哥萨克会不会还回来，还是你，亲爱的，永远把他们赶走了？”

恰巴耶夫笑嘻嘻地捻着小胡子，和蔼地、高兴地、满意地回答说：

“你们跟俺们一块干，那他们就永远回不来了，要是你们只顾和婆娘们鬼混，谁还来保护你们？”

“那我们该怎么干呢？”

“俺们怎么干，你们就怎么干呀！”恰巴耶夫指了指他周围的人说。

接着，他开始向老乡们讲说红军为什么强大，苏维埃俄罗斯又多么需要红军，劳动农民群众对红军应该抱什么态度。

恰巴耶夫脑子虽牢牢记下了十几条正确的、不容置疑的

原则，一部分是他从什么书上看来的，大部分是他听人家讲的时候记住的。比如，我军的阶级成份问题；为什么目前大部分哥萨克必然是我们的敌人，而不是偶然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富裕的边区必须立即帮助饥饿的中央地区，等等，等等。这些条文很有说服力，道理很简单。他有明确、清晰的思考力，很快接受了这些原则，既然接受了，也就永远不会改变，他引以为自豪的是：他晓得了这些原则，记住了这些原则，而且无论在什么场合同人谈话的时候，总尽量引用这些原则，有时说得恰到好处，但有时候说得牛头不对马嘴。

他跟老乡们唠起来，特别喜欢发挥这些原则，老乡们也听得出神。有时候他东拉西扯乱讲一通，但是，总的效果却是很好的。比如，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农庄里的一套工作制度、庄员之间的关系，等等，他自己就没有完全弄清楚，讲起来很吃力；讲到"分配"和"独立核算"等问题，自己往往也糊里糊涂。这类问题，他根本解释不清，但即使解释不清，谈谈也能收到一些好的效果。他号召大家要热爱劳动，反对贪心不足和自私自利，反对愚昧和无知，提倡在农业上采用新的、先进的工作方法。有一次，在一个村子里，他讲到工厂工人挨饿的情景，讲得非常动人。他严厉指责农民，说他们自己吃饱肚皮，就把挨饿的弟兄完全忘掉了。农民听了他的话，马上决定募集粮食，送到莫斯科去。当场选出了负责办这件事的工作人员，并且向恰巴耶夫保证，一定要把募集的粮食全部送到莫斯科去，也一定要到前线上向他报告这次募集的情况。他们是否募集到粮食，是否把粮食送去了，就不清楚了，但他们没能够把情况报告给恰巴耶夫，因为恰巴耶夫没能再活多久，就离

开人世了……

这样，一路受到热烈欢迎的红军部队接近了目的地，很快就到达了乌拉尔斯克城下。最后一仗，哥萨克突破合围圈，狼狈逃跑了。被围困的守卫部队的指挥员们，率领一个骑兵连和军乐队，到乌拉尔斯克城外大约十里路的地方来迎接……在高昂的《国际歌》声中，在一片愉快的欢呼声中，人们含着喜悦的眼泪见面了，相互拥抱，都想一下子把许多心里话都倾吐出来，可是，内心思绪万千，太激动了，太感动了，话梗在喉，就是说不出来。

"费多尔！"汽车旁有个人喊了他一声。

费多尔扭过头，看见安德列耶夫骑在一匹乌黑的高头大马上。他们俩人亲热地吻了一阵。在安德列耶夫一双非常美丽、明亮的眼睛里，这时露出一种新的、费多尔从未见过的神情——一种冷漠、严肃而又强烈多疑的神情。单看这种眼神，还以为，安德列耶夫不喜欢这次旧友重逢呢！但是他的声音，他这些亲切、热情的话语，恰恰说明，并非如此。有一条皱纹横在鼻梁的上方，深深地刻在他的额头上，犹如一道裂缝，永远也磨不掉了。

他们交谈了一会儿，费多尔知道了安德列耶夫积极参加了镇压叛乱，打击阴谋活动的工作，被围的乌拉尔斯克险些陷入敌人的圈套。对这伙坏蛋必须严厉、坚决、无情地惩罚。这场艰苦的斗争在他那年轻的脸上留下了印记，一条粗粗的、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不久，由于情况需要，安德列耶夫被调到部队，有一次，部队被敌人包围，经过拼死搏斗，他被野兽般的敌人剁成碎块。）

乌拉尔斯克大街上挤得水泄不通，到处是工人、战士，居民也都上了街。

“光荣属于英雄！光荣属于恰巴耶夫！恰巴耶夫师的部队万岁！红色领袖恰巴耶夫万岁！”

一片喜悦的欢呼声响彻了解放了的乌拉尔斯克城。大街小巷挤满了成千上万的群众，连恰巴耶夫和费多尔乘坐的汽车也难以通过。人们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恰巴耶夫，向他大声欢呼，致敬，抛起帽子，唱着庄严的胜利凯歌。城里红旗招展，装饰一新，到处搭起了讲台，举行了群众大会。当恰巴耶夫登台演讲时，人群象发了狂似地沸腾起来，不停地喊呀，跳呀，简直象暴风雨掀起的大海波涛。他第一句话刚出口，全场立刻鸦雀无声，他最后一句话刚说完，又爆发出一阵尽情的狂呼。在汽车的旁边，几十双工人的手把恰巴耶夫抬起来，向上抛，后来车子开走了，人们又跟在车子后面奔跑，象是要追上他，再一次向他表示感谢，表达他们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敬佩心情。各部队指战员也同样受到尊敬：乌拉尔斯克的居民们向他们问寒问暖，照顾得无微不至，举行庆祝游行，组织各种各样的军民联欢，为他们做好菜好饭，又尽各人的力量募集了一些东西，送给红军。

庆祝活动延续了好几天，庆祝活动是在敌人榴霰弹的爆炸声中进行的！剧院正在演出的时候，一颗炮弹就落在剧院的屋顶上。但是，这种事儿丝毫破坏不了大家欢乐的情绪。哥萨克军队退到河对岸去了，要一刻不停地穷追猛打，不让他们集结兵力，再来威胁这个城市，要赶得他远远离开这个象磁

铁一般有吸力的乌拉尔斯克。对恰巴耶夫来说，在战场上夺取新的胜利，才是最好的奖赏，因此，当最初的一阵狂欢热情稍稍平息以后，他就按老规矩，跨上马，从一个团飞驰到另一个团，去检查渡河的准备情况。

红军正在河上架桥。这时候，已经有两个团用他们能够找到的一些工具渡过了河。架桥工作必须加快进行，好让炮兵开过去，没有炮兵，各部队就觉着没有靠山。据各指挥员的报告，情况相当吃紧，叫人感到不安。恰巴耶夫来到乌拉尔斯克的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一清早就亲自去河边检查工作：一夜里做了多少活儿，总的情况怎样，工程进度如何。费多尔也和他一起去了。在一片绿色的高坡上，到处都是红军战士在奔忙，他们在把几根很大的圆木拖到岸边去……每一根木头的旁边拥了四十来个人，瞎忙活——推来推去，咋呼闹喊，可是不出活儿……他们要把木头搬上大车，放在前面，看起来，挺便当的，可是大伙儿挤在一起，还是弄不出名堂来。

“指挥员在哪儿?”恰巴耶夫问。

“喏，在桥上……”

他们来到桥边。一看，负责这个工作的工程师，正坐在一根小圆木上，慢悠悠地抽着烟。他一看到恰巴耶夫，赶快钻到人群里去了；他站在人群里，若无其事地东瞧瞧，西看看，仿佛他一直在监督工作，并没有无所事事地坐在岸上抽烟。恰巴耶夫看到这种事儿，非常恼火，毫不客气。对岸的弟兄们含着眼泪请求增援的情景，还在他脑子里回旋，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心急如焚，唯恐对岸的部队被敌人吃掉……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得拼命干才行，他把这么多的红军战士调到这儿

来工作，不是凭白无故的，甚至把自己的警卫队也调来了一半。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这座桥上，每时每刻在等待着，巴不得这座桥立刻架好，可是竟然……竟然碰上这种混乱现象，有些人瞎忙一通，有些人却在悠然自在地抽烟……

他飞快地奔到桥上，象发了狂的野兽扑到工程师的面前，二话没说，挥起手，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工程师在木头上一摇晃，差一点儿落到河里。他脸色顿时刷白，吓得浑身发抖，心里想，也许马上就被枪毙……恰巴耶夫果然伸手去摸枪套，这个意外的动作使费多尔大吃一惊，幸亏他及时把恰巴耶夫拦住，才没有出乱子。激怒了的恰巴耶夫把吓得发抖的工程师严厉地、狠狠地骂了一顿：

"你们这些狗崽子！就他妈的知道磨洋工！俺知道，你们不会管俺的士兵的死活……你们存心想把他们害死，该死的混蛋！……哼……哼……狗杂种！……限你午饭前把桥架好！明白吗?!要是架不好，俺就枪毙你这狗东西!!!"

工程师立即在岸上忙碌起来。原来那根圆木旁边挤了四十来个人，现在只留下了三四个人，其余的都调去做别的工作……红军战士也都加了劲……立刻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结果怎样呢？这座桥，两天两夜只架了四分之一，但在午饭前居然架好了。

恰巴耶夫督工有一套，不过他的方法很厉害，很粗暴。当时的环境是那样，有时候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大家甚至对那种最凶、最厉害的"打嘴巴"也不计较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指挥员不得不用鞭子抽打自己的战士，这样做，反而挽救了整个部队。

桥上发生的那件事，是不是可以避免呢？这是无法解答的……无论怎么样，架桥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任务，这是不容置疑的，恰巴耶夫曾亲自几次找过工程师，亲自去过工地，一再下命令，一再催促，又是骂，又是威吓……工作照样还是慢吞吞的。是故意怠工，还是偶然的？谁也不知道！但是，那天早晨，恰巴耶夫是忍无可忍了，不可避免的事就这样发生了，可是桥……在午饭前就架起来了。这就是严酷的、肯定不移的、铁一般的战争逻辑的例证！……

恰巴耶夫有时候也会随心所欲乱来一通，显得特别幼稚，连最简单的事情也搞不清楚。

这次到了乌拉尔斯克，过了大约一个星期，也可能是一个半星期。有一天，一位兽医和一位政治委员跑来找费多尔。这两个人直哆嗦，兽医还眼泪汪汪的……十分害怕、十分焦急，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兽医的政治委员一般都是性格温和的。）

“怎么回事？”

“恰巴耶夫……又骂……又喊……还要枪毙……”

“他骂谁？他要枪毙谁？……”

“我们……我们两个……他说，要不就关进监狱……要不就枪毙……”

“为了什么呢？”

费多尔让他们坐下来，安慰他们一番，听他们讲了这件奇怪的、几乎不可思议的事。

恰巴耶夫认识的一位农民，从乡下来找他。这个农民是

个有名的“马医”，干这行当已经有八到十年的历史了。这个人看上去很老练，无疑是个内行。今天，恰巴耶夫把骑兵营的兽医和政治委员叫来，让他们坐在桌子旁边。那个农民也在场。恰巴耶夫“命令”兽医，当着他的面考考那位“马医”，并且要发给他一张证书，证明这位农民也可以当“兽医医师”。为了使这张证明更过硬，要政治委员也在上面签字……考试要严格，但不能故意刁难。恰巴耶夫说：“俺们知道，你们这帮狗崽子，不会让农民当医师，一个也不让。”

“我们如此这般地对他说，我们不能给考试，我们没有权利发证件。他听了，马上跳起来，用拳头敲着桌子说：‘住嘴！当俺的面，马上就考，要不，俺就把你们下狱，混蛋……枪毙你们！……’于是，政委只好往您身上推。他说：‘我们去问问费多尔，考试究竟怎么搞，去跟他商量一下……’一听提到您，倒还好。他定我们五分钟……他还在那儿等着呢……现在我们该怎么对他说呢？……说不定真的要枪毙我们哩……”

两个人用探问和祈求的目光，望着费多尔……

费多尔把他们两个留下来，什么地方也不让去，他知道恰巴耶夫自己会找上来的。果然，隔了十分钟，恰巴耶夫跑进来了，气势汹汹，两眼喷火，一副怕人的样子，直对着费多尔嚷道：

“你要干什么？”

“那你要干什么？”听了他这种吓人的语气笑了笑。

“你跟他们串通了？”恰巴耶夫大声吆喝着。

“串通什么？”费多尔又笑了笑。

“你们都是混蛋！……知识分子……马上到俺那里去考

试，”他对着发抖的“兽医”说，“马上跑步去考试！！！”

费多尔看出，这件事已经不是说着玩的了，决定用自己惯用的武器——沉着冷静，来对付恰巴耶夫。

恰巴耶夫在费多尔鼻子底下一边喊叫，一边挥舞着拳头，一会儿威胁说要枪毙，一会儿说用鞭子抽。费多尔左劝右劝，讲了许多道理，竭力说明，这种证明发出去，会闹出多么荒唐的笑话来。但是，这一回要能说服他，似乎特别困难，费多尔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办法。

“我看这么办吧，”费多尔向恰巴耶夫建议说，“这个问题，咱们这里解决不了。还是打个电报给伏龙芝，问问他怎么办？他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你看行不行？”

只要一提到伏龙芝的名字，恰巴耶夫立刻就会冷静一些。这回也平静下来了，不再大吵大闹了，默默地同意了费多尔的意见。

他们把政治委员和兽医放了，拟好了电报，签了字，但是费多尔把它压了压……

过了五分钟，他们两个一起喝起茶来，边喝，边聊，蛮亲热的，心平气和地交谈中，费多尔终于说服了恰巴耶夫，说应该把电报烧掉，不要给任何人看见，免得闹笑话。恰巴耶夫一声不响，看得出，他是同意了……电报就没有发出去……

象这样离奇的笑话，恰巴耶夫不知闹了多少次。有人说，在一九一八年，恰巴耶夫用鞭子抽打过一个相当“有地位的”人物；有一次在答复别人的一份电报上用了“他娘的”这样的字眼；还有一次在一份报告上，也可能是在一份命令上加了个“批示”，这个批示念出来，简直不堪入耳。真不愧是个独具一

格的人物！他对许多东西还不理解，还没有领会，但是已经能自觉地、而不是本能地，去探索许多合理的、光明的东西了。再过二三年，他身上那些陈旧的东西，就会从他身上彻底地甩掉了，而现在，他已经开始从那些充满他脑子的，使他感兴趣的，强烈地吸引着他的事物中，汲取很多东西。但是，命里注定，另有安排……

十五 结 局

恰巴耶夫师正在向勒比辛斯克进军。从乌拉尔斯克到勒比辛斯克有一百多里。周围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这里是哥萨克的“老家”，到处都有人给他们支持、同情和各种各样的援助，而对红军部队却抱敌视的态度。在那些还留下了一些居民的镇子上，你听不到一句好话，更不用说什么支援了。大部分哥萨克人的镇子，在红军到来之前，都已经空空如也了，只是偶而在什么地方还遇上个把被人遗忘的龙钟的老婆子。哥萨克撤退时，吓唬老百姓，说“布尔什维克来了要杀头”，于是各镇居民们套上大车，装上自己的全部家当纷纷逃难，只剩下谷仓里的粮食，但多半也烧掉了，或者在粮食里掺上砂子、烂泥，把它变成一堆烂泥巴。水井里几乎都放了毒，或者填上半井泥土，吊桶一只也没有留下。凡是需要而且可以毁掉的东西，都彻底毁光了，毁得不成样子。必要的房屋都拆掉了，毁坏了，烧光了。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哥萨克一去不复返

了。他们撤退到勒比辛斯克周围，边撤边打，战斗非常激烈，哥萨克进行了顽强、坚决而又巧妙的抵抗……

恰巴耶夫师的指挥部设在乌拉尔斯克，他的先头部队前进了几十里。炮弹、子弹、衣服、粮食都不够……饥饿的红军战士走过的田野，遍地都是谷物，各个镇子里没有脱粒的谷物也堆积如山，可是，他们就是没有粮吃。当时的困难太严重了。甚至发了霉的、已经腐烂的粮食，有时候接连几个星期都运不到前线，红军战士只好挨饿……唉，那些日子是多么艰苦、多么难熬，多么严酷啊！

恰巴耶夫和费多尔几乎每天都乘汽车到各旅去看看。这一带公路宽阔、平坦，车子可以开得很快。车子要是出了毛病（啊呀，那是常有的事！），就骑马，一昼夜也能跑它一百五十来里，一早出发，赶天黑就能回到乌拉尔斯克。恰巴耶夫对草原太熟悉了，大小村庄，大小道路在什么方位，他都能准确地判断出来。可是，有一次他也搞错了，迷了路。草原迷路的情景，费多尔用《夜火》为题，写在他的日记上了。现在我们把这一段从日记里抄出来，不过要记住，那天夜里，在恰巴耶夫率领下在草原上迷了路的同志们，心情是特殊的，奇异的，这种心情，在他的日记里，连十分之一也没有表达出来。一幕幕"夜情夜景"，他是不会确切描写的，话再说回来，这种"夜情夜景"也实在难以用语言描绘和表达。

夜　火

我们要去看看西佐夫。准备工作很简单：备好了马，带了十二名可靠的随行人员，就出发了……驰过恰甘，路上尽是倒

毙的死马，臭得要命，我们沿着路边，越过草原，朝着一座小湖奔去。沿途庄稼茂盛，蒿草丛生，一块块草地开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我们很快地驰到了一片洼子似的小湖边，登上湖边斜堤，下了马，走到水边。马儿拼命地喝了一个饱，我们比马儿渴得还要凶。已经是五六点钟了。我们又继续朝前赶路，走了三十来里，没有碰上一个庄子。凡是坑坑洼洼的地方，都奔过去瞧瞧，想找点水喝，但是没有找到，渴得叫人难耐。在远处，在土岗子顶上，有几个骑马的人，这一定是哥萨克部队的了望兵和游动哨。在这里，每一分钟都可能遇上哥萨克，他们从随便什么洼地里突然朝你袭击。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他们在一个地方埋伏下来，窥伺时机，放你过去几步，然后，象飓风似地飞驰而来，挥舞着明晃晃的马刀，抖动着哥萨克长矛，大喊大叫地冲上来，出其不意地砍杀一阵，可你连枪也来不及从肩上摘下来呢。我们一边走，一边朝四下张望，注视着每一个坑洼，作好了战斗准备。

烟雾般的悠悠浮云，突然变黑，变浓，黑压压的一片，劈头盖脸地压了下来。顷刻间，天昏地暗，狂风骤起，呼啸着，横扫田野，驱赶着那黑沉沉、预示不祥的浓云，卷成一堆堆大云团。

先落下几滴雨点，接着又稀稀拉拉地掉了几阵……而后，真正的草原大暴雨倾盆而下，雨声大，雨点密……打在地上，劈劈啪啪……大伙儿一下子淋湿了。我真倒霉，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衣，比谁都湿得快，一直湿到五脏里去了。我开始觉着发冷，又冷一阵，又热一阵，两只手直打哆嗦，牙齿碰得咯咯响。路旁出现了几间被毁的土坯房子，这是一个小村子的残迹。看过去，破房子旁边有人在闪动……

我们驰马过去，一看，原来是我们的两个辎重兵。这两个倒霉家伙困在这里，正在无计可施呢。他们的部队已经走远了，他们在这儿出了事：车轱辘坏了，小马跌倒了，怎么也拉不起来。他们决定把东西都丢在水井旁边，自己去追赶部队，免得落入哥萨克的魔掌。我们看到那儿有一只四公升的大瓶子，就用缰绳拴住瓶颈子，又在绳子的头上坠上一块石头，放到井里……虽然我们知道，哥萨克常常在井里放毒，但是渴得要命，谁管得了这些，只好丢开这种可怕的念头。瓶口小，等了好久，才灌满了水，我们喝足了水，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草丛里的道路，已经看不大清楚了，但是总的方向还有谱儿，因而又信心十足地朝前驰去，约摸走了四里路，我们决定改变方向，沿着草原，直朝远处依稀可见的一点火光奔去。按我们估计，大概还有十五里的路程，我们以为再走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那里。至于前面的火光，我们作了各种猜测，最后断定，这是我们散兵线上点起的篝火，但也可能不是，反正不去管它：你总跳不过自己的散兵线，总会碰上的……我们一声不响地策马急驰。下雨前，大家的衣服还没有淋湿的时候，都唱呀，叫呀，喊呀，现在都蔫了，不唱，也不大声说话了。这堆篝火，尽管大伙儿议论过了，都说“跳不过自己的散兵线”，然而每一个人的脑子里还是有另外一种想法：

“哼，要是走错了路，岂不是直奔哥萨克的虎口？”

想到这里，心里不是个滋味，各种各样可怕的念头都钻到脑子里来了。恰巴耶夫白白地一根接着一根地划着火柴，白费劲地用手指在地图上划来划去，盯着指南针看，还是拿不定主意。我们只好碰运气，盲目地朝前走，自己根本不知道到哪

里去。前面的火光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火光暗下来的时候，一闪一闪，眨着白光，朦胧暗淡，一眼望去，非常遥远，使人感到有些离奇神秘，仿佛这不是火光，而是故意在黑夜里来作弄我们的妖怪和幽灵。起初我们以为总共才六里到八里路，可是我们足足走了有十里，而那个小小的火光还是和原来一样，从容地一闪一灭，一会儿离得很近，一会儿消逝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开始胡乱猜想：这是不是篝火呢？兴许是远处高杆上挂着的灯笼吧？……可是为什么它好象一直在往前走，离我们愈来愈远？……

我们决定不再向前走了。我们早已经走错了路。马在那长得又高、又密、又湿的草地里走着，马蹄踏在草上，咔咔直响，踏断的野草，尤如一根根绷紧的丝线，发出清脆的声音。右面又出现了一点火光，好象也离得不太远，但是走了一里路，才发觉这儿也有点儿不妙……又出现了一点火光，又一点，又一点……在一片空荡荡、象坟墓一样死寂的漆黑草原上，真叫人毛骨悚然……雨一会儿停，一会儿下，淅淅沥沥地打在湿透了的单薄的衣服上……哎呀呀……好冷啊！……冰冷的雨水顺着脖子、背部、胸部直往下淌，好象几条小蛇在身上爬动，多么难受啊……眼下要是能走进一间屋子，坐在热烘烘的火炉旁边，烤烤身子，那该多好啊……可前面依旧是漫漫长夜，依旧是那样寒冷，雨依旧是下个不停，浑身湿漉漉的，滋味真是难熬！大家的情绪低落到极点。走啊，走啊，究竟往哪里走？有时候，我们好象在往回走，又回到刚才走过的熟地方，象是碰上了鬼打墙，老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一听到旁边有沙沙声，立刻转过头去，死死地盯着看：是不是哥萨克的侦察队？说不

定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悄悄地靠近了……跟踪……追迹摸上来了……马上就要……一……二……三……鬼才知道，这漆黑的夜对人有多么大的威胁力啊！碰上这样的黑夜，哪怕是最最胆大、最最勇敢的人也没辙儿，也要疑神疑鬼、畏缩胆怯……这当儿，就在我们旁边，好象冒出了一个黑糊糊的、长长的、扭在一起、非常难看的东西……派了两个人前去侦察。他们悄悄地从两边向那个方向快步跑去，回来后报告说，那是几堆没打过的麦垛……决定就在这里停下来，在麦垛下，等候天明……马不卸鞍，甚至马脚也不绊起来。派几个人轮流站岗，隔两小时换一次，必须整夜戒备。

每个人都把枪放在手下，子弹推上膛，作好了准备，以防突然袭击。大伙儿靠着麦垛坐下，在麦垛上掏了个窟窿，把身子缩在里面……雨一分钟也没有停……我刚坐下还觉得蛮舒服，地上铺了不少麦草，过了几分钟，觉着自己象掉在水洼里一样。稀糊的泥浆，叫人恶心，想吐，浑身发冷，心里烦得要命。恰巴耶夫就坐在旁边，脸贴着湿漉漉的麦草，突然间……唱了起来，轻轻地、慢悠悠地、愉快地哼起自己心爱的歌儿："我囚在潮湿牢房的铁窗里……"，这支歌他唱得异乎寻常，非常突然，我起先想，是不是我听错了？也许是他自言自语地嘟囔什么，可我却把它当成歌曲了……然而，恰巴耶夫确实是在唱歌……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你是怎么啦？"

"俺怎么啦？"他瓮声瓮气地回答说。

"敌人会听到的，骑兵侦察队来了怎么办？"

"听不到，俺轻轻地……老弟，呆在这水里又冷、又腻烦，

还是唱两句……”

他的回答很不错，很干脆，我听了，仿佛也轻松一些。

“有这么一回事，费多尔，俺想起来了，”恰巴耶夫说。“记得有人给俺讲过，说有两个人，在沙漠里迷了路……对，就象咱们现在一样，只是他们一共才两个人……是人家把他们抛在那边，还是自己掉队的，就不清楚了，他们只有坐在沙漠里，反正没路可走了……俺们虽说在夜里……嗨，那有啥要紧……太阳一出来，俺们就能找到路了，可他们往哪儿去呢？白天黑夜，四周是望不到边的沙漠：这儿是沙漠，那儿也是沙漠，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每人带了一壶水，可是不敢喝。他们不想死啊，他们知道，水一喝光，死神就要临头了……有水，他们才能活下去。他们在一起走了三天，什么路也没有找到，还是一眼望不到边……到了第四天，一个人倒下了。他说，‘我就要死了，你也躺在我旁边吧，咱们一起来，也要一起躺下……’说完，倒在沙漠上，就完了……活下来的那个人，在他的同伴身边坐了一会儿，看见同伴龇牙咧嘴，睁开一双锡白色的眼睛。他一个人，在茫茫的沙漠里，害怕起来了……唉，怎么办呢？……得离开这个地方，可又舍不得。他走了一程，又回到这儿来看一看，生怕丢下……虽说同伴已经死了，可总好象是两个人在一起…… 你瞧，结果怎样呢？这时，有几匹骆驼朝他走过来，是一队骆驼商队，这个人也就得救了……他把自己的同伴埋在沙漠里……你瞧瞧，这是多么危险啊！如果周围几千里尽是沙漠，你能往哪儿跑啊……”

“那是什么？”恰巴耶夫急忙向旁边一转头，迅速地跳了起来。

费多尔跟着跳起来，佩季卡也跳了起来……抓起步枪，屏声息气地等着。过了几秒钟，自己的传令兵从黑暗中闪出来，有几匹马跟在他后面，吧唧着嘴，小声地打着响鼻走近这里……他们又靠在硬绷绷的、刺人的麦捆上……

"你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费多尔问恰巴耶夫。

"想起来说说罢了。自己碰上困难，总爱回想旧事，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遇到的困难比俺还大。俺就想，人家能忍受，为啥俺不能忍受呢？俺还听说过，有一只船在海上失事，一个水手抱着一根木头，随波漂流，在海上漂了两天两夜，才被救上来……想想看，他当时是个啥光景，两腿泡在水里，弄不好自己也会翻在海里……可是他却死里逃生了……"

大家把他团团围起来，听他讲……佩季卡听得顶用心，要咳嗽的时候，他用手捂住嘴巴，把头钻到麦垛里，象猪一样，吭吭地咳几声。在黑暗中，他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象猫眼一样闪着光……恰巴耶夫刚刚讲完，佩季卡飞快地看了他一眼，全身抖动了一下，看来，他也很想讲点什么。

"我也来讲讲……可以吗？"他问恰巴耶夫说。

但是，恰巴耶夫什么也没回答，默默地摩挲着小胡子。

"拿我说吧，"佩季卡接着往下说，"一九一八年的时候，在顿河……哥萨克把我们二十来个人锁在一间板房里。他们说：'明天早上来弄弄清楚，看你们里边谁是布尔什维克……你们要是不实说，都当布尔什维克来处理。一句话，统统完蛋。'我们知道，这帮子混蛋一准枪毙我们……我们就悄悄地拆一块墙板，咔吱、咔吱，终于被弄下来了……我在他们中间是最小的一个……他们说：'你先爬出去，要是你被抓住了，不

要牵连我们，就说，自个儿干的……拿块石头，看准了，一家伙把哨兵砸死……'闲话少说吧，我就往外钻。那天夜里，也跟现在一样，下着雨，漆黑漆黑的……我悄悄地伸出去一只腿，不见什么动静……我稍微把身子一弯……把肩膀……胳膊和头都钻了出去，再把另一只腿提了出来……一看，我已经到了板房外边的地上，墙角上正好有一个哨兵……我趴下来，我心想，先爬过去，看看他是坐着还是在走动，我象一条虫似的在泥浆地上爬着，弟兄们都伸出头来看……这个家伙坐在一块劈柴上，搭拉着脑袋，我想，他兴许睡着了……我拿着弟兄们从板房里递出来的那块砖头，爬到他跟前，举起来，嗖地朝他的太阳穴砸去。乖乖，那个家伙一下子就昏倒在地上了，什么也没喊出来……我又敲了四下，鲜血向四下溅出，溅了我一身……咱们的人都出来了，这间板房在村子的边上……我们爬呀，爬呀，一个劲地向前爬，就这样，悄没声儿地溜出来了，敌人一点儿没发觉……我们记得是在什么地方掉队的，后来就找到了部队……嘿，也真够险的！……"

"险是险，可是你还活下来啦，"恰巴耶夫不在意地说。

"活下来了！"佩季卡看到恰巴耶夫注意地听他讲，他高兴地应声说。"大家都活下来了，就这样一块爬出来了……这话是真的……"

"我相信，"恰巴耶夫微笑着说。

佩季卡又用手捂住嘴，对着麦垛咳了两三下……

"瞧，都睡着了，"指着周围躺着的同伴，对恰巴耶夫说……"我可不行，要遇上啥情况，我怎么也睡不着……"

毕竟，还是拗不过困倦。大伙儿都不说话了，又钻进了麦

垛，打起瞌睡，但是睡得不安生，很惊醒，有一点儿响动，就会醒来……就这样迷迷朦朦地瞌睡到天亮，当昏暗的天空微微透出一线曙光时，大家就爬起来了。折腾了一夜，没有睡好，很疲倦，全身湿透，冷得发抖。决定撒马快跑一阵，暖和暖和身子。恰巴耶夫把地图一看清楚，确定了方向，我们真的拼命打马向附近的一个土岗子奔去，过了几分钟，确实觉着精神多了。太阳一升起来，我们更来劲儿了。从土岗子上望到前面有一队辎重车，我们打算朝它奔过去，可是，他们看见来了一队人马，就赶快打着牲口奔跑……佩季卡纵马追上去，想了解一下，是不是自己人。其余的人缓辔碎步跟在后面……辎重车是我们自己的，正是我们要去的那个部队的辎重车……半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一间小房子跟前，西佐夫和他的流动野战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这个小地方叫乌西哈！……………………

……………………………………………………………………

……………………………………………………………………

…………………我们到达的时候还不到六点钟，可西佐夫和政委已经起床了。他们登上土坯小房的平顶，一面用望远镜向四下仔细观察，一面又相互在商量什么。看到恰巴耶夫一行人走近，就从上面下来了，把他们领到一间肮脏的、光线暗淡的破房子里。他们两个人的脸色简直怕人：又白又青，象死人的一样，两眼闪着焦灼的光芒，露出极度疲劳和一种绝望的神情。两人都没有穿军上装，只穿了件衬衣，小屋子里，又闷又热，穿着全副军装是没法干活的。西佐夫干脆打赤脚。一看他那双肮脏的结满老皱的大脚，可以断定，他准是几个月没有洗澡了。由于几夜没有睡觉，又极度紧张，他双手直打颤，

说话发急的时候，吭吭哧哧，开始语塞，喉结神经质地抽搐着，急促地上下移动。他那干巴巴发白的嘴唇，裂成了许多口子。西佐夫已经连一句话也不能心平气和地讲了：他用又尖又高的抗议声调，大声地叫喊着，边说边挥手，顿足捶胸地讲着那些不讲也很明白的道理。他说，没有子弹，没有炮弹是不能打仗的。这里是平原，从屋顶上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于是西佐夫举起望远镜观看哥萨克的营地，确实看得清清楚楚。

"到底有没有子弹送来，恰巴耶夫同志？"西佐夫用嘶哑的嗓子说，两眼直盯着恰巴耶夫的面孔，注视着他的眼色，期待着他第一句的回答……

"马上会送来的……已经下了命令……"

"下命令又怎么呢……这仗我打不下去了！……"

"那你就等一等……你说，俺上哪儿给你去弄，俺又没有随身带着，"恰巴耶夫向他说明道理。"俺说，他们正在运，很快就到……"

"你们知道，"西佐夫用焦灼的、半发狂似的目光，一个挨着一个扫视在场的人们，"我和政委整天呆在屋顶上不下来。这里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那帮混蛋，一天向我们进攻四次……进攻四次啊！敌人怎么准备，怎么一窝蜂地冲上来，我们从这里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本该好好收拾他们一下，可惜办不到，子弹没有啊……昨天我命令，三个人中间，只准一个人开枪……后来改为五个人……现在又改为十个人……放敌人走近我们，到只有十步远的地方，只能用手榴弹来抵抗……其他，什么办法也没有。要知道，一天四……四次进攻呀！这里的地形，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一马平川，简直象桌面

……”

“明天进攻的命令接到了吗?”恰巴耶夫问了一句,回头望了一下。

“接到了……没关系,这儿都是自己人,”西佐夫使他放心地说。“没有子弹怎么办, 我是一点儿辙也没有……不能赤手空拳……”

“你算了,俺知道了,”恰巴耶夫有些生气了, “俺知道了,干啥还啰哩巴苏?你的压力马上就减轻了。什马林开始 ……敌人的兵力会引到他那里,而你就可以……”

“明白了,”西佐夫赞同说。“只有一件事:子弹……”

“炮弹怎么样?”恰巴耶夫问。

“也缺。不过,勉强还可以对付。可粮食……粮食一点也没有了……瞧,也没有什么东西招待你们,连一点面包皮也没有, 我的老天爷……只能喝点儿水,就在水壶里……”

“卡车会把粮食一起运来,”恰巴耶夫解释说。“俺们马上就到什马林那里去,没有时间多耽搁了……好吧,再见……”

我们从西佐夫那里出来, 心情很沉重……大约要走十五里。马也饿,人也饿,但是我们知道, 昨天晚上就应该有粮食运到什马林那里。因此, 我们一到, 他们马上就给我们弄早饭。什马林正在执行师部命令,忙得满头大汗,他明天一早就要率领全旅开始行动。他承担的任务很重要,必须仔细筹划,可是什马林身边能出谋划策的人不多。他把参谋长找来, 可是,你从他那儿能听到什么高见呀?他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什马林的参谋长,在这以前,好象是当文书的, 一时派不出人来, 只好把他硬提上来。他担任这个职务, 还算有点机灵劲

儿，小伙子并不笨，可是，参谋那些运筹帷幄的道理，唉，唉，唉，他听也没听见过，简直一无所知。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详谈，仔细地了解：这里的情况怎么样，什么地方住了些什么人，离这儿有多远，敌人有多少兵力，搞到的情报可靠程度怎么样，敌人现在正在准备干些什么。这些情况都是随便闲谈弄清楚的，等大伙儿一吃饱，立刻挤在地图旁边，恰巴耶夫才开始对什马林详细地讲解这次战役从开始到结尾的打法。他立地就作出了这样有预见的推断和正确的计算，大家听了都很高兴。恰巴耶夫考虑情况，面面俱到，连细枝末节也不放过，这是他独有的、显著的特点。

“如果你们照这样开始，结果会有这样的局面，到那时候，西佐夫部队就会到这里……波波夫渡河到对岸，会处于这样的形势……”

他反反复复地考虑：这些困顿的、几乎光着脚的伤病战士的运动速度；子弹、炮弹、粮食运送的数量和速度；缺水的情况；遇上老百姓或者老百姓全部跑光后的情况；侦察工作的范围和可靠的程度；哥萨克的战备；西佐夫旅能有多少战斗力；兵分几路和在无路草地上的行军速度……

恰巴耶夫把一切的一切，都作了详细的估计和衡量，一下子推断出三四种设想，每一种设想都有大量现有的、同时发生的，以及过去发生过的事实和情况作依据……从这几种设想中，选择一个最可靠的，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至于其余的设想，只要求不要忘记，而且要记住什么时候应该采取什么办法。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结束以后，刚要启程回到师指挥部

去，本旅一个离前线大约两里路的后备团里来了几个人，邀请恰巴耶夫他们去看戏。真是件稀奇事……明天就要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敌人的战壕就在跟前，却突然演起戏来?!

"一向就是这样，"什马林微笑着说。"演员一来，弟兄们就等上了，哪怕战斗已经打响，也要演……他们对看戏，喜欢得要命……"

"敌人不是离得很近……"

"他们才不在乎呢……如果没有什么动静，就从战壕里爬出一半人来看，看完一场，再回去，换另一半人来看……这样，一个不漏，大家轮流着都能看到……"

"就在敌人眼皮子下演出?"

"就在眼皮子下……卓娅·帕芙洛芙娜胆子可真大，什么也不怕，她总是和演员们一起到处跑……要是哪儿的红军战士听说她要带着剧团赶来演出，就眼巴巴地盼啊，盼呀，盼她……战士们都是自己动手准备……有时候，她到了一个地方，一看，台已经搭好了……把镇子里的板墙拆了搭的台，唉，真是!"

恰巴耶夫和费多尔知道，卓娅·帕芙洛芙娜在最近几个星期里成立了一个巡回剧团，但是万万没有料到她会在离战壕这样近的地方来演出。这件事她自己从来没有讲起过，只说要到旅里来演戏……谁也没有去多问她。他们来到旅部，光谈军事问题，时间还紧得要命，哪还顾得上过问剧团呢!现在，大家说起来，才知道，有一次，她带着自己的巡回剧团在穿越草原时候，正碰上敌人射来的猛烈炮火。全旅发起了进攻，这当儿，剧团正来到一个团附近，这个团已经跃出阵地向前冲

去……演员们立即决定，每辆车留下一个人赶车，其余的毫不迟疑地拿起步枪，成了普通一兵……卓娅·帕芙洛芙娜向来是骑马的。她策马来到团政治委员跟前，过了十分钟，她和政委，还有五个战士一起出发侦察去了……这个时代多么令人惊奇啊！演员、组织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宣传员、鼓动员、政治委员——所有这些人，首先都具有同一个概念：战士！师部的巡回剧团，为什么特别受到战士们的欢迎，是因为战士们感到，演员是自己的弟兄，永远和自己在一起，需要时，也和自己一起去冲锋陷阵……

红军战士总是以无比殷切的心情盼望着剧团的到来。通常，这个剧团的情况，他们每时每刻都知道，而且一清二楚：它现在在哪儿，在哪一个旅，在那儿呆多长时间，到不到这里来，还是到其他旅去了。要是知道剧团到他们这里来了，个个情绪高涨，当作特大的喜讯，传来传去。接着就开始张罗起来。剧团到了以后，他们甚至常常拿出自己有限的一点口粮，来热情款待他们……舞台一般早就搭好了，如果他们移防，开到空旷的草原上去，知道那里找不到木板，而且知道剧团马上就要来了，那干脆把这一大堆木板也随身带去……

在布置舞台的时候，他们是多么高兴啊！这是多么大的盛会啊！看热闹的人很多，只好和颜悦色地劝他们走开，免得挤来挤去，妨碍布景、换装和化妆。有些特别调皮的战士，往往站在敞开着的服装箱旁边，欣赏各种各样的常礼服、燕尾服，趁人转过身去，一不留意，就从箱子里抽出一件花花绿绿的长外套，勉强套在身上，绷得嚓嚓直响。他得意地咧着嘴，喊道：

“弟兄们，来看国王呀！”

不消说，马上就有人把这位“国王”抓住揍了一顿，把他身上的王服剥下来，有时还在他颈脖上敲两三下。可是他呢，又溜到后台什么地方去了，看看那里还有什么好穿的，再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看准备上演，似乎比看正式演出更有意思……演员们开始换服装了……本来，化好妆，出人意料地一亮相，毕竟会使观众不胜惊讶……可是躲来躲去，怎么也躲不开。总得想个办法呀，要不，让大家把一个个都事先看个够，要不，少数人先化妆，随大家去看，其余的演员绝对看不得了……两者挑一，觉得后面这个办法还凑和。于是他们大约选了四、五十个人，当着大家的面换衣服，装假发，勾脸化妆……当时为了化妆，那是用了多少木炭啊！想起来，确实叫人吃惊！这个剧团在一九一九年有多少家底，就可想而知了！那时候连一块干巴黑面包皮都看成宝贝，哪有贵重的东西用来勾脸！有时，也能搞到一些名贵的化妆品，但他们决不肯“平白”用掉，而要等到什么“隆重的”、非同寻常的日子才用，比如，前线大捷、运来了大批服装、增加了定量等，这类特殊的、战地上的欢乐节日，在我们团里也不少哩！

演员的表演并不怎么精彩，然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荣誉应该归于卓娅·帕芙洛芙娜：她能从几个有限的剧目中选出适合当时特点的最好的剧目来。她自己也上台表演，她了解战士，她知道战士们需要看朴实的、易懂的、有力的、适应时代特点的节目。她选的正是这样的剧目。其中有几个戏就是自己师里的作家编写的……有些作家不是没有天

才……大多数剧本写得比较粗糙，没有文学味儿，不过却有一些难以言喻的特点：自然、有力、倾向正确、思想真实、感情强烈，只是，他们有时完全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感情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剧目的水平差一些，但是，在当时还不算最蹩脚的；其他一些地方，还不如这里，还要差，为了应付，干脆就演一些有害的……

卓娅·帕芙洛芙娜特别热爱自己的工作，她完全是“白手起家”建立了这个深受战士欢迎的巡回剧团，而当时的环境又是多么困难哪！换个环境，在顺利条件下创建一个剧团，是没啥稀罕的。然而，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手中一无所有，部队还要不断进行艰苦的战斗，这个功绩确实不小啊！

有时候，他们常常跟在两三匹骆驼后面……在草原上沉重地徒步跋涉，全部家当都放在骆驼背上……有的地方，能弄到几匹马，大家就分坐在车子上，从一个团到另一个团，轮流演出，而各团早就翘首盼望这些贵客……

当恰巴耶夫和全体在场的人接受“莅临”观剧的邀请时，前来邀请的一个战士报告说，一切都已经准备停当了，马上就可以“开幕”……恰巴耶夫他们决定去看看，为什么不去呢？离这儿又不远，何况他们还要上那儿去调换什马林几匹新马呢。当他们走到观众跟前时，大家已经知道是谁来了。全都回过头去。一个接着一个飞快地传着说：“恰巴耶夫……恰巴耶夫……恰巴耶夫……”

这是多么别致的场面啊！靠近舞台的头几排观众都趴在地上；在他们后面的几排观众都坐着；在坐着的人后面，有一批人跪着，好象复活节前的礼拜四祈祷一样；在他们的后面，

都站着，站着的人占大多数……后面，有二十几辆大车，车上也坐满了观众。在这别出心裁排列起来的一大批观众周围，是骑兵，他们全副武装，骑在马上……几百人就这样排列在平坦坦的田野上，全都看得见，听得到……

他们让恰巴耶夫、费多尔、佩季卡走到前面，安排在"第二批观众席"里，坐在地上。

上演的是一出三幕短剧，由本师编写的。剧情非常严肃，写得也不坏。说的是红军各部队开进一个哥萨克村庄，哥萨克妇女如何接待我们的红军女战士，起初是怎么躲避和辱骂她们，后来又怎么了解了她们……演出开始了，一个团正在进村……红军女战士，大多数是共产党员，穿着男人服装：衬衣、军裤、长筒靴、短筒靴、树皮鞋，头戴尖顶军帽或者是破便帽，有的剃光头，有的剪短发。有几个哥萨克婆娘碰上她们，都转过脸去，咧咧嘴巴，呸呸地直吐唾沫，有的人挖苦她们或者拿她们寻开心：

"你干啥穿上这种裤子？蠢货，穿上这玩意儿怎么办？"

"哎，当兵的，"一个哥萨克妇女对着一位红军女战士喊，"你穿那开裆裤干吗？"

"都是你们这帮该死的，"在另外一个地方，一群哥萨克婆娘指着一个红军女战士骂。"都是你们，把俺们什么都折腾光了……把俺们这地方全毁了，你们这帮天杀的，把你们这伙臭娘们也收罗来了，没地方可摆了……你们这些个骗子，有啥怕丢掉的？很清楚，没啥怕丢掉的，就到处浪荡……白吃人家的粮食，谁不愿干？"

"唉，不是这样，不是呀，"女共产党员们打算辩驳。"我们

可不是你们想的那号人，不是那号人；我们是女工……我们和你们一样干活，不过我们在工厂里，不是干家务活……”

“你们是下流胚，就是那号人！”

“为啥，下流胚？我们也有家，家里留下了……孩子……”

“你们有孩子，俺们知道！”女人们叽叽喳喳地说。“知道你们那些孩子是啥货色……小杂种。”

女共产党员们给哥萨克女人解释说，她们不是什么“破鞋”，是清白的女工，世道逼的，才不得不丢下工作，离开家庭，抛掉一切，到前线来了。

“这儿也好，那儿也好，”哥萨克女人对她们喊着说。“不管在哪儿，只要你乐意，照样勾勾搭搭，下流东西……不是这种货色，也不会到这儿来……就不会来了……”

“妇女们，你们可知道，为什么我们上这儿来呢？”

“有啥不知道，俺们当然知道，”哥萨克女人支吾说。

“看来，你们是不知道的。”

“俺们也不想知道，”哥萨克女人扭过脸去。“不管你们说啥，反正都是撒谎。”

“这算什么回答，你们干脆说嘛！”红军女战士向她们进攻了。“你们照直回答：知道还是不知道？要是不知道，我们来告诉……”

“我们来告诉，我们来告诉……”婆娘们嘿嘿冷笑地说。“除了下流话，还有什么好说的。”

“可不是下流话，干吗要说下流话呢？我们说的全是正经话。哎，你们这些人呀！……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是女人，你们也是女人。对吗？”

“对，可也不全对……？”

说话的那个女共产党员似乎有点莫明其妙了……

“什么？……你们总还是女人吧？”

“是啊，是女人……”

“你们要洗自己的衣服，对吧？”

“我们谁洗衣服，关你啥事？是不是想摸摸底，好来偷？”

“想必是都有孩子，”机智地、连续不断地步步进逼，“孩子要有人照管吧？”

“哪能没有孩子……谁没有孩子？只有你们才把孩子扔在野地里、墙脚下……”

随你说什么难听的话，这些坚强的女宣传员还是不动火，不泄气。

“你们天天跟母牛打交道……围着锅台转……没完没了地……”

“你要说，就说正经事，”一个女哥萨克打断那个很老练的红军女战士。“这种事俺比你懂。”

“这些事你都得去做，”女战士接着她的话碴说。“你们懂吗？妇女们，你们活干了不少，可是，你们看到出头的日子吗？我问你们：出头的日子你们看见了没有？妇女们，你们的日子过得好不好，舒心不舒心？啊？”

“这个……舒什么心，”搭话的那个女人口气已经软下来了。

而红军女战士的攻势，愈来愈有力。

“对，你们的男人还要打你们，你们怎么不说呀。你们当家的动不动打你们，这是真的吧！对吗？”

“去你的吧，魔鬼！”哥萨克女人连连摇手说。“这关你什么事！”

“也许，你那口子特别知疼着热吧，”女宣传员微笑着说。“难道一次也没有打过你吗？你可以对别人撒谎，大婶，可瞒不了我呀。我也有男人，他已经死了，他就是这种坏胚子，该死的东西！喝醉了酒，打人骂人，凶得象铁链子锁着的恶狗……这种人死掉，我现在能难过吗？如今，我一个人自由自在：高兴起来，就起来，高兴躺下，就躺下，一个人多……”

“你说的全是空话，姑娘，”女哥萨克反驳的口气已经完全无力了。

“但愿你们不要再挨打了，”红军女战士让步地说。“即便不再挨打……可是你们还是没有好日子过……永远也不会有，谁会给你们送来好日子呢？没人。只有靠自己！……自己能办到，可是你们象个木头墩儿，死不肯离开老窝，就连好话也不愿意听。唉，你们这个样子，有谁能把你们拉得出来呢？”

“干吗还要拉出来？……”女哥萨克摸不着头脑。“算了吧，不是已经把我们拉出来了。”这时候，哥萨克女人都叽叽喳喳地嚷起来了。

“要拉出来！”红军女战士肯定地说。“要把你们拉到大路上，到大路上，真正生活才开始……妇女们，这个道理你们还不懂！”

“开始……”哥萨克女人抱怨地说。“你们只有‘开始’，不会有收场。”

“现在不能收场啊！妇女们，我们也很愿意……唉，我们多么想快一点收场啊，”一位女共产党员热情地、真诚表示遗

憾地说。"正是为了早一点收场，我们才穿上了军裤，可你们不明白……还要笑我们……"

"看了好笑，就笑了，"人群中有几个人回答说。但是，已经好半天没有听见笑声了。

她们的话越说越轻，越说越没有力量，自知理亏，对抗的情绪也渐渐地烟消云散了。

"你们顶好把道理弄清楚，先甭笑，"她们开导哥萨克女人说，"笑人家，自己长不了见识……"

"吓，瞧你们多有见识！……"

她们就这样地谈着，谈得热烈、自然、轻松……戏演得非常带劲儿……出色地表达出哥萨克婆娘们听了朴实、明了、令人信服的话语，开始心悦诚服……这样的谈话不止进行一次，也不止两次。红军女战士们，趁着和团里同志一起驻扎在镇子里的机会，帮助她们的女房东照看小孩、喂牲口、做家务……

这样，当这个团要开拔的时候，情景完全变了样。哥萨克的婆娘们给自己的"老师"做点心，做奶油面包，走出家门热情欢送，有的点头致意，有的亲吻，眼里汪着泪水，说了不少感激的话，现在跟刚来时不同了，说的尽是些好话。

从此，镇子里形成了两个阵营，那些听过女共产党员讲话的哥萨克妇女，被看作是"女布尔什维克"，遭受了残酷的迫害。

这个团开走了……镇子里依然如故，静悄悄的……许多哥萨克妇女又动摇了，完全觉悟的只是极少数。但是，每当大家回想起"红军女兵"，两眼就充满着喜悦，心里顿时暖烘烘的，他们相信自己的一生不会永远在牛棚里，另外一种生活将

会到来，而且必定会到来，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何时何人会给他们带来这种生活。

……………………………………………………

戏演完了。幕落下来了。命令本来规定不准喝采，不准鼓掌。但是，战士们情不自持，竟向自己热爱的剧团热烈鼓起掌来……

要是哥萨克听到这儿又喧又叫，他们在阵地上会有什么想法呢？他们会不会想到，在这里，在舞台上，正在把他们的老婆拉出来，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信仰"呢？

演出刚结束，又出了一件意外的事。在占领这个镇子的时候，在一间破屋子里发现一首为恰巴耶夫写的诗，它是白卫军诗人普·阿斯德罗夫写的，诗人的姓名写在最后一行诗的下面。有人把这首诗仔细地抄了下来，现在正在舞台上朗诵。朗诵完了，就把这首诗献给了恰巴耶夫留作"纪念"。诗词是：

从伏尔加两岸的青山
到雅依克城
布尔什维克万马千军
向着东方迤逦挺进。

他们有许多炮弹，
有许多大炮和臼炮，
指挥官恰巴耶夫
两手叉腰，亲自督导。

他要征服和占领
暴动的雅依克城，
村庄在冒烟，在燃烧，
百姓在啼哭悲号……

看吧，每到一个村庄，
杀人、酗酒和劫抢……
老人和青年
都纷纷这样讲：

“我可爱的家乡
大难临头，百姓遭殃。
哎，哥萨克，拿起长枪
转战在欢乐的草原上！……

布尔什维克的政委
让他们统统去见鬼！
我们这些旧俄的哥萨克，
没有他们本来自由自在。

你们啊，草原上的雄鹰，
不分老少，站起来！
摘下墙上的步枪，
把宝剑磨得锋快。”

刹那间各村各镇喊杀震天，
哥萨克队形密集，
齐心协力，铺天盖地，
向红军飞袭。

雅依克老爷爷
望着他们微微笑，
发疯的布尔什维克
可耻地狼狈溃逃。

朗诵这首诗是出人意料的。是谁出的点子，硬是没有弄清楚，话又说回来，也没人特地去追查这件事。不管怎么说，可以不必当众朗诵，干脆把抄写的一份交给恰巴耶夫就得了。既然已经开始朗读了，谁也不想在半中间叫他停下来，就一直听到底，听完，感到莫明其妙，一个个都拉长了脸。

费多尔推了一下恰巴耶夫，说：

“去，上台讲讲，哥萨克是怎样‘打你’……”

这个建议正提到节骨眼儿上：这首诗着实刺痛了他的自尊心。他上台讲了话，讲得简短扼要，而又形象生动，中间还穿插了一些战斗生活里的生动故事……他讲完了，台下热烈鼓掌欢呼……一个个激情满怀，斗志昂扬……到第二天早晨，这些“观众”里的许许多多人，有的倒下了，把血肉模糊的尸体留在草地上；有的重伤残废，被送到各个镇子或乌拉尔斯克……

这是费多尔和恰巴耶夫一起作的最后一次巡视。没有过几天，费多尔就被调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了。组织上派巴图林接替他的政委工作。他们两个早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认识了。

至于费多尔调到什么地方去了，去做什么工作，我们就不多说了，那完全是另外一段经历。恰巴耶夫发了几次电报，苦苦央求总司令，不要把费多尔调走，可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因为这个问题早就决定了。恰巴耶夫清楚地意识到，费多尔这一走，他失掉的是一位什么样的朋友，这个朋友非常了解他，非常热爱他，有人攻击他时，总是保护他，遇到他发脾气，谩骂“上司”、“该死的司令部”和“特别人物”时，这个朋友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他；当他谩骂政治委员和所有的“政治长官”时，这个朋友原谅他，并没有向革命委员会打他的小报告；这个朋友从来不跟他计较，了解他恰巴耶夫发脾气只是发发而已。有一个时期，费多尔把恰巴耶夫看成格里哥里也夫、“马赫诺老爷”一流的人物，后来，他认识到这种看法不对头，知道自己错了，对恰巴耶夫作出这样的评价，显然太轻率了，在气头子上，缺乏慎重的考虑……恰巴耶夫任何时候也不会背叛苏维埃政权。但是，他平日我行我素，碰到棘手的问题，就大动肝火，乱骂一通，使得不大了解他的人，难免要产生怀疑。记得有一次，还是在兵临乌发城下的时候，从莫斯科来了一位“高级人物”，这位人物，恰巴耶夫的话，只听过一次，而别人讲恰巴耶夫的坏话，却听了许许多多。他对费多尔说过这样一些话：

“……只要他稍微有点儿‘那个’，我们马上把他捆起来！……”

费多尔听了这话，气得要命，当时毫不客气地顶了这位“人物”几句，为此，他一直没能博得这位“人物”的赏识。但这有什么奇怪呢？那位“人物”的怀疑完全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恰巴耶夫第一天在这位“人物”面前的举止态度，同二百另一天在费多尔面前的举止态度是一模一样的。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个整整有半年的时间相处在一起，恰巴耶夫给费多尔留下了最好的印象。如今就要分离了，费多尔和恰巴耶夫一样，心情是很沉重的。但他没有想到，这次分离却把他救了，否则他也难逃一死，因为两个星期以后，前来接替他的帕维尔·斯捷潘内奇·巴图林就在他的岗位上代替他牺牲了……

这件事迫使费多尔后来一直思考和怀疑下面一些问题：恰巴耶夫的英雄气概在哪里呢？他的功绩在什么地方呢？究竟有没有功绩？到底是不是英雄？他们长期相处，形影不离，日复一日，时复一时……在那火热的岁月，不停地行军，连续地战斗……恰巴耶夫的每一个行动，费多尔都知道，都看见，都了解，甚至连他内心的动机、暗地里的盘算，他多半也知道，也看得清清楚楚。现在，他一件一件地逐日回忆着，从亚历山大罗夫盖依见面时起，直到在这儿乌拉尔斯克最后诀别的一天为止。斯洛米欣斯卡亚战役，他那巨大的工作能力，迅速的行动，敏锐的思考力，雷厉风行的工作……进军乌法……皮柳金诺之战。乌法之战……后来又打回来……那些可以看作英雄事迹的具体事实又在哪里呢？关于恰巴耶夫的传说，家喻户晓，远近皆知，这种传说，恰巴耶夫当然是当之无愧的，别的什么人都不能同他相比。恰巴耶夫师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其中，恰巴耶夫的功劳不少。他把整个师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用，他使他们确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他使他们在行军打仗中，能吃大苦，耐大劳，乃至把艰难困苦统统踩在脚下；他培养、选拔和锤炼了一批指挥员，使他们彻底具备自己那种勇往直前的坚强毅力；他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把他们的思想完全集中在同一个目标上，那就是夺取胜利，胜利，胜利，噢，这就是伟大的英雄主义！但它不是那种同恰巴耶夫名字联在一起的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主义。按照这种传说，似乎"恰巴耶夫本人"一定要手握明晃晃的马刀，在两军阵前，纵横驰突，挥刀杀敌，投入最激烈的战斗，而且决定战斗的胜负。但是，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恰巴耶夫在那个时候，在那种环境里，在那样的一伙人中，他是个机敏的优秀组织者，他同这些人朝夕打交道，也正是这些人培育了他，使他扶摇直上！要是时期有一点点不同，而相随他左右的又是另外一批人，那就不一定会出现象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恰巴耶夫这样的人民英雄！成千上万的战士把恰巴耶夫的光荣事迹象柳絮一样，撒在草原上，撒遍了草原以外的地方。他们也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他们相信这些事，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又添油加醋，凭着自己的臆想，继续传播。你去问问这些宣扬恰巴耶夫荣誉的人吧！他们大多数一点儿也不知道恰巴耶夫的事迹，既不晓得恰巴耶夫本人，连一件可靠的事实也不知道……

歌颂英雄的故事就是这样形成的。颂扬恰巴耶夫的故事也就这样形成了。

恰巴耶夫的名字将象一颗明亮的巨星闪烁在国内战争的史册上。这话不是平白瞎说，象恰巴耶夫这样的人物，确是少见的。

我们面前将展现一幕悲剧，我们这本回忆录就要用这个悲剧来作结束。

我们知道，恰巴耶夫曾一再请求把费多尔留下来，但没能成功。当费多尔自己表示愿意留下来和恰巴耶夫一起工作时，上级坚决地，甚至采取严厉的措施把他调走了。回顾过去的六个月，费多尔现在觉得自己判若两人了，他已经迅速地成长起来，精神意志无比的坚强了，他在各种考验中锻炼了自己，能得心应手地、很有把握地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他来前线之前，他会认为是无法解决的难题。现在他才体会到火热的战斗生活给予他的强烈影响以及战争环境所起的教育作用……

巴图林来了，就住在费多尔这里。两人亲热地回忆起当年在莫斯科时候的生活……然后把话题转到本师的情况。费多尔给巴图林介绍了今后的工作环境。帕维尔·斯捷潘内奇本来愁眉苦脸，很少说话，象有什么心事似的，现在听说自己将在这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工作，立刻活跃起来……

这一天召开了全师党代表会议。费多尔最后一次主持这个会议，同时，把接替自己工作的巴图林介绍给大家。大家热情地、亲切地欢送费多尔·克雷奇科夫同志，对他调走，感到十分惋惜。这半年来，大家都热爱他，尊敬他，特别钦佩的是，他能制服恰巴耶夫和恰巴耶夫那套作风，也就是恰巴耶夫对政治工作人员、契卡、司令部……那种令人不快的、有时简直是很危险的攻击和狂妄的态度。

代表会议结束之后，晚上，费多尔又把所有的指挥员和政

洽委员请到自己这里话别辞行。帕维尔·斯捷潘内奇也在座。可是，他的情绪很奇怪：坐在一个角落里，几乎一动也没动，没对任何人说句话，这一坐就好几个钟头，而朋友们、同志们都向费多尔依依话别，回忆过去的战斗生活。眼见这样一位纯朴的、忠实的好同志就要离开了，大家的心情格外惆怅……

第二天一早，他们相互吻别以后，各朝不同的方向出发了。费多尔去萨马拉，恰巴耶夫和巴图林一起到前线各团各旅去巡视……

各部队的进攻很顺利。什马林旅还是同从别的师调来的一个旅，沿着乌拉尔河的一条大道向前推进。波波夫旅向乌拉尔外围地区的布哈拉方面进军。西佐夫率领自己的三个团完成了向乌西哈四周机动出击，乌西哈就是恰巴耶夫和费多尔有一次遇上“夜火”之后到这里来找过他的那个地方。这次机动出击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损失很大，结果得不偿失。恰巴耶夫在一切军事行动中，向来机智、灵活，能迅速掌握和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他懂得，在这儿草原上对付哥萨克，不能再用不久前对付那些被高尔察克强征来的农民曾经用过的老一套办法。哥萨克是不大容易吓倒的，你占领他们一些地方，也不至于使他们仓皇失措，因为哥萨克的地盘全是辽阔的草原，在这一大片草原上，他们纵横奔驰，到处受到哥萨克居民的欢迎。他们躲在你的后方，来无影，去无踪，危害极大，的确是心腹之患。对付他们的战略，不是把他们赶走就算了事，不是坐等他们内部自行瓦解，不是一个一个地占领他们的村镇，这些

事固然很重要，也很有必要，但是，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集歼哥萨克部队。如果过去可以用被俘的高尔察克士兵来补充自己队伍，那么如今想用被俘的哥萨克来补充自己就不可能了，因为这里，每个哥萨克都是不可调和的敌人。不管怎么说，你想把哥萨克变成你的朋友和帮手，那可不是一下子能办到的事！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是恰巴耶夫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愈深入草原，这项任务就愈难完成，因为困难增加了，人困马乏了，缺粮缺水，远离中央，使局面变得更加严重、更加恶化。

哥萨克也有困难，但是红军比他们更困难。这就是说，必须加快进攻步伐，不惜一切代价：牺牲人力和物力，自动放弃许多地方，免得深入草原，遭受更大的损失。恰巴耶夫为了达到预定的目标，正在探索一切途径。在乌西哈进行了一次机动出击——这次出击，完全没有必要。接着又集中兵力，从正面攻击，拿下了乌拉尔第二大城——勒比辛斯克……遭受了损失……确实遭受了损失，但却取得了重大的战果。要能再进行五次这样的攻击，问题就可以解决！

他们打下勒比辛斯克，又绕过戈梁钦斯基，在麦尔格涅夫斯克附近停了下来。溃退的哥萨克部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们看到，在乌拉尔河下游的荒芜沙漠地带，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现在，趁老本还没有全部输光，另打主意还不迟，必须在这一带地方，把红军部队打退。于是他们尽一切力量加强各村镇的防御工事。他们顽强地死守勒比辛斯克，拼命地进行抵抗，苦撑了很久，不肯放弃，但是红军在那里发起的强大正面突击，显然出乎哥萨克的意料。他们以为，恰巴耶夫一定还

是运用机动战术，一定还相信铁臂合围的老办法。他们估计错了。但是，他们从这个错误里吸取了教训，现在用一切可能的人力和物力来加强麦尔格涅夫斯克的防御。他们利用了春季战役中留下的深壕，在这里集结了炮兵，把一门门大炮架在各个角落；把一挺挺机关枪，隐蔽在每一个掩体，每一条战壕里。红军从正面突击，攻打麦尔格涅夫斯克。打下来了。不管怎么样，把它打下来了。哥萨克撂倒不少，但是红军伤亡更大。这次胜利，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哥萨克摸透了恰巴耶夫的战术，恰巴耶夫使出一个新招，他们就用自己一套特殊办法来对付。经过麦尔格涅夫斯克战斗，恰巴耶夫认识到，应该把正面突击的打法暂时搁一搁，所以他命令西佐夫沿着大路推进，命令什马林奔向库舒姆谷地，抢占克兹尔—乌宾村，出现在萨哈尔纳亚镇的对面，为西佐夫占领这个镇子减少一些困难。

正在这个时候，斯洛米欣斯卡亚附近过来了哥萨克部队，他们闯进了一个村子，正碰上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团的辎重队耽搁在这里。一场残酷的屠杀开始了，只有三个红军战士逃了出来，侥幸死里逃生。他们报告了村子里发生的情况。旅部的人惊慌失措，没有料到哥萨克会从那个方向过来，赶紧调回一个团，奔到那个村子去营救辎重队。但是，没能把全部辎重夺回来，比较好的东西都让哥萨克抢走了，哥萨克边打边退，离开了村子。村子里留下一副惨绝人寰的景象：两名姑娘躺在地上，乳房被割掉了；许多遇难的战士，有的脑壳被砸碎，有的脸孔被剁烂，有的手脚都被砍掉……一个瘦小的战士，满身是血，仰面躺在那里，嘴里塞着他那被割下来的生殖器……真是惨不忍睹，毛骨悚然……

哥萨克制造这种恐怖，除了图报复之外，显然是为了吓唬红军战士，使他们害怕作哥萨克的俘虏，使他们不敢在这儿草原上再呆下去，促使他们开小差逃跑。结果恰恰相反。由于害怕作哥萨克的俘虏，怕受折磨，红军战士不肯活着落在敌人手里，打起来那股顽强劲儿，简直惊人，真正是流尽"最后一滴血"。哥萨克在村子里惨杀我红军战士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连各团。人人咒骂这帮残暴的刽子手，战士们发誓一定要战胜敌人，不然宁愿拼死在战场！

西佐夫一直打到卡尔申斯基，在这儿停下来等候什马林向他靠拢。但是，什马林带了部队在草原上迷了路，接连几天，怎么也没能同他们联络上。他派出几个联络员，但都被巡逻的哥萨克骑兵游动哨抓去了。哥萨克逼着他们供出各种消息，搜去他们随身携带的信件和文件，然后，砍掉了他们的脑袋。哥萨克本想枪毙他们，但舍不得子弹，想吊死他们，又没东西可吊。什马林无论派出多少联络员，遭遇都是一样，他们当时的处境非常糟糕：周围是空空荡荡一片草原，不见一个村镇，难得碰上个把小屯子。粮食吃完了，只好宰牲口；单把肉在火上烤烤就吃。病号增多，什么病都有，黄疸病最伤脑筋。既无医生，又无药品。水也没有。派人到库舒姆河去弄水，但是这段河干了，只好弄一些好象死水塘里发霉的淤泥一样的青褐色泥浆。他们把锅、桶都装得满满的，回去过滤，去掉污泥，剩下来的给大家喝。他们给一个团送去一小桶，一送到就吵嚷开了：究竟谁先喝？

不知怎么偶然发现一口井。哥萨克人的水井，水都不多。

这口井总共才弄出十五桶水。在挂吊桶的辘轳旁边，架起了一挺机关枪，周围还派了不少人把守。这几桶水平均分给各团。成千名战士排着队，站在水桶旁边，等着喝水。他们一个个面色蜡黄，两颊深凹，显得非常憔悴。每个人走拢来，紧盯着冰凉的井水，两眼闪着凶光，仿佛马上要扑过去，双手捧起水桶，把燃烧着的脑袋扎在水里，张大嘴巴，拼命地喝它个痛快，喝呀，喝呀……无论你怎么打他、拉他、赶他，甚至朝他开枪，他也不会放下！如果这儿不派人把守，如果杯子不是一个挨一个地传递，说不定真会发生这种事情。可怜的人儿走上来，接过别人递给他的水杯，看呀，看呀，贪婪地看着杯子底里漂着的浅浅一汪水。

“再给我一点儿吧，同志，”他用乞求、悲哀、沉重的眼光望着分水的人说。

“不行……大家一样……”

“哪怕再添一滴……”

“一滴也不行，”大伙儿对他说。

他又看了看杯子底，慢慢地把杯子举到唇边，舍不得一口喝光，吮吸了好半天，好象杯子里盛的不是水，而是又浓又甜的蜜汁，似乎蜜汁满得漫了边儿，怎么也喝不光似的。

又找到了几口井，可是全都填了半井土。大家动手挖土，但是，挖到底，只见污泥，不见水。有两口井，还挖出了死牛死马，都发臭了，老远就臭气熏鼻。这两口井也挖开了，把死牲口掏了出来，从井底挖出来的污泥，呈巧克力色，臭不可闻，沉淀了污泥，也拿来喝了。

什马林在没有找到西佐夫的部队以前，就这样吃足了苦

头。这时候，西佐夫的部队已经占领了萨哈尔纳亚镇。他们没有呆在镇子里等候什马林的支援，又急忙前进了。

由于什马林未执行命令，恰巴耶夫怒不可遏，大发雷霆，把他送交军事法庭，要求枪毙他！

但是，审判委员会主席西佐夫分析了案情，坚持把什马林降为团长。巴图林支持他这个建议，第二天早晨就撤掉了什马林的旅长职务。

各团都已经作好准备，继续进军：经过卡尔梅科夫到古里耶夫，向里海挺进。但是，一场永远令人难忘的悲剧就在这时发生了。

师指挥部设在勒比辛斯克；恰巴耶夫和巴图林几乎每天都从这儿坐汽车到各旅去巡视。寒秋季节到了。气爽风清的白昼很快消逝，黄昏转眼降临，黄昏一过，便是漆黑、死寂的秋夜……退却的哥萨克部队处境愈来愈无望了：前面是荒无人烟、茫茫草原、饥饿和异乡……如果想要进行抵抗，只有现在这个时候，再退下去，就晚了！于是，哥萨克部队决计作一次垂死挣扎：趁对手连打胜仗，用计麻痹他的警惕性，出其不意地直捣他的心脏。他们决定从萨哈尔纳亚镇穿越奇任沼泽地带，沿着库舒姆谷地，正好绕过春天恰巴耶夫师在斯洛米欣斯卡亚一带攻打他们的那些地方，人不知，鬼不觉地插到红军的后方，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消灭集结在勒比辛斯克的所有兵力。那时候，在这里的人员不少，师属机关也很多，还有刚刚运来的军用物资：枪弹、炮弹、军服。由于肮脏、饥饿、艰苦的行军，整连、整营的人得了伤寒病，师部想用这批衣服给全师

上下换换装。

从乌拉尔斯克到古里耶夫这段困难重重的征途上，死于伤寒病的战士比打仗死的还多。在各村镇的茅屋草舍，团里的辎重车上，甚至路边的沟沟里，都躺满了害了病的红军战士。一批病员没来得及运走，另外一批人又病倒了，没有运输工具，只好把他们丢在空无一人的镇子中的空房子里，或者草地上、沟沟里、大道上……

没有药品，医务队有一半人病倒或病死了。哥萨克的情况略微好一些，他们占便宜的是先进村镇，先把东西抢光、拉走，牲口也都赶走，那些拿不了的东西，烧的烧，毁的毁，或者放上毒药，反正想着方儿，叫你不能再用。红军到的地方，已经破破烂烂，一无所有。最紧张、最缺少的是粮食、水、子弹、炮弹、车辆、马匹……越向前走，越严重。哥萨克知道了这种情况，毫无疑问，他们在策划奇袭的时候，也充分考虑了这种情况。他们想：只要把红军司令部消灭，切断联系，那么沿着乌拉尔河已经深入下游百里路的红军几个团，就变成赤手空拳，看到继续抵抗，已经完全没有希望，那时就会自动投降……他们认为，打不垮的恰巴耶夫师一定会被打垮，一旦这个师垮了，他们就可以从红军手里把乌拉尔草原夺回来……

哥萨克对这次战役抱有很大希望，因此，选派最有经验的将领指挥……乌云压在勒比辛斯克上空，可是城里还不知道，一场可怕的灾难就要临头……

今天，恰巴耶夫的脸色比平时更阴沉：一清早，坐汽车上前线去了，但在那儿没呆多久，中午又回到勒比辛斯克……部队前进的速度慢下来了：伤寒病把无数的战士无情地拖倒了，

辎重队没能把一切必需品及时运到。恰巴耶夫看到而且知道，已经没有人可“抽”了，实在“抽”不出来了——巧妇难做无米炊啊！各旅的部队正在浴血战斗，但是，无论怎样不顾死活，硬打硬拼，也无法扭转这严重的局势。恰巴耶夫愁容满面。他到巴图林那里坐了一会，谈了谈自己的疑虑，又回到自己屋里。一个劲儿地在一间宽敞的哥萨克人的屋子里，走来走去。他希望能想出个办法来，但是想不出来，因为可他心意的办法是没有的。佩季卡从门缝里看着他，一声不响，在等候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给他下什么命令。

切科夫来了，可是佩季卡在过道上就把他拦住了，劝他最好别进去。“朋友，现在你去见他，不是时候呀，”他对切科夫说。切科夫那浓密的大胡子抖动一下，鼻子里哼了一声，二话没说，转身就走了。伊利亚·焦特金也来看了一眼。他有一件甚至是“很重要的事”要向恰巴耶夫报告，但是听说恰巴耶夫现在心情烦恼，也回去了……佩季卡忍痛把参谋长诺奇科夫放进去了。参谋长是来“汇报”的，佩季卡没敢阻拦他。

诺奇科夫是个青年军官，大约二十三岁，也是恰巴耶夫信得过的少数军官中的一个，而且恰巴耶夫还很喜欢他。他在一九一八年就加入了红军，屡次战斗证明，他对共同的事业是忠诚的。他好象还负过伤。所有的指挥员他都认识，而且完全了解。他和他们的关系搞得很好，指挥员们也喜欢他，尊重他，一句话，是“自己人”。恰巴耶夫和他共事以来，从来没有对他嚷过、威胁过，没有让他吃过什么苦头，从这一点来看，足以说明恰巴耶夫是多么重视他，象他这样的幸运儿，几乎没有第二个。

诺奇科夫走进房间，在微微打开着的门口站下来。他腋下夹着一大叠文件。

“进来呀，站在那儿干吗?”恰巴耶夫看了他一眼。

“是，”诺奇科夫走进来，看到恰巴耶夫在桌子旁边坐下，诺奇科夫就俯下身子，站着开始报告。他按着最新几分战报，指着地图，报告了本师据守的防线。恰巴耶夫特别详细地询问了越过乌拉尔地区向布哈拉方面挺进的那一旅人的消息，因为他们已经被切断，几乎断绝了供应，正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苦战。可是，当他听说刚才接到那里发来的电报，最后一批辎重已经运到了，他脸上露出喜色，说话的语气更和蔼、更平静了。

“大概您已经知道了，”诺奇科夫报告说，“离我们这儿不远，大约十五里的地方，昨天哥萨克袭击了我们的辎重车。”

“知道了。”

“我们调查了，也追问过了。我们人有伤亡……哥萨克的骑兵侦察队一直追到离镇子很近的地方，后来不知去向。”

“咱们没有去追吗?”恰巴耶夫问。

“去晚了，没看见他们向哪个方向窜去了。逃回来的辎重兵说，他们也不知道。”

“诺奇科夫，你看怎么样，在这儿附近什么地方，会不会有大股敌军部队?”

“我说不上，遵照您的命令，今天一大早，向各方面派出了骑兵侦察队，还派出两架飞机……”

“还没人回来?”

“飞行员报告说：没看见什么，没发现什么动静。”

“你可知道?”恰巴耶夫问。“今天夜里要把教导队派出去放警戒。”

“是……”

恰巴耶夫又问了几个问题，就让诺奇科夫走了。不一会儿,巴图林来了。他刚刚和回来的侦察员谈过话,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地方有敌人。

在那万分危急的夜晚，究竟是谁把教导队从警戒岗位上撤下来的?直到现在还是个谜,真叫人奇怪。恰巴耶夫没有给任何人下过这样的命令,诺奇科夫也不应该受到任何怀疑,因为那天夜里他在勒比辛斯克战斗中,打得很勇敢,而且吃了很大的苦头。

哥萨克和村镇里的人有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别的不说,一打响,有些人家立刻出现了敌人的伏兵,他们用步枪、机关枪从屋子里向外射击;敌人出奇迅速地找到了仓库和师属各机关,这一切说明事先作了准备,都查看准了。

正当巴图林坐在恰巴耶夫这里时，有个儿子在乌拉尔斯克工作的哥萨克女人,不顾佩季卡的阻拦,闯进恰巴耶夫的房间,一片好意地前来报信,她气喘吁吁地报告说,要出危险了,她看见“田野里有许多骑马的人”。但她的警告却没有起任何作用:恰巴耶夫和巴图林只是微笑了一下,认定这个女人讲的就是袭击辎重车的那股敌人侦察队……这时候，伊利亚·焦特金又来了,佩季卡把这个“傻女人”报告的事讲给他听了。他知道恰巴耶夫在和政委谈话，又不声不响地回头走了……

午夜早已过去，黎明前，朦胧的天色开始微微闪光,但是

镇子里的人还在沉睡着。哥萨克的先遣骑兵侦察队悄悄地摸到了寨门，干掉了哨兵……跟着，一股股哥萨克部队也摸近，靠拢，集结，他们全部集结完毕，就黑压压地向城里冲来。

巡逻兵打响了第一阵报警的枪声……危险发现得太晚了，哥萨克已经布满了的各条街道……枪声乱作一团，盲目打枪，谁也不知道应该向谁打枪，朝哪里打枪……红军战士纷纷跳了起来，只穿了一件内衣，到处乱奔。看得出毫无组织、毫无准备……这边一堆，那边一伙，自己对打起来，那些来得及抓到步枪的人，就各自找多少有利的角落，隐蔽起来，对着街道开枪，打一阵，急忙跑掉，向河边跑去。撤退的共同方向是乌拉尔河岸。哥萨克骑兵在郊外追赶逃跑的红军战士，杀的杀，抓的抓，把抓住的都带走了，红军在郊外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但是，敌人也没能攻进勒比辛斯克中心……在一个地方，有几十个人围着恰巴耶夫，很快成散兵线，卧倒在地上。恰巴耶夫自己也是穿着一件内衣跑出来的，他右手拿着一支步枪，左手握着一把手枪……朦胧夜色已经完全消失，不用费劲儿，什么都可以看清楚了……他们焦急地等了两三分钟……看到一股哥萨克骑兵向他们涌过来。一排枪打过去，又是一排，接着又打一排……拖来一挺机关枪，哒哒哒地扫了起来，蜂拥冲来的哥萨克退回去了。

邻近一条马路是政治部的所在地。巴图林身边也聚集了八十来个人。苏沃罗夫率领的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几乎都在这里，巴图林本人、诺奇科夫、克莱纽科夫也在……巴图林看到哥萨克的进攻，一阵紧似一阵，一阵猛烈一阵，就亲自带了一小队人向哥萨克冲过去。这个出击打得突然，前面两辆车上的

两个哥萨克机枪手跳了下来，跑掉了，两挺机枪落在巴图林手里……机枪调转枪口，立即向敌人射击……这时候，诺奇科夫腿上受了重伤。把他拉到一旁，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把他扔下。他爬到一间土坯子房跟前，钻了进去，躲在一条凳子下面……巴图林这一队人坚持得最久，但是由于同各方面都失去了联系，他直到最后一刻还以为，哥萨克只是一小股。其实主要的兵力都在邻近一条马路上进行决战，是在恰巴耶夫的附近……正由于这样的判断，他把自己的一队人全断送了……联络断了，他一支部队的胜利，根本挽救不了邻近几支部队的败局，因为谁也不知道周围的情况怎么样，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哥萨克发觉，正面进攻不易速胜，一部分人翻身下马，穿过园子，潜到防守部队的后面……

后方枪声一响，哥萨克大队人马立即又从正面连续进攻，巴图林一队人支撑不住，退下来了，四散奔逃。战士们各自乱跑，找个地方躲藏起来。然而，一个也未能幸免……一个个都被哥萨克居民告发了；只有向乌拉尔河逃跑的一些人，渡过了河，活了命……巴图林逃到一间土房里，躲在炉炕下面，但是这家的女主人立刻把他告发了，她向哥萨克报告说"这个人一准就是政治委员"，这个该死的女人大概记起来了，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巴图林给居民们讲过话。疯狂、凶狠的哥萨克一听说"政治委员本人"落到了他们手里，也不想从他口里了解什么，不想审问他、拷打他，他们兽性大发，恨不得马上把他千刀万剐。他们把他拖到外边，每个人都想头一个把闪着寒光的锋利尖刀刺入他的胸膛……他们在他的头上摇晃着步枪，交叉地搭起马刀，两刀相碰，发出锵锵声响。一个个呲牙瞪眼，

面孔狰狞，只等着把他往地上一摔……他刚被扔到地上，马刀、刺刀就一齐对准他的喉咙、肚子、面孔乱砍乱刺……开始了纵情的血腥作乐。但是，这还不能发泄他们的兽性：他们又扯住他的两腿，拎起来晃了几下，然后使劲地往地上一摔，脑壳崩裂，脑浆四溅……又把他的衣服扯破，撕开，用脚乱踢那血肉模糊的尸体，每个人还对准他的脸乱踢……这时，边上站着几个被俘的红军战士；他们惊骇地眼看着自己敬爱的政委帕维尔·斯捷潘纳奇·巴图林被敌人蹂躏成这副样子。多么不幸啊！但过几分钟以后，他们自己也一个不留地死在哥萨克的屠刀下……

可是恰巴耶夫呢，他现在在哪里呢？

他们在战壕里没有能坚持多久，因为哥萨克沿着河岸插到这里了。只好向悬崖那边撤退……这儿有一座悬崖高耸在波涛汹涌的乌拉尔河畔，其实，往上攀登，也是一样，会成为敌人的靶子。但是，无路可走，哥萨克已经在两边架起了机关枪：他们朝河面上扫射，凡是想泅渡过河，逃向布哈拉方面去的，都葬身在河底。恰巴耶夫的一只胳膊被打穿。他抬手擦擦脸，脸颊上、前额上留下了一条条血迹……佩季卡一直跟在他身边。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我给您把头包扎一下吧，”他对恰巴耶夫喊着说。

“不要紧……没事儿……”

“额上直淌血，”佩季卡说话喘着气，想说服他。

“嗯，算了——反正……”

他们一步一步地向悬崖后退。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很少有人能泅过汹涌的乌拉尔河。但他们下决心要救恰巴耶夫。

“扶他下水，”佩季卡喊了一声。

大家明白，这儿的“他”指的是谁。站在他旁边的四个人小心翼翼地扶着他那只血淋淋的胳膊，慢慢地架着他沿着沙岸向河边走去。三个人扶着恰巴耶夫跳下水去，一起向前泅去。其中两个人刚刚沾到水，顿时就被打死了。恰巴耶夫和另外一个人继续向前游去，眼看就要靠近对岸了，就在这当儿，一颗残忍的子弹打在恰巴耶夫的头上。前面泅渡的那个人钻进菖蒲丛里，回头一看，后面的人没有了：恰巴耶夫淹没在乌拉尔河的波涛里……

佩季卡留在岸上，一直坚持到最后，他放下打光子弹的步枪，举起那干式手枪，对着冲上来的哥萨克散兵线打了六发子弹，第七发打进了自己的胸膛。然而，哥萨克还是发疯地作践这位普通的、小小的、但却是可爱而又崇高的战士的尸体。后来，同志们好容易才认出这具被弄死在沙滩里的血迹模糊的尸体……

在佩季卡悲惨牺牲之后，大约又过了两个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命令，授予光荣的战士佩季卡以红旗勋章，表彰他的卓越功绩……崇高的奖赏晚到了两个月，没有来得及让这位英雄佩戴在胸前。

和佩季卡他们一起退到河边的还有切科夫。他没有来得及下水，就被打死在沙滩上了，子弹打穿了他的头颅。

现在，哪儿也没有人抵抗了。哥萨克到处追捕逃跑的红军战士，追上，抓住，当场就砍死……

“犹太佬、政治委员、共产党员——统统走出来！”

他们都走到前面，他们不忍连累红军战士也遭枪杀。即

使这样，也不是每次都能挽救战士们的生命。他们走到自己同志们的队列前面，昂首挺胸，傲然默立，显出一副英勇不屈的气概。他们的嘴唇颤动着，眼睛喷着怒火，痛斥哥萨克暴徒，他们都牺牲在敌人的马刀下、枪弹下……其余的人被带到田野里，用机枪扫射……在镇子的后面有三个砖砌的大坑，里面填满了被枪杀的尸体……

当恰巴耶夫师的几个旅正停留在萨哈尔纳亚镇附近和上游的一些镇子里的时候，传来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司令部、政治部、全师的指挥人员都被消灭了，联络切断了，供给部被抢光了，炮弹、子弹、衣服、鞋袜和粮食都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再有了……落到这般地步，可怕呀！红军战士由于连续不断打仗，已经困顿不堪，由于经常挨饿，体力弱到了极点，整连整连的人受着疾病折磨，死于伤寒……那些被哥萨克切断、包围、失去了领导的红军战士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西佐夫担负起指挥全师的责任，谁也没有委任他，谁也没有批准他，而是他自己主动担当起来的，因为没有时间等待了。

前进呢，没有意义！后退呢，就等于赤手空拳地从勒比辛斯克附近的大批哥萨克军队中间冲过去。然而，后退却还有一线成功的希望，尽管这一线希望非常渺茫，而前进，甚至连这点希望也没有，摆在前面的是不可避免的、迅速的死亡。决定立即后撤，悄悄地迅速撤回驻扎在周围的部队，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他们失去警惕……战士们怀着沉痛、恐惧的心情相互传说着这不幸的消息，在勒比辛斯克发生的事，大家很快都知道了。

“前进还是后退？”大家彼此询问着，不晓得这个孤师的新任指挥员，对于这个迫切需要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前进还是后退？这时候，还没有拿定主意呢！

第一旅从麦尔格涅夫斯克出发了，驻在萨哈尔纳亚镇的第二旅应该随后立即跟上……决定在夜里开拔，要不出一点声响，让敌人想不到红军在撤退。把辎重和炮兵夹在当中，留下骑兵营殿后。大队人马悄没声响地在黑夜里偷偷出发了……镇子里燃起一堆堆篝火，好让哥萨克以为红军战士还安然地在篝火旁烤火……

他们又走进草原，愈走愈深入……口令，低声地传递着，在看不见的散兵线里和纵队里一个挨一个地传下去……车轮轧轧地响着，有个人的脚给轮子碰了一下，他不由自主地哎哟了一声。有个人用拳头捂住嘴巴，闷声地咳嗽几下，接着又肃静下来，没有一点儿声音……他们哪儿是在走，简直是插了翅膀在飞。卡尔申斯克早已甩在后头，麦尔格涅夫斯克已经在眼前……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沉闷的轰隆声，萨哈尔纳亚镇里那支最后撤退的骑兵营，由于没有运输工具，就把剩下的炮弹炸毁了……炸毁以后，立即快马加鞭，追赶早已走远的部队……

几乎两天两夜一直在走，没有休息。有时在地上稍微坐一会，喘口气，马上又前进了；时间紧迫，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第二天夜里，靠近了勒比辛斯克。早在头天晚上，从麦尔格涅夫斯克出发的红军第一旅到达之前，哥萨克已经从这里向上游乌拉尔斯克开去了。他们也兼程赶路，仍然对突然袭击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进攻抱着很大的希望。他们认为被切

断的那两旅红军注定完蛋了，萨哈尔纳亚镇附近的哥萨克部队会收拾他们的！他们自己要赶快地向乌拉尔斯克进军！但是，结果出乎意料，完全出乎意料："注定要完蛋的"人却活下来了，安然无恙。

眼下第二旅正在通过这不祥的、血洗过的勒比辛斯克……这个城镇还是那样阴森、死寂、空荡荡的。那些被哥萨克用刺刀捅死，用马刀劈死，开枪打死的红军战士，依旧横七竖八地躺了满街，没人收尸……第一旅没在这儿耽搁，就往科热哈罗夫去了。第二旅到达后，把尸体收拾起，运走埋好……他们又来到郊外，把被哥萨克用机枪扫死的几百名红军战士集体埋葬在公墓里……战士们脱下军帽，默默地跪在埋葬亲爱的同志们的墓前，没有致悼词，没有奏哀乐，大家万分悲痛，心头充满无限哀思……

在勒比辛斯克没有停息多久，又拔营前进了……这时从萨哈尔纳亚镇追来的哥萨克部队赶上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打响了，哥萨克不肯相信，如此疲惫不堪的部队还有力进行抵抗，便接连几次发起疯狂的进攻，想赶快结束这场错过时机的战斗。然而，注定要死亡的红军部队，却从死神的铁爪里挣脱出来，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杀开了一条血路。他们在这种危急的环境中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恰巴耶夫师的部队是名不虚传的……

他们到达亚奈斯克屯子时，已经夜静更深。大家疲倦到了极点，脚都站不稳了，倒下去便睡，一下子都睡得死死的……甚至连卫兵也支撑不住，都睡着了。红军的营地刹时变成了万籁俱寂的王国。哥萨克正准备进行突然袭击；他们成散兵

线悄悄地摸了上来，几乎摸到跟前了，在距离红军只有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他们不敢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贸然进攻，想等到那羞答答、颤抖抖的黎明露出一丝微光的时候，再动手……他们把大队骑兵布置在两翼，准备追击惊惶逃散的红军战士……一切都安排停当，死亡威胁着红军部队！

哥萨克的头一阵突击是试探性的，想看看红军会不会惊慌失措？是逃跑还是按兵不动？……当仲秋之夜的黑暗开始慢慢变灰的时候，哥萨克部队雷鸣般地呐喊起来：“乌拉!!!乌拉!!!乌拉!!!”敌人的排枪一齐开火……后面什么地方也响起了隆隆炮声……

酣睡中的红军战士霍地跳了起来，抓起步枪……但是乱哄哄的，瞎打一阵，哥萨克射来的头一阵火力，就撂倒了不少红军指挥员。红军陷入混乱状态。谁也拿不准立时应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候命令，但就是没有命令。他们的抵抗是分散的，东打一下，西打一下，根本抵挡不住……愈来愈混乱，愈来愈惊慌，随时都可能出现狂奔乱跑的、毁灭性的悲惨局面……曾经在红亚尔村打过仗的炮兵营营长尼古拉·赫列勃托夫跑到大炮跟前，一看，炮位上没有一个炮手：他们为了躲避敌人的炮火，有的离开炮位，跑到马车那里去了，有的趴在地上……他厉声地把他们吆喝起来，各就各位，打出去一发炮弹，接着打了第二发、第三发……向敌人射出无情的、毁灭性的炮火……这样一来，就压住了阵脚，不再惊慌了。战士们一看到、一听到自己的炮兵开了炮，顿时精神振奋，勇气倍增，出现了新的指挥员去代替牺牲了的指挥员。展开了一场血肉横飞的恶战，象这样的战斗，甚至连恰巴耶夫师里有经验的战斗

指挥员也经历得不多……红军由抵抗转入进攻，当敌人用机关枪拚命扫射的时候，又给压得抬不起头来……

敌人的两辆装甲车，吼叫着朝红军散兵线隆隆地冲来：一辆穿越平川地迎面上来了，另外一辆从旁边的深谷地带迂回过来。对这玩艺儿红军还有点陌生，不知如何对付，只好更加紧贴地皮伏下来，等候着……等一个怪物靠近的时候，尼古拉·赫列勃托夫打出去一发炮弹，正击中车头，它晃了一下，翻倒在地上……红军战士欢呼跳跃，又发起了进攻。打了一阵……接着又卧倒在地，等候敌人再一次反冲……

哥萨克被赶回去几里路。在这次亚奈斯克的战斗中，红军战士牺牲不少，但是哥萨克丢在战场上的尸体更多。他们就这样一排一排地躺在地上，在这里，敌人的整个散兵线被机关枪喷出的无情火舌，全部撂倒……

象亚奈斯克这样残酷的战斗是没有过的。不久，红军的援兵开到……哥萨克被赶着向后撤退，他们经过的大小村镇，正是几天以前红军被他们追得仓里逃跑路过的那些地方。现在红军又进攻了，而且一直打到古里耶夫，逼近里海沿岸……

红军又路过勒比辛斯克，在战友们的墓前肃立致哀，唱了挽歌。他们宣誓：要和敌人斗争到底，誓夺最后胜利，永远铭记在奔腾不息的乌拉尔河畔和[illegible]涛中奋不顾身、英勇献身的烈士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恰巴耶夫
作者＝
页数＝３７２
ＳＳ号＝１１４７３６３８
出版日期＝